

# 東海學報

第三十五卷

文學院

## TUNGHAI JOURNAL

Volume 35 JULY 1994

College of Arts

---

---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東海大學出版

台灣省台中市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第三十五卷

發行人 阮大年

召集人 呂士朋

總編輯 楊承祖

執行編輯 蔡英文

編輯委員 艾嘉蕙

林正成

俞懿嫻

許莉青

陳秋蘭

陳榮波

魏仲佑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第三十五卷

### 目 錄

1. 魏晉南北朝經學史小識 ..... 陳鴻森 1
2. 《詩經·常棣》「鄂不韡韡」釋義 ..... 呂珍玉 21
3. 佐藤春夫與中國文學 ..... 黃美慧 29
4. 清代荒政——救荒政策與備荒措施 ..... 林正成 43
5. 梁啟超的戴震研究——動機、方法、與意義 ..... 丘為君 61
6. 梅農、弗來格與羅素的指謂論 ..... 俞懿嫻 87
7. 墨家的辯學理論 ..... 陳榮波 101
8. The Demise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The Close-down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1980 ..... 古鴻廷 109
9. A Review of L1 and L2 Reading Theories ..... 陳秋蘭 127
10. Ancient Indian Poetics: A Brief Survey ..... Anjan K. Nath 149
11. You Are What You Eat -- An Anatomy of Ben Jonson's  
Food-coated Didacticism in *Volpone* ..... 陳順龍 165
12. 福沢諭吉の平等觀の二面性 ..... 陶長君 183

## 魏晉南北朝經學史小識

陳鴻森\*

### 摘要

本文係作者所撰魏晉南北朝經學史考證札記之一部分。全文所考論者凡十五事：1. 王肅《周易注》2. 謝萬《周易繫辭注》3. 劉瓛《易》義4. 范寧《尚書舜典注》5. 劉楨《毛詩義問》6. 劉兆《公羊》義7. 劉兆《穀梁》義8. 北朝之《公羊》學9. 王肅《孝經注》10. 韋昭《孝經解讀》11. 殷仲文《孝經注》12. 劉瓛《孝經》義13. 陸澄《孝經義》辨14. 劉邵《爾雅注》辨15. 孫炎《爾雅疏》。文中於魏晉南北朝諸家經說佚文，稽考鉤沈，足補馬國翰等輯本之遺闕。其次，群籍有關魏晉南北朝經學之記事，其有謬誤者，則備舉事證，辨正其非。凡所考論，咸有明驗。

去年秋間，余承乏東海大學中研所教席，講授經學史一課，稍理舊業，間作小記。頃以暇晷，擇其有關魏晉南北朝經學者彙錄成篇。不賢者識小，此用備異日之稽考耳，初未敢自附於著述之列也。

一九九三年七月

### 王肅《周易注》

《釋文·序錄》著錄「《周易》王肅注十卷」，《隋書·經籍志》、兩《唐志》同。《魏志》肅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點校本，頁四一九）又《齊王紀》載：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頁一二一）故張惠言《易義別錄》謂：「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其書久佚，（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云：「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然《釋文》、《正義》、李鼎祚《周易集解》、《文選注》、《御覽》諸書，尚多引之。清人張惠言《易義別錄》、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漢學堂經解》並有輯本，雖互有詳略，大體則同也。肅遠紹賈、馬，近傳父業，其《易》說旨要，藉此略可考見。清儒右鄭，於肅所著書，掎擊幾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於體無完膚；惟馬國翰云：「肅注在魏立學，頗著盛名。文字、解說雖與康成殊異，要皆有據。朱子《本義》每稱王肅本，蓋深有所取也。」說較持平。

近年黃慶萱氏纂《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參合諸家所輯，詳為考釋。顧有諸家輯本未具其義，而黃君亦失采輯者。今錄存之，以備考索：

一、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王肅云：「可以居天子位，子萬民。」（隋劉炫《孝經述義》卷四，林秀一氏輯本，頁一七八）

二、〈繫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王肅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日本釋信瑞《淨土三部經音義》卷四，頁七）

三、又「陰陽不測之謂神。」

王肅云：「神者，測陰非陰，測陽非陽，亦一陰一陽之義也。」（同上，卷二，頁十一）

四、又「天數五。」

王肅云：「謂一三五七九也。」（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一，中村璋八氏《校注》本，頁二十）

五、又「地數五。」

王肅云：「謂二四六八十也。」（同上）

六、又「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

王肅云：「五位，金木水火土也。謂水在天為一，在地為六，六一合於北。火在天為七，在地為二，二七合於南。金在天為九，在地為四，四九合於西。木在天為三，在地為八，三八合於東。土在天為五，在地為十，五十合於中。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同上，頁二一）

七、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王肅云：「元氣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別而為鬼神。」（《弘決外典鈔》卷二）

又，黃氏《考佚》於肅注別擇略欠精審，如〈繫辭〉「河出圖」，據《尚書·顧命·疏》引王肅曰：「河圖，八卦也。」（頁二〇一）實則此固王肅《尚書注》語，〈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偽孔傳：「河圖，八卦。」與肅注正同，故孔疏言：「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書疏》卷十八，頁二二）《疏》語上下文意極分明，不容混同也。又「雒出書」，據《釋文》引「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佳。」（頁二〇三）實則此自陸德明語，非肅注也，故張惠言、孫堂、黃奭諸家俱未輯入。另如「橈萬物者莫疾乎風。」《釋文》：「橈，徐乃飽反。王肅乃教反。又呼勞反。」按「又呼勞反」句自是陸德明語，乃黃氏凡王肅音下之又音，悉數輯入，以為「王肅又讀」，豈王肅注《易》無定解乃爾？若此之類，是又讀黃氏書者所當知也。

## 謝萬《周易繫辭注》

《隋書·經籍志》著錄「《周易繫辭》二卷，晉西中郎將謝萬等注。」兩《唐志》著錄，但作謝萬注，無「等」字。萬字萬石，陳郡人，謝安之弟，官至散騎常侍，事蹟詳《晉書》本傳。

謝氏《繫辭注》久佚，馬國翰諸家輯佚書俱未之及，黃慶萱氏《考佚》、簡博賢氏《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並闕之。余考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一，引〈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謝曰：「陰陽相應，奇偶相配，各有合也。」韓曰：「天地之數各有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也。」（《五行大義校注》頁二一）又日本故籍直本所撰《令集解》卷二，引「〈易繫辭〉云：『遊魂爲變。』」謝靈運曰：「精氣之爲物，常遊魂變化，飄兼在天地之間也。」韓康伯曰：「聚極則散，而遊魂爲變也。遊魂言其遊散也。」」（頁三五）然按《宋書》謝靈運本傳，不載其注《易》事，隋、唐志亦無其書。《釋文·序錄》云：「謝萬、韓伯（本注：字康伯）、袁悅之、桓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顧懽、明僧紹、劉瓛。自謝萬以下十人，並注《繫辭》。」亦無謝靈運名，而以謝萬居韓康伯前。疑《五行大義》、《令集解》所引，蓋謝萬注，後人轉寫，或妄改爲謝靈運耳。吳承仕氏《釋文序錄疏證》云：「自元嘉以來，王《易》盛行，獨闕《繫辭》以下不注，故自謝（萬）訖劉（瓛），專注《繫辭》，皆繼輔嗣而作，其同以玄遠爲宗可知也。自韓氏專行，而各家並廢。」（頁四九）其說蓋是，特此二文不見其「以玄遠爲宗」耳。

## 劉瓛《易》義

《隋書·經籍志》載南齊劉瓛《易》學之書，有《周易乾坤義》一卷、《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又言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其《乾坤義》、《繫辭義疏》二書，《宋志》以下已不載，蓋亦亡佚久矣。清代張惠言《易義別錄》、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馬國翰、黃奭四家，就《釋文》、《正義》、李氏《周易集解》、《文選注》、《玄應音義》、李衡《周易義海撮要》諸書所引，共輯得劉氏《乾坤義》、《繫辭義疏》十數條。簡博賢氏《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黃慶萱氏《考佚》，復據《慧琳音義》所引，增得五事。然尚別有可考者。余按原本《玉篇》殘卷六部「參」字下引：

《周易》「參五以變」，劉瓛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變三言參者，謂相參也；變五，言明伍也。」註一

此蓋劉氏《乾坤義》遺文。又卜部「卦」字下引：

註一 按《玉篇》殘卷，此文文字多訛衍。「參五」下原衍「在」字；「謂相參也」上，衍「諸」字；又「倚數」之「倚」，原誤「時」字，今刪正。

《周易》：「包羲始作八卦，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劉瓛曰：「卦之言畫也，謂圖畫之也。」（頁三一七）

又日本釋中算《法華經釋文》卷下引：

《周易》：「精氣爲物。」劉瓛云：「精者，靈也。」（頁一七一）

又《淨土三部經音義》卷二引：

〈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劉瓛曰：「精識無爲曰魂。」（頁十三）

此並劉瓛《繫辭義疏》佚文諸家失采者。又日本古寫本《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釋文》引劉瓛曰：「鼓，動也。」（頁八）按《波羅蜜經釋文》多截取原本《玉篇》所引群籍釋義，此蓋劉瓛《繫辭義疏》「鼓之以雷霆」訓義也。

另《玄應音義》卷一引「《易》云：彌綸天地之道。注云：彌，廣也；綸，經理也。」（頁三）不言何家之注。張惠言《易義別錄》以爲劉瓛注，黃奭從之；孫堂、馬國翰二家輯本未采入。今按原本《玉篇》糸部「綸」字下引：「《周易》『彌綸天地之道。』劉瓛云云。」（頁一五一）其文正同。（又《法華經釋文》卷中亦引劉瓛曰：「彌，廣也。」）是其爲劉瓛《義疏》無疑。又〈繫辭〉「聖人以此洗心」，諸家輯本並據《釋文》，輯錄劉疏作「洗，盡也。」考原本《玉篇》水部「洒」字下，引「《周易》『聖人以此洒心。』劉瓛曰：『洒，盡也。』」（頁三七五）則顧野王所據本作「洒」。黃慶萱氏《考佚》並陸氏「悉殄反」之音亦輯入，以爲劉瓛《疏》語，蓋其疏也。

## 范寧《尚書舜典注》

《釋文·序錄》載范寧《尚書集解》十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僅「《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寧注」，又言：「梁有《尚書》十卷，范寧注，亡。」吳承仕氏《釋文序錄疏證》云：「其遺說無考。今〈舜典〉僞傳中或有范義，然已不可識別矣。」（頁七三）實則范注佚說，群籍間引及之，非絕無可考，吳氏自失檢耳。馬國翰曾就劉昭《後漢志注》、《玄應音義》、《御覽》等書所引，輯得十三事，爲《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今檢諸書所引，尚有馬氏輯本所未及者若干事，今錄次：

一、〈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范寧云：「（岱宗），泰山也。」（原本《玉篇》殘卷山部「岱」字下；又《慧琳音義》卷九十五，頁三）

按：「東巡狩」，今本作「守」字，敦煌本《尚書釋文》殘卷（伯三三一五號）

同，云：「本或作狩。」

二、又「鞭作官刑」。

范寧云：「在官不恭其事之刑也。」（《慧琳音義》卷三十二，頁六）

三、又「惟刑之恤」。

范寧《集解》：「恤，憂也。」（《慧琳音義》卷六，頁十二）

四、又「惟時懋哉」。

范寧云：「懋，勉也。」（《慧琳音義》卷八十四，頁三一）

按：《慧琳音義》引此但稱「范寧云云」，不記其為何書注語。然考《穀梁傳》並無「懋」字，則此當為《尚書集解》義訓，今故系此。敦煌本《釋文》云：「懋，王云：勉也；馬云：美。」明范注用王肅義也。

五、又「帝曰：垂，汝共工。」

范寧云：「主百工匠之官，謂司空也。」（原本《玉篇》殘卷工部「工」字下）

按：敦煌本《釋文》引「馬云：共工，司空官也。」蓋范注所本。

六、〈尚書序〉：「作汨作、九共、藥飫。」

范寧《集解》：「藥，勞也。飫，賜也。勞賜下士，故曰藥飫也。」（原本《玉篇》殘卷食部「飫」字下）

按：范注「勞賜」下，寫本有「也賜」二字，當涉上文而衍，今刪。

另按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引《書》孔安國傳，與今孔傳並同，獨〈舜典〉注則與今注疏本異，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氏以為杜氏所引即范寧注。<sup>註二</sup>

按孔傳古文〈舜典〉注凡三本。敦煌本《尚書釋文》殘卷，其〈舜典篇〉音義尚存，篇題下出「王氏注」字，下云：「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篇〉，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是徐邈作《音》、陸德明據以為《音義》，並後人取肅注以補孔傳之闕者，此一本也。原本《玉篇》引《尚書》皆用孔傳，其〈舜典〉則據王肅注，當亦此本。又《釋文·序錄》云：「范寧變〔孔氏古文〕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蓋范寧改孔氏本隸古定字為今體文字，並為之注。孔本原闕〈舜典〉，故俗間亦有取范寧所注者以補續孔傳，此又一本也。其三則《釋文·序錄》言：「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此姚方興偽造之本，即今注疏本〈舜典〉孔傳也。

今考《玉燭寶典》卷二引：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孔安國曰：「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岱宗，太山。祭山曰柴，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也。」

王肅曰：「守，謂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時往巡行之也。」（頁三四）

姚方興本「孔傳」則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一本無「所」字）宗，燔柴祭天告至。」（《書疏》卷三，頁九）與《玉燭寶典》所引孔傳文異。考《後漢書·祭祀志上》劉昭注引范寧《集

註二 見〈玉燭寶典〉之舜典孔傳，大正八年，《藝文》第十卷第十二號。



解》：「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sup>註三</sup>，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點校本，頁三一六五）與《玉燭寶典》所引孔安國說正同，特二書各節引之耳，杜書節略「二月直卯」二句，按「直卯」謂斗柄昏指正東方，此釋經文「東巡守」也；劉昭注則略「岱宗，太山」句，據上錄《玉篇》、《慧琳音義》所引范寧注亦有此語，則此為劉昭刪略無疑。

又，《玉燭寶典》卷二下文另引〈舜典〉孔安國說：

修五禮（孔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五等諸侯瑞圭璧。）三帛（玄、纁、黃也。三孤所執。）二牲（羔、雁。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雉也，士之所執。）

姚方興本「孔傳」則云：

修五禮（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玉（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牲（二牲，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一死，士執雉。）

二家解「三帛」其說迥異<sup>註四</sup>。今考《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范寧《集解》（頁三一六八），與《玉燭寶典》所引孔傳悉同。據此二例，可以證知：《玉燭寶典》所引〈舜典〉孔傳，實范寧注，即《釋文》所謂「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傳」者，石濟氏之說是也。然則下列諸條，當亦范注無疑。

一、《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安國云：「正月上日者，納舜于大麓，明年之正月朔日也。堯以終事授舜，舜受之于文祖者，五府名，猶周明堂也。未改堯正者，明帝堯尊如故，舜登其位，令試其事也。」（《玉燭寶典》卷一，頁二九）

按敦煌本《釋文》：「王云：『文祖，廟名也。』」馬云：『文者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史記集解》引鄭注則言：「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是范注從鄭也。

二、又「望秩于山川」。

孔安國云：「秩者，如其次秩而祭之也。」（同上，卷二，頁三四）

按《公羊疏》引鄭注云：「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卷三，頁十一）范注義或然也。

三、又「肆覲東后」。

註三 按「燔」字疑衍，敦煌本《釋文》引「馬云：祭山曰柴，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也。」（今本《釋文》「祭山曰柴」四字誤「祭時」。）鄭玄云：「柴者，考績燎也。」（《公羊疏》卷三，頁十二）是范注從馬融義也。

註四 敦煌本《釋文》引「三帛，馬云：三孤所執也。」（亦引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此范注所本也。《玉燭寶典》卷二引王肅注：「附庸與諸侯適子、公之孤，執皮帛，繼子男。或曰：孤執玄，諸侯適子執纁，附庸執黃。」（《書疏》卷三，頁十二引王注，文字略異）此姚氏所本也。《公羊疏》引鄭注，則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卷三，頁十二；又見《史記正義》引），與馬、王說又異。

孔安國云：「以次見東方之君也。」（同上）

按姚方輿本云「遂見東方之國君」，以「遂」訓「肆」，蓋本《史記》。上文「肆類于上帝」，敦煌本《釋文》引王肅注：「肆，次也。」范氏此注疑本王肅。

四、又「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孔安國云：「南岳，衡山也。」（同上，卷五，頁十四）

五、又「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孔安國云：「西岳，花（華）山。」（同上，卷八，頁十一）

按：此釋「南岳」、「西岳」，雖與姚方輿本同，然此固義有定解，不容立異也。

六、又「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

孔安國云：「北岳（森按：下疑脫「恆山」二字）。〈王制〉曰：『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守禮也。」（同上，卷十一，頁十二）

按：今本經文「如初」二字作「如西禮」。敦煌本《釋文》出「至于北岳如初」，云：「馬本同。」又《公羊疏》引鄭注：「五月不言『初』，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是馬、鄭、王、范四本並作「如初」，與姚方輿本異。

又，此注「王制曰」九字，疑杜臺卿正文，寫者淆錯入注耳。

據上所考，知范寧《集解》，蓋參酌馬、鄭、王諸注，「集諸家之善說以爲解」，如其《穀梁集解》、何晏《論語集解》之比也。而其尤足述者，則范氏首將孔本隸古定字改爲今字，其事固遠在天寶衛包改字之前矣。

## 劉楨《毛詩義問》

《隋書·經籍志》著錄「《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兩《唐志》同。楨字公幹，東平人，爲建安七子之一，《魏志》附見王粲傳。

劉楨《義問》久佚，馬國翰從《水經注》、《毛詩正義》、《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得十二事，爲《毛詩義問》一卷。今檢《類聚》卷六十三引「《詩義問》：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頁一一二八）馬氏誤作卷三十三（又《御覽》卷一八二亦引此文，馬氏失記）。又〈鄘風·蝦蟆〉，馬氏據《北堂書鈔》卷一五一引「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有赤色在上者，陰乘陽氣也。」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三引之，則作「虹見，有青、赤之色<sup>註五</sup>。青在上者，陰乘陽，故君子知以爲戒。」（頁一）蓋各節引之，非其全文也。《書鈔》云「赤色在上」，《玉燭寶典》言「青在上」，未知孰是。又《御覽》卷八三二引〈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弋鳬與雁。」《詩義問》云：「弋，以繳繫矢而射。」（頁五）此條馬氏輯本失采，今補。

註五 按「有青」二字，寫本誤倒，今乙正。

## 劉兆《公羊》義

《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是書史志著錄，題名不一。《晉書》本傳稱「解詁」，《通志·藝文略》稱「集傳」，兩唐志則並《左傳》為《三家集解》；《慧琳音義》引之，多稱「劉兆注公羊傳」、「劉兆注穀梁傳」。此書久佚。其《公羊》義，馬國翰曾自《釋文》、《文選注》、《玄應音義》等書輯得五事，簡博賢氏《遺籍考》同。今別錄得十數事。惟《慧琳音義》稱引其說，多不錄傳文，僅截取訓義「某，某也」。單詞片義，究屬何文注語，每苦費斟酌。今凡原書徵引有《公羊傳》本文者，悉於傳文下各明記之；其傳文下無文者，則余竊以意定之。

春秋編年。（原本《玉篇》糸部「編」字下）

編，比連也。（同上；又《慧琳音義》卷十一，頁四；又卷十五，頁六；又卷二十四，頁二七；又卷六十，頁二）

編韋者，比連其竹簡也。（《慧琳音義》卷九十一，頁二）

按《慧琳音義》卷四十七引作「編，連也。」又卷七十七引：「編者，比連也。」又卷八十引作：「編，即比連也。」皆引者增減其文耳。

〔莊公元年〕

譜公于齊侯。（原本《玉篇》言部「譜」字下）

言旁入曰譜。（同上；又《慧琳音義》卷五十七，頁三八）

按：馬國翰輯本，據《文選》韋孟〈諷諫詩〉李善注引劉兆曰「旁言曰譜」，蓋選注轉寫奪「入」字而又誤倒其文與。又馬氏系此注於莊公四年「紀侯譜之」下，未核，今從《玉篇》改次於此。

〔莊公十年〕

恂者曰侵。

侵，害也。（《慧琳音義》卷四，頁四；又《法華經釋文》卷下，頁一七〇）

〔莊公十七年〕

齊人濊于遂。

濊，沾濡之言（謂）也。（《慧琳音義》卷七十五，頁四一）

按《公羊疏》云：「即《曲禮》下篇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鄭注云：『異於人也。……漬，謂相濊汗而死。』是也。」劉兆蓋同此義。

〔莊公三十一年〕

臨民之所漱浼也。

濯生練曰漱，去舊垢曰浼。（《慧琳音義》卷十五，頁二一；又卷四十七，頁五一；又卷七十七，頁五；又卷八十二，頁十八）

按《慧琳音義》卷五十四、七十七但引下句；又卷六十三引下句，「澣」字作「澣」；卷七十四、九十二引下句，並脫「舊」字。據《慧琳音義》卷十五云：「澣，俗字也，正作澣。」（頁二一）是澣、澣二字同也。

〔僖公十年〕

君嘗訊臣矣。

誠問曰訊。（《慧琳音義》卷二十，頁五）

按《慧琳音義》引此但稱「劉兆云云」，不言其為何書之注。今釋其義，蓋《公羊》此文義訓也，今故繫諸此。

桓公之享國也長。

享，食也。（《慧琳音義》卷三十一，頁四七）

〔僖公二十八年〕

放乎殺母弟。（原本《玉篇》放部「放」字下）

放，猶比也。（同上；又《慧琳音義》卷八十，頁五二）

〔宣公六年〕

放乎堂下而立。

放，至也。（原本《玉篇》「放」字下）

按《玉篇》寫本引傳文作「放口不立」，《公羊傳》無其文，蓋此文傳寫訛脫耳。

〔宣公十五年〕

析骸而炊之。

骸，骨也。（《慧琳音義》卷六十二，頁二二；又卷八十九，頁二八）

此何以書？幸之也。

幸，遇也。（《慧琳音義》卷二十二，頁六）

〔襄公二十七年〕

夫負羈繫。

繫，絆也。（《慧琳音義》卷六十一，頁十九）

〔昭公五年〕

不以私邑糝公邑。（原本《玉篇》糝部「糝」字下）

糝，次積也。（同上；又《慧琳音義》卷三，頁三十）

按：今《公羊傳》字作「累」，同。

直泉者何？涌泉也。

涌，騰也。（《慧琳音義》卷十九，頁十；又卷二十，頁十九；又卷三十一，頁二四；又卷三十二，頁二四；又卷四十四，頁二十）

## 劉兆《穀梁》義

劉兆《穀梁》義，馬國翰由《釋文》、《文選注》等書輯得五事，簡博賢氏《遺籍考》同。今別輯得二十餘事，仍依前例錄存之，以備治斯學者之研討焉。

〔隱公元年〕

蹈道則未也。

蹈，履也。（《慧琳音義》卷四，頁十；又卷三十三，頁十八）

按《慧琳音義》卷十二、十三兩引「劉兆注《公羊》：蹈，履行也。」然《公羊》無「蹈」字，蓋《穀梁》此文義訓，引者誤憶耳。

襄內諸侯。（《慧琳音義》卷四，頁二二）

襄，圻也。（同上）王者千里內封域也。（《慧琳音義》卷八十八，頁二八）

〔隱公三年〕

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鑿地出土曰壤。（《慧琳音義》卷六十九，頁三六）

按楊士勳《穀梁疏》引麋信注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卷一，頁十三）是劉、麋義同也。

〔隱公五年〕

始厲樂矣。（原本《玉篇》尸部「厲」字下）

厲，咸略。（同上）

按：「咸」字疑當作「減」，寫本轉寫失之。

〔桓公十四年〕

以指隱桓。

指，亦斥也。（《慧琳音義》卷三十四，頁八）

〔莊公三年〕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原本《玉篇》糸部「緬」字下）

緬，謂輕而薄也。（同上）

按《慧琳音義》卷八十八引「劉兆注《公羊》：（緬），輕而薄也。」（頁十九）考《公羊傳》無「緬」字，當爲此文訓義，引者誤《公羊》耳。

〔莊公十七年〕

蜮，射人者也。

（蜮），狀如蟹，含沙射人，著人皮膚爲害。（《慧琳音義》卷八十二，頁二）

按《慧琳音義》引此，但稱「劉兆云云」，不言其爲何書注語，今審文義，疑此傳訓義，今故系此。

〔莊公二十四年〕

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斥，指也。（《慧琳音義》卷六十二，頁四）

按《慧琳音義》卷十五引「劉兆注《公羊傳》云：斥，指言也。」考《公羊傳》無「斥」字，蓋此注誤書作《公羊》耳。

〔僖公元年〕

惡公子之紿。（原本《玉篇》糸部「紿」字下）

紿，相負欺也。（同上）

按《慧琳音義》卷九十九，引作「紿，謂相欺負也。」卷九十五引同，惟無「謂」字。

〔僖公二十八年〕

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原本《玉篇》阜部「陽」字下）

以見日爲陽也。（同上）

按：今《穀梁傳》此文作「水北爲陽，山南爲陽」。

〔文公二年〕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檐，屋椳也。（《慧琳音義》卷三十一，頁四六）

按《慧琳音義》卷八十八，引「劉兆注《穀梁》云：椳，屋椳也。」下云：「《文字集略》作簷。」檐、簷字同，蓋亦此注，引者易其文耳。

〔文公九年〕

箕鄭，累也。（原本《玉篇》糸部「累」字下）

累，連及也。（同上；又《慧琳音義》卷三十三，頁三七）

按：「箕鄭」，今傳作「鄭父」。

又，《慧琳音義》卷十引「劉兆注《公羊傳》：（累），連及也。」疑即此注，引者誤《公羊》耳。

〔文公十四年〕

綿地千里。（原本《玉篇》糸部「綿」字下）

綿，猶經歷也。（同上）

躋入千乘之國。（《慧琳音義》卷八十四，頁二十）

躋，深遠也。（《慧琳音義》卷八十八，頁二八；又卷九十五，頁十九）

按此注《慧琳音義》數引之，文多參差。卷八十八別引作「躋，亦遠也。」（頁九）卷九十二引，作「躋，深也。」蓋文有刪省。卷九十四、九十七引此，則稱「劉兆注《公羊傳》，考《公羊》無「躋」字，當爲此傳之誤無疑（卷九十七引，「遠」下有「貌」字）；又卷八十四引，誤「劉兆注《漢書》」。並附正於此。

〔襄公十九年〕

取邾田自漚水。軋辭也。（原本《玉篇》車部「軋」字下）

軋，委曲隨漚水，爲侵邾田多也。（同上）

〔襄公二十三年〕

及慶寅。慶寅之累也。（原本《玉篇》糸部「纍」字下）

累，黨屬也。（同上）

〔襄公二十四年〕

一穀不升謂之歉。（原本《玉篇》欠部「歉」字下）

歉，不足也（同上），謂食不飽也。（《慧琳音義》卷九十九，頁十五）

按：今本《穀梁傳》「歉」字作「嗛」；馬國翰輯本據《文選》〈辨亡論〉注引作「慊」，訓「不足也」，與《玉篇》同。

四穀不升謂之康。（原本《玉篇》欠部「康」字下）

康，虛也。（同上）

按：今《穀梁傳》「康」字作「康」，音假字。

〔昭公八年〕

流旁客握，擊者不得入。（原本《玉篇》車部「擊」字下）

流旁客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客握。握，四寸也。擊，絰也。絰中門橫，則不得入矣。（同上）

按：馬氏輯本據《釋文》引，僅錄「擊，絰也」句，今補。

又，今本《穀梁傳》無「客」字，「擊」上有「御」字。「客」字於義難通，蓋「容」字傳寫之誤。

〔昭公二十年〕

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繫。（原本《玉篇》糸部「綦」字下）

天性然者也。綦，連紆也。蹶，聚合不解放也。繫，如見絆也。（同上）

按：「衛謂之繫」，今傳「繫」字作「輒」，與劉兆本異。又，馬氏輯本據《釋文》引此注，無首「天性然者也」句，今補。又「解」下無「放」字；「絆」下有「繫」字。今按：「繫」字疑衍，原本《玉篇》「繫」字下亦引「《穀梁傳》：『兩足不〔能〕相過，衛謂之繫。』劉兆曰：『天性然者也。繫，如見絆也。』」是其證。

〔哀公元年〕

上甲始庀牲。（原本《玉篇》广部「庀」字下）

庀，簡核也。（同上）

又，《法華經釋文》卷下引劉兆曰：「伺，奄也。」（頁一七〇）未知於公、穀何屬。記此俟再考。

## 北朝之《公羊》學

《北史·儒林傳》載：「漢世鄭玄並為眾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

、《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皮錫瑞《經學歷史》非之云：「據《北史》，河、洛主服氏《左傳》外，不聞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則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實錄。」（頁一七三）按《北史·儒林傳》「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諸語，實本魏收《魏書·儒林傳》，魏收北齊人，去北魏時世甚近，其說非必無據。《魏書·高允傳》言允「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公羊春秋》。」著有《公羊釋》。又〈劉芳傳〉載芳所著，有《何休注公羊音》，並可為旁證。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儒林傳序〉，始言「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北史·儒林傳》沿之耳。蓋北齊時儒學最為凋弊，史載當時「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其州郡雖立學，「學生俱差逼充員，……墳籍固不關懷。」（《北齊書》、《北史》〈儒林傳〉）然則北齊時二傳式微，固不足為異，然未可即此以概北朝也。至皮氏謂「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梁祚一人。」此亦有說焉。按《魏書·儒林·梁祚傳》言祚「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既以《公羊》教授，當必有從習者。一也。又〈劉蘭傳〉載蘭治《左傳》，「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則當時固有明習三傳之學而不尚墨守者，故劉蘭排毀《公羊》反為世所譏。二也。更考北朝諸史，梁祚而外，《魏書·辛紹先傳》載辛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又〈儒林傳〉載劉獻之著有《三傳略例》；孫惠蔚「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逸士傳〉載李謐「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北齊書·儒林傳》載李鉉撰《三傳異同》；張雕「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孫靈暉「《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周書·儒林傳》載熊安生「從陳達受《三傳》」；《北史·儒林傳》載：張奉禮「善《三傳》」；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劉炫能講何氏《公羊》。又《隋書·郎茂傳》「就國子助教張率禮受《三傳》群言。」據是，則北方明習《公羊》者，實繁有徒，特當時學風不尚墨守，故學者或三傳兼習，鮮以《公羊》專門名家耳。

## 王肅《孝經注》

馬國翰輯王肅《孝經注》，云：「子雍好攻鄭注，此解不見有駁難之語，蓋唐明皇作注時悉汰去之。」馬氏以今肅注不見有駁難鄭注之語，為經玄宗芟去耳。簡博賢氏《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用其說（頁一八三）。然余考隋劉炫《孝經述議》別引肅注十餘事註六，亦絕不見有攻鄭之語：

註六 劉炫《孝經述議》五卷，中土久亡。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兼任國寶調查委員，於調查舟橋清賢氏家藏故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本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氏復就日



〈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述議》云：「王肅以法言爲詩書禮樂，法行爲孝友忠信。」（頁二四一）

〈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王肅云：「母亦有敬，君亦有愛，不如父之篤耳。」（頁二四六）

〈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王肅云：「天地爲父母，萬物爲之子。五行更相生，終始相奉成，孝子之道也。」

（頁二五六）

又「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王肅云：「象天常明之道，地有生長養人之利，萬民所以尊敬奉養其親者也。」（頁二五九）

〈孝治章〉「禍亂不作。」

王肅云：「喪亡曰禍，不治曰亂。」（頁二七〇）

〈聖治章〉「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王肅云：「父子相對，又有君臣之義。」（頁一二八）

又「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王肅云：「以君之尊臨正己，以親之愛臨加己。」（頁一二九）

又「言思可道，行思可樂。」

王肅云：「思使其言可名道，思使其行可愛樂也。」（頁一三七）

〈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王肅云：「三千之刑，不孝之罪最甚大。」（頁一五六）

〈感應章〉「長幼順，故上下治。」

王肅云：「天子至尊，然猶先兄後己，順於長幼之宜。」（頁二七四）

〈喪親章〉「爲之棺槨。」

王肅云：「舉尸於棺而殯之，舉棺於槨而葬之。」（頁二九七）

凡此，俱不見其有攻詰鄭玄之語，如馬氏所說，則此豈亦劉炫爲《述議》時所「悉汰去之」？然考《唐會要》卷七十七載開元七年四月七日劉知幾上議，辨《孝經鄭注》非康成書，舉十二驗爲說。其十一事言：「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繁多，而肅無言」云云（頁一四〇六；又見《文苑英華》卷七六六；《經義考》卷二二二）。觀此，知王肅注《孝經》，本無非鄭之語，事在不疑。馬氏失考，遂爲此臆說耳。

## 韋昭《孝經解讀》

《隋書·經籍志》著錄吳韋昭《孝經解讀》一卷，兩《唐志》則稱《孝經注》。劉

本舊籍所過錄《述議》遺文，蒐輯整比，爲《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一書。劉炫《述議》舊貌，居然可見。以下所引《述義》之文，並據林氏之書。

炫《孝經述議》評議諸家舊注，云：「自許洛訖于魏齊，各聘胸臆，競操刀斧。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頁六四）知其書於諸家注中最高為世所推重。唐玄宗〈孝經序〉亦言：「近觀《孝經》舊注，踏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中略）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故玄宗注間依用其說。首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玄宗注：「言教從孝而生。」又〈事君章〉「進思盡忠」，注：「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邢《疏》並言：「此依韋注也。」邢氏另引其說六事，馬國翰輯為《孝經解讀》一卷。

今按〈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劉炫《述議》卷三引「韋昭云：天立性命，以卑承尊，故曰『天之經』也；地以柔順配天而日（一本無「日」字）行，故曰『地之義』也。」（頁二五六）又「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述議》引「韋昭云：天垂象，聖人則之。地所生育，教民稼穡以養之。」（頁二五九）又〈孝治章〉「禍亂不作」，《述議》卷三引「韋昭云：無篡弑之患。」（頁二七〇）又〈諫爭章〉「士有爭友」，《述議》卷五引「韋昭云：士卑，故不稱臣。」（頁二八六）此四事邢《疏》未載，今錄之以備一義。

## 殷仲文《孝經注》

《隋書·經籍志》載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孝經注》一卷，邢《疏》引其三事，馬國翰輯為《孝經殷氏注》一卷。按〈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劉炫《述議》卷三引殷仲文曰：

夫以親為本，則在我愈末。本重末輕，則親忘己，此孝之大要也。天者，日月之本。日月雖靈，每以沖冥處末，由其自虧，故能常奉其本，冥符孝理，天之常也。地者，山川之本也。山川能資此群生，使各得其宜，原為功之母，必歸美於地，由其自損，故在本常重，義協顯親，是謂地之宜也。（頁二五六）

此注邢《疏》未引，錄之備參。

又，邢氏所引三事，《述議》俱有其文，二者文字略有異同。〈開宗明義章〉：「仲尼居，曾子侍。」邢《疏》引殷仲文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述議》卷二引，下句作「故稱字以說」（頁二一三）；又「先王有至德要道」，邢《疏》引殷氏云：「窮理之至，以一管眾為要。」文有脫闕，《述議》引上句作「窮理之極為至」（頁二一六），當據補「極為」二字。又〈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邢《疏》云：「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未詳其說。《述議》卷四云：「江左名臣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徒，皆云：『五刑之罪，可得而名；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頁一五七）可補邢《疏》引述之闕略也。

## 劉瓛《孝經》義

南齊劉瓛《孝經》義說，《釋文》、隋、唐志俱不載，《經義考》亦闕。惟邢《疏》引其五事，馬國翰輯爲《孝經劉氏說》一卷。

今考敦煌文書伯三二七四號佚名《孝經鄭注疏》殘卷，引「劉先生」說四事，蓋劉瓛《孝經》義也。〈士章〉「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引「劉先生以爲『資用』之資，王肅以爲『資取』之資。」又〈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始終。」引劉先生云：「禮不下庶人。今行孝罔極，雖貴爲天子，賤爲庶人，其奉於父母恐後。不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又〈五刑章〉引「劉先生云：斷右足謂之刖。」〈感應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引「劉先生云：眇然不測謂之神。」按《南齊書》劉瓛本傳，言瓛「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點校本，頁六七九）據此，知劉瓛固名重當時，此《鄭注疏》不之名而敬稱「劉先生」與。考〈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始終，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邢《疏》：「劉瓛曰：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己者，未之有也。」此引劉瓛說，亦有「禮不下庶人」之語，與《鄭注疏》引劉先生語正合。特彼文專解「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始終」；邢氏引者，則截取其說，以解下文「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故二文若有異耳。然則敦煌本《鄭注疏》所引，其爲劉瓛說，殆無疑義。

劉炫《孝經述議》卷二疏解「仲尼居，曾子侍」之文，云：「近世有沛國劉瓛，得重名於江左，掇摭諸說，自立異端云：『夫名以名質，字以表德。夫子既有盡孝之德，今方制法萬代，宜用此表德之字，故記字以冠首。而曾子有道之賢，能受命聖葉，實爲可義（森按：「義」字疑當作「嘉」），故記者書其姓字，明有道宜敬也。』」據炫說云云，似劉瓛之書亦兼載他家注說而評議之。惟劉炫於瓛此說，頗不以爲然，因駁之云：「仲尼之聖，誰惑不知，方待表德之字以彰孝性之盡乎？制法萬代，自出孔子之心；記以冠首，更由錄者之意。乃使撰錄之人，裁量孔子，事非聖人之心，文成記者筆，以此作法，何足可師？若曾之稱姓，出於記者，與夫《論語》何以異？閔子等四人侍側，子路、子貢稱其字，閔子、冉子稱其姓，豈復特爲有道偏被敬乎？此等不知《孝經》是仲尼自制，故致斯謬耳。」（頁二一三）然劉炫以《孝經》爲仲尼自制，其說亦未爲得也。今味《孝經》之文，其言「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云云，稱「子曰」者十有五，此豈仲尼自制之體？且其文與春秋時之古質亦不類。是炫說亦未可據爲典要。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譏劉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斯亦其例與。

## 陸澄《孝經義》辨

《經義考》卷二二三著錄陸澄《孝經義》，朱彝尊云：「按陸澄《孝經義》，隋、唐志、《經典·序錄》皆不載。然在開元所采六家之例（森按：疑當作「列」），故特著之。」（頁三）按唐玄宗〈孝經序〉評議歷代舊注，言「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邢《疏》云：「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孝經序疏〉頁六）又《崇文總目》玄宗注條下亦云：「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攷孔、鄭舊義。」（頁二十）此朱氏所本也。

今按：玄宗《孝經注》多折衷諸儒，參酌舊義，其注本乎前儒者，邢《疏》皆明著之「此依某注也」。通計全書，其所用前儒舊義凡鄭康成二十九事，孔安國、魏克己並十六事，王肅十三事，韋昭二事，絕不見有參用陸澄之說者；且史傳、《釋文·序錄》、《隋志》俱不言陸澄注解《孝經》。今詳釋玄宗序文，其言「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者，蓋《孝經孔傳》久失其傳，劉炫從王劭得其書，因撰《述議》以申明孔義，諸儒則以《孔傳》為劉炫依託，非安國舊本。（《隋書》頁九三五）而世所行《孝經鄭注》，陸澄亦譏其與康成他注不類，疑非鄭玄之書。按《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本傳，載澄〈與王儉書〉，有云：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

時陸澄領國子博士，王儉為尚書令。澄與之書，論《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不當立學。王儉答云：「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中略）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點校本，頁六八五）唐開元七年四月，劉知幾上議，亦以鄭注為偽：「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劉氏並立十二驗，斥其非康成注（《經義考》卷二二二，頁五）。此其事也。故玄宗序下文言「在理或當，何必求人」，謂孔傳、鄭注之說每當於理，其義可采，不必責求其書果出安國、康成否。然則玄宗所參用前儒舊義，乃孔傳、鄭注二家，而非劉炫、陸澄也，理固甚明。邢昺失考，誤以陸澄為開元所采六家之一，蓋其疏也。而《經義考》著錄陸澄《孝經義》者，則沿邢氏之誤耳。要之，陸澄本不注《孝經》，可無疑義。

又按：玄宗序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下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一似虞翻、劉邵亦在所

采六家之列。實則玄宗注並未引及虞、劉二家；而所用魏克己說凡十六事，僅次於鄭注，乃〈序〉中反不之及，殊不可解。附記於此，以待明教。

## 劉邵《爾雅注》辨

《初學記》卷三〈歲時部〉引：

《爾雅》曰：「蟋蟀，蜚。」劉邵注云：「謂蜉蝣也。」孫炎云：「梁國謂之蜚。」郭璞云：「今促織也。」（頁四九）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因據補「劉邵《爾雅注》」一種，云：「按《魏志》〔劉劭〕本傳，稱劭所撰述凡百餘篇，不言有《爾雅注》；《釋文》及隋、唐志亦俱不載。而《初學記》此條，首引《爾雅》本文，次引劉邵注，又引孫炎注、郭璞注，甚是分明，無可疑者。」（頁二三）侯康《補三國藝文志》亦有「劉劭《爾雅注》」一書（頁七）。

今按：劉劭《爾雅注》，《魏志》本傳、史志俱不見載，且群書所引，亦止《初學記》一見耳，則劉劭是否果注《爾雅》，誠不能無疑焉。余考《玉燭寶典》卷六亦引《爾雅》此文，次「劉歆注云：謂蜉蝣也。孫炎云云，郭璞云云。」（頁一）與《初學記》所引者正同註七。按《釋文·序錄》著錄「《爾雅》劉歆注三卷」，《隋書·經籍志》亦言「梁有漢劉歆、韋為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蓋劉歆《爾雅注》唐時已不傳，唐、宋人書間引及之者，實自沈旋《爾雅集注》轉引之耳（別有考），黃奭、馬國翰並有輯本。然則《初學記》之「劉邵注」，實「劉歆注」之誤耳。近中央圖書館編《中國歷代藝文總志》〔經部〕，其〈爾雅類〉亦列有劉邵《爾雅注》（頁三一八），蓋展轉承訛，迄今未已。

## 孫炎《爾雅疏》

治《爾雅》之孫炎有二。據邢昺〈爾雅疏序〉云：「其為注者，則有韋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此為《爾雅注》之孫炎，字叔然，三國時魏人。邢〈序〉又言：「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為此義疏者，則別一孫炎也。朱彝尊《經義考》未加析別，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十，頁三）、謝啟昆《小學考》（卷三，頁四）始引丁杰之說辨之，別為二人。惟據吳騫〈孫氏爾雅正義拾遺序〉，則此說戴東原實首發之。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八亦有說。宋陸佃《埤雅》嘗引孫氏《正義》六事，吳騫輯錄之，為《孫氏爾雅正義拾遺》一卷。實則孫炎《正義》佚文，除《埤雅》所引六事外，尚別有可考者：

〈釋草〉「蒿，山蒜。」宋釋贊寧《物類相感志》卷十一引：

註七 按《初學記》「蜉蝣」二字誤倒。《詩·唐風》「蟋蟀在堂」，《慧琳音義》卷六十三引《韓詩》云：「蟋蟀，蜉蝣也。」是也。

孫炎曰：帝登葛山，遭藹茅草毒，將死。得蒜，乃齧之，解毒（森按：二字疑倒）。乃收栽植，能殺豚（一作「蟲」）魚之毒，攝諸腥羶。（又見宋人羅願《爾雅翼》卷八）

又「楸，木堇。」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五引：

孫炎《疏》：花如蜀葵，紫色，朝生夕隕也。此花夏五月方榮盛也。

又「中馗，菌。」《物類相感志》卷十一引：

孫炎曰：聞雷即生，俗呼地菌。白如脂，可食。亦名地蕈、比丁、馗廚。江東人今呼土菌可食者。

又〈釋木〉「楓，櫟櫟。」《物類相感志》卷十三引：

孫炎曰：櫟櫟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森按：《御覽》卷十一引作「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即雨。

又〈釋獸〉：「獬豸類狸。」《物類相感志》卷十引：

孫炎曰：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遇有道君隱藏，無道君出食之矣。

凡此，並宋、遼時書所引。《物類相感志》所引四事，雖不言其為注為疏，然按其說，與孫（叔然）注之簡質者截然異趣，其為孫炎《疏》殆無可疑。其中「楓，櫟櫟」一條，亦見於《御覽》卷十一，稱「《爾雅孫炎注》云云」（頁七）。邵晉涵《爾雅正義》（《經解》卷五一八，頁九）、臧庸《爾雅漢注》（卷下，頁十一）、嚴可均《爾雅一切註音》（卷九，頁六）、郝懿行《爾雅義疏》（卷下之二，頁十三），及馬國翰、黃奭二家輯本並采之，以為魏孫炎注。然按其說「天旱以泥泥之即雨」，說頗不經，蓋即邢〈序〉所斥「淺近俗儒，不經師匠」者。宋人修《御覽》時，已淆混之矣。

近中央圖書館纂《中國歷代藝文總志》，其〈爾雅類〉，乃將吳騫所輯《孫氏爾雅正義拾遺》，與馬國翰、黃奭所輯魏孫炎注混而為一，殊誤。

## 引用書要目 (依引用先後為序)

- |                |          |                |
|----------------|----------|----------------|
| 《易義別錄》         | 清張惠言輯    | 《經解》本          |
|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     | 清孫堂輯     | 嘉慶四年孫氏映雪草堂刊本   |
| 《玉函山房輯佚書》      | 清馬國翰輯    | 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刊本    |
| 《漢學堂經解》        | 清黃奭輯     | 藝文印書館景印本       |
| 《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   | 黃慶萱氏著    | 一九七五年幼獅文化公司排印本 |
| 《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 | 日本林孝一氏輯  | 一九五三年作者自印本     |
| 《淨土三部經音義》      | 日本釋信瑞著   | 聚珍版排印本         |
| 《五行大義校注》       | 日本中村璋八校注 | 一九八四年汲古書院排印本   |
| 《弘決外典鈔》        | 日本具平親王撰  | 日本寶永六年京都書林刊本   |
| 《尚書注疏》         | 唐孔穎達疏    | 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本     |

- 《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 簡博賢氏著 一九八六年三民書局排印本
- 《令集解》 日本直本集解 大正十三年東京國書刊行會排印本
-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 吳承仕氏著 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排印本
- 《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 簡博賢氏著 一九七五年黎明文化公司排印本
- 原本《玉篇》殘卷 梁顧野王著 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 《法華經釋文》 日本釋中算撰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釋文》 撰人無考 昭和四十七年優鉢羅室叢書影印日本古寫本
- 《一切經音義》 唐釋玄應著 同治八年寶晉齋重刻莊炘校刊本（文中引用，簡稱「玄應音義」）
- 《一切經音義》 唐釋慧琳著 大通書局景印高麗藏本（文中引用，簡稱「慧琳音義」）
- 《玉燭寶典》 隋杜臺卿著 景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古寫本
- 《公羊注疏》 何休注 舊題徐彥疏 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本
-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等纂 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校點本
-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纂 大化書局影印宋刊本
- 《唐會要》 宋王溥撰 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排印本
- 《文苑英華》 宋李昉等編 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 《經義考》 清朱彝尊著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 《孝經注疏》 唐玄宗注 宋邢昺疏 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本
- 《崇文總目》 宋王堯臣等編 清錢東垣輯 台灣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 《初學記》 唐徐堅等著 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 《三國藝文志》 清姚振宗著 開明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 《補三國藝文志》 清侯康著 同上
- 《中國歷代藝文總志》〔經部〕 中央圖書館編 一九八四年中央圖書館排印本
- 《經義考補正》 清翁方綱著 廣文書局影印本
- 《小學考》 清謝啟昆著 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 《孫氏爾雅正義拾遺》 清吳騫輯 《拜經樓叢書》本
- 《讀書叢錄》 清洪頤煊著 廣文書局影印本
- 《物類相感志》 宋釋贊寧著 清陳鱣鈔足本（中央圖書館藏）
- 《續一切經音義》 遼釋希麟著 大通書局影印本
- 《爾雅正義》 清邵晉涵著 《經解》本
- 《爾雅漢注》 清臧庸輯 嘉慶七年問經堂刊本
- 《爾雅一切註音》 清嚴可均輯 《木犀軒叢書》本
- 《爾雅義疏》 清郝懿行著 藝文印書館影印郝氏家刻本

## 《詩經·常棣》「鄂不韡韡」釋義

呂珍玉\*

### 摘要

由於毛傳對「鄂不韡韡」詩句中「不」字未加解釋，因而造成其後各家或作實詞，或作虛詞，絕然不同之訓解，本文先擇要歸納具有代表性各家訓解如下：

一、用爲實詞：又分以下四種不同訓釋

1. 鄂足、草木下房、花蒂（鄭玄、孔穎達、陳第、方玉潤、屈萬里）
2. 豈不（朱熹）
3. 胡不、遐不（于省吾、聞一多）
4. 盛大（高本漢）

二、用爲虛詞（陳奐、馬瑞辰、王引之）

爲討論之方便，先分析「不」無用爲虛詞之必然性，再分析「不」用爲實詞，當作「豈不」、「胡不、遐不」、「盛大」之可議，最後探求「不」的本字，實象華蒂，並分析「鄂」古通「噩」、「萼」。「鄂不」、「萼不」、「萼不」、「萼不」爲不同書寫形式，乃合義複詞，都指花下子房之結論，並進而補充毛傳、鄭箋釋「韡韡」爲光明、茂盛，實狀子房顏色鮮麗且飽滿。

### 一、前言

小雅·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裋矣，兄弟求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兄弟閱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饋爾藟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濡。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上引「常棣」詩中開頭兩句「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係詩中起興，其義該作何解，由於最早注詩的毛傳對詩句中最爲關鍵的「不」字未加訓解，因而造成後來註家有各種不同之補充，衆說紛紜，使人莫衷一是。本文試圖綜合整理最具代表性諸家之說法，釐清其異同，發現造成訓解差異主要原因爲將「不」字當成「實詞」或「虛詞」，因而有此絕然不同的見解。「不」字用爲實詞，又有作鄂足（草木下房、花蒂）、豈不、胡不、遐不、盛大等各種不同意見。到底何者爲是，本文先歸納諸家不同說法，再分別檢討用爲虛詞無必然性，用爲實詞，作鄂足解，最得詩意。

### 二、訓爲實詞諸說

(一) 鄂足、草木下房、花蒂

\*東海大學中文系



1. 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
2. 孔疏：「…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做拊，拊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眾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
3. 陳第《毛詩古音考》：「不音義與夫同，草木下房曰不。常棣之華，萼不韡韡，萼，藥也，不，蒂也，萼不茂盛，所以與兄弟，此鄭康成舊音。古樂府陌上桑：『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窺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亦其一證也。今讀爲卜，意義似淺矣。焦弱庵曰，山東之華不注山，浙江之餘不溪，皆依此讀。」
4. 方玉潤《詩經原始》：「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姚氏際恒曰：『鄂，萼同，花苞也，不拊同，花蒂也。集傳以鄂爲鄂然，本毛傳之謬，又云不猶豈不也，並謬。』」
5. 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毛鄭詩考正云：『鄂不，今字爲萼拊。』」

#### (二) 豈不

朱熹《詩集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 (三) 胡不、遐不

1. 于省吾《澤螺居詩義解結》：「鄂不猶言胡不、遐不，詩言胡不、遐不者習見。古讀鄂如胡，古讀遐爲公虎切。（見江有誥《廿一部諧聲表》）鄂、胡、遐三字，就聲言之，并屬淺喉。就韻言之，並屬魚部。…胡不韡韡？系反詰語，正言其韡韡。」
2. 聞一多《詩經通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與本篇『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語調亦近，特二句互易其次耳。常棣亦當讀爲棠惟，其韡字從韋作，亦猶本篇穠從衣作，韋古褱字，褱即衣也。二句但謂兄弟偕來，其車服之盛，有如此者。鄂不猶胡不，箋以鄂爲花萼，不爲花蒂，喻兄弟恩義之顯，曲說也。」

#### (四) 盛大

高本漢《詩經注釋》：「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提出：說文有：『茱』字，訓爲『華盛』。『茱』字如此用，古書未見。不過桂氏以爲許慎就是說這句詩，而『茱』就是本篇『不』的繁體。有一種植物叫『茱萸』（見周南茱萸），『茱』音b'ieu/b'ieu/fou。許氏訓『華盛』的『茱』讀什麼，不得而知。也許它的音是p'iaŋ/p'jwi/p'ei[父 ㄟ]，因爲『不』當『丕』p'iaŋ/p'jwi/p'ei用是極常見的，周頌執

競『不顯成康』和大雅假樂『丕顯申伯』和尚書康誥的『丕顯考文王』是一樣的。尚書洛誥又有『丕顯德』。金文總是用『不』代『丕』，如著名的大盂鼎有『丕顯文王』（和尚書康誥的『丕顯考文王』相當）；同樣著名的毛公鼎有『丕顯文武』（和尚書文侯之命的『丕顯文武』相當）。『不』字用作『丕』而指『大，盛』的例有數十百個。如此，現在這句詩（和『鄂丕韡韡』或『鄂朶韡韡』一樣）就是：（常棣的花）突開盛大而鮮明。

### 三訓爲虛詞諸說

- (一)陳奐《詩毛氏傳疏》：「文選東哲補亡詩注引毛詩作萼，說文引詩亦作萼，段注云字當作萼，萼俗字也，今詩作鄂，亦非。萼，取萼布之意。傳云鄂猶鄂然，華外發也者。萼字各本作言字誤，正義謂華聚而發於外也，又以華外發取萼多爲義，釋文華外發鄂然也，是其證。說文華部，韡，盛也。玉篇，萼，盛貌，隸變作韡。傳訓韡韡爲光明，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作煒煒。不，語詞，正義引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彊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杜預左傳注云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而有光輝韡韡然。王杜皆足以申明傳義，王云華發，杜云華外發，尤足以訂今本傳文之誤。」
- (二)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此從毛傳讀爲是。玉篇曰，不，詞也。王肅述毛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彊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王尚書曰不乃語詞，鄂不韡韡猶言天之沃沃，其說是也。據藝文類聚引韡詩作萼不煒煒，則鄭箋訓鄂爲花萼之萼，其說蓋本韡詩。說文朶，華盛，艸艸不聲，或謂不即朶之省，然不若毛傳爲善。」
- (三)王引之《經傳釋詞》：「常棣曰：『鄂不韡韡』傳云：『鄂，猶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則不乃語詞，鄂不韡韡猶言天之沃沃耳。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爲拊。拊，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古聲不拊同。』案詩詠草木之華，皆直美其華之色，無以鄂足言之者。且韡韡光明，華色則然，鄂足隱在華下，安所見其韡韡哉！鄭亦知鄂足不得言韡韡，乃爲之說云：『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迂回而難通矣。王肅述毛云：『不韡韡，言韡韡。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彊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斯言得之。」

### 四虛詞說檢討

爲討論之方便，先就比較單純，用爲虛詞說法加以討論。

「不」字用爲語詞最早始於擁護毛傳，攻詰鄭箋的王肅，這段文字出自孔穎達正義所引王肅述毛「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彊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陳奐、王引之、馬瑞辰從其說。陳奐並引杜預左傳注「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而有光輝韡韡然。」說明「不」用爲語詞。同時引正義「華聚而發於外」、釋文「華外發鄂然」證明毛傳「言外發」應爲「華外發」。

」之誤。

三家中以王引之提出最多證據，他在《經傳釋詞》中說：「鄂不韡韡，猶言天之沃沃耳。毛傳「鄂不韡韡」係狀詞＋不＋狀詞之形式，《詩經》中許多「×之××」的詩句，如「天之沃沃」（隰有長蘗）、「被之僮僮」、「被之祁祁」（采芣）、「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鶉之奔奔）、「泌之洋洋」（衡門），皆為名詞＋之（作用在延長語氣）＋狀詞之形式，但「之」與「不」是否相當，即使「不」用為語詞，是否與「之」作用相同，極成問題。此外其舉《詩經》中「不」作語詞詩句——不顯不承（清廟）、濟盈不濡軌（匏有苦葉）、徒御不警、大庖不盈（車攻）、不難知也（何人斯）、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桑扈）…不顯其光（大明）等等三十餘例，「不」或在句首或在句中，在句首者不論，在句中者和毛傳釋「鄂不韡韡」「不」介於兩狀詞之間，形式亦不相同，是否可以《詩經》中「不」字作為語詞詩句證明，值得懷疑。像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就指出「濟盈不濡軌」、「鄂不韡韡」，王氏以「不」為發聲，失之。楊樹達《詞詮》亦指出王氏所收助詞「不」太廣，因此「鄂不」之「不」是否必然作語詞，還有商榷餘地。

### 五實詞說檢討

「不」字用為虛詞，既如上所論無必然性，用為實詞，又有以下四種不同意見，分論如下：

#### (一)「不」猶豈不。

朱熹釋「不」猶豈不。常棣之華，則其鄂然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朱熹之訓解任意在「不」上增「豈」字，以表反詰語氣，又於句末加「乎」字，以表真性詢問，並將下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改成一致語氣，這樣任意增字，改變語氣的訓詁方式，實難令人認同。

#### (二)「鄂不」猶言「胡不」、「遐不」。

于省吾、聞一多將「鄂不」合釋為「胡不」、「遐不」表反詰語氣。聞一多未說明，而于省吾則引江有誥《廿一部諧聲表》說鄂、胡、遐就聲言之，并屬淺喉，就韻言之，並屬魚部。事實上「鄂不」是否讀為「胡不」、「遐不」頗成問題。「鄂」、「胡」雖同為魚部入聲、平聲字，但「鄂」乃疑母字，聲母以鼻出氣，諧聲行為有自成一類的趨向，與「胡」、「遐」之屬匣母，不可視為當然的同近。因此于省吾只講韻母，不提聲母，「鄂不」是否可為「胡不」、「遐不」仍是問題。《詩經》中常用「胡不」、「遐不」甚至「曷不」作反詰語（註一），用「鄂不」

註一：用「胡不」如胡不歸（式微）、胡不遄死（相鼠）、胡不比焉、胡不飲焉（杖杜）、胡不萬年（鸛鳴）、胡不旆旆（出車）、胡不相畏（雨無正）、胡不自北、胡不自南（何人斯）、胡不替（召旻）。用「遐不」如遐不謂矣、遐不謂矣（南山有台）、遐不謂矣（隰桑）、遐不作人（文王）。用「曷不」如曷不肅雝（何彼穠矣）。又用「曷」如曷至哉、曷月予還歸哉、曷又懷止、曷其有常。

僅此一見，亦可證明「鄂不」和「胡不」、「遐不」、「曷不」通假之可疑。

另聞一多《詩經通義》更別有新解，將「常棣」釋為「裳帷」，同於〈何彼穠矣〉之「唐棣之華」，〈采芣〉之「維常之華」皆指車服而言，並非常棣樹。其論點為「古音唐棣與裳帷相近。唐棣一作常棣，裳即衣裳本字。帷从佳聲，棣从隶聲，古讀並歸舌頭，又同脂部，故帷棣聲亦相近。」「棣」、「帷」雖同屬脂部舌頭音，但「棣」開口，「帷」合口，除唇音字外，假借中無開合口可以相借情形。隋唐以後韻書因開合口不同，而一韻分為二韻，如「戈、歌」、「寒、桓」、「眞、諄」等韻，雖可押韻，但顯然古音歸為不同的兩類。龍師字純並指出「帷」字音清悲切，屬喻三，古歸匣母，與其他从佳之同音字多以「以」字作為反切上字，如「唯」、「惟」之音以追切，屬喻四，古歸定母者，實不相同，龍師此見對於否定聞氏之說最是切中癥結。

聞氏又說「唐棣」、「常棣」為「裳帷」乃諧聲瘦語與尋常所謂假借者不同，「裳帷」之聲本似「唐棣」、「常棣」，其以車服為花樹，初或由於聽覺之誤會，繼而覺以花樹擬車服，不失為美妙之聯想，因復有意加深其誤會，以增強其聯想，而直呼之為「唐棣之華」。這段話更是無稽，諧聲瘦語本用於感情不願直接表出，而有所隱藏，車服之盛，本非隱晦語，實無理由以常棣花樹暗指。

(二)「不」為「丕」，盛大也。

高本漢以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以為許慎《說文解字》「朮」即「不」字之繁體，許慎訓「朮」為華盛，並舉周頌〈執競〉「丕顯成康」、大雅〈假樂〉「丕顯申伯」、《尚書·康誥》「丕顯考文王」等例，說明全文總是以「不」代「丕」，而指「大、盛」的例子很多。因此「鄂丕韡韡」或「鄂朮韡韡」就是常棣的花突開盛大而鮮明。高本漢與王引之用「丕顯××」相同例子，卻有不同的訓釋，主要由於高氏從「不」的繁體字「朮」解釋，而王氏從「不」在詩句中作語氣詞，論點不同所致。前已檢討王氏所舉「不」當語氣詞之例，和「鄂不韡韡」之結構形式並不相同，「不」是否作語氣詞，仍須商榷。而高氏將「不」釋為盛大，是否必然呢？「韡韡」鄭箋作「盛」，毛傳作「光明」，都有花盛開鮮明之意，高氏將「不」釋為盛大，在意思上和「韡韡」重複表花盛開，似乎不必以如此疊床架屋方式修飾。

(四)鄂足、草木下房、花蒂。

三者名稱雖異，皆指承接花下之部位。鄭箋、孔疏、方玉潤《詩經原始》、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皆主此說。「拊」字有各種不同寫法，鄭箋、孔疏作「拊」，方玉潤作「拊」並引姚際恒說作「跗」，屈萬里先生引戴震《毛鄭詩考正》作「跗」。拊、拊、跗實為一字，阮元《毛詩校勘記》：「…古書木手多誤譌，木尤多从扌者，棠棣釋文作拊，…拊，俗作跗。」

「不」與「拊」古音是否可通？龍師字純《讀說文記》稿提出「不」屬之部，「拊」屬侯部，如音字从「丕」為聲，而音聲之字古韻屬侯部唇音看來，「不」與

「拊」本爲同字，實有可能。而且從甲骨文來看，「不」字有二類，一類作「𠄎」其形與許慎「鳥飛上翔不下來」之訓相合；一類作「𠄎」與小篆同形，宋代鄭樵《六書略》首先不同意許慎講「不」爲鳥飛不下來，而說以爲「鄂不」之「不」，象華萼蒂之形，鄭樵又同時說蒂爲蒂字，以甲骨文帝、不二字字形之相關證之，鄭說實不可易（註二）。

李師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收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人釋「不」之意見，皆承鄭樵之說，但各家未提及鄭樵。茲徵引之，以證鄭箋等講「鄂足」，乃就「不」之本義解釋，此派說法絕無理由被否定。

羅振玉曰：「象花不形，花不爲不之本誼，許君訓爲鳥飛不下來，失其旨矣。」

王國維曰：「帝者蒂也，不者拊也。古文或作𠄎，但象花萼全形未爲審諦，故多於首加一作𠄎，諸形以別之。」

郭沫若曰：「分析而言之，其𠄎若𠄎象子房，𠄎象萼，𠄎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爲拊說始於鄭玄，小雅棠棣『棠棣之花，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音不拊同』王謂『不』直是拊，較鄭玄更進一境，然謂與蒂同象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猶帶餘蕊，與帝之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申爲丕，其用爲不是字者乃假借也。」

其次說「鄂」字，段玉裁《詩經小學》改「鄂」爲「鄂」，鄂，直言也，段氏不知何故作此更改，恐亦無此必要。根據羅振玉釋「喪」：「許書無𠄎字，而有𠄎，注『譌訟也，从𠄎，𠄎聲』《集韻》萼韻，萼或从𠄎，以是例之。知𠄎即許書之𠄎矣，𠄎字見於周官，以卜辭諸文考之，知从王者乃由𠄎傳寫而譌，傳世古器有𠄎侯鼎、𠄎侯敵，鼎文𠄎字作𠄎，敦文作𠄎，又古金文中喪字从𠄎从亡，𠄎侯敵喪作𠄎…喪爲可驚𠄎之事…𠄎侯《史記·股本紀》作鄂侯…，𠄎、𠄎、鄂古通用，《爾雅》釋天之『作𠄎』《史記》歷書『作鄂』（集解引徐廣曰：𠄎一作鄂）知《史記》之鄂侯即金文之𠄎侯。」（註三）𠄎、𠄎、鄂、𠄎古本通用，「萼」乃後出轉注字，韓詩作「萼」爲漢時今文，「鄂不」、「萼拊」、「萼拊」、「萼拊」爲不同書寫形式，乃合義複詞，都指花下子房而言。

## 六、結語

朱熹、于省吾、聞一多將「不」釋爲表反詰的疑問詞，高本漢用引申義釋爲「盛大」，陳奐、馬瑞辰、王引之等釋爲語詞，都由於未能瞭解「不」的本義所致。

「鄂不」就本義而言合指花房應可確定，但如王引之駁鄭箋「案詩詠草木之華，皆直美其華之色，無以鄂足言之者。且韡韡光明，華色則然，鄂足隱在華下，安所見其韡

註二：「不」字甲骨文有二形及鄭樵說不蒂二字，參龍師字純所著《中國文字學》第三章第五節及第四章。

註三：參李師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二，釋「喪」字。

韡哉！鄭亦知鄂足不得言韡韡，乃爲之說云：『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迂回而難通矣！」相當中的，令我們不得不重新評估「韡韡」之意。毛傳釋爲「光明」，鄭箋釋爲「盛」皆用以狀「鄂不」，固然鄂不隱在花下，不可能光明、茂盛，但可理解爲狀子房飽滿，顏色鮮麗，和常棣之華相承覆，用以比喻兄弟相互友愛，如此本詩開頭「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兩句兼具比興修辭特色，合全詩意旨來看，亦最爲得之。

## 參 考 書 目

1. 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台北新興書局一九七三年九月版。
2. 《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
3. 朱熹《詩集傳》，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四年四月三版。
4. 陳弟《毛詩古音考》，台北廣文書局一九六六年版。
5. 王引之《經傳釋詞》，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四月版。
6.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7. 陳奐《詩毛氏傳疏》，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八六年十月版。
8. 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〇年六月版。
9. 聞一多《詩經通義》收入《聞一多全集》，香港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六八年版。
10. 于省吾《澤螺居詩義解結》收入《澤螺居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版。
11. 高本漢《詩經注釋》，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台北台灣書店一九六〇年七月版。
12. 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三年版。
13. 李師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專刊之五十。
14. 龍師宇純《中國文字學》，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八七年九月五版。

## 佐藤春夫與中國文學 ——『玉笛譜』之製作經緯與意圖——

黃美慧\*

### 摘 要

佐藤春夫是與中國關係深遠的日本作家之一。其對中國文化的關心，有時以多數創作，有時以翻譯作品的形式出現。

翻譯作品裡，『玉笛譜』乃其中之一。這是一部從「女流小詩」，與唐宋的「名家大作」中選譯而成的詩集。其選擇的傾向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相去甚遠，譯法亦大異其趣。不過，整體而言，被認為是部相當優秀的作品。

此譯詩集，不但給日本文壇吹進一陣新風，豐富了日本的譯詩詩壇，也解除了不少當時日本青少年對漢詩的恐懼感。然，有關其製作動機及經緯之研究卻極罕見。

本論中，筆者試著透過對佐藤春夫的身家、資質、與中國文學的接觸經緯等之探討，摸索出『玉笛譜』的製作動機及其過程，並以其問世的真正意圖為焦點，考察佐藤文學的另一面。

### 前 言

明治以來，尤其大正時期的日本，可說是西洋一面倒的思想。龜井俊介說「日本的近代化，即……大幅度的西化」註一。杉田弘子也說「從某種角度來看，大正可說是開始接受西洋文化的時期。若說明治是即物並倉促性的西化時期，大正則是較個別性且自省性地接受西洋思想、哲學、及文學等精神方面的時期了。」註二

如此時代潮流下，佐藤春夫亦憧憬並積極地學習西洋文明。事實上，島田謹二亦曾提及，佐藤春夫的成名作『田園的憂鬱』便受到德國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832)及義大利作家丹濃雪烏(Gadriale D'Annunzio, 1863~1938)等西洋作家莫大的影響。尤其，西洋詩文對佐藤春夫的影響亦極深遠。詩人佐藤春夫的心目中，從美國的愛倫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到德國的海涅(Heine, 1797~1856)等作家，都頗具分量，登文壇後其最先介紹的也是西洋詩文。『初期習作拾遺集』中的「光

\* 東海大學日文科。

註一「西洋的衝擊與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4年10月。

註二「近代文學的思想與藝術」，東京大學出版社，1974年6月。



」、「鵲」、「祈禱」、「愛在年輕時」、「風」、「人生」，及收錄於「棣棠花」中的「夜鶯之歌」註三及「波蘭文」註四等便是其中的例子。

儘管如此，佐藤春夫對東洋也一直很關心，算是當時日本文學家中的異類。

「唐物因緣」註五中，佐藤春夫曾說「我當然不是中國學者，也不是所謂的中國通，連中國文學的研究者都稱不上。……頂多可算是中國文物的嗜好家罷了。」不過，正如尾崎秀樹在「佐藤春夫與中國」註六中說的，「……恐怕再沒有像佐藤先生那麼愛好中國的文人了。」佐藤春夫雖如上的謙虛，也以愛好中國的最後文人為己任。同文中佐藤春夫也自認為「……大正以來的文人之中，雖不敢說算認識或發現，但要說去注意這一點，俺可說是第一個……」。另外，祖父江等在「佐藤春夫與中國」註七中也說，若以「近代文學中的中國」為題，而以大正時期為中心時，往往會同時舉出谷崎、芥川、佐藤三個名字，論及三人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學造詣，並言及三人都基於一種文人嗜好與對異國的情趣而接近中國，然其中佐藤春夫尤是多方面與中國關係深遠，算是大正以後的日本文學家之中，重新認識或是發現中國的第一人。

事實上，如佐藤春夫自己說的「……照這樣下去，我的全著作中，就有一半或三分之一跟中國有關了。……不過，畢竟有關文學、尤其詩方面最多也是不辯的事實。」(同註五)一般，佐藤春夫傾心並愛好中國文化及文學至極，其著作中，甚多帶中國色彩，其中文學、尤其詩歌方面更是占大部分。

然而，佐藤文學中，有關中國方面的比率雖高，至今的「佐藤春夫論」中，卻不太被論及，所占比率可說甚低。其實，從佐藤春夫與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學的影響關係之觀點來評鑑佐藤春夫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位置也有其必要，而這種研究亦能使至今的「佐藤春夫論」更具體才對。

無論如何，如佐藤春夫的自述一般，於探討佐藤春夫與中國文學之關係時，最引人注意的，還是在佐藤春夫與漢詩因緣之深上。尤其譯詩集『玉笛譜』的存在，更令人難以漠視。

以往有關佐藤春夫與漢詩方面的研究，盡是以『車塵集』為對象。然而，『佐藤春夫全集』(講談社)第一卷及『日本詩歌16』(中央文庫)、『佐藤春夫詩集』(旺文社)、『佐藤春夫詩集』(彌生書房)、『殉情詩集·佐藤春夫』(筑摩書房)等目錄，雖都將『玉笛譜』及『車塵集』立成兩個項目，其實『玉笛譜』含蓋整個『車塵集』作品，正是佐藤春夫漢詩翻譯作品之集大成。它除了實錄多數作品發表時的各界反應外，包括二十年前『車塵集』出版當初在內，亦談及諸多『車塵集』發表後搖擺不定的佐藤春夫之精神生活層面。

註三「中央」，1919年4月。

註四「改造」，1929年4月。

註五「中國雜記」，大道書房，1941年10月。

註六「佐藤春夫全集」，講談社，第11卷附錄，1969年5月。

註七「和光大學文學部紀要」，1978年3月。

本論試著透過對「玉笛譜」之製作動機及原委的探討，尤其從其收錄詩集之題名方面，想探索出另一種新的「佐藤春夫論」來。

## 一、佐藤春夫與中國文學之連繫

佐藤春夫何時開始對中國文學發生興趣呢？

『詩文半世紀』（1963年8月）中，佐藤春夫記述如下：

中學四五年級時，我開始學習漢文之後，便從家父的藏書中，自己任意讀記唐詩選之類。……漢詩比漢文讓我讀起來方便。正因它有五言或七言的限制，我就在五字或七字之間揣摩，想辦法讓自己理解。……畢竟讀了只要讓自己感到慰藉就行了，我就隨心所欲地讀過去罷了，至今我仍是採這種讀法。總之，雖然勉強而不完美，但我先是自以為是地讀著，不久再以一些注釋為指引，如此，以自己的方法讀漢詩以為樂之間，似乎也多少了解了詩這玩意兒哩。

以上透露出佐藤春夫是幾時開始對中國文學有興趣，其最初所接近的是何種內容、方法、與態度，及他從中學四五年級開始親近「固定形式的五言或七言」之中國詩調等端倪。

一般認為，佐藤春夫在創作或翻譯詩時，尤拘泥於古典形式的五七調或七五調，佐藤春夫亦自以為然。然其中原由之一，應與佐藤春夫親近漢詩有關。『詩文半世紀』中，佐藤春夫又說：

我覺得自古以來的我國國語的詩語，至少對我的詩歌非常有用，不只有用而已，除此再也找不到可以陳述我詩情的用語了。這種五七或七五的單純詩調，實在令我感激不盡，這不只是因為我不懂外語，也是因為我的詩情屬於這個國土使然吧。

的確，「五七」及「七五」詩調，乃佐藤春夫終生愛用的詩歌形式。事實上，日本的詩界，從明治到大正，由最初的七五調新體詩到文言體自由詩，再到口語體自由詩，其變化之快速實令人眼花撩亂。然而，佐藤春夫卻如置身詩壇時勢的局外一般，其詩歌形式始終保持使用傳統的音數韻律或音數韻律性的調子。也因此，荻原朔太郎還在「一九二五年版的日本詩歌集總評」註八中指摘佐藤春夫的詩「舊了十年之久」。無論如何，如佐藤春夫在「有關我的詩方面」註九中答覆荻原朔太郎的一般，佐藤春夫的詩確實「大多以古語綴成」，又蠻拘泥於五七或七五調的。

註八「日本詩人」，1925年7月。

註九「日本詩人」，1925年8月。

另一方面，佐藤春夫的詩文也很善長於對照句法及疊詞用法。這跟其愛用「五七」或「七五」之類的音律性詩調一樣，不只受到日本自古以來「的詩語」之影響，跟其中學以後所「讀記」的唐詩也關係深遠才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佐藤春夫之所以對中國文學、特別是漢詩方面產生興趣，跟其成長環境有極密切的關係。

## 二、佐藤春夫及其生長家庭

佐藤春夫乃日本大正時期最特異而多才的作家之一。他是位詩人、小說家、及批評家。也寫童話、戲曲、及隨筆。其作風既非自然主義，也不屬於白樺派，亦非全屬於耽美派。不過，無論如何，其文學的最大特色之一，乃是身為一個詩人。

1892年(明治25年)4月9日，佐藤春夫生於和歌山縣東牟婁郡新宮鎮，1964年(昭和39年)5月6日，因心肌梗塞而死於家裡。

新宮鎮乃現在的新宮市船町，位於日本本州南方，面向熊野海灘，是個風光明媚之地。佐藤春夫在「懷鄉五月歌」中吟詠鄉土勝景，感動了諸多讀者，而其本人正是出生於此名山秀水之地中一個愛好詩文而富文學素養的家庭。其家族歷代行醫，父親豐太郎為第九代醫生，亦為一位景仰正岡子規的俳句詩人，俳號鏡水。祖父為一位漢詩人，號鏡野隱逸，著『鏡村詩集』。曾祖父號椿山，紀伊侯召其為御醫而未接受，他將族人吟詠的詩歌編成『懸泉堂歌集』，是位不屈權勢的孤高詩人。

如此，佐藤春夫亦自己提及，「大概詩歌乃家族自古的嗜好」，其血液中生來便具祖先代代詩人的素質了。而且，這種文學上得天獨厚的資質，隨著歲月的增長，又將佐藤春夫導往詩人的方向。不過，影響佐藤春夫的中國文學最大的，還是與其血緣最近的父親。「唐物因緣」中，佐藤春夫記述如下：

我對中國文物的嗜好恐怕是最近祖先的意向，是家父教育的結果。……父親……在我小的時候時常告訴我「睡獅」中國的事……說我國人片刻也不該忘記這個鄰國，並力說中國文藝美術之美之長，且說當時偏重歐美文物之不合理，還好幾次諄諄教誨我不該疏於研究中國文學。如此的教育，及將身邊的文房雜具和茶器等稱為中國文物的父親大人之身影，似乎不覺間鼓吹了我對中國文物的嗜好哩。

受到如此影響的佐藤春夫，同樣在「唐物因緣」中提及如下。即：儘管當時日本並非絕無優秀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然其研究內容卻難以理解而過於高遠，結果使得已對中國文化失去興趣的青少年們更加卻步；同時，當時的文壇，表面上中國的傳統文學可說幾乎瀕臨滅絕的狀態，一般大眾迷於歐美的文化而逐漸忘記日本式中國文化的存在；為此，佐藤春夫感到擔心，他認為「明知無法勝任，但至少若能在日本的文化潮流中，保持那雖然微弱但只要注意就可以發現的日本式中國文化傳統，也非全然無用」，又「見

於其他沒年青人甘於此愚鈍的工作」，故雖明知自己「無法勝任」還是「主動以此爲己任」；而且，正因其作品通俗而易於爲一般人所親近，才終能達成傳承日本式中國文化傳統的任務。

那麼，在西洋一面倒的時代潮流中，一面憧憬並接近西洋，一面又主張日本式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殊存在者佐藤春夫，實際上又是何時以文學作品開始其任務呢？

### 三、佐藤文學中的中國

前言中提過，佐藤春夫在「唐物因緣」中說：

……這樣下去的話，我的全著作之中，就有一半或三分之一是跟中國有關了。

之後，佐藤春夫又說：

……其開端是寫了被誤傳爲由中國小說篡改而成的「李太白」之後的事，那是(1941年)三十年以上的事了。……在此(『車塵集』)之前，我在寫「李太白」之際，便試著想翻李詩了，卻終歸於失敗。

即，佐藤春夫在寫「李太白」時，曾試著翻譯李詩，卻歸於失敗，而「李太白」便是佐藤春夫所認爲跟中國有關的最初作品了。

「李太白」乃佐藤春夫於1918年5月完成，而於該年7月，由一年前左右所認識的文壇前輩亦爲好友的谷崎潤一郎所推薦，發表於『中央公論』的短篇小說。谷崎評之爲佐藤春夫豐富幻想與敏銳感覺的產物，是一部創作。然，因看來似乎有所依據寫成的，有家報社便報導爲「翻譯或是翻案(佐藤春夫)作品，而令佐藤春夫感到不滿。

然而，雖然佐藤春夫認爲「李太白」乃其最初與中國有關的作品，且「佇立徐福墓畔」註十儘管亦非純寫中國的事，筆者卻竊認爲後者才是佐藤春夫表現其對中國關心的最初作品。

「佇立徐福墓畔」乃佐藤春夫「但覺寂寥」而於晚秋黃昏佇立於故鄉新宮的徐福墓畔時的感想文。文中佐藤春夫想起幼時伴著父親來到徐福墓畔聆聽徐福故事的情景，其「幻想綿綿展翼而飛，還遠到三千里外的萬里長城」，可說是部以中國古典爲背景的作品。

有關徐福的故事(這也是幼時佐藤春夫的父親所講的中國故事對其影響的例子之一)，後來佐藤春夫還寫過「徐福」註十一之童話故事，並以「徐福之船」註十二的詩歌形式表現在其文學裡面。童話和詩歌的內容雖多少有異，卻都大致描述：秦道士徐福船載三千

註十「會誌」，和歌山縣新宮中學校友會，1908年3月。

註十一「中國童話集」，日本兒童文庫，阿魯斯，1929年1月。

註十二「文藝日本」，1953年3月。

童男童女，說是替皇帝求不死仙藥，實則乃欲逃避秦朝暴政，故至離東海萬里的蓬萊島後便不復返了。其中的「徐福之船」，選於1984年3月，由新宮文珠蘭合唱團作曲，而廣為世人所知。

無論如何，幼年所聞關於徐福的傳說，乃深植佐藤春夫心中的中國文化之一，它以「佇立徐福墓畔」的形式，最先表現在佐藤春夫的文學上。

其他，跟中國有關而比「李太白」還先表現在佐藤春夫文學的作品，有「曾哲的回答」註十三及「雉子之肉」註十四等作品，然而佐藤春夫真正頻頻將其對中國的關懷表現在文學作品的，是在1920年台灣旅行後的事。

佐藤春夫一生踏過中國領土四次。然，自小親近中國文物，且中學起愛讀漢詩的佐藤春夫，其第一次踏上中國領土，是在「李太白」發表後約整整過了兩年的1920年(29歲)6月下旬到10月15日之間，地點是台灣及其對岸的福建。第二次則是1927年7月10日到8月2日之間，地點是中國大陸中部的上海和南京等地。第三次是1938年5月1日到6月上旬之間，地點是中國大陸北部及東北地方。第四次是1938年9月14日到10月11日之間，地點是中國大陸中部而以上海為主。其他，也曾計畫於1922年12月起旅行中國半年，然因其弟住院而作罷。

卻說，四次之中，第一次的旅行期間雖不滿四個月，影響佐藤春夫卻極為深遠。旅行後，佐藤春夫不但以旅行體驗為題材寫成小說、遊記、小品文等十幾篇作品，其他創作也突增許多，此後到昭和初期所發表的作品又被認為最能發揮其浪漫性或抒情性並最吸引讀者。而且，不只以旅行體驗為題材的作品，之後有關中國的其他作品也明顯的急速增加。

即，這次旅行後，佐藤春夫不只開始積極展開其著作活動而確立獨特作風，亦更關心並對中國感到興趣。

#### 四、有關中國方面之佐藤春夫作品

到台灣旅行之前，有關中國方面的佐藤春夫作品，雖只有上述介紹的數篇，其後的作品則可整理如下：

##### 1. 1920年旅行中所取材的作品(以其初出為主)

###### a. 取材於台灣之作品

「日月潭遊記」(『改造』，1921年7月)

「蝗蟲大旅行」(『童話』，1921年9月)

「鷹爪花」(『中央公論』，1923年8月)

「魔鳥」(『中央公論』，1923年10月)

註十三 「反響」，取材自論語的短篇，1914年6月。

註十四 「讀賣新聞」，取材自論語的短篇，1916年11月。

「旅行者」(『新潮』, 1924年6月)

「霧社」(『改造』, 1925年3月)

「女誠扇綺譚」(『女性』, 1925年3月)

「日本旗下」(初以「奇談」為題1928年1月發表於『女性』, 1936年的「霧社」中則改為現名)

「殖民地之旅」(『中央公論』, 1932年9~10月)

「社寮島旅情記」(『文學』, 1937年8月)

b. 取材於大陸之作品

「黃五娘」(『改造』, 1921年1月, 為之後「星」五十五折中的前十二折部分)

「星」(『改造』, 1921年3月)

「南方遊記」(『新潮』, 1921年8月~11月)

「廈門記趣」(『改造』, 1937年12月)

c. 提及1920年台灣, 福建旅行之作品

「被剪下的花」(1922年8月, 新潮社)

「旅行記趣」(『報知社』, 1924年7月)

「我們三人」(『改造』, 1925年6月~1926年10月)

「文藝心聲」(五之三, 『文藝春秋』, 1935年3月)

「那年夏季」(『霧社』之後記, 昭森社, 1936年7月)

「綺麗海邊」(『新潮』, 1954年1月)

「文學之志」(『文藝』, 1955年1月)

「人生樂事」(『文藝春秋』, 1955年9月~1956年8月)

「日本風景」(『心』, 1958年1~12月7月從缺, 其中的「失敗之旅成功之旅」「下北津輕」「未完成的『佐久三部作』之由來」「不好的第一印象」「事隔五十年」)

「炎熱旅行之憶」(『世界之旅, 日本之旅』, 1959年10月)

「鷺江・西湖・玄武湖」(『世界之旅・日本之旅』, 1960年4月)

「忍川」與「蕃婦羅萌的故事」(芥川龍之介賞選評第四十四回, 『文藝春秋』, 1961年3月)

「望鄉賦」(一名「回鄉記」, 『群像』, 1961年4月)

「應邀到台灣」(『讀賣』晚報, 1963年4月)

2. 翻譯作品類(以成書出版者為主)

「玉簫花」(中國短篇集, 1923年8月, 新潮社, 取材於『今古奇觀』及『聊齋志異』等, 共11篇翻譯或改編作品)

「中國童話集」(日本兒童文庫, 1929年1月, 阿魯斯社, 取材於『今古奇觀』『聊齋志異』『太平廣記』『東周列國志』等, 共16篇, 序文中記載著本想和芥川龍之介共著)

- 『車塵集』(1929年9月,武藏野書院,將中國六朝到明清的三十二位女流詩人的四十八篇詩,依季節順序譯出的作品)
- 『平妖傳』(世界大眾文學25卷,1929年12月,改造社)
- 『木竹集』(世界名作文庫412卷,1933年5月,春陽堂)
- 『魯迅選集』(1935年6月,岩波文庫,與增田涉共譯)
- 『中國印度短篇集』(世界短篇傑作全集6,1936年9月,河出書房,譯者代表)
- 『浮生六記』(沈復作,文庫版,1938年9月,岩波書店,與松枝茂夫共譯)
- 『中國文學選』(1940年7月,新日本少年少女文庫)
- 『中國雜記』(短論隨筆集,1941年10月,大道書房)
- 『好述傳』(中國長篇小說,1942年10月,奧川書房)
- 『西遊記』(1944年6月,新潮社)
- 『玉笛譜』(中國詩選,1948年4月,東京出版社)
- 『新譯水滸傳』第一卷(1952年9月,中央公論社,原預定共十二卷,結果只完成九卷,起初有村上知行的協助)
- 『新譯水滸傳』第二卷(1952年10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三卷(1952年11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四卷(1952年12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五卷(1953年2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六卷(1953年3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七卷(1953年7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八卷(1953年9月,中央公論社)
- 『新譯水滸傳』第九卷(1953年12月,中央公論社)
- 『唐物因緣』(中國新書10,短論隨筆集,1965年6月,勁草書房)

以上的數量堪稱可觀。然而,不只上述作品,通讀佐藤春夫全集(講談社版),便會發現:其他佐藤春夫的創作中,也隨處可以感到跟中國有關、或某些部分分明由中國引進的作品。

1918年7月佐藤春夫在當時文壇的重要舞台『明星』上發表了「風」一首詩後,至過逝的57年間,從詩歌到散文,沒有一年從缺過,然寫作上亦有其高低潮的現象。其間尤以1920年的台灣之旅為界,之後佐藤春夫的作品明顯的增加,與中國有關的創作及翻譯作品也顯然劇增,譯詩集『玉笛譜』亦是其中之一。

## 五、『玉笛譜』之翻譯經緯

前面說過,佐藤春夫是明治以來,尤其是大正時期的日本文學家之中,最了解並關懷中國的作家之一,這在詩歌方面亦然。

試觀明治以來的日本翻譯詩歌，從『於母影』（1889年8月・新聲社同人譯・『國民之友』），到『海潮音』（1905年10月・上田敏譯・本郷書院），『珊瑚集』（1913年4月・永井荷風譯・山書店），『海涅集』（1919年2月・生田春月譯・春秋社），『白孔雀』（1920年1月・西八十譯・尙文堂），『牧羊神』（1920年10月・上田敏譯・文淵堂），『明亮時光』（1921年10月・高村光太郎譯・藝術社），『惠特曼詩集（草之葉）』（1921年11月・有島武郎譯・叢文閣），『鵝媽媽』（1921年12月・北原白秋譯・阿爾斯出版社），『月下的一群』（1925年5月9日・堀口大學譯・第一書房），『山內義雄譯詩集』（1933年12月・白水社），『海表集』（1937年5月・日夏耿之介譯・野田書房）等，一本接一本，盡是西洋詩歌的介紹，其譯詞也幾乎都口語化了。

無可厚非的，此種現象乃是日本詩壇致力於進步的一種表徵。實際上，洋詩的介紹與詩語的口語化，促使了日本詩的多樣化與豐富化，確也頗具其歷史意義與效果的。只是，一般在歷史性的轉換期間，也難免會被迫放棄固有的文化財產，日本也不例外。而在日本如火如荼地展開洋詩的介紹與詩歌的口語化之際，佐藤春夫依然堅信，至今的五七及七五的古調甚能發揮日語特性，乃形成日本詩獨特風格的創作形態，因此並不以追求時尚為榮。不過，佐藤春夫堅持以維護傳統的七五調而首次在漢詩翻譯方面成功的，不外『車塵集』這部譯詩集。

『車塵集』發表於1929年。明治以來，只有少數嗜好家讀漢詩，『車塵集』是首次試著以七五調的詩歌形態為日本一般大眾譯成的譯詩集。它打破漢詩即李白、杜甫、白樂天之詩的一般想法，趨於介紹些較平民化的作品，甚具獨創性。其內容包括三十人以上的女流詩人作品，原作者的背景則從無名妓女、名家小姐、到人婦等各式各樣。

至於作品的翻譯經緯，佐藤春夫在「唐物因緣」中陳述如下：

比此（『車塵集』）更早，我曾試著在「李太白」中翻譯李詩而終告失敗。（中略）在原著方面專找些名作而感到力不從心的我，之後想要翻譯中國詩時，則專找些不值得尊敬但詩情單純而容易引起共鳴的原作，並改用不太拘泥原作而以輕鬆的心情給予再吟過的方法。至於之所以是巾幗者流的作品，乃基於上述理由及想打破有關中國詩的既成概念，而想盡可能找易懂的抒情詩使然哩。

以上，佐藤春夫說他譯『車塵集』時，採「不太拘泥於原作而以輕鬆的心情給予再吟過的方法」，道出了『車塵集』雖為譯詩集卻又常被指為半創作的理由之一端，也說明了其譯『車塵集』之原由。即，佐藤春夫因曾經對名作感到力不從心，又想打破對中國詩的既成觀念，才選擇了「容易引起共鳴的抒情詩」。不過，如吉川發揮在『佐藤春夫的車塵集』<sup>註十五</sup>中所指摘的，佐藤春夫之所以譯『車塵集』，主要還是「車塵集」般的「抒情詩」「容易理解」，又能對當時佐藤春夫之前輩亦為好友的谷崎潤一郎之夫人「千代子表白並傾訴戀慕及勸誘之情」使然。無論如何，具此特色的『車塵集』，

註十五 新典社刊行，1989年1月。



迥異傳統的漢詩之訓讀方式，卻又繼承日本舊有五七及七五調的詩性美，在西洋一面倒的文壇上放出異彩，受到不少的矚目。

不過，『車塵集』發表後，雖大致博得各方好評，卻也有人批評原作並非名詩人之作、及翻譯沒忠於原作。佐藤春夫不滿於這些批評，便決心抄譯一些男性的、且一般被認為是大家的、唐·宋時代的詩人作品，此乃『玉笛譜』問世之由來。『玉笛譜』的自敘中，佐藤春夫說：

我翻譯若干中國歷代女流詩人的小詩命為車塵集問世以來，已過了二十年。當時我並非無意想讓人們憶起一時被置若罔聞的鄰國詩歌，(中略)不過似乎也有一些有識之士笑我迂愚採女流小詩而沒傳達堂堂中國詩的真面目。本來我自覺力不從心不敢著手於名家大作，所以只拾些可愛而無名的小詩罷了。然而，可能受到有識之士嘲笑的鞭策吧，那之後一有機會，我也會翻翻唐宋名家的詩集並抄下名篇放置枕邊，之後若自己思索或請教諸友而能領會的，便試著將其譯出而自以為樂。

上述，除了傳達佐藤春夫出版『車塵集』的動機及那之後的一部分評價情況，同時也說明了佐藤春夫接著翻譯唐·宋時代名作的動機及經過。而那些累積成果，於二十年後的1948年4月，由東京出版社推出了『玉笛譜』譯詩集。

『玉笛譜』以「中國詩選」為副題，乃當時佐藤春夫所譯漢詩的總集編，裡面除了「唐宋大家的名篇」，也收錄了集「女流小詩」的『車塵集』之全部作品。有關其編集經緯，佐藤春夫在序文中陳述如下：

……唐詩共約六十首。另外，有幾篇應人要求匆匆譯出而還沒燒掉的未定稿，我加以修改後置於机窗下積灰塵之際，有人提議復刻春夫詩集而且要將車塵集獨立出來。然而，車塵集雖為雞肋，本人卻不忍全然割捨。因此，便將其與之後的唐詩黃絹幼婦抄和不惜但傷抄三者合成一卷而題為『玉笛譜』。或許將三塊雞肋合成的集子命為『玉笛譜』有些不妥，然裡面的調子卻正是玉笛之聲哩。

即，『玉笛譜』乃合『車塵集』與那之後所譯的「唐詩黃絹幼婦抄」及「不惜但傷抄」三者而成，其中大部分是佐藤春夫自己想譯的，不過也有「幾篇」是「應要求」而譯的作品。

所謂「應要求」而譯的「幾篇」，該指應『婦人公論』<sup>註十六</sup>等雜誌社的要求而譯的作品。刊載於『婦人公論』的「玉關情」中，除了李白的「子夜吳歌」，還有『全唐詩』中也收錄的開元宮人的「袍中詩」，張九齡的「賦得自君之出矣」，盧殷的「遇邊使」，薛濤的「贈遠」與「籌邊樓」等。另外，應『改造』的要求而試譯的「漢詩漫讀妄解」<sup>註十七</sup>中，有李白的「長干行」，李賀的「將進酒」與「莫種樹」等。嘗過「試著譯

註十六 「婦人公論」，1940年2月。

註十七 「改造」，1936年2月。

李詩而終告失敗」之痛苦經驗的佐藤春夫，在「玉關情」及「漢詩漫讀妄解」中卻都還以李詩為卷頭，實在蠻耐人尋味的。

無論如何，除了李白的作品，張九齡、盧殷、李賀等的作品，也都收錄在『玉笛譜』的「唐詩黃絹幼婦抄」中。其他，應「講授中國詩課程之需」而譯的「蘆溝曉月」註十八及「翻譯寄給改造社增刊中國號用的」詩稿「海韻」註十九也收錄於『玉笛譜』的「不惜但傷抄」中。這些可說非完全由佐藤春夫自己選譯，某種程度是順別人之意向選譯出的，即所謂「應要求」而譯的作品。

卻說，上面提及，向來有關佐藤春夫與漢詩翻譯方面的研究，幾乎盡以『車塵集』為對象。此乃『車塵集』為佐藤春夫引起當時日本文壇一陣騷動的第一本漢詩譯詩集，其價值受到肯定的結果。然而，不只『車塵集』，收錄於「唐詩幼婦抄」及「不惜但傷抄」的作品，雖也與歷代一樣選譯自「唐宋名家的名篇」，然在其選擇上，實亦具獨到之處。無論是其內容本身或翻譯作品文體的特性方面，也都頗值得探討的。惟此篇筆者首要探索的，乃於『玉笛譜』中各選集之命名方式上。

## 六、何謂車塵・黃絹幼婦・不惜但傷

『車塵集』的卷首，寫著「獻予芥川龍之介之佳靈」。芥川龍之介與佐藤春夫乃文壇至友，在愛好漢詩方面意氣投合，還計畫要一起出譯詩集的。然而，芥川竟於佐藤春夫第二次旅遊中國期間，以自殺的形式結束了自己。佐藤春夫為此感到惋惜，故寫此以表哀惜之念。不過，正如詩集開頭部分所引用『楚小志』中的「美人香骨化作塵土」之詩句般，也暗喻著『楚辭』中「香草・美人」所象徵的才子之不遇與其生命之短暫。尤其，對佐藤春夫而言，顯然不只芥川而已，收錄於此詩集中的才媛們之詩才與生命，亦皆無常而悲哀的。這便是抱此人生哲學觀的佐藤春夫賦予此譯詩集題名之象徵意義吧。

卻說，1929年發表了『車塵集』以來，新的譯詩集方面，經過一段空白的歲月。二十年後，才好比打破此一沈默似的，接連發表了「唐詩黃絹幼婦抄」及「不惜但傷抄」兩部詩集。這兩部便是佐藤春夫所謂的唐宋大家詩作的抄譯集了。

其中，「唐詩黃絹幼婦抄」乃專譯唐詩之集子。所謂「黃絹幼婦」乃絕妙一辭之謎底，出自於『世說新語』註二十的「捷悟篇」。按記載：中國後漢時代的魏武帝曹操通過「曹娥碑」時，發現碑後的八個題字，其中的前半便是「黃絹幼婦」四個字。而且，隨從楊脩因先悟得題意而招魏武帝嫉其才並害其命。

「捷悟篇」中，楊脩解題曰「黃絹、色系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即絕妙之意。上述，佐藤春夫於『玉笛譜』自敘中說「我也翻譯唐宋詩集並抄下

註十八 「新日本女性讀本」，「婦人之友」，1938年9月，不過這裡採訓讀方式，「玉笛譜」中則完全重新排列過，而且有兩種譯法。

註十九 「改造」，1926年7月。

註二十 「世說新語」，新釋滿文大系，明治書院，1986年9月出版。

名篇放置枕邊，之後若遇到自己思索或請教諸友而能領會的，便試著將其譯出而自以為樂。」然，其所以題之為「唐詩黃絹幼婦抄」，不外意味著自己抄譯的唐詩乃絕妙之作。

在本詩題「唐宋黃絹幼婦抄」之後，馬上還付著韓愈的長詩「石鼓歌」「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一節。韓愈乃唐宋八大家中尤善長古文之人，其詩以古詩為最，「石鼓歌」正是其古詩的代表，是首長達六十行的七言古詩大作。

詩中，韓愈感嘆被傳為周宣王時代寫在「石鼓」上、文化價值極高的「石鼓文」長期暴露荒郊野外無人關心之實，並請求為政者給予重視與保護。其與佐藤春夫之立場和主張共通的是：韓愈和佐藤春夫都極力認定古文化水準之高及其對現在社會所具的價值，現實中卻不得不感嘆傳統文化得不到理解不被關心而面臨逐漸腐朽消失的命運。不過，兩者在感嘆之餘，都還以文學作品為手段，不放棄繼續向世人推動其主張。

即，「唐詩黃絹幼婦抄」中所引用的「石鼓文」之一節，乃佐藤春夫自己心中的感嘆，暗示了其創作之出發點。韓愈對石鼓之暴露荒郊野外感到義憤填膺而寫「石鼓歌」大作，佐藤春夫也因感慨唐詩被冷漠而燃起創作之意慾。對佐藤春夫而言，唐詩正是韓愈心目中的石鼓文吧。

另一方面，「不惜但傷」乃取材於唐代以外、尤以宋朝為中心的名詩譯成之集子。

所謂「不惜但傷」，乃引用漢詩集『古詩源』第四卷的「古詩十九首」中第五首之一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而來。詩以「西北有高樓」為始，內容乃感嘆知己之難求。可見佐藤春夫想說的，勿寧是言外的「知音稀」三個字。如詩中的歌者一般，唱歌——對佐藤春夫而言是創作、更縮小來說是翻譯詩、的辛勞，並不讓他感到苦惱，唯有愈來愈少知音才最傷其心。這一點可由其自敘中得知一二。

唉！到底能引起幾個人思古園之情？其實我也沒那麼大的野心想藉此讓少年子弟領會東洋古代的詩情與詩法。只是，這些乃我近年以書中的古人為師為友、在虛度光陰之際、多少磨練了自己的表現法與表現能力的紀念品就是。碰巧當時無論城鄉都是洋文橫行，主張國語之美等只會惹人笑柄，而漢字也以使用簡字為高明的情形。所以也不曉得人家對我想細細咀嚼漢字並試著努力盡己所能將其重新以美麗的國語表現出來這種不合時宜的願望是給予同情、嘲笑或感嘆。(中略)不過，本書現在雖不知如何，但我深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廣為讀者所愛。這不是作者的努力使然，而是可以預見有朝一日國人會越來越愛原詩呀。

上述的引用雖長了一點，卻也道盡了佐藤春夫創作『玉笛譜』的意圖及其當時的心境與環境之一端。

當時的日本，是西洋一面倒的潮流。整個社會一味地憧憬西洋，一心只想學習西洋，到處洋文橫行，甚至有輕視象徵傳承東洋文化血統的漢字之傾向。這不外是一種被西洋文明沖昏了頭，迷失了自己原有「東洋」文化的現象。這種現象對以中國古典文學、

尤以漢詩作者之中國先賢「爲師爲友」、甚至爲心理之依歸的佐藤春夫而言，是不可漠視的問題。而且，正因有此想法的佐藤春夫在「以書中古人爲師爲友」之間，遇到投自己所好而難以割捨的作品時，還「想細細咀嚼漢字並努力試著盡己所能重新以美麗的國語將其表現出來」，才有『玉笛譜』問世的一天。

總之，如佐藤春夫自己所言，其對『玉笛譜』之期待，與其要讀者去注意他「努力試著盡己所能」所表現出來的「國語」之美，而是希望讀者透過這部作品，能回顧日語血脈中連綿不斷傳承下來的「東洋」傳統。

另外，『玉笛譜』跋的最後，署名「戰敗國之民佐藤春夫」。事實上，『玉笛譜』乃日本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約三年後出版的。明治以來，日本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大正時代，雖有某種程度的反省，結果還是反復不斷地模倣西洋文明。然而，這次大戰卻又被西洋文明衝擊得體無完膚。受到如此衝擊，日本更是幾乎迷失了自己，而有更加强其西化的傾向。如此時代潮流下，佐藤春夫可能也自覺到自己那種「不合時宜」而固守「東洋」文化之類的主張與想法，頂多只會博得同情的眼光或被一笑置之罷了。有這樣的背景與心情，也難怪其署名爲「戰敗國之民」了。儘管如此，佐藤春夫還是毅然且努力不懈地主張維持並傳承自己所確信屬於「東洋」的傳統日本文化。

## 七、結論

佐藤春夫的祖父是漢詩人，父親又是俳句作家，故自幼便親近中國古典文學而理解「詩的精神」，乃極自然的趨勢。在此優惠的家庭環境中，佐藤春夫不覺間已吸收了凝結成俳句形式的日語精髓與中國古典中所展現的哲學及文學概念爲自己的一部分，並以詩人的姿態讓其開花結果。對佐藤春夫而言，唯有五七或七五調那種「自古以來的」日語，才是最能表現自己全部詩情的語言。而且，也唯有回歸到形成東洋文化之血脈根源及中流砥柱的中國古典，並加以咀嚼吸收時，才最能錘鍊出他自己的詩情。

然而，時代潮流卻呈現一種反象。漢詩文已成爲只是一部分漢學家的研究對象罷了，對一般大眾而言，漢詩文更被認定是一種難懂而遙遠的存在。爲此，佐藤春夫並不以強硬推銷漢詩文的原典爲方法，他試著以自己的理解爲基礎來解釋中國的古典，並以自己的用語將其表現出來，以圖讓世人所知。而其最初的佳作，乃其登上文壇不久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李太白」。

1920年到台灣及中國大陸旅行後，佐藤春夫的創作意慾隨其對中國文化傾倒的明顯化而提高，開始一部一部地發表不愧以「喜愛中國文物」爲傲的作品。其中有遊記、小品文及詩、童話、翻譯小說等，體裁各式各樣，而1929年所發表的『車塵集』也是其中之一。

『車塵集』不只可說是當時唯一以純日本式的七五及五七調移植中國原典的成功譯詩集，也是打破當時常識、幾乎都以無名女流詩人的小作為原典的一部譯詩集，乃佐藤春夫最初的一部漢詩譯詩集。

二十年後，佐藤春夫又出版了『玉笛譜』。此乃合併『車塵集』及另外兩篇漢詩的譯詩集，從中可以看出『車塵集』後佐藤春夫選擇漢詩的傾向、意圖與變化。尤其，『玉笛譜』的問世，不只提倡了原作詩詞之美的藝術價值，也提倡了當時情勢中越發磨練加深的佐藤春夫自身——進而是日本文化內部對「東洋」的再認識，給一再漠視東洋的日本文化界敲了一記警鐘，是部值得紀念的文學作品。

筆者但願今後有機會能對此譯詩集的內容及譯法等進一步作更具體的研究。

## 清代荒政之研究 ——救荒政策與備荒措施——

林正成\*

### 摘要

清代荒政的重要步驟乃由救災開始再由官方依勘災、審戶、發賑之程序進行。而清代的救荒措施主要有蠲免、賑濟、調粟、借貸、除害、安輯、撫恤等七方面，其中以蠲免與賑濟最為重要。

中國古代儲糧備荒的傳統可謂淵源流長，漢唐以來逐漸發展的倉儲制度至清代更加完備，清代以常平倉、社倉、義倉等三倉積谷備荒。清代常平倉優於前代的重要特色之一是穀本充裕、穀本來源，則有官紳富民捐輸、貢監捐納、按畝攤徵、截漕增補，撥帑銀採買等，其中最主要的來源則是動庫銀採買。除此之外更在某些地區設置裕備倉以補常平倉之不足，用以平糶賑貸。倉穀之來源乃由捐輸或以漕米易穀貯倉。

綜觀清代荒政措施可謂集各朝代之大成，完全地法制化，且有種種立法督促政策的貫徹實施。

### 前言

荒政措施雖說是千頭萬緒，但通常可分為三方面的處理方式。一即事前預為防範，並力除災患之可能發生，而一旦發生即力加排除。二為災患發生時的應急對策。三為如何維持過渡以至得以復原俾恢復生產的事後措施。本篇主要論述清代的救災程序及其平時未雨綢繆之良策為何？與前相比較又具何種特色，其效益上如何等問題點加以分析討論。

### 第一節清代救荒政策及其基本程序

清代救災，已具有一套妥善並完整的程序。地方每遇天災，得由地方官循序報災、勘災與審戶之程序，以申請中央政府之蠲免及賑濟。在此過程中環環相扣依序處理以確定是否予以災賑，由是可知清代有關荒政之處理已日臻制度化。茲將清代處理荒政的重要步驟與內容分述如下：

#### 1. 報災

報災由地方官吏逐級向上報告災情，此乃政府了解災情的原始依據。清代對報災速度要求甚嚴「凡地方有災者，必速以聞。」否則逾期必予相當處罰（註一）。順治六年曾諭「嗣後直省地方如遇災傷，該督撫即當詳察被災頃畝分數，明確具奏，毋得先行泛報」（註二），惟當時尚未規定報災期限。直至順治十年戶報定夏災限六月底以前，秋災限九月底以前。且得先將受災情形馳奏，並於一個月之內，查核輕重分數，提前蠲免

\*東海大學日文系

註一：嘉慶『大清會典』卷十二。

註二：『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五。

○如逾一個月內者，巡撫及道、府、州縣官各罰俸，超過一個月者各降一級。如遲緩已甚者革職（註三）。至順治十七年，再重申並嚴定夏災限六月底前，秋災限九月底前的報災期限。州縣官逾一個月內者罰俸六個月，一個月以外者降二級，三個月以外者革職。撫、司、道，以州縣報到日期起限，逾期按州縣例處罰（註四）。從此報災遂成定制。報災期限恰當與否非常重要。期限過長，延至收割結束，則不利勘災。但如期限過短，地方官每慮及辦理愆期，易生匿災不報之情。康熙初期戶部曾擬修改定制，將報災期限提前至，夏災不得超過五月底，秋災不得超過八月之議，但最後還是改回原規定。雍正六年，又增定勘報之官寬限十日，奏報之官寬限五日，計以四十五日為限，也即州縣官報災限四十日，上司官接州縣奏報後於五日內上報（註六）。甘肅地區節氣較遲，收穫期也較晚，特准夏災於七月中，秋災於十月中奏報（註七），以因地因時制宜，有此報災規定，尤以對地方官而言：「罪其匿災者，減災分者，報災之不速者」（註八），為災情上達及清政府等安排救災事宜提供一切翔實可靠的管道。

## 2. 勘災

勘災即地方官吏勘查與實核田畝所受災害之程度，並確定成災之成分。依清代規定，受災達六分至十分者方可謂成災。至於五成以下者不以為災（註九）。勘災要與報災同時進行以求火速之功。地方每當遇災後，得一面呈報災情，一面由知府會同知縣與通判以便遴選委員，並任沿河地方之兼河委員，以會同該州縣、迅詣災所履畝確勘，將受災分數按照區圖及村莊，逐一加以區別，俾速申報司道，由該管道員覆行稽查，再共同具結呈請督撫具簽。凡災重之處，更得要求督撫親往查勘（註十）。而勘災的具體方式乃先由災戶自行申報簡明呈單，並註明災戶姓名，所在村莊，受災田畝若干，坐落某區某圖或某村莊及該戶大小口數等，填報後交由地方官與糧冊核對，如申報屬實，方可將其作為勘災底冊。接著查災委員執底冊履畝核實，以劃定災分。待全部勘畢後，州縣官再核造總冊，註明應否蠲緩上報。對勘災不實及隨意刪減成災分數的地方官吏均嚴加懲處（註十一）。

註三：『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註四：『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註五：『清聖祖實錄』卷三十三載有：「康熙九年七月戶部議復：浙江、福建總督劉兆麟疏言，請展報災期限。查康熙七年會議，夏災不過五月，秋災不過八月，地方官每慮愆期，匿災不報。應如所請，仍照順治十七年定例，夏災不出六月終旬，秋災不出九月終旬。從之。」但同書卷二十六曾載康熙七年六月戶部擬改定例為夏災不過五月初一，秋災不過八月初一，康熙未允。」

註六：嘉慶『大清會典』卷十二。

註七：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註八：嘉慶『大清會典』卷十二。

註九：同上。

註十：同註七。

註十一：同註十。

勘災乃以村莊為基本單位，按地畝受災輕重確定災分。凡受災分數不准通縣牽算（註十二）。至於五分以下勘定為不成災之州縣中如有災重地畝應請蠲免者，可按村莊區圖開列註明，以便報災時另行聲請（註十三）。而勘災過程中最大的困難，乃受災地畝往往面積較大，難以在短期內勘察完遍。地方官往往奏請展限。如乾隆元年（西元一三六年），安徽省查勘水災「誠恐限期太迫，未免草率」，請寬限一個月（註十四），同年江蘇省查勘水災，也同樣請展限一個月（註十五）。在一般情況下均可獲准。戶部在接到報災題請後，往往還要再派員復勘。經復核斟酌，或依從原報，或酌予更改，則此勘過程方告結束（註十六）。而此一勘查結果，便可做為蠲免的依據。

### 3. 審戶

所謂審戶即核實災民人口，劃分為極貧、次貧等級，以備賑濟。清代規定，飢口以十六歲以上為大口，十六歲以下至能行走者為小口，再小者不准入冊。但其未具體劃分確定極貧與次貧的分別要件，僅是概略性地指出「如產微力薄，家無擔石，或房傾業廢，孤寡老弱，鵠面鳩形，朝不謀夕者，是為極貧。如田畝被災，蓋藏未盡或有微業可管，尚非急不可待者，是為次貧。」（註十七）。乾隆三年直隸的劃分標準乃「凡實在極貧、止靠數畝窪地，並未收過好麥，及無業窮民猝遇水淹，朝不謀夕，嗷嗷待哺。……其次貧之戶，或尚有高粱數畝薄收，或別有經營活變，不專借地土，或現在稍存糧食牲畜，暫可支持者。」（註十八）地方審戶過程中最感棘手的問題便是區分極、次貧民。因地畝災分不一、戶口多寡各異、查勘起來甚為不易。再加之「辦賑各員意見不同，懷邀譽之心者每失于濫、存刻核之見者多致于遺。」（註十九）但多數情況下，掌握尺度稍寬。雖然難免遺漏、極貧之戶不能獲賑者甚少（註二十）。為了簡化審戶手續，乾隆七年又規定：「山西、湖廣、貴州不分極貧次貧、山東、陝西僅分極貧及次貧、皆按月給賑。江南、浙江原分極貧、次貧、又次貧。凡被災待賑，每至數千戶。分為極貧、

註十二：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日侍郎裘日修奏：「臣查向來散賑其成災分數皆以一州一縣合計為率，不知極高之區亦有下濕，最窪之地亦有高原，不可概論。而率作成災分數，往往非濫即遺。……臣請此番辦賑，惟通行以村莊為率。有一縣俱不成災而某村某莊不妨十分者，有一縣俱成災而某村某莊全不成災者，不得仍前牽混。」朱批：所見是。此前數日裘日修曾奏河南歸德府連遇水災，但高地有收，地方官不能分別辦理，動言率作五六分以上有收。年復一年，窪地災民日益貧困，不能恢復。詳見中共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官中全宗朱批奏摺內政類（以下此類檔案僅簡稱「大陸檔案」四字，不另詳註）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日及六月二十八日裘日修奏。

註十三：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註十四：「大陸檔案」、內閣全宗前三朝題本賑濟類（以下簡稱「前三朝題本」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趙國麟題。

註十五：前三朝題本，乾隆元年十月十二日顧琮題。

註十六：如康熙十九年九月「戶部復議：先經直隸巡撫於成龍以武清等十四州縣衛被災分數題報，奉旨差戶部郎中額爾赫圖查勘。今據回奏，交河、阜城二縣，被災分數應如原報。唐山等八縣衛應比原報減二分，大城等四縣，應不准災。」見『清聖祖實錄』卷九十二。

註十七：汪志伊『荒政輯要』卷二。

註十八：「大陸檔案」、乾隆三年九月十一日李衛奏。

註十九：「大陸檔案」、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尹繼善奏。

註二十：「大陸檔案」、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高斌奏。



次貧易于察驗、至又次貧與次貧相去無幾，不便酌減賑恤。且分析分端，未免耽延滋擾。應只分為極貧次貧，其又次貧宜從刪省。」（註廿一）。

清廷對審戶的要求主要是無遺無濫。因此一再告誡地方官「凡災地應賑戶口、應要正、佐官分地確查、親填入冊，不得假手胥役。」並規定「倘有不肖紳衿及吏役人等串通捏冒，察出革究。若查賑官開報不實，或循縱冒濫、或挾私妄駁者，均以不職參治。」（註廿二）。審戶之後要發給賑票。賑票一共兩聯，各委員按戶查明應賑戶口，即將所帶賑票隨時填明災分、極次、戶名、大小口數、應領糧若干等，將一聯發給災民作為領賑憑據，另一聯則留底以備核查。有的地區還在應賑之戶門首壁上用灰粉書明姓名、人口、極次等等，以便上司委員抽查。地方審戶完畢後，上級官吏均要抽調查。（註廿三）。地方審戶完畢後，上級官吏均要抽調查驗（註廿四）。應增則增、應刪則刪。例如有查出冒開者，有臨賑不到者，有被災之初實屬困苦，今已各謀生計尚可糊口者，則應刪除。有的聞賑歸來，有的夏秋之間尚堪度日，未報入冊，入冬飢寒交迫者，則應添補（註廿五）。審戶情況複雜，有時遇水災民搭棚居於堤上，造成落實審戶工作上的困難（註廿六），因而如遇到規模較大的災情，審戶工作往往得花上一個多月（註廿七），以力求誤差之最微。因審戶是辦理災賑過程中最繁瑣而且又最至關緊要的一道程序。

#### 4. 發賑

發賑即按照賑票所列數目將賑米或賑銀發放到災民手中。也可說是辦理災賑事務的最後一個程序。也是最關鍵性的程序。賑濟錢糧能否順利發放下去，關係到救災的實效。發賑是在審戶的基礎上按戶發給。「極貧無論大小口數多寡，俱須全給。次貧則老幼婦女全給，其少壯丁男力能營趁者酌給（註廿八）。」發賑的工作量大，要求到毫無遺漏，實屬不易。清廷遂在此方面制定補救辦法。

首先是多設米廠。各州縣務選擇適中之地，約一二十里內設一廠作為發放點。三日一給或半月一月一領。放賑前先將某村莊在某處、某日發給之資訊明白曉諭，以免災民往返守候。往往在條件允許下，有的按鄉設廠，再於受災村莊分設小廠，先將米糧運貯，預示放賑日期，並用肩牌告知領賑區圖，逐起傳喚，令災民隨牌進領，驗票付給（註廿九）。其次為防止冒領，每次領賑後，于賑票上加蓋第幾賑放訖戳記，票仍還災民，留作下次領賑之用。賑濟底冊內亦加蓋戳記。俟領完未賑，將賑票收回，繳具核銷（註三十）。

註廿一：『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註廿二：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註廿三：『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四日劉慥奏，以及參看『荒政輯要』卷三。

註廿四：『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馮鈴奏。

註廿五：『大陸檔案』，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那蘇圖奏。

註廿六：『大陸檔案』，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常鈞奏。

註廿七：如乾隆二十二年江蘇十六州縣衛水災，從七月查到九月初才「將次完竣」參看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六日陳弘謀奏。

註廿八：汪志伊『荒政輯要』卷三。

註廿九：『大陸檔案』，乾隆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那蘇圖奏。

註三十：汪志伊『荒政輯要』卷三。

發賑最易滋生的弊病是短少相剋扣。因此清廷規定發賑時「有司官必親臨，毋假手胥役里甲（註卅一）」○並且「部差司官，每府一人，協同地方官親驗給放（註卅二）」○其後再「將賑過銀米數目、戶名、姓名、月日刊示曉諭，以杜胥吏中飽（註卅三）」○這些規定多可對經辦者的貪污侵蝕稍加反制。

## 第二節清代救荒措施實施之概況

清代救荒措施集歷代之大成，最為完備，大凡可賑飢濟貧之術，靡不畢舉。嘉慶『大清會典』卷十二對清代救荒，備荒措施步驟如下：「凡荒政十有二：一曰備侵、二曰除孽、三曰救災、四曰減糴、六曰出貸、七曰蠲賦、八曰緩征、九曰通商、十曰勸輸，十有一曰興工築、十有二曰集流亡。」等十二項施政方針，除「通商」外其餘均囊括歷代相沿而成的各項救災、備荒措施，而通商之法則反映出清代的特色。其目的乃基於易被動為主動的前提下，動員民間力量以通商方式參與更能貨暢流通。

清代的救荒措施主要有蠲免、賑濟、調粟、借貸、除害、安輯、撫恤等七方面，其中以蠲免與賑濟最為重要。現逐一論述如下：

### 1. 蠲免

遇災蠲免錢糧，為清代救荒的重要措施。

清代災蠲早於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時，曾免直隸霸州等八縣水災額賦三年（註卅四）。又「江西頻年旱澇，其今年漕米之未兌運者罷免之（註卅五）」○蠲免的數量最初無定制，至順治十年，才將全部額賦分做十分，按田畝受災分數酌減。「州縣被災八分、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二，四分者免一。」康熙十七年又訂定：「災地除五分以下不成災外，六分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二，九分、十分者免三。」而將四、五分災所免之數取消。隨著社會經濟的好轉，雍正六年大幅度增加災免比例，改被災十分者免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乾隆元年諭被災五分之處亦准免十分之一（註卅六）。各省隨地丁徵收的耗羨，也於災蠲地丁正賦之年按照被災分數一律蠲除（註卅七）。入官旗地被災，將災戶原納租銀分作十分，按災請蠲。受災十分蠲原租十分之五、災九分蠲原租十分之四，災八分蠲原租十分之二，災七分蠲原租十分之一。六分災不予蠲免，但可緩征（註卅八）。康熙、乾隆時期常普免各地錢糧。若于普免之年遇災，也可將因災議蠲各州縣展至次年補行蠲免（註卅九）。

註卅一：『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註卅二：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八。  
 註卅三：『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註卅四：『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註卅五：『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五。  
 註卅六：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註卅七：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三。  
 註卅八：同註卅六。  
 註卅九：同右。

九) ○災情異常嚴重，也有特殊加免。如康熙十一年將邳州等五州縣按災分各加免二分(註四十)。康熙九年山東地震，則准照水旱災例蠲免災民錢糧(註四一)。

蠲免的具體做法是，凡遇蠲免錢糧，各州縣查明應征應免數目，預期開單申繳藩司核實，然後發回刊刻填給各業戶收執，仍照單開各款大張告示，遍行曉諭。但往往災地錢糧獲准蠲免之旨未到而本年錢糧已徵完或徵收了一部分。為此康熙四年下令：「以後被災州縣，將本年錢糧先暫行停徵十分之三，俟題明分數，照例蠲免(註四二)。」為了防止官吏在執行蠲免過程中貪贓中飽，更規定「恭遇蠲免錢糧以奉旨之日為始。其奉旨以後文到以前已輸在官者准流抵次年應完正賦。若官吏朦混隱匿照侵盜錢糧律治罪」○。「災蠲及蒙恩指蠲分數錢糧該管官奉蠲之後，遵照出示曉諭刊刻免單，按戶付執並取具里長甘結，詳情咨送部科察核。若不給免單，或給而不實，該官吏均以違旨計贓論罪。胥役需索，按律嚴究，以失察官議處。」(註四三)。康熙六年，又詳定五條處分條例：「以後被災州縣衛所，凡奉蠲錢糧，有已徵在官，不准抵次年者，有未徵在官，不與扣除蠲免，一概混比侵吞者，或于督撫具題之時，先停徵十分之三，及部覆之後，題定蠲免分數，不將告示通行曉諭者，或止稱蠲起運，不蠲存留，使小民僅沾其半者，或于田單內扣除，而所扣不及蠲額者，州縣各官，俱以違旨侵欺論罪。如上司不行稽查、道、府俱降三級調用，督撫、布政司俱降一級調用。如該管上司察出，不行糾參，被科道察糾，旁人首告，俱照徇庇例議處(註四四)。」康熙十五年又規定，凡蠲免時隨意增減造冊者，州縣衛所官降二級調用，該管司、道、府、都司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個月。康熙十八年再加重對侵佔蠲賦官吏的嚴懲，凡被查出者照貪官例革職查辦。上司官包庇者亦革職(註四五)。由於有上述種種嚴刑重罰，以連座方式不僅懲處違法的當事官吏，更追究具有失察之責的上司官，大幅度的提升災蠲的正常實施。

與災蠲相關的措施是緩徵。所謂緩徵乃是將受災較輕地區的應徵額賦暫緩徵收。成災五分之州縣以及成災五分以上州縣中之成熟地畝徵錢糧例准緩徵。而當年緩徵錢糧，可緩至次年麥熟後開徵。次年麥熟後應徵錢糧，遞行緩至秋成(註四六)。緩徵雖與蠲免有根本區別，但臨災緩徵，總可略紓民力。連年災歉之區，也常根據災情延長緩徵期限，甚至將緩徵錢糧一併蠲免(註四七)。自嘉慶朝起，由於財政困難，緩徵愈加成為經常實施的救災措施。

## 2. 賑濟

註四十：『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五。

註四一：『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七。

註四二：『清聖祖實錄』卷十四。

註四三：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註四四：『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一。

註四五：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三。

註四六：同註四三。

註四七：如乾隆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就曾免直隸災緩銀，參看『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二五、一三四九。

賑濟是用錢糧救濟災民。順治初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之賑濟主要針對八旗人口。八旗墾地每畝給米二石，口外八旗蒙古地畝被災，按飢民名口折給米銀，八旗游牧地方被災人口每月給米一斗（註四八）。直省較大規模的賑濟，始見於順治十一年，是年發帑銀二十四萬兩賑直隸各府災民（註四九）。此後兼及於浙江、湖北等地，康熙朝以後漸施於各省。康熙、雍正時期，賑濟月給米數、賑濟等項均無定制，大體上視災情而定。如康熙九年賑准，災民「人給米五斗，六歲以上十歲以下半之（註五十）。」是一次性賑濟，若按月支給，則每口月支三、四合至七、八合不等（註五一）。乾隆四年，正式制定出統一的標準，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二合五勺。按日合月，小建扣除。盛京旗地、官庄地（隸屬皇室官吏之莊田，清代可分為宗室莊田，八旗莊田，駐防莊田，乃至糧莊、鹽莊、棉花莊等）、站丁（驛站之丁夫）等災賑米數，大口月給米二升五升，小口減半，比各直省要多（註五二）。賑濟米谷不足者可銀米兼給。各省均有折賑定價，大致康熙、雍正時期米一石折銀一兩，乾隆以後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嘉慶時米一石折銀一兩四錢。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五省例不折賑。若米價昂貴，折賑銀不敷買米，或災情嚴重，還可奉旨增加折銀數目（註五三）。賑濟期限，也于乾隆七年確定。地方凡遇水旱即行撫恤，不論成災分數，不分極、次貧民，概賑一個月，是為正賑，也稱急賑或普賑。待勘災、審戶之後，被災六分者極貧加賑一個月，被災七、八分者極貧加賑兩個月，次貧加賑一個月，被災九分者極貧加賑三個月、次貧加賑兩個月，被災十分者，極貧加賑四個月，次貧加賑三個月，此為大賑。大賑賑四個月者從十一月起賑，賑三個月者從十二月起賑。賑一或二個月則從正月起賑。若地方連年災歉，或災出非常，則許將極貧加賑五、六個月至七、八個月，次貧加賑三、四個月至五、六個月。賑期也有從九、十月份開始的（註五四）。大賑賑畢之後，災民生計仍然艱難，或次年青黃不接之際災民力有所不逮，臨時奏請再加賑恤，是為展賑。展賑多從三月起賑，賑一至三個月不等（註五五）。除上述正賑、大賑、展賑之外尚有摘賑之法。而所謂摘賑也稱之為抽賑，即擇應賑者面賑之。通常實施摘賑的情形有下列幾種：

註四八：同註卅二。

註四九：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八。又順治四年曾賑江南、八年賑蘇州，規模很小。參看乾隆二年『江南通志』卷八十四。

註五十：『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註五一：如康熙三十年賑陝西災，「每大口日給米三合，小口一合五勺。」同年賑直隸災，「每大口日給米四合，小口二合。」康熙四十二年賑安徽災，「大口日給五合，小口給三合」等。參看『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六。

註五二：同註四六。

註五三：參看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嘉慶每石米折銀數見「大陸檔案」，嘉慶八年三月五日顏檢奏。又乾隆二十二年江蘇正賑每石增給銀二錢，見「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陳宏謀奏。又『清朝文獻通考』卷八十一載乾隆諭曰：「此次通海等處同時地震，情形較重，……若僅每石折銀五錢，為數尚少，恐不敷買食。著再施恩加倍折給銀一兩。」

註五四：「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陳宏謀奏。

註五五：每年歲末，清廷要向諸省查詢是否有災地應於來年春展賑，以便新正發帑。參看「大陸檔案」，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四日閔鶚元奏引十月十六日所奉上諭。

一、於勘驗戶口時，遇有老病孤苦情狀危慘，非急賑之不生者，如驗明實情，知會印官，即可先行摘賑。

二、正賑之後，大賑之前，極貧戶內有老病孤寡，一經停賑，難以存活者，應行摘賑，使接至大賑。

三、成災五分之地，與六分相近，恐勘報稍有不確，或氣涼霜早，分數減變。可將五分災內無地極貧酌量照六分成災定例摘賑（註五六）。

此外；對特殊災害，也有特殊賑法，如乾隆四十七年江蘇豐、沛等縣及山東濟南等府屬受重災，諭「常予賑恤，不必論月，災退後始行停止（註五七）」。<sup>○</sup>盛京旗地、官庄、站丁的賑期也有優待，災後先借一月個口糧，不作正賑。及查明被災分數，不論極貧次貧，旗地災十分九分者賑五個月，八分七分者賑四個月，六分五分者賑三個月。官庄災十分九分八分者賑五個月，七分六分者賑四個月，五分者賑三個月。站丁災十分九分八分七分者賑九個月，六分五分者賑六個月。災賑主要針對農民，但貧生、飢軍也可隨坐落地方給賑（註五八）。<sup>○</sup>所不同的是與滿族或清廷相關之人員更從優撫恤而已。<sup>○</sup>同時，賑濟還分夏災、秋災兩類，以賑秋災為主。民田夏月風、雹、旱、蝗、水溢成災，若秋禾播種可望收成，統俟穫時確勘分數另行辦理。其夏災之後播種較晚，必須接濟者，酌借子種口糧，秋後免息還倉。若播種只有一季，夏月被災，即照秋災例辦理。播種兩季地方，既被夏災不能復耕秋禾者，亦照秋災例辦理（註五九）。<sup>○</sup>

賑濟的另一種形式是煮賑，也即賑粥。清人對煮粥的看法也有所分歧。惠士奇謂荒政之弊有四，而行粥居第一。<sup>○</sup>其認為煮粥之法，壯得之而不能及老幼，近者獲哺而不能周僻遠，且飢疲之民聚聚一團，往往口腹未果而爭奪夷傷。張伯行則建議改煮粥為擔粥，即富家有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隨處給食，食畢而歸。明日再煮，陸續挑給。但此法實際上未能實行。清代煮粥仍以設粥廠為主，為克服上述弊病，也採取管理措施，如領粥給簽，男女分撥設柵相隔等，粥廠秩序遂有改善。近城之地設粥廠，遠在四處者則於二十里內各設一米廠，照煮賑米數按口月給一次，使遠者亦可得賑。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煮粥只是賑濟的輔助性方式，如「夏秋被災較重，例賑之外，准予近城處所煮粥兼賑（註六十）。」<sup>○</sup>或者「被災州縣於本地災民例得撫賑之外，凡有外來窮人俱擇寬展處所設廠煮粥施賑，俾得借資糊口以度殘冬（註六一）。」<sup>○</sup>此施粥的對象主要是流徙之災民。京城每年例行煮賑，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京師五城按城設廠煮粥賑濟，每城日給米二石，柴薪銀一兩。直省省會也照京師五城之例於每年多月煮賑（註六二）。<sup>○</sup>例如蘇州城自雍正十一年以來，每至

註五六：楊景仁『籌濟篇』卷六。

註五七：同註五十。

註五八：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十二。

註五九：同註五二。

註六十：同上。

註六一：『大陸檔案』，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鍾音奏。

註六二：同註六十。

歲末，煮粥一月（註六三）。赴諸城粥廠食賑者除城內貧民外，大部分是本省甚至外省流徙而來的災民。清代在廠行賑濟的基礎上又施以煮賑，更使賑濟制度趨於完善，為衆多的災民提供更多的賑濟方式。

工賑也是清代經常施行的一種賑濟方式。災年由官府興辦工程，募災民勞作，日給米或給錢，既可使災民免除飢饉，又能利用民力，實屬最為積極的救災辦法。工賑興辦的事業，雖然也包括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程，如修築宮室、官府衙門等，也有一些與國計民生關係不大的工程，如修城牆等，但絕大部分仍與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的工程有關，如清淤、補堤、開渠等，使工賑帶有生產自力救濟的性質，更有利於來年的農業生產及防治災害。正如清人所言「廣賑莫過於興工，而興工莫善於溝渠堤防，蓋以一時之補救，而開萬世之樂利也（註六四）。」

事實上，工賑實行起來也很方便，如乾隆二年蘭州受州，統計應加賑貧民計十五萬餘口。其中老弱殘疾及不能力作者只令領賑，每戶內之精壯勞力另冊登記，施以工賑。城工每日需夫役二、三千名，每名日給銀六分，每二十日更換一批人，使災民于領賑之外，又可得工賑銀一兩二錢（註六五）。工賑給銀的標準，除上述按日計值外，如系修堤，則按土方給銀，一般每土方給米一升，銀一分。如工程險要，土質浮鬆者，還要每土方加給碎實銀一分余（註六六）。若為開河，旱土方給米三升，水土方給米四升五合（註六七）。

清代工賑的特點一是數量多，興辦次數頻繁。凡有可行工賑之項，即行動工。或者災後令督臣、河臣「查該地方應修工程酌議舉行」（註六八），或者徑先撥款，由地方官「悉心斟酌，于地方或開浚河道，或修理城垣堤岸，令小民就近開工，借以糊口」（註六九），二是工賑內容以治河修渠為多。除大規模的挑河、堵口、築堤等多借工賑興辦外，遇災受損之農田水利設施，也立即興工賑搶修，以免影響日後生產的正常進行（註七十）。

### 3. 調粟

調粟是通過糧食調撥救濟災民的辦法。古代調粟，主要是移民調粟。有災民自發逐熟就豐，官聽其便者，也有官府有計劃地組織、安排者。清代前、中期由於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交通發達，各省糧食儲備充足以及糧食日益大量地進入市場，調粟也因而移

註六三：「大陸檔案」，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許容奏。

註六四：「大陸檔案」，乾隆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朱鳳英奏。

註六五：「大陸檔案」，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元展成奏。

註六六：「大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劉峨奏，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梁肯堂奏。

註六七：「大陸檔案」，乾隆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張鳴鈞奏。

註六八：『清世宗實錄』卷一三八。

註六九：『清世宗實錄』卷五三。

註七十：如雍正二年九月曾論：「今歲七月中，颶風大作，海潮泛溢……被冲海塘若不及時修築，恐鹹水灌入內河，有礙耕種。爾督撫等著即查明各處損壞塘工，料估價值，動正項錢糧，作速興工。至沿海失業居民，度日艱難，借此庸役，俾日得工價，以資糊口。是拯救窮民之法，即寓其中矣。」參看『清世宗實錄』卷二十四。

粟就民爲多，很少採用移民就粟的方法。或偶爾行之，也要求外出覓食者「俟本處麥收有望，即可速回鄉里（註七一）。」此種權宜之計，事後即令停止。嘉慶時期，由于人口壓力與災荒日益嚴重，「恐借糶緩征，亦未能周普（註七二）」對移民就粟的限制逐漸放寬，主要是允許直隸、山西、陝西、甘肅等地災民出關覓食。嘉慶八年諭：嗣後「即遇關內地方偶值荒歉之年，貧民亟思移家謀食，情願出口營生者，亦應由地方官察看災分輕重，人數多寡，報明督撫，據實陳奏，候旨允行后，始准出關（註七三）。」就此而言，比起前代，移民就粟之事雖已大爲減少，由此一事態足可顯現出清廷尚無足夠的糧食儲備及運輸能力來撥糧救災。

清代的調粟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截漕平糶」。如康熙三十三年准許直隸景州等沿河一帶受災諸州縣衛每歲將山東漕米截留二千石發糶（註七一），康熙四十年題准「截留楚省漕糧四萬五千石，分發淮安等處平糶」（註七五）等。調粟的另一方法是採買。如雍正二年江浙災，由湖廣買米十萬石，江西買米六萬石，安徽買米五萬石，運至江蘇平糶（註七六）。嘉慶六年直隸災，也是由山東採買米麥十萬石，河南採辦小麥五萬石平糶（註七七）。調粟的再一種方法是撥運。由政府統一安排或發通倉米運赴災地（註七八），或調他省米濟災民（註七九）。由于所調之粟主要用于平糶，而只有中等之家才有可能糶米，因此這項措施的大部分受惠者是尚有餘力之百姓，其主要作用是平抑糧價，減輕災後的糧荒現象，使災區無缺食之虞。對領到賑銀的極次貧民而言，也須靠此購糧度日。

清代調粟，經常爲之。不僅臨災調撥，也根據各省糧食存貯情況預先調運（註八十）。具有儲糧備荒的作用。調粟既有省內協濟，又有跨省調運，數額巨大，接濟地區廣泛，是頗有成效的救災措施之一。

#### 4. 借貸

借貸是針對尚可維持生計，但又無力進行再生產的災民的救荒措施。借貸的對象，一是受災五分之貧民，依此規定准酌借來春口糧（註八一）。二是蠲、賑之後，尚未完全恢復之災民。如康熙三十五年曾諭：「直屬寶坻等州縣被水，今年錢糧業已免徵，無

註七一：「大陸檔案」，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七日梁肯堂奏。

註七二：『清仁宗實錄』卷五。

註七三：『清仁宗實錄』卷一一三。

註七四：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一。

註七五：同上。

註七六：『清世宗實錄』卷二十四。

註七七：『清世宗實錄』卷八十五。

註七八：『清世宗實錄』卷四十一。載雍正四年「發通倉米二萬五千石運往保定，減價出糶。」

註七九：『清世宗實錄』卷四十五載雍正四年將江西存倉之穀運至福建平糶。

註八十：如雍正十二年命將江南起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分貯江蘇被災各州縣俟來春平糶。參看『清世宗實錄』卷一四八。

註八一：同治四年『戶部則例』。

可蠲恤，該府責成賢能地方官，確查實系窮民借支倉米，務令均沾實惠，不致流離失所（註八二）。」三是青黃不接之際缺乏子種、口糧的災民。如康熙三十一年貸山東貧民谷二十八萬石以濟春耕（註八三）。這類借貸為數最多。上三種情況往往同時並存，因此借貸範圍頗為廣泛。例如乾隆七年諭：上江風、穎、泗三屬連年被潦，民因為甚，著將三屬已賑貧民再借與口糧一月。其正月止賑之處，去麥秋尚遠，最貧之民借與口糧兩月。至五分災不賑者，定例於春日酌借口糧，統于秋成還倉（註八四）。」借貸米谷不敷，可照例用銀折借（註八五）。

借貸的種類有貸口糧、貸子種、貸耕牛等（註八六）。借貸的錢糧來源，主要是常平倉、社倉倉谷，而借貸是常、社倉的重要功能之一。再者是截漕或發庫銀出貨（註八七）。有時也動用州縣捐項（註八八）。出貨米谷時，州縣官必須按名面給，秋熟後按戶繳還。若胥吏詐冒領給，致追欠無著，胥吏依法處罰，逋欠之數由州縣官名下追還，並論以失察之罪（註八九）。最初災年借買米谷於秋後徵還時每石加息一斗。乾隆二年諭曰：「若值歉收之年，國家方賑恤之不遑，非平時貸谷者可比，若還倉時止應完納正谷，不應令其加息。將此著為例（註九十）。」從此借貸徵還時要分別年歲豐歉收息免息。乾隆十七年又提出具體規定，即災民所貸種食，夏災貸者秋後免息還倉，秋災貸者次年麥熟後免息還倉（註九一），使借貸的功能得以擴大，也更能發揮救災的功用。

#### 5. 除害

除害主要是指捕除蝗蝻，為救災減災的重要手段。清代蝗災尤甚，因此對捕蝗非常重視。康熙曾著『捕蝗說』，對蝗蝻生長規律與捕蝗方法有較多論述。地方官員等也因大量吸收捕蝗經驗（註九二）。直省每有蝗災，康熙、乾隆諸帝總要親自且具體的指揮各地協同滅蝗。且對捕蝗失職官吏的處罰也極嚴格。州縣官員遇蝗蝻發生，不身體力行撲捕，借口鄰區飛來，欲藉此卸責者，一律革職拿問。該管道府不速催撲捕者，降三級留任，布政使不行察訪速催撲捕者，降二級留任，督撫不行查訪嚴飭催捕者，降一級留任。協捕官不全力協捕，以致養成羽翼，為害禾稼者，將所委協捕各官革職。各級地方官遇有蝗蝻發生不申報者也要分別革職或降級留任（註九三）。

註八二：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二。

註八三：同右。

註八四：同註八二。

註八五：同右。

註八六：如乾隆七年貸安徽災民口糧，乾隆十年貸安徽災民子種，同年貸直隸災民耕牛等。參看『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二。

註八七：康熙六十年以截漕之米貸直隸災民，同年撥解戶部庫銀二十萬兩貸給陝西、甘肅災民。參看『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二。

註八八：如康熙三十年貸給山西災民捐米。康熙三十一年貸陝西災民捐銀。參看『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二。

註八九：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二。

註九十：同右。

註九一：同註八九。

註九二：參看『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又陸曾禹之「捕蝗八所」、「捕蝗十宜」等所論甚詳。

註九三：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八十八。



清代捕蝗，特重在蝗蝻始生之際，羽翼未成之期。同治四年『戶部條例』卷八十四所載督捕蝗蝻條例規定：直省濱臨湖河低窪之處，須防蝻子化生，該督撫嚴飭所屬，每年於二、三月早為防患，實力搜查。一有蝻種萌動，即多撥兵役人夫，及時撲捕。或掘地取種，或於水涸草枯之時縱火焚燒，各該州縣據實稟報，該督撫具奏。倘有心違飭，不早撲除，以致長翔飛騰者，一經發覺，重治其罪。如系飛蝗，就要動員大批人力撲打。如雍正十二年夏有飛蝗臨近山東濟陽縣。縣令即調集本縣民夫八百名，並委派二十余人在境設廠守候。俟飛蝗入境，廠中傳炮為號，民夫齊集到廠。每里設大旗一枝，鑼一面，每甲設小旗一枝。地方官執鑼，鄉約執大旗，甲長執小旗。各甲民夫隨小旗，小旗隨大旗，大旗隨鑼。民夫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低頭徐行撲捕。東邊人直捕至西盡處，西邊人至東盡處，折返再捕。每日早、午、晚乘蝗蟲沾露難飛和歇息不飛之機分三次捕打。因所集為本鄉民夫，故能不傷禾苗（註九四）。由此可見清代捕蝗組織周密，收效顯著。捕蝗最大的問題是外來協捕人員往往踐踏禾苗，反而貽害。為補救計，清廷還規定：「地方督捕蝗蝻，凡人夫聚集處所踐傷田禾，該地方官查明所損確數，核給價值（註九五）。」如災情不重，一般則採取勸諭百姓自行撲打，官用錢米收買的辦法（註九六）。挖掘蝗蝻及所捕飛蝗，官府皆按斗給錢文，以鼓勵百姓捕蝗。

#### 6. 安輯

小農御災無力，難以生存，只有外出謀食。每罹重災，流徙之民更不在少數。災民流亡，田地荒蕪，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流民聚集，若不能妥善安置，也易釀成事端。因此歷代政權對安輯流民十分重視，給復 給田，資送回籍等都是較為常見的安輯辦法。清代的安輯措施則主要為收養貧民與資送流民回籍。

清代極為重視對流亡在外災民的安置工作。地方遇災，便傳諭督撫飭令各州縣妥為收留安頓外來流民，賑給口糧粥食，并為之搭棚置屋居住。同時也勸諭富戶量力收養，「有能存恤周濟者，該地方官酌量輕重，賞給花紅旗匾。最優者，詳請題達，給以頂帶，以示鼓勵（註九七）。」如乾隆十三年山東全省收養本省及外省災民五萬六、七千口，計收養二、三個月不等（註九八）。嘉慶六年初湖北漢陽收養災民六萬余人，絕大多數為外來難民（註九九）。為順利春耕生產，至開春以後，要將所收集的外地流民資送回籍。雍正八年曾諭：「凡遇外來被災就食窮民，即動支倉谷核實賑恤，再動用存公銀兩賞為路費，資送回籍。并知會原籍地方官收留照看。嗣後以此為例。」但清廷也考慮到「若必設立科條，令各直省通行資送，徒致紛繁滋擾，殊非政體（註一〇〇）。」因而仍未制定統一法規，而由各省自行酌量辦理。如山東，「預給十日口糧，資其路費，

註九四：李鍾份「捕蝗記」，載『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五。

註九五：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註九六『清仁宗實錄』卷一九七。

註九七：『清世宗實錄』卷一〇八。

註九八「大陸檔案」，乾隆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准奏奏。

註九九：「大陸檔案」，嘉慶六年三月四日倭什布奏。

註一〇〇：「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傅恒等奏。

并令知照各原籍地方官，妥爲安插，以使得所（註一〇一）。」陝西是按路途遠近，每日計行五十里，照例大口給銀三分，小口給銀二分，以資送災民回籍（註一〇二）。湖北則「每大口給銀一兩，小口給銀五錢，飭令各歸原籍。并令經由各州縣差役護送，仍飭知原籍地方官俟到籍後察看情形，妥爲安頓，以免失所（註一〇三）。」收養並資送災民回籍，除可救濟災民外，對恢復生產也可發揮直接的鼓勵作用。但此法於執行上則易出紕漏。例如災民領取路費之後，是否真正返回原籍難以稽查監督，不免有往返於鄰省重複再領路費者。更因爲有此例，一遇災歉，災民輕去其鄉，對救災反而不利。因此至嘉慶中期，已不再實行這一辦法（註一〇四）。

#### 7. 撫恤

清代對災情也有多項撫恤措施，據『大清會典事例』之記載，計有恤孤貧、養幼孤、收羈窮、安節孝、恤薄宦、矜罪囚、撫難夷、救災等等。除最後一項外，均屬一般性救濟性質的措施，與以恢復社會再生產爲目的的救荒政策關係不大。如是故本人僅論及救災一項。

救災是對突發性災害如地震、海嘯、颶風、山洪等所造成的破壞施予救濟的措施。其目的是安置災民，使能盡快復業，從事正常生產。依清廷規定，地方猝受水災浸害，督撫一面題報，一面得委官確查沖坍房舍及淹斃人畜情形，以分別撫恤。「被災之家，果系房屋沖塌無力修整，并房屋雖存，實系飢寒切身者，均酌量賑恤安頓。如遇水雹颶風等災，其間果有極貧之民，亦准其一例賑恤（註一〇五）。」各省坍房修費及淹斃人口撫恤銀最初尚無訂定額數，如廣東沖倒大瓦房每間賑銀一兩，小瓦房并大草房每間賑銀五錢，小草房每間賑銀二錢五分，淹斃男婦每口賑銀二兩（註一〇六）。雲南沖倒瓦房每間賑銀一兩五錢，草房每間賑銀一兩，淹斃人口每口賑銀一兩五錢（註一〇七）。山西全坍瓦房每間給銀一兩二錢，全坍土房每間給銀八錢等（註一〇八）。河南被水沖塌房屋貧民則每戶給銀一兩（註一〇九）。於此一期間各省予災民的賑銀均有所不同，全視各區的財務狀況而定。及至乾隆四十一年也以此方式對各省分別制定了撫恤標準，大體上坍房修費，瓦房每間一兩五錢左右，草房八錢左右。淹斃人口每大口給銀一兩左右，小口則減半（註一一〇）。地震壓斃人口及坍房也給予相當的撫恤銀及修繕費。如雲南於乾隆二十六年之地震，坍倒瓦房每間賑銀五錢，草房三錢。壓斃大口每口賑銀一

註一〇一：同註九八。

註一〇二：「大陸檔案」，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查郎阿奏。

註一〇三：同註九九。

註一〇四：汪志伊『荒政輯要』卷三。

註一〇五：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七。

註一〇六：「大陸檔案」，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武繩謨奏。

註一〇七：「大陸檔案」，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愛必達等奏。

註一〇八：「大陸檔案」，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鄂爾琿奏。

註一〇九：同註一〇五。

註一一〇：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八十四。

兩五錢，小口五錢，壓傷不論大小每口賑銀五錢（註一一一）。有了上述撫恤之案例，災民於猝受災傷之餘，或多或少均可由清廷獲得重建家園的補助及救濟。

### 第三節清代的備荒措施

我國古代儲糧備荒的傳統可謂淵源流長，漢唐以來逐步建立並發展的倉儲制度至清代時更加完備。清代以常平倉、社倉、義倉等三倉積穀備荒，現將各倉概況分述如下：

#### 1. 常平倉

常平倉始建於西漢，最初的作用是豐年平糶荒年平糶，唐宋以來漸發展為賑糶兼行。清代常平倉恢復重建於順治中中期。清初災荒嚴重，欲賑而無穀物，因而促成統治者重建倉儲制度的決心。順治十二年題准各州縣自理贖緩，春夏積銀，秋冬積穀，悉入常平倉備賑。翌年更議准積穀賑濟，令修葺倉廩，印烙倉斛，選擇倉書糶糴平價。不許別項動支（註一一二）。清代常平倉仍保有賑貸與平糶兩大功能，春夏出糶，秋冬糶還。如遇凶荒，則按數賑給災民。倉穀存糶的比例為存七糶三，各地也可酌情略有變動，或存六糶四，存半糶半，以及不限數額。大體上豐年少糶或停糶，歉歲逾額出糶，亦不得空倉全糶。並規定糶後得報查核。出糶的價格，豐年每石減市價銀五分，歉歲減銀一錢。如米價過昂，也常破例多減，通常以不得超過三錢為原則，但如屬狀況特殊，亦有減四錢和減市價十分之三的情形（註一一三）。

清代常平倉優於前代的重要特色之一是穀本充裕。而穀本來源，則有官紳富民捐輸、貢監捐納、按畝攤徵、截漕增補、撥帑銀採買等，其中最主要的來源是動庫銀採買（註一一四）。由國家直接出資買補，可有效地維持倉儲的充裕，並可隨時平糶賑貸。

關於常平穀之額度，各省、府、州縣均有定額，康熙四十三年規定大州縣存萬石，中州縣八千石，小州縣六千石。其餘則按時價易銀解存藩庫。但由於南北方氣候差別甚大，北方易於儲存糧穀，各州縣貯穀額數略高一些，如山東、山西等之大州縣存穀二萬石，中州縣一萬六千石，小州縣一萬二千石。陝西咸寧、長安二縣貯穀額達七萬五千石。南方如江蘇、四川，大州縣僅五、六千石，中州縣四千石，小州縣二、三千石。康熙至乾隆初，存倉米不斷增加，全國總定額已達四千八百餘萬石。但官聚過多，也成為各省米價上漲的因素之一。因而乾隆十三年又另行重新調整各省定額，陝、甘、雲、貴、

註一一一：「大陸檔案」，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愛必達等奏。

註一一二：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九。

註一一三：「大陸檔案」，乾隆十六年二月四日溫承惠奏，嘉慶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富俊奏。

註一一四：康熙十八年題准：「地方官整理常平倉，每歲秋收，勸諭鄉紳士民，捐輸米穀。」雍正四年議准：「暫照河工議敘貢監之例，將銀改為本色米穀，每銀一兩，收米一石，或谷二石，……并出示曉諭，本省生監，令其急公赴輸，且分別府州縣之大小，酌量應輸米谷之多寡，俟各該處應貯穀捐足之日，即行停止。」康熙二十一年議准：「山東每畝捐穀四合，除原有可貯倉廩外，其無倉廩之州縣，交與地方官酌量建造。」此雖云捐輸，實系攤徵。康熙五十九年覆准：「河南截留漕米內，撥十萬石，運至西安存貯。」乾隆元年議准：「江西動用存公銀買穀十萬石，分貯各府州縣備緩急。」以上所列，為常平倉穀本之主要來源，參看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九。

閩、粵等省照乾隆時定額，其餘諸省照雍正時定額，通計全國各省共積穀谷三千三百余萬石。各省多者如甘肅三百余萬石，少者如廣西祇近三十萬石（註一一五）。倉穀出糶後，要於秋收後買補還倉。如遇穀價昂貴，可將所糶價銀解交府庫，俟次年秋成價賤時如數買補。或至鄰邑、鄰省買補。被災州縣若倉糧散給無存，則務於秋收豐稔之際，題明撥銀買補。買補倉穀嚴禁派累百姓，如有發短價低銀、抑勒交糧、斗秤以大易小者定嚴加查辦懲處（註一一六）。從乾隆時期屢次上諭以觀，清廷對買補倉額十分重視，遇豐年告誡地方督撫預為積貯，歉歲則根據情形相機等籌劃，盡量保證定額。或難以買補足數，即截漕補倉。因此乾隆中期以前常平倉較為充裕。

並且為了確保倉穀實貯，清代還規定了嚴格的盤查追賠制度。借糶倉糧時地方官得親臨驗放，每年年底州縣官須將存放倉數目造冊上報。州縣官離任時常平倉穀亦須照正項錢糧交代，如有虧空限期賠補。如逾期限者，則照侵挪倉穀定例治罪。督撫離任，得將冊籍交代新任，並限新任官三個月內查核奏聞。如有虧空，即行題參。清廷對此項甚為重視，認為：「若虧空倉糧，則一時旱潦無備，事關民瘼，是虧空倉谷之罪較虧空錢糧為甚，自宜嚴加處分（註一一七）。」雍正四年更具體議定如下：

「……倉谷虧空處分，以谷一擔，比照錢糧五錢定罪。嗣後虧空倉谷，系侵盜入己者，千石以下，照監守自盜律擬斬，准徒五年。千石以上，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不准赦免。……系挪移者，數止千百石，照律准徒，五千石至萬石，照律擬流外，萬石至二萬石發邊衛充軍，二萬石以上者，照侵盜擬斬（註一一八）。」

除以上類以侵犯行為之罰責外，更針對因官員失職，導致存倉米穀霉爛損失者，亦須革職留任，限期賠補。若逾期限未補齊，則照定例擬罪。雍正時期對盤查倉糧執行甚嚴，因而大多數的處分條例都於此期制定的。

常平倉主要是供本地糶借賑貸。康熙十九年曾定，直省常平倉留本城備賑，永停協解外郡（註一一九）。但各省豐歉不均，具體情況亦各異，尤其江南氣候濕熱，倉穀易於霉變，存貯難多，而人口又高度集中，救災賑糶「非借資鄰省不足以充用（註一二〇）」，調糧救荒遂無法避免。乾隆時期，常平倉出省協濟之事屢屢可見（註一二一）。撥

註一一五：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九。

註一一六：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〇。

註一一七：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一。

註一一八：同上。

註一一九：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九。

註一二〇：「大陸檔案」，乾隆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朱鳳英奏。

註一二一：如乾隆二年八月從河南偃師等七州縣常平倉貯穀中碾運十六萬石接濟陝西，參看「大陸檔案」，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尹會一奏。又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從山西寧武等十州縣常平倉谷中碾運四萬石協濟陝西，參看「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劉惻奏。

後缺額，往往以截漕補足（註一二二）。跨省協撥更有利於發揮常平倉在更大區域的備荒救荒的功能。

清代在一些地方還設有少量的裕備倉，其作用基本上與常平倉相同，用於平糶賑貸。倉穀的來源乃由捐輸或以漕米易穀貯倉。如乾隆四十二年于安徽鳳、潁二府屬添建裕備倉，其具體做法則是倉中「不拘豆麥雜糧，增貯二十萬石，分貯鳳陽、壽州、鳳台、亳州、阜陽、霍州、蒙陰、太和、潁上等州縣，以備鳳、潁二屬就近撥協賑濟。如遇無需動用年分，照常平糶易之例，於糧價昂貴時，存七糶三，減價平糶。若遇貯穀年久，亦一律出陳易新。其有無動用，均照常平倉穀，于每年歲底一律盤查，奏銷結報（註一二三）。」其目的乃是於小區域設此倉，以彌補常平倉的疏漏之處，發揮相輔相成的功能。

## 2. 社倉

社倉創於宋代朱熹，其基本特色是穀本源於捐輸，採官有民營，由地方官監督的方式，倉穀用於出借并逐漸由收息至免息。清代基本繼承了宋代社倉的主要內容，使其成為鄉村儲糧備荒與扶助生產的方法之一。

社倉在康熙時期屢有興廢。康熙十八年，下令於鄉村建立社倉。初時尚產生一定的功能，如康熙二十二年河南曾將社倉積穀借與墾荒之民，免其生息，秋成還倉（註一二四）。但不久便如同虛設。康熙四十年之後直隸巡撫李光地疏請再行社倉。試行幾年，收效甚微。其主要困難是穀本拮据和管理不善。據直隸巡撫趙弘燮奏報：「今四十五年社倉米穀等項臣再三勸諭，止捐有一萬四千六百石，為數無幾。當此豐收之歲尚然完納寥寥，偶遇歉年，地方官奉行不善者，勢必不便于民（註一二五）。」因此其法未及推廣便自行終結。康熙五十五年張伯行疏請于直隸等地方建立社倉，未被批准（註一二六）。於是終康熙之世，社倉一直未能得到恢復。

雍正即位之後，下令各省推行社倉，並制定出較為完善的社倉條例，於雍正二年頒佈。其主要內容為：勸諭社穀，不拘升斗，聲民自便。若捐至十石以上，給以紅花，三十石以上，獎以匾額，五十石以上遞加獎勵，捐至三四百石者，給以八品頂戴。每社設正副社長，選擇品行端正家道殷實者二人擔任。如能出納有法，鄉里推服，可按年給獎。十年無過，給八品頂戴。徇私舞弊者即行革懲，侵蝕者按律治罪。出借社穀每石收息二升，小歉之年減息之半，大歉之年全免其息。息穀二倍於本穀之後只收十分之一穀息。

註一二二：如乾隆十六年諭：「著江浙二省督撫，于浙省及江省稍近州縣常平倉谷內，酌量應需數目，作速動撥，碾米轉往溫、台等屬接濟平糶。其常平缺額，即于浙省冬兌漕糧內照數截留，撥補還倉。」參看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一。又乾隆二十二年撥江西、湖北倉糧五十萬石運赴河南。撥後缺額于本年應運漕糧內照數截留。參看「大陸檔案」，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吳士功奏。

註一二三：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一。

註一二四：『清聖祖實錄』卷一〇八。

註一二五：康熙朝朱批奏摺，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八日趙弘燮奏，引自『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摺匯編』第一冊二八九頁，大陸北京，檔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註一二六：『清聖祖實錄』卷二七〇。

。倉穀須公平收入，不准短放多收。其出納數目要登明於簿籍，一式二本，一本交州縣備查。嚴禁地方官吏挪借侵蝕倉穀（註一二七）。由於此一立法甚為完備，督促也嚴格，雍正年間各省社倉因此一契機得以建立並逐漸發展成形。

社倉穀本除以捐輸籌措為主外，也有從裁減火耗中暫行徵收，發予民間買穀入倉的，也有從常平穀中暫時撥借的（註一二八）。但實質上都是取於民間。同時清廷最忌地方官吏「不知此項穀石，本系民資，以為收貯在官，即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營，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借之弊。」於是乃下令「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原系官項，豫為公事侵挪之地者，俱以擾撓國政，貽誤民生論，從重治罪（註一二九）。」這一法令表明清廷對社倉的高度重視與維護之意。

雍正以後，社倉之制無大變動，僅做細部的補充以期完善。如乾隆時規定將息穀七分歸倉，三分交社長作修倉折耗之用，社長每三年更換一次，嚴其交代等。更針對各省情況的差異性，也因制宜的方式訂定具體的法規。嘉慶時愈加強調社倉須由民間經營管理，避免官吏經手以防滋生弊端（註一三〇）。因此，就整體上而言；清代社倉在一定時期中曾有很大的進展，如雲南省社倉在雍正末年時之統計「一省所捐穀麥七萬余石，其中千石以上者僅二十余處，此外皆數百數十石，亦有全無社穀者（註一三一）。」而及至乾隆二十四年社倉之穀「子母相生，數逾十倍（註一三二）。」由此可見其發展之神速，更可證明社倉在清代備荒救災史上也發揮了它的應有功能。

### 3. 義倉

義倉也是清代的一項備荒措施。其設置的目的是救災。雍正四年，以兩淮鹽商捐銀二十四萬兩，鹽政繳公務銀六萬兩共三十萬兩，做為買米貯穀，蓋造倉廩，設立鹽義倉的經費。鹽義倉由商人經理，每年於青黃不接之際，照存七糴三之例出陳易新，或於米貴時開倉平糴，至秋收後買補還倉。如遇災荒，則用其賑濟。每年動支之數，要呈報巡鹽御史，核實奏報（註一三三）。從倉穀來源以觀，其性質如同社倉。但由功能上而言，其作用卻與常平倉相同。

雍正時期，兩浙鹽商也曾輸銀買穀，於杭州府地方建立鹽義倉（註一三四）。惟鹽義倉數量有限，貯穀不多。據同治四年『戶部則例』卷十八所載，各處貯鹽義倉額儲穀約五十萬石左右。雖然有一次動支二十余萬石穀賑濟災民之事（註一三五），其作用畢竟十分有限。無法與常平倉及社倉同日而語。

註一二七：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二。

註一二八：同上。

註一二九：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〇：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一：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二：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三：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四：『清世宗實錄』卷五十一。

註一三五：『清世宗實錄』卷一〇二。

## 結語

本篇所述三大方面，勾劃出清代荒政的基本內容。從各項措施的制定過程中可清楚的觀察到，清代荒政措施已完全制度化，其各項條例均周密詳盡，且以種種立法督促政策的貫徹施行。已凸顯出清代荒政措施已達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階段。但是，政策措施無論如何周密也須靠人來執行。更由於時空的轉移與時代主、客觀條件的演變，上述措施在執行過程中也並非盡善盡美。此一問題請參考另篇拙著「荒政與吏治之良窳」（東海學報第三十四期，民82年6月）。

## 梁啓超的戴震研究

### ——動機、方法、與意義

丘爲君\*

#### 摘要

本篇的意旨，主要在於藉著關於梁啓超在1923-24年間密集地從事於清代中葉考據學大家戴震的研究，來探討梁氏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九年（即1920年遊歐返國後至他於1929年過世為止），突然決定淡出政治圈並投入教育文化事業這一重大轉變的基本意義。在五十七載不算長壽但卻是不凡的生命中，梁任公將他的晚年全心全力地投入講學與著述的事業中。在這轉變上，梁氏除了繼續扮演他昔日的啓蒙思想家的角色之外，但更值得注意的（同時也是更有成績的），便是他作為學者的這一角色。而作為一介極具影響力的學者，梁氏的學術工作重點基本上圍繞在兩個主要焦點上，一是清代思想史，另一個則是先秦思想史。這兩者中，就意義而言，又以前者為他用力之所在。而就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本身而言，梁氏的成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具體在通論性的《清代學術概論》（1920）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另一方面則是具體在個案性的、於1923-24年間完成的有關戴震的研究上。本篇的研究，則從後者入手，來探討梁氏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動機、方法與意義。

#### 前言

本世紀對戴震的研究，概括而言，有兩個高峰：一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整理國故〕期間，另一個高峰則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前者的代表性研究者有梁啓超（1873-1929）與胡適（1891-1962）<sup>1</sup>，後者的代表性研究者首推余英時先生<sup>2</sup>。估且不論這兩個戴震研究

\* 東海大學歷史系

本篇原來的字數約在五萬五千左右，受限於篇幅，因而必須做大幅度的刪減，因此若有〔言不盡意〕之處，則遠非作者本意，敬請原諒。

<sup>1</sup> 在梁啓超的影響下，胡適於1925年八月完成七萬字的〈戴東原的哲學〉一長文。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冊，（台北：聯經，1984），頁596。

<sup>2</sup> 余英時先生在這一方面的代表作爲《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1976）；除了余氏的著作之外，在1970年代有關戴震的研究，舉例而言還包括有：王梓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研究〉，碩士論文，（台北：台大中文所，1974）；梅汝椿，〈戴東原思想研究〉，碩士論文，（台北：文化哲研所，1975）；劉昭仁，〈戴東原思想研究〉，碩士論文，（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1974）；——，〈戴震〉，收於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台北：商務，1978）；鮑國順，〈戴東原學記〉，博士論文（台北：政大中文所，1978）。中國大陸方面則有王茂，他的研究成果《戴震哲學思想研究》，在一九八〇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



的高峰期有何內在的意義關聯，就彰顯戴震在清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並積極地促進學術界對戴震思想的重視與研究而言，梁啟超殆為第一人。本文的重點在於，透過梁啟超，戴震思想如何呈現於本世紀初葉。其次，作為思想啟蒙家的梁啟超，他投入戴震研究的思想史意義為何？為了釐清這一問題，本文試從動機，方法，與意義等三個角度來探討。

## 一、動機

雖然梁啟超早在一九〇二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便已對戴震在經學考証的貢獻上給予高度的評價<sup>3</sup>，但是梁氏積極地與密集地從事戴震思想的介紹，則要遲至二十年之後——精確點地說，在一九二三年底一九二四年初。而直接觸發梁啟超於這段時期密集地表彰戴震思想的主要因素，則是因為是時正好逢上戴震的二百年冥誕。戴震生於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二十四日，換算為西曆，則應為一七二四年元月。

為了紀念這一深具歷史意義的日子，梁氏與同志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在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市，籌辦一個紀念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的〔東原學術講演會〕。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脫稿的〈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一文中，梁氏將籌辦這一紀念會的動機說得十分清楚：

“稍為研究過中國近世學術史的人，都應該認識戴東原先生的位置和價值。今年是他的老先生的誕生二百年。舊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他的生日，我以為我們學界的人很應該替他做一回莊嚴的紀念。前清一朝學術的特色是考證學，戴東原是考證學一位大師，這是人人都知道了的，單就這一點論，他的研究成績，值得紀念的已經很多”<sup>4</sup>。

作為戴震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的發起人，梁啟超建議紀念會的焦點應凝聚在兩個方面：第一，塑成戴學特色的方法論；第二，戴震的哲學世界<sup>5</sup>。為了彰顯戴學特色的〔研究法〕和〔情感哲學〕，梁啟超建議〔東原學術講演會〕範圍應包括至少八個方向：(1) 戴東原在學術史上的位置；(2) 戴東原的時代及其小傳；(3) 音聲訓詁的戴東原；(4) 算學的戴東原；(5) 戴東原的治學方法；(6) 東原哲學及其批評；(7) 東原著述考；(8) 東原師友及

社出版。此外，日本學者山井湧，也在一九七〇年代從事有關戴震哲學的研究，山井的研究論文後來收在一九八〇年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思想史研究》一書中。

<sup>3</sup> 在這一作品中，任公說：「當是時，天子方開四庫館以藻飾太平，而(戴)東原實總館事……彼之學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復祭酒於首善之區，以是戴氏學掩襲天下」。最後他總結地評論道：「惠戴之學，……為群經忠僕，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誣也。」《飲冰室文集》，第三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93-94。

<sup>4</sup> 梁啟超，〈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38。

<sup>5</sup> 同前引。

其弟子<sup>6</sup>。這八項綱目，我們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任公欲為戴東原作系統研究的一個藍圖。依照這個藍圖，任公在戴東原二百年紀念會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以前，首先草擬了〈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於一九二三年底)一文<sup>7</sup>，由於此文並未完成。爲了紀念會，他緊接著於一九二四年初分別寫出了〈戴東原先生傳〉與〈戴東原哲學〉兩文以應景<sup>8</sup>。

## 二、方法

梁啟超的戴學研究成績，基本上以〈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戴東原先生傳〉，與〈戴東原哲學〉等三篇論文爲代表作。〈書目考〉雖然起草最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但在上述三篇中卻是成文最晚的，(是在紀念會結束許久之後才完成的)，由於它在性質上僅屬於書目的整理，是梁任公作戴學研究前的預備工作，並非他研究戴震用力之所在，因此不擬在此文中討論。而長約八千字的〈戴東原先生傳〉，雖然根據梁氏自己的說法，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以一晝夜之力完成的，但卻是他的力作之一，因此不能簡單地視爲即興式的雜文。而他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以連續三十四小時不睡覺趕出來的〈戴東原哲學〉，則更是他戴學研究的主要作品，因此我們討論梁氏研究戴震的方法，將以〈戴東原先生傳〉與〈戴東原哲學〉兩文爲中心。

### (1) 〈戴東原先生傳〉

在這篇相當簡短但卻是精煉的論文中，梁啟超首先介紹他作此文的材料來源。根據梁啟超自道，〈戴傳〉的寫就，主要係依據下述資料：(1) 洪榜(1744-1779)，〈戴先生行狀〉(《初堂遺稿》)；(2) 段玉裁(1735-1815)，〈戴東原先生年譜〉；(3) 王昶(1725-1806)，〈戴先生墓志銘〉(《述庵文鈔》)；(4) 錢大昕(1728-1804)，〈戴東原傳〉(《潛研堂集》)；(5) 余廷燦，〈戴東原事略〉；(6) 凌廷堪(1757-1809)，〈戴東原先生事略〉，(《校禮堂集》)；(7) 孔廣森(1752-1786)，〈《戴氏遺書》總序〉，(《巽軒駢儷文》)；(8) 江藩(1761-1831)，《國朝漢學師承記》，以及最後，(9) 李元度(1821-1887)，《國朝先正事略》<sup>9</sup>。單就寫作的材料來源而言，便已不難看出梁啟超作〈戴東原先生傳〉一文的用心了。而這些材料雖然都是一時之選，但最爲梁氏所重視的，卻要屬洪榜的〈戴先生行狀〉與段玉裁的〈戴東原先生年譜〉。

在研判過研究材料的價值後，梁啟超開始進行介紹並分析戴學的特色與成就。就結構這一角度而言，〈戴傳〉基本上側重三個面向：第一，戴震的方法論；第二，戴學的

<sup>6</sup> 同前引，頁39。

<sup>7</sup> 梁啟超，〈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80。

<sup>8</sup> 根據梁氏自己的說法，長約八千字的〈戴東原先生傳〉，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以一晝夜之力完成的；而長一萬七千字左右的〈戴東原哲學〉，則是在一月十九日接連三十四小時不睡眠的情況下趕出來的。

<sup>9</sup> 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40-41。

主要內容；以及第三，戴東原哲學的特質<sup>10</sup>。在方法論方面，梁啟超認為戴學的特色在於三方面：淹博、識斷、和精審<sup>11</sup>。這三項戴學特色的形成，自然都與經學研究有關，或者更精確地說，與經典文獻的考訂有關。由於儒學經典的重要文獻，在千餘年的變革中，因著不同的時代特色而呈現不同的風貌，因著各個的時代特色而有不同的解經方式。這樣，有時不僅解經的注文難以理解，甚至有解說注文的疏文也對很多人感到困惑的了。由於經文的注疏常會有趕不上時代需要的現象，於是就有了甚至發展成後來的學者或思想家必需去改動經文的程度。像朱熹更改《大學》經文，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疑點的討論等，便是這一現象的產物。而這種注疏與經文互相糾葛的怪現象，對戴震這類講求文獻可靠性的考證學者，是絕不願意輕易放過的。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穿梭在各種不同的歷史時空中，把不同時代的經典注疏一一歸位。而其最後目的，則是一方面要還給經典一個原始的面貌，一方面則更要還各個時代的思想家予各個原始的面貌。處理這種被有意或無意地錯亂的糾葛經文，不僅需要極大的耐心，同時更需要具備有戴震所強調的淹博、識斷、和精審等三個條件。因此可以說，戴學方法論的三個特質：淹博、識斷、和精審，是和他的經典考證工作習習相關的。同理，戴氏生平所強調的〔為學之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這一種治學的精神<sup>12</sup>，也一樣是和他的經典考證工作相關。

治學方法離不開治學的內容，因為兩者實際上是相互呼應的。關於戴震的治學內容，梁啟超追隨凌廷堪的看法，認為可以歸約成三項：小學、測算、與典章制度<sup>13</sup>。小學實際上包括文字與聲韻兩者，因為〔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sup>14</sup>，所以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由於文字與聲韻在小學裡是等於一物的兩面，所以戴東原在這兩者上都有重要作品：〈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以及〈方言疏證〉十三卷<sup>15</sup>。至於戴震治小學的用意又為何？任公則接近洪榜的觀點，以為儒者之道，詳載於經書，只有透過經文的理解，才有悟道的憑藉。但是經書裡的義理，是用文辭來敘述的，由是必需先通文辭才可能解經，解經以後才有悟道的可能。〔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sup>16</sup>。簡言之，欲讀書明道需先識字。

關於測算方面，它實際上包括測(天文曆法)與算(數學)兩者，前者與六藝有關，後者與九數有關。戴震在他的時代，除了在小學的領域裡，開創了凌廷堪所謂的〔古人所

<sup>10</sup> 就這一結構而言，我們不難看出，此文與他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脫稿的〈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一文裡所強調的，紀念會的焦點應凝聚在塑成戴學特色的方法論與戴震的哲學世界這兩方面，是相互呼應的。

<sup>11</sup> 戴震說：〔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與是仲明書〉），但這三者正是戴學特色之所在。

<sup>12</sup> 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43。

<sup>13</sup> 同前引，頁44。

<sup>14</sup> 同前引。

<sup>15</sup> 同前引。

<sup>16</sup> 同前引。

未發〕的事業之外<sup>17</sup>，還以自然科學家(或者說得更精確些，科學史研究者)的身份，完成了五篇有關天文與數學的論文。這五篇文字分別是：〈原象〉、〈迎日推策記〉、〈句股割圖記〉、〈續天文略〉、以及〈策算〉。梁啟超認為，就近代純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戴震在天文與數學這些方面的成就，不能算是有什麼不朽的貢獻，因為戴的研究成績，在梁氏看來，是不能和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相提並論的。雖然如此，他還是從考古的立場，高度肯定戴氏這些研究的價值<sup>18</sup>。

關於戴東原在典章制度方面的成就，梁啟超著墨不多，基本上，他受到凌廷堪的影響，認為東原〔典章制度之書未成〕，因而只舉出〈考工記圖〉與〈蠃旋車記〉這兩篇作品<sup>19</sup>。事實上，就《戴震集》來看，卷二中所收的諸篇如〈明堂考〉、〈三朝三門考〉、〈匠人溝洫之法考〉、〈樂器考〉、〈記冕服〉、〈記朝服〉、〈記冠裳〉……等等<sup>20</sup>，均是和典章制度有關的，梁氏說東原〔典章制度之書未成〕，就比較戴震在小學與測算方面的著作成績來看，這一說法似嫌勉強。

從上面對戴東原治學方向與方法的討論，梁任公結論道：戴震雖以考證家稱名於世，但是他的考證事業並非如世人對考證學者的印象，盡是作些枝離破碎的工作。事實上，戴東原〔每研究一對象，必貫通群籍而斷之以己之所自得〕<sup>21</sup>，這也就是說，戴氏的考證研究工作，其實是〔極分析綜合之能事〕的<sup>22</sup>，他的事業，是和任公所剛剛經歷的〔五四〕時代所禮讚的〔科學精神〕並不違背。

雖然梁啟超刻意強調戴震考證事業的〔科學精神〕，但事實上，戴震本人晚年在自我的評價上，倒是對時人所重視他的考證事業並不很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他最好的著作，是〈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等關於哲學方面的討論<sup>23</sup>。戴氏對此曾作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文字聲韻與測算等事，在學問上就有如轎夫一樣，它們的作用是用來抬轎中人的<sup>24</sup>。因此如果有人用它們來等同我的事業，那就猶如誤認轎夫為轎中人般。順著戴氏的意思，梁啟超不僅表彰戴東原的作為〔轎夫〕的文字聲韻學與測算學的成就，也更表彰他的作為〔轎中人〕的論性道之書。

關於戴氏的哲學成就，前面已提道過，它主要在〈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三個作品上。其中〈原善〉，是由原先的三篇發展成三卷的；而三卷本的〈緒言〉，

<sup>17</sup> 同前引。

<sup>18</sup> 校訂古集不僅是戴東原的嗜好，更是他維生的重要憑藉之一。他在校訂明代的《永樂大典》時，曾從這部百科全書中整理出《九章算數》、《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和《夏侯陽算經》等古算書，算是以科學史家的身份，總結了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見《戴震集》點校本〈前言〉，(台北：里仁書局，1980)。

<sup>19</sup> 同前引，頁47。

<sup>20</sup> 《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9-51。

<sup>21</sup> 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48。

<sup>22</sup> 同前引。

<sup>23</sup> 〈緒言〉三卷是《孟子字義疏證》的前身，這點在近代學者的討論中已無多爭議。但是它成書的時間，則看法不一。梁啟超認為它完成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戴氏四十四歲時。(梁啟超，〈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頁89。)但是根據錢賓四先生精密的考訂，認為〈緒言〉草創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氏四十七歲時，而完成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氏五十歲時。(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328-329。

<sup>24</sup> 所謂轎中人，自然是指他有關哲學方面的論著。

則是《孟子字義疏證》的前身。所以任公認定，戴東原的哲學成就，可以就〈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兩項作品來討論<sup>25</sup>。

〈原善〉的內容，就作者在序文中所自道，是關於天人之道的討論。<sup>26</sup>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sup>27</sup>

從作者所說的「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來看，戴東原對他這一作品，看來似乎相當自負。<sup>28</sup>〈原善〉的出現，標誌著戴震學轉變的一個新起點。在此之前，戴震並未有明顯反宋學的言論，自此篇以後，戴東原揚漢斥宋的觀點便已十分了然<sup>29</sup>。由於這一變化，它在戴震思想的研究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梁任公在這一文字中並未察覺到這一史的變化，也未就這一點來加以發揮。梁氏僅根據洪榜的〈行狀〉來對〈原善〉作一提要。

這一提要基本上圍繞著戴東原哲學系統中相當重要的概念〔私〕與〔蔽〕而開展。所謂私，它係指〔逞己以縱欲〕，而蔽則指〔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就因果的角度而言，私係由於〔欲之失〕，而蔽則是來自〔知之失〕。古代的君子對付這兩個〔人之大患〕的方法，是〔強恕以去私〕與〔學問以去蔽〕。但是後世的君子對付這兩個〔人之大患〕的方法，卻是用遏欲與主靜的手段。然而人總是有〔血氣心知〕的，這便是所謂的〔性〕。性表現在哪些方面？在欲，在情，在巧與智。而真正的君子要治天下，其主要責任便在於〔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若如此，則天下之人便能〔達禮精義〕，便能〔至仁盡倫〕，而達到〔至善〕的理想<sup>30</sup>。這便是梁任公所理解的戴震的〈原善〉的理論。

至於《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的要旨，梁任公從〔正人心〕的觀點來解讀。任公以〔僕生平著述之大，《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這一段戴震寫給段玉裁的

<sup>25</sup> 同前引，頁48-49。據任公的研究，〈原善〉是戴震二十一歲時的作品，初時只有三篇，每篇不過千餘字，但是累年增加，到四十歲左右，擴大成三卷。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至於《孟子字義疏證》，任公認爲是戴震四十二歲時動手做的，直到臨終那年（五十五歲）才定稿。初稿名爲《緒言》，後來才改爲《孟子字義疏證》，此書係專就孟子書中關於哲學的名詞逐一詮釋，卷上釋理字凡十五條，卷中釋天道字四條，釋性字九條，卷下釋才字三條，釋道字四條，釋仁義禮智四字合二條，釋誠字二條，釋權字二條。梁氏認爲，〈緒言〉和《疏證》內容的實質相同者十之六七，但排列組織不同，每段字句差異也多。見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52-53。

<sup>26</sup> 錢穆先生認爲，大抵而言，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325。

<sup>27</sup> 《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330。

<sup>28</sup> 這話有其它證據可以佐證。段玉裁在《年譜》中曾說道：「記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喫飯亦別有甘味。』」見《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465。

<sup>29</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325。

<sup>30</sup> 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48-49。

信，來作為理解《孟子字義疏證》的主要線索<sup>31</sup>。在梁任公看來，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野心〕，便是將自己與孟子相比附。孟子在他的時代，以好辯知名，但孟子於外人對他的這一不是太正面的評價，僅以〔我知言〕（我只是想辨明真理）來回答外人對他的有意或無意的誤解。在理解孟子本意的戴東原看來，孟子所爭的，事實上是在於想要〔轉移人心〕（即正人心之意）。孟子為何要〔轉移人心〕呢？戴震認為，這是因為若不出來〔正人心〕，則人心將有〔受蔽〕的可能。人心若〔受蔽〕，則會反應在兩件重要的事情上：第一，〔害於事〕，第二，〔害於政〕<sup>32</sup>。由於孟子若不挺身站出來〔正人心〕，那將會有如此深遠的害事與害政的社會影響，所以東原以為，孟子的〔好辯〕，其實是有他不得以的苦衷。同樣的，戴震自認他所戮力的考證事業，是肩負著同孟子般的〔正人心〕的巨大使命。在《孟子字義疏證》序裡，戴東原很清楚地表達了他這一層意思，他說：〔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吾用是懼。〕<sup>33</sup>

在彰顯了戴東原這一層欲〔正人心〕的意圖後，梁啟超進一步地探索戴震所謂的〔害事〕與〔害政〕的意思。任公以為，戴震所謂的〔害事〕，應是指戴氏在《疏證》中所強調的〔理事一元論〕的觀點：〔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sup>34</sup>。至於〔害政〕，則是由於〔理〕已不再是客觀的理而是主觀的〔意見〕之後所產生的社會結果。任公據《疏證》來證明他所觀察到的這一見解。〔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捨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這也就是說，在戴震的系統裡，人情與天理在理論上應該是不相衝突的。對於人情，不應該以所謂的天理來度量，而是應該就事論事，以人情來考量。如果硬要捨情而求理，則這個〔理〕恐怕不是〔天理〕，而是〔意見〕罷，如此一來，將會冒著把〔意見〕說成是〔天理〕的這一種危險；而一個社會若可以輕易地將主觀的〔意見〕視為客觀的〔理〕，那麼這一發展在政治社會上的影響上，就可能帶來〔禍民〕的結果<sup>35</sup>。

〔害事〕與〔害政〕的主要因素既然來自主觀的〔意見〕與客觀的〔理〕相互倒錯的結果，那麼是誰促成或造成這一現象呢？在戴震看來，難辭其咎的自然要屬程朱學派的儒學者了。

“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清以無欲之說，於得理欲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

<sup>31</sup> 同前引，頁48。

<sup>32</sup> 這個典故是出自於《孟子》〈公孫丑〉上：〔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戴震在〈與某書〉中曾引用過這段話並明示他的意旨，見《戴震集》卷九，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187-8。

<sup>33</sup> 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49。

<sup>34</sup> 在戴震看來，就任何情況而言，〔理〕不論作〔天理〕解，或作〔公理〕，都不應該與〔事〕（人世裡的實情，事實）相違背，否則，這個理不是站不住腳，就是〔害事〕。

<sup>35</sup> 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49。

，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其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sup>36</sup>

這也就是說，〔理〕作爲一個抽象的概念當然是不會禍民的。那麼是誰禍民呢？戴震認爲，是以〔意見〕爲〔理〕的程朱學者才會禍民。姑且不論禍民的緣由爲何，就結果來看，不講人情的程朱學者，以他們所謂的〔天理〕來殘害人民，這和酷吏以法殺人，有甚麼區別嗎？〔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sup>37</sup>。

以上便是梁啟超對戴震思想的討論。總結地來看，梁任公對〈原善〉的理解不如他對《孟子字義疏證》的理解來得透徹。這可以從他必需大量地依賴洪榜的〈戴先生行狀〉來作〈原善〉的提要，與他自由地出入戴震文集來解說《孟子字義疏證》的意旨，兩相對照來印證得知。這一現象的主要因素之一，用他的話來說，是〈原善〉〔文字太簡，幾乎沒有一個閒字〕<sup>38</sup>。

## (2) 〈戴東原哲學〉

不同於〈戴東原先生傳〉僅是提要式地介紹戴氏的生平、戴學的特色，以及治學的方法，〈戴東原哲學〉則是有一種欲全面性地探索戴震學術精華所在的哲學的這種企圖——雖然梁任公很遺憾自己並未能完整地實踐這一企圖。這篇作品，基本上是由三個部份所組成的。第一個部份是，對研究戴東原哲學主要材料所作的一個基本考察；第二個部份是問題性的提出、戴東原的思想淵源，以及戴東原思想形成時思想界的基本形勢；第三個部份是，（也正是此篇重點之所在），戴東原哲學的主要內容。在第三部份中，梁任公原本打算討論戴震的宇宙觀，由於趕不及，故此部份從缺。另外，作者原先還計畫在文末檢討戴東原哲學的反響，也終因時間不夠而作罷。由於第一與第二部份僅是此文的導引，不是梁任公重點之所在，由是，本文將直接針對梁氏所認爲重點之所在的戴東原哲學來探討。

梁任公將戴東原的哲學分爲五個主要的部份加以討論：(1) 客觀的理義與主觀的意見，(2) 情欲主義，(3) 性的一元與二元，(4) 命定與自由意志，以及(5) 修養與實踐<sup>39</sup>。不同於〈戴傳〉，作者在此篇不再大量借用洪榜或段玉裁的二手著作來理解戴東原思想的特質與原本，而是主要藉著戴震的一手作品來勾勒其思想體系，因此，就某一意義而言，上述這五個構成戴東原哲學體系的主要部份，可以說是梁氏自己所構築的戴東原哲學系統，而這一系統，在梁氏看來，是以戴震的〔理〕的觀念來開展的。

<sup>36</sup> 同前引，頁49-50。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戴震集》卷八，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175。

<sup>37</sup> 同前引，頁50。戴震，〈與某書〉，《戴震集》卷九，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188。

<sup>38</sup>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52。

<sup>39</sup> 見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4，77-78。

在梁任公的理解裡，戴震係以一種近似〔理學終結者〕的形像來建構他的哲學體系。也就是說，戴東原的哲學，本質上是一個以終結理學為目標而開展的思想系統。為了終結理學，戴氏直接切入理學系統的核心之所在的〔理〕這一概念，一方面提出反駁，另一方面則在批判理學的過程中，提出他的觀點與發展他自己的系統。為了挑戰理學家對〔理〕這一解釋的壟斷，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開宗明義地給〔理〕下一個全新的定義：〔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不紊，謂之條理。〕<sup>40</sup>戴東原一方面引《易經》、《中庸》、《樂記》，以及《說文解字》序等古文獻，來支持他在這一定義裡的見解。另一方面，他也在文字裡不客氣地表達，他重新定義〔理〕這一概念的主要動機之一，便是想要論證理學家對〔理〕這一解釋的無效性。戴東原說：〔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sup>41</sup>。這裡的〔後儒〕，自然是衝著宋儒而言的。

戴震之所以認定理學家對〔理〕的解釋的無效，主要是在於他與宋學家之間對〔理〕的認知有不同的見地：前者係從自然主義的觀點出發，而後者則自超自然主義的角度視之。才思過人的梁啟超在此文中，當然也敏銳地注意到戴東原與理學家之間存在著這麼一個差異。在梁氏看來，作為漢學家的戴震與以〔理〕為中心的宋學家之間的不同點，主要在於前者強調〔理在事情〕，而後者則聲稱〔理在人心〕<sup>42</sup>。所謂〔理在人心〕，是指宋儒所說的〔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sup>43</sup>。理學家的口頭禪〔天理〕，便是指此而言。職是之故，宋儒所說的〔天理〕，自然不是經驗世界的，而是先驗的、超越的。用梁任公的話來說，是〔先天的超時間空間的〕<sup>44</sup>。至於〔理在事情〕，則是指〔理〕作為一種概念，其要旨並非在〔形上地存在〕這層意義上，而是具體在客觀的事物上；用梁任公比較現代的觀點來解讀的話，戴震的〔理〕的特質是〔客觀的存在〕<sup>45</sup>。關於這一點，用戴震自己的話最為傳神，他說：〔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能得〕<sup>46</sup>。換句話說，在戴震看來，理學家所說的抽象的、形上的〔理〕，基本上是〔空無依傍〕，是〔鑿空〕的，是〔離人情而求諸心〕，因而是沒有堅實根據的；他們所謂的〔理在人心〕，其實是將心裡自我〔意見〕當成外在世界的〔理〕<sup>47</sup>。由於宋儒錯將這種心裡的、主觀認知的意見當成客觀世界的公理與法則，這便在社會政治的層面上

40 同前引，頁62。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卷九，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65。

41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卷九，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65。

42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62。

43 關於戴震對〔理得於天而具於心〕這一觀念的討論，見《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67-270，277-281。

44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61。

45 同前引。

46 同前引，頁62。

47 戴震說：〔《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群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慙，口不能道辭者，理屈。〕《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68。



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用戴震的話，造成了〔禍民〕的結果了。而宋儒這種〔禍民〕的結果，在戴氏看來，跟古代的酷吏以法殺人相似的。所不同的是，〔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sup>48</sup>。簡言之，戴震是不承認宋儒那種主觀意見式的〔理〕、先驗的〔理〕、形上的〔理〕；而只承認客觀存在的〔理〕、經驗的〔理〕、形下的〔理〕。

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梁啟超將戴震的〔理〕分為〔物理〕與〔事理〕兩類，然而中國古代聖賢所強調的，（同時也是戴東原所強調的），則是後者。梁氏以為，前者的客觀剖析是容易知道的，但是後者在處理上則比較費事。依照梁任公的觀察，戴震對〔事理〕的處置原則，是以〔情〕與〔欲〕這兩項具體於人身上的特徵，作為判定〔理〕有效或無效的依據。戴震對他這一規定有明確的說明：〔凡事為皆有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sup>49</sup>作為一介自然主義者，戴震肯定人的情欲，因為人若無情無欲，則不會有任何的作為，若果沒有任何的作為，理便要掛空了，又哪來理的問題及其討論呢？

戴震從自然主義的觀點來肯定人的情欲，從經驗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理〕的有效與無效性，結合兩者，戴東原便得以發展他的〔情欲主義〕。用戴震自己的話最能道出他這一〔情欲主義〕的特色：〔理者，存乎欲者也〕<sup>50</sup>。戴氏的情欲哲學基本上是從兩點出發的：第一，從經驗主義的觀點來繼續開展他的以〔理〕為中心的這一哲學系統；第二，從自然主義的觀點來駁斥宋儒〔理欲二元論〕的無效性。

〔理欲二元論〕是理學家人生哲學中的主要論點。這一理論認為，人的終極目的應在於善的完成（即，道德的完成）。在這層意義上，儒學便是道德實踐的學問。一個人若能透過道德實踐（即，修身）的手段，而終極地成為一介最大意義上的道德的人，便是完成了圓滿的〔聖德〕（sagehood）這一不朽的事業。可是聖德卻不會從天而降的。雖然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從至善的〔天〕那兒獲得了他的〔性〕，但是這一天賜的可寶貴的〔性〕，卻因著個人的機緣與造化而有著不同的變化。人在塵世間的流轉，由於受到形上概念的〔氣〕（惡的象徵）的習染，因而有了墮落的可能。於是，要修成聖德的首要前提，便是防止所有可能的墮落。具體在人身上的，使人墮落的最主要因素便是〔欲〕。換句話說，要修成聖德便得要減欲，除欲，乃至於滅欲——最終是達到無欲的理想。

上頭這極簡單的描述，便是理學家〔理欲二元論〕的基本要旨。從這一〔理欲二元論〕的觀點出發，宋儒嚴辨理欲，他們認為人生哲學基本上是圍繞著下述這一二分法的命題而開展的：〔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這一理欲的二分法，不僅是意味著善惡之分，也是意味著君子小人之分，由是，儒者的終極事業便在於做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這一境界<sup>51</sup>。但是，戴東原並不贊同理學家這種〔理欲二元論〕的論

48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64。

49 同前引，頁62。

50 同前引，頁65。

51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65。

調。戴氏認為〔欲〕本身是自然的，（〔欲者，血氣之自然〕<sup>52</sup>），是中性的（〔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sup>53</sup>），說不上甚麼好壞；因為即使是儒家的聖人也不是無欲的：〔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爲了說服他的讀者，戴氏還舉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這話爲例，來證明〔欲不可無，寡之而已〕的道理。然而〔欲〕在何種情況下才會與〔好壞〕有所關連呢？戴震認爲是當〔欲〕超過了一般的限制，才可以說是〔壞〕，用他的話來說，即是：〔欲之失爲私〕<sup>54</sup>。換句話說，當〔欲〕超過了正常的限制，便是〔不仁〕，有違天理；反之，則是在〔仁〕的標準之內，合乎天理<sup>55</sup>。

宋儒在人生哲學上之所以將天理與人欲看成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對立體，梁啟超認爲這是有他們哲學上的依據。因爲，宋儒以爲人類的〔性〕，基本上是由兩個部份所組成的：〔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前者是善的象徵，後者則是惡的代表。這種〔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分（即〔理氣二元論〕），梁任公謂之〔性的二元論〕。梁氏認爲，理學家這一〔性的二元論〕，在中國哲學界〔當了專制帝王近一千年〕，一直要到顏元（1635-1704）與戴震的出現後，才受到有力的批判<sup>56</sup>。

戴東原從〔性的一元論〕出發，來批判程朱理學中的〔性的二元論〕。爲了批判〔性的二元論〕，東原首先解說宋儒〔性的二元論〕的基本原理：〔宋儒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人之生也，由氣之凝結生聚，而理則湊泊附著之……因以此爲完全自足〕。這種〔氣聚理湊〕的〔理氣二元論〕，在戴震看來，並非原始儒家的真貌，而是受到道佛兩家影響下的產物。戴震說：

“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歟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sup>57</sup>

這裡所謂的〔分理氣爲二本〕，即是〔理氣二元論〕或梁啟超所說的〔性的二元論〕。

老莊釋氏爲甚麼要在人世間對立〔真宰〕〔真空〕與〔形體〕使之成爲〔二本〕呢？戴震認爲這是爲了解說他們的〔神形分離論〕的需要而建構的。所謂〔神形分離論〕，是指神離形體而長存之意。就道家而言，他們有一種〔長生久視〕說：所謂長生，即是指形化而神長存的意思，也就是以死來〔返其真〕。另外，佛家也有一種〔不生不滅〕說：所謂不生者，是指不受形而生的意思；所謂不滅，即是指其神長存而言。<sup>58</sup>這裡

52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85。

53 同前引，頁266。

54 戴震說：〔天下古今知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74。

55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65-66。

56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69。

57 同前引，頁69-70。《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79-281。

58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82。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0。

的〔神〕，就是老莊釋氏所謂的〔真宰〕〔真空〕<sup>59</sup>。就這點來說，相對於〔神〕的這一個人之實體所在的〔形〕，不就是〔假宰〕〔假空〕了嗎？

“在老莊釋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體，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推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本，……遂求無形無跡者爲實有，而視有形有跡爲幻。”<sup>60</sup>

對自然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支持者戴震來說，佛道兩家這種以〔神識爲本〕、並進而以〔以神爲有天地之本〕的〔真其神而假其形〕的學說，將明明是實存的形體卻看作是虛幻的，將明明是虛幻的神識卻看作是實存的，其論證上的繆誤與無效，自然是十分清楚的。<sup>61</sup>

令戴東原遺憾的是，大賢如程子朱子們，不僅不能辨識他們所一貫反對的佛老學說在論證上的繆誤與無效，反而是〔受其蔽而不自覺〕了。在形式的意義上受到佛道〔真其神而假其形〕學說的影響，程朱們〔借階於老莊釋氏〕，將老莊釋氏的〔神形二元論〕，在形式上轉爲理學家的〔理氣二元論〕。根據戴震，爲了要轉出這一〔理氣二元論〕，宋儒先將老莊釋氏的〔神識形氣〕二本說合爲〔一本〕，然後於這〔神形一本〕之外，再推出一個〔天理說〕（即，〔理得於天〕的理論），如是，理學家便創造出了所謂的〔理氣二本說〕。<sup>62</sup>

“宋儒以形氣神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於天。推而上之，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當其無形無跡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跡爲粗……此別理氣爲二本”<sup>63</sup>

同佛道〔神形二元論〕強調〔神本形末〕、〔形由神生〕的觀點一樣，理學家的〔理氣二元論〕也是講求〔理本氣末〕、〔氣由理生〕等概念。這種以〔理〕爲〔氣〕之主宰的觀點，在戴東原看來，基本上是脫胎於佛道的以〔神〕爲〔氣〕（即指〔形〕而言）之主宰的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與理學家世界觀有關的〔理氣二元論〕，是與理學家人生觀有關的〔理欲二元論〕緊密呼應的。關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用〔血氣〕（即是指物質而言）與〔心知〕（即是指精神而言）這一組概念來理解。<sup>64</sup>就戴震的觀點來看，人的性命，基本上是由〔血氣〕與〔心知〕二者所構成的：〔夫人之生也，血氣心知而已矣〕。

<sup>59</sup> 所謂〔真宰〕，是指《莊子》書所說的：〔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至於〔真空〕，是指佛家所說的：〔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真空則能攝聚有而應變〕；〔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即是妙有。〕見《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77。

<sup>60</sup>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90。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0。

<sup>61</sup> 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戴震的經驗主義式的自然主義觀，與道家的先驗的自然主義觀，在本質上是南轅北轍的，儘管二者均打著自然主義的旗號。

<sup>62</sup>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90。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0。

<sup>63</sup>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90。

<sup>64</sup>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0。

65 人之所以生而〔有欲〕而非〔無欲〕，這是自然界生物的本能，用戴震的話來說，這是因為〔欲者，血氣之自然〕的緣故<sup>66</sup>。除了〔血氣之自然〕外，人還有〔心知之自然〕這一部份。所謂〔心知之自然〕，這是指人的心智在初始階段是處於極其自然的狀態，戴東原認為，這也是為甚麼孟子主張〔性善〕的主要理由。既然人的心智在初始階段是在自然與和諧的狀態，是在準〔善〕的優美狀態，根據戴震的這一孟子式〔性善說〕的見解，則人在世間也就自然具備有欣賞和接受〔理義〕的本能了；儘管在真實的世界裡，〔理〕與〔義〕有時並不是搭配的十分完美。〔理義〕作為一種理想，是相對於自然(be)而言的，它在本質上是屬於〔必然〕(ought to be)的範疇。在戴震的系統裡，〔自然〕(Nature)的概念雖然具體在〔血氣〕與〔心知〕這兩個因素與條件上，(即是，不論是物質性的〔血氣〕還是精神性的〔心知〕，都是在〔自然〕這一概念的大範疇內)，但是，因為有這麼一個〔心知之自然〕，——一個在功能意義上能夠理解自然界、認知自然界、並進而超越自然界的認知系統，——這便使得〔血氣之自然〕通往〔理義〕之〔必然〕成為可能了；也就是說，〔自然〕(be)與〔必然〕(ought to be)兩者是相通的。用戴震的話來說，〔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雖然〔自然〕與〔必然〕兩者是相通的，但是戴震認為〔自然〕(包含be與Nature這兩層意義)必須受到〔必然〕(指〔理義〕而言)的導引與約束，否則，任其自然(指〔放任〕之意)的結果，反而有喪失其〔自然〕的可能。

“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悅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所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自然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sup>67</sup>

不同於戴震的〔血氣心知一元論〕，佛道兩家則是採〔血氣心知二元論〕的觀點：否定〔血氣之自然〕，但肯定〔心知之自然〕；視〔心知之自然〕為正面的〔性〕，而視〔血氣之自然〕為負面的〔欲〕。這種〔貶血氣而揚心知〕、〔非欲而是性〕、〔低物質而高精神〕的論調，主要是因為老莊釋氏認為放任〔血氣之自然〕的發展有其潛在性的危險，因而必須講求〔心知之自然〕。戴震說：〔老莊釋氏見常人任其血氣之自然之不可，而靜以養其心知之自然；於心知之自然謂之性，血氣之自然謂之欲〕。<sup>68</sup>便是這個意思。

但是，戴震的孟子式〔性善論〕的〔血氣心知一元論〕，卻和荀子式〔性惡論〕的〔血氣心知一元論〕又有所不同。同佛道兩家一樣，主張〔性惡論〕的荀子也注意到〔

65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85。

66 同前引。

67 同前引。

68 同前引。

血氣之自然〕有其潛在性的危險，因而在一般人的心知之外，另外提出一個所謂的〔禮義的聖心〕。荀子之所以提出〔禮義的聖心〕這一概念，其目的在於，要以〔禮義〕之〔必然〕來約束與限制〔血氣心知〕之〔自然〕。這樣一來，荀子雖然將〔血氣心知〕視為〔一本〕（即指在〔自然〕的概念範疇內這層意義上），但卻又抬出了一個〔禮義〕之本，所以戴震認定，在結構上荀子的系統仍是〔二本〕說。也由於有這麼個〔二本說〕，荀子才將〔血氣心知〕之〔自然〕劃歸於〔性〕的範疇，而將〔禮義〕之〔必然〕劃歸於〔教〕的範疇。<sup>69</sup>

同佛道兩家以及荀子一樣，程朱也是持〔二本說〕的立場。一如荀子般，程朱先合〔血氣心知〕為一本，然後另外再增加一本。這所增加的另外一本，荀子說是聖人特別給我們的，所以叫做〔聖心〕；程朱則說是天特別給我們的，所以叫做〔天理〕<sup>70</sup>。程朱雖然合〔血氣心知〕為一本，但是他們也意識到放任這一〔血氣心知〕的自然發展是具有危險性的，因此也主張以〔理〕這一必然來約束與限制它。

“程子朱子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進以理之必然；於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氣質，於理之必然謂之性；亦合血氣心知為一本矣，而更增一本。”<sup>71</sup>

在戴震的立場，他既反對佛道的〔神形二元論〕，也更反對宋學家的〔理氣二元論〕；既反對佛道的〔貶血氣而揚心知〕的觀點，也更反對宋學家的〔非欲而是性〕的見解。作為一個自然主義與經驗主義的信仰者，他在世界觀上只接受〔理氣一元論〕，在人生觀上只接受〔理欲一元論〕。簡言之，無論在世界觀或人生觀方面，戴震都是一個徹底的〔一元論〕的支持者。而他之所以自信地高舉〔一元論〕的旗幟，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是《六經》和孔孟的真正信徒，二方面則是他認為荀子、老莊、釋氏等，都在認知上有所謬誤。然而在戴震看來，最不可原諒的，則是〔借階於老莊釋氏〕的程朱等理學家。他們〔雜荀子及老莊、釋氏以入《六經》、孔孟之書〕，其罪孽不僅在於使〔學者莫知其非〕，更嚴重的是，他們的作為，已經使〔《六經》、孔孟之道亡矣〕。<sup>72</sup>

在釐清了〔性一元論〕與〔性二元論〕的問題後，梁啟超轉而討論戴震哲學中的〔命定〕與〔自由意志〕的問題。就理學的哲學系統而言，〔性〕與〔命〕本來就不是兩個分割的理念。在新儒家的經典《中庸》裡，〔性〕與〔命〕的連接，是從〔天命〕（Mandate）這一角度來開展的：〔天命之謂性〕。這即是說，人的性（包括物質屬性的〔血氣〕與包含精神特質的〔心知〕），基本上都是由作為〔意義之源〕（source of meaning）的〔天〕所賜予的。就這一意義而言，〔天〕與〔理〕是同義的，所以理學家要把〔天〕與〔理〕並舉。而宋儒為了要講〔天理〕，為了要彰顯〔天理〕的地位，

69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0。

70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0。

71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85。

72 同前引。

於是從〔理氣二元論〕的觀點，將〔理義之性〕與〔氣稟之性〕對立起來。這種〔理氣二元論〕，一方面肯定人的〔理義之性〕，一方面則相對地貶斥〔氣稟之性〕。但是作為一介〔性的一元論〕者，如前述可知，戴震卻不認同這一種對〔性〕所作的解釋，不接受人的性是專就〔理義之性〕而論的說法。根據戴震，古人言性，係專指氣稟而言；後人言〔理義之性〕，主要是受到理學家誤解孟子〔理義〕論的影響。戴震說：

“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為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為聖人治天下(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sup>73</sup>

由於在對〔性〕這一觀念的認知上，與理學家有這樣的差異，作為漢學家的戴震因而對〔命〕的看法也與程朱等宋學家有很大的距離。

不同於理學家對〔命〕持〔天命〕(Mandate)的解釋，戴震將〔命〕當成〔命定〕來看。所謂〔命定〕，是指限定的意思，即梁任公所說的〔分限〕。戴震說：〔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為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sup>74</sup>這裡的〔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便是將〔命〕視為限定的意思。在一封給彭允初的信函中，戴東原將〔命〕解說為命定的意思說得更為清楚。〔凡命之為言，如命之東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sup>75</sup>由於東原均對〔命〕作限定釋，因此連對《中庸》〔天命之謂性〕這段話的看法，他也是持同樣的見解。戴震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sup>76</sup>由上面所列舉的例子可以得知，在理學中常被並舉的——而且還常被視為同義詞——〔性〕與〔命〕這兩個觀念，在戴震的系統裡，是做了相當幅度的修訂。由於對〔命〕有這樣的一種解釋，這樣一來，作為約束與限制意義的〔命定〕，就理論上來看，便與〔自由意志〕這一概念有所衝突了。但奇特的是，〔東原是兩說都主張，而令他不矛盾〕。<sup>77</sup>

為甚麼戴震能兩說都主張而又不互相矛盾呢？這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具體人〔性〕之特徵的〔欲〕，一方面天生就具備有自然發展的傾向(即梁啟超所謂的〔自由意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天生有它的極限(即〔命定〕)。(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也。)<sup>78</sup>關於這個〔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的見解，戴震所心儀的孟子對此解說得最為傳神。孟子說過，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等等，本來都是人天生的傾向，而這也就是人性。戴東原雖然在原則

<sup>73</sup> 同前引，頁271。

<sup>74</sup>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307。

<sup>75</sup> 《答彭進士允初書》，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170。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2。

<sup>76</sup>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291-292。

<sup>77</sup>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2。

<sup>78</sup>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305。

上追隨這種孟子式的人性論，但是他又主張，具體在人〔性〕的這些〔欲〕又都得有它們的界限(命定)，超越了這個界限，就是不仁，就是違背天理。這是戴震從〔命〕(限定)的角度來看〔性〕。

但是戴震也反過來說從〔性〕的角度，來看〔命〕。戴東原認為，具體在〔血氣〕這一概念上的〔性〕雖然有它的命定，有它的限制，可是人卻不可以用這個藉口來畫地自限，不思長進，因為藉由孟子〔擴而充之〕的理論，人是可以透過具體在〔心知〕這一概念上的〔性〕，來昇華自己。藉由〔心知〕的功能，人可以認知並開展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這個人倫系統，並且在這個人倫系統裡發展仁義禮智等〔善端〕。簡言之，〔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而不盡其材〕。<sup>79</sup>

藉由戴震所重視的孟子〔擴而充之〕的理論，梁啟超進一步地將問題轉至如何透過〔擴而充之〕的理念來達到實踐性善的理想，而這便是修養與實踐的議題了。這個議題的反面是：為甚麼性善的人會變惡呢？理學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氣〕的因素。而如何整治那惡呢？宋儒講的是〔主靜立極格物窮理種種方法〕。戴東原一方面既不認同〔氣惡說〕，另一方面也不贊成宋儒治惡的辦法。他認為惡的來源是〔私〕與〔蔽〕，因此他所開出的治惡藥方，則是〔去私〕與〔解蔽〕<sup>80</sup>。戴震說：

“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生於其心為溺，發於政為黨，成於形為惡，見於事為悖，為欺，其究為私己。蔽也者，其生於心也為惑，發於政為偏，成於行為謬，見於事為鑿，為愚，其究為蔽之以己。鑿者，其失誣；愚者，其失為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為固。私者之安若固然為自暴，蔽者之不求牖於明為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sup>81</sup>

以上便是梁啟超所理解的戴震的修養實踐論。雖然梁任公從孟子的〔擴而充之論〕入手，來理解戴震的修養實踐論，而且也因此相當成功地闡釋了戴震修養實踐論的特色與性格，但是，他卻沒有從戴震思想重要特質的〔理學批判論〕這一角度來立論。所謂〔理學批判論〕，這是指戴震的思想系統，基本上以批判程朱理學為中心而開展的。以戴氏的〔去私解蔽論〕來說，他的〔去私論〕，表面上是圍繞著〔欲之失〕的問題來立論，骨子裡，卻有濃厚的批判理學家的味道。對理學家來說，人之所以變惡的理由其實是很單純的，即是〔人欲〕的問題，所以他們要在〔理欲二元論〕的立場來否定人欲。但是戴震對這一〔貶人欲而揚天理〕的立論卻不能苟同，這主要是由於前面所提到過的戴震的堅持〔理欲一元論〕的看法。戴震的〔理欲一元論〕堅稱〔理者，存乎欲者也〕，否認理與欲是對立不相容的。這一理論認為〔人欲〕是中性的，人人皆有，絕非〔天

<sup>79</sup> 同前引。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2-74。

<sup>80</sup>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74。

<sup>81</sup> 同前引，頁74-75。〈原善〉，卷下，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343。

理〕的敵人。在戴震的立場來看，理學家根本把問題弄錯了，人之所以變惡，不是人欲本身的罪惡，因為人若無欲則無爲，無爲則無理矣，何來理欲之辯。人之所以變惡，在東原看來，是人欲(即〔血氣〕之謂)跨越了應有的界限，超越了應有的限制。所謂〔欲之失〕，便是這個意思。

同〔去私論〕一樣，戴震的〔解蔽說〕也是用來批判理學家的。理學家們認為，人之所以有蔽，是由於人欲所致，他們所謂的〔人欲所蔽〕，便是這個意思。這種把性惡的來源皆簡單地歸諸於人欲這個單一因素，基本上是一種性惡化約論。戴震反對這種性惡化約論，認為人之所以有蔽，主要不是由於〔人欲〕的緣故，而是由於無知與主觀所導致的——而後者又比起前者更爲可怕。在戴震看來，程朱等理學大賢當然不是屬於無知之輩，而應是屬於主觀之徒，他們〔離人情而求諸心〕，進而以心之意見當理，進而再以理殺人，這都是戴震所不能容忍的。戴震的〔解蔽說〕認為人要去惡成善，不能走理學家〔滅欲說〕的途徑，而應該走〔進學說〕的途徑(即是〔解蔽莫若學〕)。這也就是說，就去惡成善而言，戴震的〔解蔽說〕一方面在肯定古典儒家〔進學說〕的正確性，另外一方面則在批判理學家〔滅欲說〕的無效與謬誤。

### 三、意義

在討論了梁啟超研究戴震的動機與方法後，我們也不能放過下面這一個要緊的問題：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啓蒙家、宣傳家、思想家、乃至政治人物之一的梁任公，在他極具傳奇性而又多彩多姿的生涯中，於他的五十壯年，正打算在混沌的軍閥時代中國，對政治事業做更上一層樓發展之時，<sup>82</sup>卻不很實際地花下大力氣來研究與當下政治事業發展不相干的清代中葉經學考據家戴震，其意義究竟是什麼？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他個人生涯的轉捩點1920年來討論。梁任公在1920年春遊歐返國之後，對個人未來事業的開展問題，已經和出國之前計劃在渾沌的軍閥時代開啓一個清新的政治格局的考慮有所不同了。這個在歐洲旅遊時因種種見聞而有所感發所作成的決定，主要在於擬將昔日的以政治活動爲重點的事業，轉爲未來的以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sup>83</sup>這個心路歷程的變化並非偶然，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當中的過程相當曲折，要言之，任公在民初歷經從〔聯袁〕(世凱)到〔倒袁〕的政治事業過程中，在經過1916年〔復辟事件〕與其師康有爲的公開決裂之後，對政治生活已頗有厭倦之意。<sup>84</sup>然而任公又因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糾葛，無法立即切斷與政治生活的所有關聯，於是在一種近乎折衷的意義下，在不失對國家社會之關懷的前提下，任公已有打算將政

<sup>82</sup> 梁任公與民國政界的關係，主要有三次。第一次爲1913年熊希齡組閣時，受聘爲司法總長。第二次爲1924年任幣制局總裁。第三次爲1917年擔任財政總長。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1978)，頁106。

<sup>83</sup>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台北：世界，1988)，p. 570。

<sup>84</sup> 關於梁啟超從〔聯袁〕到〔倒袁〕的政治事業過程中，以及因〔復辟事件〕與其師康有爲的決裂事件，請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1978)，頁64-104，254-259。



治救國的抱負，轉為教育救國的計劃。決定了此一人生的新方向，回國後的梁啟超，已經不復往日熱衷與周旋於詭譎莫測的政治圈，轉而是忘情地投入與社會文化教育建設有關的書籍雜誌出版事業，和在全國各地展開的講學活動。<sup>85</sup>梁氏在1920年之後至他於1929年去世之間的主要活動，基本上是在這層文化教育建設之意義的前提下開展的。

從1920年到1929年任公去世的短短九年間<sup>86</sup>，梁氏以他驚人的精力，在全國各地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四處旅行演說與講學，同時，就他遺留下來的數量通訊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如此忙碌與不安定的旅行講學日子中，還不時地以書信向家人和同志們報告他的活動與成績。而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在他晚年的歲月中因為活動太多而相對地使時間變得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他還完成了大量的純學術研究的著作，這些作品雖然基本上還是任公他極具個人特質的巨大熱情下的產物，但和往昔他的甚具宣傳特質的文字相比，已經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奠定日後他國學大師聲名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有：1920年的《孔子》、《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清代學術概論》，以及《墨經校釋》；1921年的《歷史研究法》和《墨子學案》；1922年的《大乘起信論考證》和《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的《陽明先生傳》與《朱舜水年譜》；1924年的前述關於戴震的研究之外，另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以及《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1925年《復餘姚評論社論邵二雲學術》；1926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1927年的《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以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sup>87</sup>這些只是舉其犖犖大者，並不完全包括他已經發表和不少未見發表的和學術有關的演講稿。

從這些純學術著作中，我們可以將任公的興趣重點概括為四類：第一類，屬於通論性質的，例如《中國文化史》和《儒家哲學》；第二類，與先秦思想史有關的，例如《孔子》、《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墨經校釋》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sup>88</sup>第三類，關於清代思想史的，例如《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最後，第四類，和史學方法有關的，例如《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就這四類作品相比較，不論在質與量方面，又以先秦思想史與清代思想史這兩方面的研究最具成績。我們幾乎可以斷言說，這兩個領域，是梁氏晚年學術研究的兩個高峰。站在梁啟超的時代來看，先秦思想史與清代思想史是中國思想史的首尾兩端，那麼有人不免要問這麼個問題：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使任公必須從事於乍看來似乎不甚關聯的這兩個相去千年的研究領域呢？關於梁氏的清代思想史研究，其目的比較單純，要言之，是梁氏意欲在一個時代的結束之時，總結與檢討該時代的思想遺產，並藉此反省

<sup>85</sup> 吳天任編著，《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四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1435。

<sup>86</sup> 任公係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故為九年左右。

<sup>87</sup> 關於這些著作的完成情形，主要可參見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台北：世界，1988），頁570-787。

<sup>88</sup> 關於任公的先秦史研究，除了思想史之外，另有社會史方面。例如1906年完成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以及1920年完成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和在1920年以後完成的《太古及三代載記》、《春秋載記》與《戰國載記》。參見孟祥才，《梁啟超傳》（學術篇），（台北：風雲時代，1990），頁117-123。

，他在晚清風雲變換的歲月中的思想活動，其基本意義為何？職是之故，像1904年完成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20年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以及1924年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基本上都是屬於這一意義下的產物。至於梁氏為何在治清代思想史之外，又耗費大量心力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上，其間關係則比較複雜。關於這一問題，簡約地說，大概有下述幾個原因：

第一，是與中國通史撰述計劃有關。梁任公早在1918年春夏間起，便有專心撰述屬於通論性質的《中國通史》鉅著的計劃。然而由於工作過度著述過勤，至是年八九月間忽然罹患了嘔血病，使這一計劃不得不叫停，就他是在是年給陳叔通的信函來看，這一《中國通史》的撰述計劃，截至五月左右，便已經完成了約十二萬字左右的關於先秦的部分。<sup>89</sup>病癒之後，他又與張君勱、丁文江等計劃遊歐的事情，並於是年年底成行，撰寫通史的計劃便無有機會付諸實踐了。返國以後，梁氏忙於四處講學，當然更是沒有機會作大型的撰述計劃了。雖然如此，他還是在1920年遊歐回國之後，斷斷續續地作了不少與先秦有關的研究，例如〈太古及三代載記〉、〈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等關於先秦社會方面的。然而成就更大的，還是在先秦思想史方面。在這方面比較代表性的，有他整理自清華與南開等大學講學的講稿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以及在1926年完成的〈先秦學術年表〉等若干論文。必須一提的是，任公躍入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並非藉著學術研究來逃避現實政治的紛擾。用他的話來說，他作先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欲「藥現代時蔽」，具有強烈的以學術經世的取向。<sup>90</sup>

第二，是與梁任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有關。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特色，借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的觀點來說，是「以復古為解放」。梁氏的「解放說」共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sup>91</sup>梁任公這「四步說」，事實上，等於是清代思想發展史由興盛到衰落的四個段落過程：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以及衰落期。<sup>92</sup>就淵源來看，梁氏這「四步說」，是自他1904年定稿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的「四期說」修訂出來的。在此篇中，梁任公分清代思想的發展為四期：順康期，雍乾嘉期，道咸同期，以及，光緒期。根據梁任公，第一期所爭的是程朱陸王問題，第二期所爭的則是漢宋問題，第三期所爭的是今古文問題，而第四期所爭的則是孟荀問題和孔老墨問題。<sup>93</sup>梁氏在

<sup>89</sup> 《中國通史》先秦的部分，在任公的計劃中是十一卷，約二十萬言左右。見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下)，頁542-543。

<sup>90</sup> 《先秦政治思想史》，序文，(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4)。參見孟祥才，《梁啟超傳》(學術篇)，(台北：風雲時代，1990)，頁123-132。

<sup>91</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1967)，頁8。

<sup>92</sup> 清代思想發展史由興盛到衰落的四個段落過程(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以及衰落期)，是任公在此一時期受到他所研習的佛學的影響。借用佛法生、住、異、滅等四個有機流轉的概念，他將清代思想發展史由興盛到衰落分成四個段落過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1967)，頁2。另參見陳祖武，〈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八輯，(1991年6月)，頁285-287。

<sup>93</sup> 《飲冰室文集》第三冊，頁102。

1920年採用〔解放〕的觀點來詮釋他的〔四步說〕，當然遠比他十六年前(即，1904年)，以發展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四期說〕，更為傳神。然而我們也不要忘了，這個〔解放說〕的反面即是他所謂的〔反動說〕，即〔清學的出發點在對宋明理學的一大反動〕(更精確地說，應是對王學的反動)<sup>94</sup>。從清代思想發展史的觀點來看，如果清初儒學的特質是對王學的反動，清中葉的漢宋之爭則是漢學對宋學的反動；而晚清的今古文之爭，則是今文對古文(考證學派)的反動；最後，清末的諸子學的復興，則又是諸子學對西漢今文學的反動了。由於清代學術思想史有這個〔解放〕的特色，而清學的〔解放〕的目標又以先秦為終點，所以梁任公抓緊中國思想史的兩端，這是很可以理解的。

第三，是與清學主流考據學的強調訴諸原始經典有關。在清代近二百七十年的學術思想中，以漢學和宋學的勢力最大，雖然這兩個學派在清代思想的發展上影響最為深遠，卻也是因此在某一意義上最不相水火，在兩派論爭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考據運動最高峰的十八世紀下半期)，民間的漢學(更精確地說，考據學)為了要與具有官方色彩的主流學派宋學(或更精確地說，程朱儒學)的主要觀點競爭，對宋學若干核心概念例如〔理〕、〔天〕、〔道〕、〔性〕、〔命〕、〔仁〕、〔誠〕等等的解釋，提出了強烈的批判。在這批判的過程中，考據學者為了強化自我的論證權威，便自然地要回到儒學經典形成與定形的古代樞軸時代(Axial Age)，透過訴諸原始經典這一手段，以證明宋學學者觀點的謬誤性和考據學者對儒學解釋的有效性。考據學大儒戴震批判宋學的經典《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便是一個有力的例證。換句話說，由於必須訴諸原始經典，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先秦時代。作為清代思想史研究的開拓者，梁啟超對清代思想史這一領域的研究，是在這一意義下要涉及先秦思想史這個範疇的。

第四，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定位問題。今文學出身的梁啟超，不僅是清代學術發展史的研究者，同時還是參與者。作為康氏的主要弟子，他年少時曾經醉心于康氏以公羊學為中心的今文經學與大同說，<sup>95</sup>並因此捲入晚清的政治改革運動中。必須一提的是，康有為的改良主義政治觀，是和他的帶有強烈意識形態取向的今文學連接在一起。雖然梁氏自從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出亡日本以後，已有逐漸放棄康版今文學以進化論為形式但是以復古為目的(即大同說)的歷史觀，<sup>96</sup>轉而接受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以現代性(Modernity)為標的歷史進化觀的跡象；同時，他在民國以後又因種種原因，與其師康有為的主要理念分道揚鑣(尤其是1915-1916年間，康氏公然主張復辟一事之後)。可以說到了1920年他擬投身教育文化事業時，已經不再為其師康有為的

<sup>94</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1967)，頁8。

<sup>95</sup> 嚴格而言，經今文學並不等於解《春秋》的公羊學，然而在晚清的今文學運動中，基本上是以公羊學為中心。而就人物來說，則又以康有為為中心。所以在晚清學術思想中，今文學與公羊學在廣義的角度來說，是互通的。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21-23章。

<sup>96</sup> 康版的今文學的歷史進化論，實際上是康有為揉和與改造《禮運》〔復古主義〕與何休公羊三世說的〔歷史循環論〕而成的。形式上它是歷史進化論，但是事實上，它卻是以理想化的烏托邦〔大同世界〕為依歸。換句話說，它在本質上，是借用了進化論形式的歷史退化觀。關於康有為的歷史進化觀討論，可參見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台北：文津，1992)，頁83-108。

今文學學說所左右了。<sup>97</sup>但是這種近乎對經今文學的否定，卻不能改變與此經今文學運動有緊密關連的他在晚清的政治改革運動事業的歷史。職是之故，在他1920年淡出政治圈投身學界之後，在他晚年檢討與總結清代學術史的發展與意義時，不可避免地要反省到這麼個問題：要如何從學術的觀點客觀地對待他的老師康有為和他曾經批判過的經古文學(或甚至放大來看，考據學)的問題<sup>98</sup>。另外，與此問題相關的，使他在歷史舞台上初試啼聲的今文學學說，其知識論的本質究竟為何？探索這些問題，自然是無法停留在西漢的今文經學或是東漢的古文經學，而必須上溯到儒學經典形成與定形的古代樞軸時代(Axial Age) 去找答案了。

簡言之，梁任公在他晚年投入大量心力從事於學術研究的工作，基本上是以先秦思想史與清代思想史這兩個學術領域為中心，而就思想史這一角度來考察他所從事的這兩件工作，(即就他學術經世這一觀點來看)，後者的重要性與意義，顯然又在前者之上了。換言之，任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工作，又可以看成是他在有限的、晚年的學術生涯中用力之所在。

梁氏在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如前所述，當然要以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和1924年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具代表性。但是除了這兩部通論性的論述之外，他在清代思想史方面的成績還有一些個案式的研究，例如1923年的《朱舜水年譜》、〈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1924年的前述的〈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以及〈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和《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1925年的〈復餘姚評論社論邵二雲學術〉。從這些有關清代思想史的散篇個案研究來看，不論是在質或者量方面，均以戴震的研究最具份量。換言之我們可以結論說，梁氏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成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具體在通論性的《清代學術概論》(1920)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另一方面則是具體在個案性的、於1923-24年間完成的有關戴震的研究上。

## 結 語

本篇的意旨，主要在於藉著關於梁啟超在1923-24年間密集地從事於清代中葉考據學大家戴震的研究，來探討梁啟超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九年，突然決定淡出政治圈並投入教育文化事業這一重大轉變的基本意義。在五十七載不算長壽但卻是不凡的生命中，梁任公於1920年遊歐返國後，將他的晚年全心全力地投入講學與著述的事業中。在這轉變上，梁氏除了繼續扮演他昔日的啟蒙思想家的角色之外，但更值得注意的(同時也是更有成績的)，便是他作為學者的這一角色。

97 梁任公說他三十歲(即1902年)以後，已經絕口不談《偽經》，也不太談《改制》，但是其師康有為在民國之後，還繼續於國內大聲呼籲創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等，梁氏認為他十分不以為然，並起來反駁其言論。見《清代學術概論》，頁88。

98 康有為批判經古文學的代表作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書，這兩本在晚清極富爭議性的著作，在當時曾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並甚至為官方所查禁。

作為學者的梁啟超，其晚年的學術工作重點，基本上是圍繞在清代思想史與先秦思想史這兩個領域方面。由於任公在這兩個領域上的示範性成績，直接與間接地影響了於〔後五四時期〕(Post-May-Fourth Movement Period)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整理國故運動。然而就梁啟超本身的角度來考察，前者(即清代思想史)的重要性(不論在成績與意義兩者上)，又在後者(即先秦思想史)之上。總結地說，作為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先鋒，梁氏在這一領域的傑出研究，如前所述，是具體在通論性質的《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在個案研究性質的戴震研究上。

晚清以來關於戴震的研究，以章太炎揭其端緒，而開花于梁任公。章太炎的〈釋戴〉篇，成於1910年，先刊布於是年的《學林》第二冊，後來收入《太炎文錄》<sup>99</sup>。這篇長約二千字的短文，主要的觀點有三：第一，是關於〔斥理崇法〕的觀念。章氏此文一方面批判程朱儒學對〔理〕的推崇，一方面則頌揚法家講求法律的精神，認為宋朝以來的統治者雖大力提倡程朱儒學，但是程朱儒學的道德訴求太過於空泛，遠不如法律來得切實。章氏以為這種〔任法律而參洛閩〕的現象，是導致宋以來各朝國運積弱的主要原因。第二，是關於〔以理殺人〕的思想。章氏從〔斥理崇法〕說，接引到〔以理殺人〕這一戴震的主要學說之一。〔以理殺人〕本是漢學大師戴震批判宋學的核心理念之一，然而作為反滿志士的章太炎，不從學術思想的觀點來考察，卻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解釋戴震，認為戴震此一思想係針對清專制帝王而發，即清室作為外來的統治者考慮到光以法律不足以服人，而必須借助程朱理學的〔以理殺人〕，來正當化其統治權力的合法性。第三，是與〔理欲論〕有關。〔理欲論〕也是戴震的主要論點之一。不同於程朱儒者所主張的〔理欲二元論〕，戴震主張〔理在欲中〕的〔理欲一元說〕。戴氏的〔理欲一元說〕表面上雖然託諸孟子，但是作為先秦諸子學專家的章太炎卻認為，戴氏此說，實際上是受到老子〔自然主義〕思想與孫子〈正名〉篇〔以理當欲〕學說的影響。<sup>100</sup>

章太炎於辛亥革命前夕完成的充滿排滿民族主義氣息的這篇有關戴震的論文，雖然在時間上，比梁任公的戴震研究早了十四年左右，但是就梁氏有關戴震的著作來看，似乎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他曾經受到章太炎此篇論文觀點的影響。雖然如此，章氏此文所強調的〔以理殺人〕和〔理欲論〕這兩個戴震思想的核心學說，的確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以梁啟超與胡適為主導的戴震研究熱潮中，有若干的呼應。

## 參考書目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1988)。

<sup>99</sup> 參見胡楚生，〈章太炎〔釋戴篇〕申論〉，《幼獅學誌》19(2)：144。

<sup>100</sup> 章太炎，〈釋戴〉，收於《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122-124。另參見胡楚生，〈章太炎〔釋戴篇〕申論〉，《幼獅學誌》19(2)：131。不過，本人對章氏此篇的看法，與胡先生略有出入。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July 1993)

王茂，〈戴震哲學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1976)。

——，〈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7)。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1986)。

何文光，〈《孟子字義疏證》點校說明〉，收於《孟子字義疏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1)。

宋文明，〈梁啟超的思想〉(台北：水牛，1991)。

李孝悌，〈胡適與整理國故：兼論胡適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食貨》15(5-6)：69 (Nov. 15, 1985)。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周策縱，〈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1991)。

吳天任編著，〈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孟祥才，〈梁啟超傳〉(學術篇)，(台北：風雲時代，1990)。

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台北：文津，1992)。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於《戴震集》點校本，(台北：里仁書局，1980)。

胡楚生，〈章太炎〔釋戴篇〕申論〉，《幼獅學誌》19(2)。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1984)。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第一集)(台北：遠東，1974)。

——，〈戴東原的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章太炎，〈釋戴〉，收於《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台北：商務，1974)。

——，〈孔子改制考〉(台北：商務，1968)。

陳祖武，〈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八輯，(1991年6月)。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

——，〈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

——，〈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

——，〈戴東原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

——，〈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4)。

——，〈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1967)。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1989)。

- , 《儒家哲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1980)。
- , 《歐遊心影錄節錄》(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1976)。
- 張朋園,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台北:食貨, 1978)。
- 張灝, 〈超越意識與幽暗意識〉, 《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 1989)。
- 劉昭仁, 《戴震》, 收於王壽南主編, 《中國歷代思想家》(台北:商務, 1978)。
- 鮑國順, 〈戴東原學記〉, 博士論文(台北:政大中文所, 1978)。
-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7)。
- 戴震, 《戴震集》點校本, (台北:里仁書局, 1980)。
- 山井湧, 《明清思想史研究》,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980)。
- Chiu, Eugene W., (丘爲君), "Morality as Politics: The Restoration of Ch'eng-Chu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
- Wu, Pei-yi (吳百益), "Self-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 of Sins in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1) (1979).

## **Liang Ch'i-ch'ao's Studies of Tai Chen** **---Motives, Methods, and Implications**

###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rise of Tai Chen learning in 20th-century China through the case of pioneering studies of Liang Ch'i-ch'ao (1873-1929). There are three principal foci in this research. First, why Liang, in the early 1920's at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zenith, suddenly gave up his promising political career in "warlord China" and, instead, turned to 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 which seems to be less exciting, if not unattractive, to Liang? Second, why he chose the figure of K'ao-cheng Learning master Tai Chen (1724-1777) as the subject of his studies? What kinds of approaches does Liang present to us in his studies of Tai Chen, which, on the one hand, generated the interest of academic circles in this extraordinary philological master of 18th-century China, and, on the other hand, made Liang's own studies of the given leader of the K'ao-cheng movemen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ai Chen Learning? And lastly, the third, what are the possible meanings of Liang's unusual change in his career decision in the early 1920's as is seen in his studies of Tai Chen? To cope with these three foci, this paper discusses Liang's studies of Tai Chen through three perspectives: motives, methods, and implications.





## 梅農、弗來格與羅素的指謂論

俞懿嫻\*

### 摘 要

指謂不存在對象 (non-existent objects) 的語詞或語句是否具有意義？這類指謂命題是否有真假可言？上述問題向為邏輯哲學與語意學中最具爭議性的議題。梅農(A. Meinong) 的「對象論」(Theory of Objects)，與弗來格(G. Frege) 的「意義與指涉論」(“On Sense and Reference”)，都在試圖為這些問題尋求解答。羅素(B. Russell) 則認為他們的答案不足以解決傳統的邏輯難題(logical puzzles)，於是在一九〇五年發表「論指謂」(On Denoting) 一文，提出以邏輯語法分析的方法釐清指謂語句的邏輯結構。羅素主張指謂詞的意義，並不取決指謂對象，而取決於其所在的語句；同理指謂語句的意義與真假也需取決於其語言使用的邏輯層次，也非取決於對象。羅素此說即所謂的「描述理論」(Theory of Description) 實為廿世紀分析哲學家的興起奠定基礎。後起分析哲學家們雖對他的學說多所批評，但是邏輯語法與語言分析的方法，已成為分析哲學採用的不二法門。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在一九〇四年「心靈」雜誌(Mind) 上發表的「論指謂」("On Denoting") 一文，可說是引起當代分析哲學家最多爭議與重視的文獻之一。(註一) 羅素自己也曾在其所著的《西洋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中說明「論指謂」所揭櫫的「描述理論」(Theory of Description) 對當代邏輯哲學與知識論的貢獻。原來傳統理性主義的數學家認為數學純為理性形式演繹下的產物，與經驗無涉，數學對象與知識真實無誤，絕對永符，自有其特定的存在地位(ontological status)，相反地經驗主義的數學家們則認為數學知識一如所有人類的知識，全然起於經驗，數學對象純為符號約定的結果，自身並無實在性，數學家知識與命題也是經驗歸納的結果。在此爭議之中，羅素採取了第三種觀點：數學家既不是純理的演繹系統，也不是經驗的綜合命題，而是根據某種語言系統規定好了語詞概念的定義和使

\* 東海大學哲學系

註一 羅素「論指謂」一文曾在一九五〇年受到史陶生(P. F. Strawson) 所撰「論指涉」(On Referring) 一文的批評，其後唐納蘭(Keith S. Donnellan)，卡頓(C. C. Caton)，林斯基(Leonard Linsky)，奎克(Saul A. Kripke)、派特南(H. Putnam) 等語言與分析哲學家，也就此課題持續討論。艾耶(A. J. Ayer) 則稱「論指謂」中提出的「描述理論」是羅素對哲學的兩大貢獻之一，另一是指羅素的「類型理論」(theory of types)。見 A. J. Ayer,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p.8 24-25.

羅素的理論可說是種「邏輯語法論」，指謂片語是邏輯語言系統中的不定成員(undetermined constituents)，其指謂的對象與意義，必需根據片語所在的命題方能決定。於是羅素說：

「我把變數(variable)看做是最緊要的，我以『C(x)』表示一個命題，其成員是x，在此變數x是完全不定的。」註廿一其次無論這命題是全稱肯定、全稱否定、偏稱肯定、或偏稱否定命題，所有的量詞自身(如每一，沒有任一，某些，某些不是)等皆無意義，唯有在命題之中才有意義。總的來說，任何語詞，尤其是指謂片語自身並無意義，唯有在命題之中才有意義與指謂可言。

根據這個理論日常語言皆可轉譯成邏輯語言。例如說「我遇到一個人」，就可轉譯為「我遇到x，x是個人。」不總是假的」。在此「一個人」(指謂片語)自身毫無意義，唯在命題之中時始具意義，也因此決定了命題的真假值。同理全稱肯定語句也可轉譯，例如「凡人皆有死」這命題即可轉譯為：「若x是人，x會死」總是真的。」在此說x是人，x已概括所有的人(all values of x)，同樣地全稱否定、偏稱肯定、偏稱否定等都可利用類似方式轉譯。

上述指謂片語都是不定指謂片語(indefinite denoting phrase)，也就是片語前是不定冠詞，或不定詞。至於定冠詞(the)引領的指謂片語(即所謂確定描述詞 definite descriptions)，其邏輯轉譯就較費周章了。定冠詞引領的片語指謂的對象不僅是獨特的(unique)，也是確定的。例如「查理二世的父親被處死刑」，若要轉譯為邏輯語言，必需一方面消除「定冠詞」(the)，另一方面又要能保存片語指謂獨特確定的意涵。如此該句或可轉譯為：「對x而言不總是假的，即x生了查理二世且x被處決且『若y生了查理二世，y則同於x』，對y而言總是真的。」(註廿二)

這樣轉譯可避免傳統指謂理論產生的困難。羅素首先提及梅農的對象論正是錯誤的傳統學說(註廿三)。梅農認為任何文法正確的指謂片語，皆代表某個「對象」。「當今的法國國王」、「圓的方形」都是真的對象。如此一來就違背了矛盾律：可以有一位當今的法國國王同時存在，又不存在；可以有個圓的方形既是圓的，又不是圓的。同時就如

註廿一 Ibid., p.104.

註廿二 Ibid., p.106.

註廿三 事實上羅素早年對梅農的學說頗多研究，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七年間，曾經撰寫七篇文章或介紹或批評梅農的論文。其中一九〇四年「梅農複合句與肯定句的理論」("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umptions")一文是針對梅農在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二年分別發表的「論高序對象與其和內在知覺的關係」("Über Gegenstände höherer Ordnung und deren Verhältnis zur inneren Wahrnehmung")與「論肯定」(Über Annahmen)所做。一九〇五年對梅農及其弟子所著「對象論與心理學探究」(*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一書做書評，此時他已發展出描寫理論，因而對梅農的「若然」學說提出批評。一九〇七年再對梅農所著「論對象論在知識系統中的地位」("Über die Stellung der Gegenstandstheorie in System der Wissenschaften")做評論。總的來說，在羅素尚未發展出「描述理論」之前，他對梅農的學說似乎採較同情的立場，可說他自己也主張「鬆散存有論」(liberal ontology)，待他發展出描述理論之後，則對梅農的學說批評嚴厲。詳見D. Lackey ed. *Essays in Analysis*, Part II, "Russell's Critique of Meinong," pp.17-20。

用規則發展出來的邏輯系統。(註二)羅素因而認為若要超越傳統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在知識論上的擾繞不清，必需訴諸新的哲學方法——邏輯語法的分析。不過「論指謂」一文雖在數學哲學上有一定的貢獻，其主要討論的議題卻是落在知識論與邏輯哲學的範疇之內。該文主要在批判梅農(A. Meinong)的對象論(Theory of Objects)與弗來格(Gottlob Frege)的意義與指謂論(Theory of Sense and Reference)，以前者提出「非存在對象」(non-existent object)的說法，而後者的理論不足以區分有實指與無實指的語詞。梅農的對象論、弗來格論意義與指謂的區分，以及羅素的論指謂不但在邏輯哲學的發展上居重要地位，也啓發廿世紀哲學主流之一的分析哲學運動。本文旨在分別討論梅農、弗來格與羅素三人的學說，以助吾人對「指謂」問題的瞭解。

## 壹、梅農的對象論(Gegenstandestheorie)

梅農在一九〇四年於《對象論與心理學探究》(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一書中發表其對象論，做為知識論的一般理論。認識必有認識的對象，梅農接受他的老師布蘭他諾(Franz Brentano)的行動心理學(act-psychology)，認為認識的心靈行動必有朝向的對象(directed object)(註三)。行動(act)固然是一切認識活動的主觀心理基礎，認識對象若為知識，則必涉及真假問題。而知識的真假有賴客觀因素——即對象——決定，因此梅農認為研究非心理性的認識對象是知識論的基本工作。(註四)他先根據對象的存在(being)狀態，將之區分為三類：(一)理想對象(ideal objects)：所有抽象的、可能存在但未必存在的認識對象，例如：全等(equality)，相似性(similarity)，數目、顏色等等，上述事物皆可長久永存(subsist, bestehen)，但不必真實存在；相反地，即使「全等」不存在，也不妨礙三角形為等邊三角形，或等角三角形。(二)實存對象(real objects)：所有具體個別、事實存在的認識對象，凡透過知覺立即為吾人所知的外在事物(extra-mental objects)，皆屬此類。(三)不可能對象(impossible objects)或不存在對象(nonexistent objects)，前者如圓的方形

註二 B.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 pp. 828-831.

註三 布蘭他諾認為心理現象(mental phenomena)的特質便在意向、朝向某物，使某物內存在於其中；在聽覺之中必有某物被聽到，在視覺之中必有某物被看到，在思維之中必有某物被思維，在判斷之中必有某物受判斷，心靈現象必有意向的對象(intentional objects)。因此心理現象的特質便是指向對象(the directedness toward an object)，這使對象內存的性質(the immanent-object-quality)便是所謂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此，布蘭他諾所謂的「意向對象」具強烈的心理色彩，並無心理以外的實在性。梅農接受布蘭他諾學說的基本原理，認為在認識活動之中必有對象被認識，不過他拒絕認識對象僅為心理現象之一部分的想法，提出對象的「非心理」層面，參看 Franz Brentano,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Translated by Antos C. Rancurello. Also, Reinhardt Grossmann, "Non-existent Objects: Recent Work on Brentano and Meinong,"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6, No. 1, January 1969, PP. 17-32.

註四 Alexius Meinong, "The Theory of Objects," tr. Isaac Levi, D. B. Terrell & R. M. Chisholm ed, *Realism and the Background of Phenomenology*, (U. S. A.: Ridgeview Publishing Co., 1960), pp. 36-78.

，後者如金山、獨角獸等。三類對象無論是否事實存在(factually exist)，皆各具可為人辨識的性質。

其次他提出一種特殊的認識對象，「確定對象」(objective, objektiv)，做為判斷與肯定行動的對象(註五)。梅農將認知行動分為兩類，一是立即直接的知覺(perception)提供的簡單思想，也就是呈現(presentation)，另一是由簡單思想組合而成的複合思想(complexes)，也就是判斷與肯定(judgments and assumptions)。正如知覺提供外在客體做為經驗呈現的對象，判斷與肯定也有從呈現衍生而出的「高序對象」(objects of higher order)做為其行動的意向內容。(註六)這高序對象就是所謂的確定對象，梅農根據其存有狀態，進一步區分之為三類：「是然對象」(Seinsobjektiv)、「不然對象」(Nichtseinsobjektiv)與「若然對象」(Soseinsobjektiv)。其中「是然對象」是單一思想行動(thetic function of thought)所把握的對象；單一思想行動就是肯定判斷，肯定某物的實存性(being, Sein)，對象的存有就是指對象的真實存在性。與「是然對象」相反的則是「不然對象」，是單一行動所否定的對象。這類對象即非存有(non-being, Nichtsein)，具有非實存性(unreal, non-existence)。而「若然對象」則是綜合思想行動(synthetic function of thought)的對象。綜合思想行動的關乎事物性質(Sosein, Something being so and so)的判斷，不論事物自身是否存在，事物的性質自具「無關存在性」(Aussersein, beyond being)。(註七)舉例來說，就判斷句「圓的方形是既圓且方的」而言，無論「圓的方形」是否存在，該判斷句自身是否為假，「圓的方形」的「既圓且方性」卻是無可置疑的。上述三種確定對象之中，「是然對象」與「不然對象」全然關乎經驗事實(a posteriori)，而「若然對象」則是與經驗事實無關的(a priori)。於是梅農提出其對象論的最重要原理：「一物的若然存在(Sosein)獨立於其是然存在(Sein)。」(註八)

這「無關存在」的理論也就是梅農對象論最引起爭議的一部份，若承認某物不存在，豈能承認某物的性質具有某種形式的存在？在此最易引起誤解的，即是「無關存在」是否也是一種存在。梅農技巧地指出無論是肯定對象存在的是然性質，或否定對象存在的不然性質，皆與某對象關連。例如說「藍色存在」與說「藍色不存在」一樣在談及「藍色」。因此只要確定對象有存在性——即有此思想、命題，則與之相關、甚至為其一

註五 「確定對象」在梅農的理論裡仍是一種「對象」，是判斷與肯定活動的內容，簡單地說就是具有真假性質的思想。羅素在對梅農學說裡的一篇評論中指出，「確定對象」就是他所謂的「命題」(propositions)。命題是語句的符常意義，且必具備真假值。參見 Bertrand Russell, *Essays in Analysi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3), p. 59。

註六 Ibid. pp.21-24.

註七 同註四，pp.81-83。梅農認為有些對象並不存在，但卻可做真命題的主詞，例如「獨角獸是種神話動物」，因此可說仍當具有某種方式超乎存有與非存有的作用。這類對象在奇索(R. M. Chisholm)看來，可說是「無家可歸」的對象，但絕非具有任何存在性的對象。見 R. M. Chisholm "Beyond Being and Non-being," in H. Feigl, W. Sellars & K. Lehrer ed. *New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72), p.17.

註八 同註四，p.82.

部分的對象也有存在性。不過確定對象的「存在」既不是實存，也不是永存(neither exist, nor subsist)，而是無關乎存在與不存在的，超乎存有與非存有之間(beyond being and non-being)。再加上確定對象與對象之間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是不可倒置的；也就是說即使對象不存在，也無礙確定對象具有「無關存在性」。如此一來梅農認為經由對「確定對象」(其實也是一種對象)無關有無性質的肯定，許多不存在對象在認識論上也有了著落。他說：「存有與非存有一樣外於對象，瞭解一對象的存有就如瞭解一對象的非存有一般。前述若然獨立於是然之外的原理，正在說明若然並不在對象之外，而是構成對象的適當本質，若然附於對象之上，不論其是否存在。」(註九)這類對象梅農稱之為「無家可歸的對象」，其「若然對象」並不因對象自身存在與否受到影響。例如不可能的對象(impossible objects)具有自相矛盾的若然性質，其若然性排除其是然性。方的圓形的若然性是既方且圓。這若然性雖使得方的圓形不可能存在，但其性質為既方且圓則是必然的。(註十)

總結以上所說，梅農的對象論有兩大主張：一是認為所有的心理行動，包括認知活動在內，皆有其對象(註十一)，而這些對象有的存在，有的可以不存在；二是對象的必然性質獨立於對象的存在；對象可以不存在，但是對象的性質則是超乎存在與不存在之外的。上述兩大主張皆不為羅素接受，為了解決「不存在對象」的邏輯問題，羅素一面批評梅農的對象論，一面提出他的描述理論。不過在說明梅農與羅素的論辯之前，還需先探討另一位同樣受到羅素重視的分析哲學家弗來格的對象理論。

## 貳、弗來格論意義與指謂

弗來格在一八九二年發表「論意義與指謂」一文(註十二)，認為任何語詞皆可區分出意義與指謂兩個層面。首先許多語詞的意義或許不同，但可能指涉相同對象，例如晨星與昏星可能都指金星，三角形三邊線a、b、c中，a、b中線的交點與b、c中線的交點正是同一點。因此說「a、b中線的交點」與說「b、c中線的交點」意義或許不同，但指謂的對象卻完全一樣，可見意義確實不同於指謂。其次一般認為語詞的意義取決於指謂的對象，如果指涉的對象不存在，語詞便無意義可言。這種說法不能解釋下面的事實：「離地球最遠的天體」、「最小的收斂數列」這一類的指謂片語，皆有可為人理解的意義，但卻沒有相符應的指謂對象。再則在日常用語中我們有時引用他人的語句，比方

註九 Ibid., p.86.

註十 有關若然性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考奇索的「存有與非存有之外」一文。在此可強調的是梅農認為「若然」並非與「是然」相反的概念，是然與不然相反，若然則是超乎兩者之外，直接對象必具性質的概念。

註十一 梅農認為除了認知以外的心理行動，意欲、情感、評價等等也各有其對象，而這些對象往往不存在。

註十二 「論意義與指涉」("Über Sinn und Bedeutung")一文中「指涉」一詞有多種英譯，如 designation, nomination 等，標準翻作 reference，羅素視之同於 denotation，即概念語所指稱之物。本文參考的是發果(H. Feigl)英譯的版本。見 G. Frege, "On Sense and Nominatum," tr. H. Feigl, in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H. Feigl & W. Sellars ed.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 1960), pp.85-102.

說A，並用引號將之括住，表作：「“A”表述句的意思是…。」在這種情況下，A的意義成為該引語的指謂對象，A自身指謂的對象，成為引語的間接指謂對象(indirect nominatum)。可見意義與指謂確實不同，宜有區分(註十三)這項區分正可以用來解決一項邏輯難題：所謂同一(the idea of Sameness)，究竟是對象與對象間的關係，還是符號意義間的關係？“a=a”與“a=b”在邏輯上來說，前者是分析命題(其結論即是其前提)，後則是綜合命題。但若以同一是根據指稱對象是否相同而定，而a與b如果正好指謂同一對象，那麼這兩個命題便相同無別了。然而說「晨星即是晨星」與說「晨星即是昏星」確有不同認知意義，雖然兩個命題所指謂的都可是「金星」。因此，唯有做出意義與指謂的區分，才可辨明同一不只是指稱對象相同，還包括意義相同在內。反之，若意義不同，指謂對象即使相同，也不能視為相同。

做此區分之後，弗來格本其一貫近乎柏拉圖實在論(Platonic Realism)的立場，強調意義與指謂不可與心靈圖像(mental image)混為一談原來十九世紀至廿世紀初，西方的知識論與邏輯哲學瀰漫著心理主義(Psychologism)的氣息，一切認識活動皆為心靈活動，知識論與邏輯也就是心理學的旁支了。再加上自亞里士多德以降，認識活動似乎總伴隨著個別的心靈圖像，其後有時是意向(intentio)，有時又是觀念、表像(presentations)，使得知識論與心理學一直糾纏不清(註十四)。弗來格站在邏輯主義(logicism)的立場，向來對心理主義不假辭色。早在一八八四年弗來格於《算術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一書的緒論中便提出，研究真確知識的第一項原理就是要將心理的與邏輯的，主觀的與客觀的嚴格區分開來。(註十五)與認知有關的語詞意義與指謂，全然是邏輯客觀的知識對象，與主觀心理的心靈圖像毫無關係。對指謂語詞如專有名詞而言，其所指謂的對象必是語詞以外的特定事物，這事物是客觀的存有，與主觀的心理圖像毫無關係。至於語詞的意義則是邏輯的概念，既不是主觀圖像，也不是客觀事物。弗來格並舉例說明之：若有人經由天文望遠鏡觀測月球，則可說月球是指涉對象，全然客觀外在的；而月球的影像必先投射於望遠鏡的鏡片之上，在這階段望遠鏡的鏡片是客觀的，其所反映的影像則因機器調整的角度不同，可以是相對的，但是卻可提供不同觀察者相同的視覺，就此而言可把它比作意義；至於反映到每個觀察者眼睛視網膜的影像，則是私人主觀的觀念或表象，每個人只能各自運用自身的器官。(註十六)質言

註十三 同上，pp.85-87.

註十四 亞里士多德在「論心靈」(*On the Soul*)中提出凡思維必有心靈圖像伴隨的理論，中世紀哲學沿此思想，發展出「類概念」(Species)與意向學說(doctrine of intention)。至近世哲學，笛卡兒(R. Descartes) 洛克(J. Locke)等皆認為觀念與表象是認識的基本對象。洛克並提出「歷史平易法」(historical plain method)說明人類悟性的起源，使得日後的知識論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之上。到了十九世紀，心理學家如布蘭他諾、史敦布福(C. Stumpf)等人，皆視心理學為一切人類知識的基礎。

註十五 G. Frege,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tr. J. L. Austin, (New York: Harper, 1960)。弗來格提出的原理有三，另外兩條是：總要在命題之中尋求語詞的意義，不要單獨地尋求語詞的意義；要注意概念與對象的區分。

註十六 同註十二，p.88。

之，弗來格認為凡屬主觀、個人的心理活動，皆為排除於客觀、公眾(public)的知識領域之外。意義與指謂皆是認識的對象，因此當擺脫心理的色彩。

接著弗來格將表達意義的語言，大致分為三類：語詞(words)，表語(expressions)與語句(complete sentences)。三種類型的語言，各有其意義與指謂。首先專名(proper name)包括語詞、表語在內，皆表達其意義而指謂其對象(expresses its sense and designates its reference)，如三角形、月亮、亞歷山大帝的老師與柏拉圖的學生，最早發現行星運轉以橢圓形軌道的人，等等，均屬此類。至於非專名，或不完整的表語(incomplete expressions)，即使具有部分意義也要在完整語句之中，才能確定其指謂的對象。其次完整語句中的陳述句(declarative sentences)中，其所表達的意義弗來格稱之為「命題」，也就是語句的客觀內容(objective content)，而其指謂對象則是真假值(truth-value)。語句的內容邏輯地說就是命題，不同語句可以表達相同的命題，好比用不同語言可以表達相同的意思。語句的意義不同於其指謂的對象，例如「奧狄賽(Odysseus)在熟睡中從印沙卡(Ithaca)漂走」，這語句中的專有名詞如奧狄賽或許並沒有一個指謂對象，但是整個語句仍有其意義。而語句本身的指謂對象則是其為真為假的情況與條件。若只是欣賞一個語句的意義，則不必關心其是否有指謂對象——可以把語句當作詩或神話，然而一旦考慮到語句的指謂對象，便是在考慮其是否真有所指，整個語句是真還是假，因此可以說語句的指謂對象就是真假值。(註十七)設若語句之中包含語句，則複合句的指謂對象不是真假值，而是命題。例如「哥倫布從地球是圓的推論出若他一直向西航行，必可抵達印度。」這語句指謂兩個命題：地球是圓的，哥倫布西航可達印度，在此重點是哥倫布是不是真的相信兩者間的關連，至於地球是否真的是圓的，以及哥倫布是否真的西航至印度，也就是這語句部分的真假值，與整個語句的真假無關。(註十八)。

命題語意主要是由概念構成，如果承認命題也可做為複合句指謂的對象，是否會使意義(或概念)與指謂(或對象)間的區別又模糊了呢？為了澄清這點，弗來格曾在「論概念與對象」(On Concept and Object)一文中說明兩者的區分。(註十九)概念是命題中的述詞(predicate)部份，可說是述詞指謂的對象(在此指謂對象是思想，而非外在客體之意)，而對象則是命題的主詞部份，可說是主詞的指謂對象(在此指謂對象或為外在實物，或為概念詞(concept-words))。例如「哺乳類的動物是陸居動物」這一命題中，哺乳類是主詞，陸居動物則是述詞，即使「哺乳類」也可算是一個概念，但是與「陸居動物」相較，則成為後者之內的成員，也就成為更大的範圍述詞概念內的對象。由此類推，若說命題為複合句的對象，則此時命題已不處於「意義」的位置，轉而成為較高序的語句指謂的對象，因此意義與指謂仍有所別。

註十七 Ibid., P. 94。

註十八 Ibid.

註十九 G. Frege, "On Concept and Object," in H. Feigl, W. Sellars, & H. Lehrer ed., *New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72), pp.23-30.



根據上述，弗來格意義與指謂的學說可撮要如下：

- 一、專名，完好形成的語詞、語句(*proper names, well-founded complexes, words, sentences*)，皆有意涵與指謂的區分。
- 二、完好形成的語詞語句其指謂對象或許不存在，但一定有意義，反之說語詞語句有指謂對象卻無意義，則是不可能的。
- 三、意義與指謂皆具客觀邏輯性質，與主觀心理圖像如觀念、表象等無關。
- 四、確定指謂語詞表達其意義，指謂其對象，其對象可為外在客體、邏輯、數學或科學對象，概念詞等；完好陳述語句則以命題為意義，真假值為指謂對象，據此原則，所有真命題的指謂對象皆相同；再則複合句之指謂對象是命題，而非真假值。命題為意義或指謂對象端視其邏輯地位，不能因此以為意義與指謂無別。

弗來格的學說比起梅農的對象論題顯然較能祛除心理的色彩，不存在對象的問題也自然消失於無形。羅素在邏輯哲學上深受弗來格的影響，認為命題、真假值皆是邏輯元素，不過對弗來格所作意義與指謂間的區分，卻不盡滿意，於是試圖提出「描述理論」補正之。

## 參、羅素的論指謂

羅素在「論指謂」一文開宗明義地說道：「我所謂的指謂片語(*a denoting phrase*)是指：一個人、某些人、任何人、每個人、所有人、當今的法國國王、當今的英國國王，在廿世紀初太陽系的中心質點，地球之繞日而行。可以說片語之所以指謂對象，全賴其形式(*form*)。在此可將之分做三類：(一)片語可能有指謂對象，也可能沒有，例如「當今的法國國王」；(二)片語可能悉謂某個確定對象，例如「當今的英國國王」；(三)一片語可能含糊地指謂不確定的對象，例如「一個人」並非指謂許多人，而是指謂一個不確定的人。」(註二十)此處羅素特別強調指謂片語是種「形式」(*form*)，其指謂對象或有不同，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有的明確，有的不明確，但其為指謂之旨之一也。

這種指謂片語在羅素看來，具有高度認識論上的價值：所有非親知(*acquaintance with*)的知識，皆靠指謂片語取得。羅素似乎認為知識之中有兩大部分，一是感官知覺的親知，對此吾人有關於認知事物的表象，另一則是借著指謂片語而知道(*know about*)的知識。由於感官知覺能力有限，借指謂片語取得的知識顯得格外重要。然而究竟指謂片語的性質如何？指謂對象與意義間有何關連？梅農和弗來格對此雖各有立場與見地，但都不能使羅素滿意，於是羅素便試著提出他自己的理論，進而批評梅農與弗來格的理論，最後再說明他的理論具有的哲學價值。

註二十 Bertrand Russell, "On Denoting" in D. Lackey ed. *Essays in Analysi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3), p.103.

羅素的理論可說是種「邏輯語法論」，指謂片語是邏輯語言系統中的不定成員(undetermined constituents)，其指謂的對象與意義，必需根據片語所在的命題方能決定。於是羅素說：

「我把變數(variable)看做是最緊要的，我以『C(x)』表示一個命題，其成員是x，在此變數x是完全不定的。」註廿一其次無論這命題是全稱肯定、全稱否定、偏稱肯定、或偏稱否定命題，所有的量詞自身(如每一，沒有任一，某些，某些不是)等皆無意義，唯有在命題之中才有意義。總的來說，任何語詞，尤其是指謂片語自身並無意義，唯有在命題之中才有意義與指謂可言。

根據這個理論日常語言皆可轉譯成邏輯語言。例如說「我遇到一個人」，就可轉譯為「我遇到x，x是個人。」不總是假的。在此「一個人」(指謂片語)自身毫無意義，唯在命題之中時始具意義，也因此決定了命題的真假值。同理全稱肯定語句也可轉譯，例如「凡人皆有死」這命題即可轉譯為：「若x是人，x會死」總是真的。」在此說x是人，x已概括所有的人(all values of x)，同樣地全稱否定、偏稱肯定、偏稱否定等都可利用類似方式轉譯。

上述指謂片語都是不定指謂片語(indefinite denoting phrase)，也就是片語前是不定冠詞，或不定詞。至於定冠詞(the)引領的指謂片語(即所謂確定描述詞 definite descriptions)，其邏輯轉譯就較費周章了。定冠詞引領的片語指謂的對象不僅是獨特的(unique)，也是確定的。例如「查理二世的父親被處死刑」，若要轉譯為邏輯語言，必需一方面消除「定冠詞」(the)，另一方面又要能保存片語指謂獨特確定的意涵。如此該句或可轉譯為：「對x而言不總是假的，即x生了查理二世且x被處決且『若y生了查理二世，y則同於x』，對y而言總是真的。」(註廿二)

這樣轉譯可避免傳統指謂理論產生的困難。羅素首先提及梅農的對象論正是錯誤的傳統學說(註廿三)。梅農認為任何文法正確的指謂片語，皆代表某個「對象」。「當今的法國國王」、「圓的方形」都是真的對象。如此一來就違背了矛盾律：可以有一位當今的法國國王同時存在，又不存在；可以有個圓的方形既是圓的，又不是圓的。同時就如

註廿一 Ibid., p.104.

註廿二 Ibid., p.106.

註廿三 事實上羅素早年對梅農的學說頗多研究，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七年間，曾經撰寫七篇文章或介紹或批評梅農的論文。其中一九〇四年「梅農複合句與肯定句的理論」("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umptions")一文是針對梅農在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二年分別發表的「論高序對象與其內在知覺的關係」("Über Gegenstände höherer Ordnung und deren Verhältnis zur inneren Wahrnehmung")與「論肯定」(Über Annahmen)所做。一九〇五年對梅農及其弟子所著「對象論與心理學探究」(*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一書做書評，此時他已發展出描寫理論，因而對梅農的「若然」學說提出批評。一九〇七年再對梅農所著「論對象論在知識系統中的地位」("Über die Stellung der Gegenstandstheorie im System der Wissenschaften")做評論。總的來說，在羅素尚未發展出「描述理論」之前，他對梅農的學說似乎採較同情的立場，可說他自己也主張「鬆散存有論」(liberal ontology)，待他發展出描述理論之後，則對梅農的學說批評嚴厲。詳見D. Lackey ed. *Essays in Analysis*, Part II, "Russell's Critique of Meinong," pp.17-20。

羅素在他處提到，如何說一物不存在，但是有關該物的性質卻存在(即若然獨立於是然之外的原則)?梅農的學說顯然有困難，究竟不存在或無關存在的對象，以及對象的若然性質居於何種存有地位?若不存在與虛構之物，確可以為認識對象，又如何與真實之物區別開來?梅農的學說對此或許有所解答(註廿四)，仍不免徒增困擾之譏。

然而羅素對梅農的批評是否中肯，仍值得斟酌。或許可以說梅農的對象究竟屬何種性質，殊難解釋，但未必可因此說他犯了矛盾律。畢竟梅農承認不可能的對象(impossible objects)如圓的方形並不存在，其若然性質也超乎存有與非存有之間。正如奇索(R.M. Chisholm)所見，梅農根本不認為這類對象有任何存有性，自然也就談不上干犯矛盾律了(註廿五)。

批評梅農之後，羅素的矛頭立刻指向弗來格。弗來格認為所有指謂片語皆可區分其意義與指謂對象之不同，固然避免了梅農理論的困境，卻仍不是個理想的學說。若如弗來格所說，指謂片語表達(express)意義，並指謂對象，則在指謂對象不存在的情況下，會產生困難。說「英國的國王是禿頭」，在這語句中的「英國國王」(the King of England)不只表達語句部分的意義，該意義更指謂了實際存在的一個人。但是「法國國王」(the King of France)這樣的指謂片語即使也有像「英國國王」一樣的意義，卻無指謂對象。弗來格會說這指謂片語所指謂的對象屬於空集合(null-class)，但事實上空集合是邏輯的設施，而說「法國國王是禿頭」這樣的語句，不只因其無指謂對象，可說是沒有意義的胡說，還因其描述的並不符合實際狀態，所以是假的。因此弗來格的理論，不足以解釋真正的情況。(註廿六)

羅素接著提出三個邏輯難題來測試他與弗來格的理論，那個較能圓滿地解決這些難題：

一是有關同一律的難題，史高特(Scott)是《威維利》(Waverley)一書的作者，根據同一律，若二者相同則任何「史高特」所在的命題位置，皆可由「《威維利》一書的作者」所取代，而不影響該命題的真假值。但若說「喬治四世想要知道史高特是否是《威維利》一書的作者」，這個命題可為真，而說「喬治四世想要知道史高特是否是史高特」則未免荒謬。因此同一律似乎有誤。

二是有關排中律的難題。根據排中律「A是B」或「A不是B」之中必有其一為真，因此可說「當今的法王是禿頭」或「當今的法王不是禿頭」這兩句之中必有其一為真。但事實上「當今的法王」根本不存在，因此無論在禿頭人士還是不禿頭人士的名單上，皆找不到法國國王。所以排中律似乎也有問題。

註廿四 梅農的學生馬利(E. Mally)根據梅農的學說發展出對象存在與否，與若然性質間關係的原則：(一)所有對象皆具若然性質；(二)所有可能對象具有不矛盾的若然性質；(三)所有不可能對象具有矛盾的若然性質，事實上其若然性質本身即排斥其是然存在。參見R.Chisholm, "Beyond Being and Non-being"一文。

註廿五 實上梅農本人早對這類批評有所答覆，他說矛盾律適用於可能與實在對象，因為唯此二者具有存在性，至於不可能對象根本不存在，則不能適用。參見奇索一文。

註廿六 同註廿，pp.109-111.

三是有關不存在事物的難題。若說「A 不同於B」，而A 真的不同於B，則可以說A與B之不同確實存在。但是若A 與B 並無不同，卻難以說A 與B 之不同確實不存在。說一物不存在，即是說該物為非事體 (non-entity)，如此「A 與B 之不同」若是非事體，如何可能成為一個命題的主詞呢？因此肯定與否定不存在事物的存在，同樣令人為難。

而弗來格所作意義與指謂對象的區分，對解決這些邏輯難題的幫助並不大至多只是避免了梅農不存在對象的困難，但是想要釐清指謂片語中意義與對象間的關係，並非易事。首先若指謂片語指謂的對象是實存事物的時候，或許可說指謂片語C 自身代表指謂對象，「C」代表指謂片語的意義，例如：太陽系的中心物質是個點(C)，不是指謂複合句(denoting complex)，而「太陽系的中心物質」(「C」)則是個指謂複合句，不是個點。顯然在此「C」是指謂片語自身的語法意義，並非C「指謂對象」的意義。其次如果指謂對象自身也是指謂片語，更易引起混淆，例如：格瑞(Gray)寫的《輓歌》的第一行(C)是個陳述命題，而「格瑞寫的《輓歌》的第一行」(「C」)並不是命題(是指謂複合句)。在第一種情況下C 同時是指謂對象的意義與對象自身(即太陽系中心的物質)，在第二種情況下，指謂片語自身並非指謂對象，則「C」的形式表達的是片語指謂對象的意義，而非片語自身的意義：「格瑞寫的《輓歌》的第一行的意義」，和「『晚鐘敲響了分離之日的喪鐘』的意義」二句相同，但和「『格瑞寫的《輓歌》的第一行』的意義」卻不相同。(即C的意義與C 指謂對象的意義相同，而與「C」的意義不同)。而且在此「C的指謂對象」也不是「格瑞寫的《輓歌》的第一行」而是「晚鐘敲響了分離之日的喪鐘」。如此一來，意義與指謂對象的關係複雜難解。總的來說，對指謂片語C 而言，若將「C 的意義」當作一個命題的主詞，總會引發一個人令人想不到的意義，即考慮C 的文法形式而非C 的實質內容。另一方面C 的意義與其指謂對象似乎密不可分，無法在對象之外再尋求出意義來。(註廿七)

總結以上所說，弗來格所做意義與指謂對象的區分，在羅素看似太牽強。根據描述理論，指謂片語自身並無意義，唯在命題之中始具意義，指謂命題則可轉譯為邏輯語言，以變數x，或邏輯事體(logical entity)做為指謂對象。根據這個原則，確定指謂片語(definite denoting phrases)或確定描述詞(definite descriptions)，如「《威維利》一書的作者」就可以改寫為「唯一且僅有一人撰寫《威維利》一書。這裡唯一且僅有一人」(x)就是指謂片語的指謂對象，若這人正好是史高特，則史高特就是指謂對象。因此史高特作的指謂對象，並不足以取代確定指謂片語，所以「喬治四世想知道《威維利》一書的作者是否是史高特」，就不能改寫為「喬治四世想知道史高特是否是史高特」。其次指謂片語是一命題的直接部分(羅素稱之「原級出現」primary occurrences)，也就是說指謂片語是直接命題的一部分，與其為一命題的間接部分(羅素稱之為「次級出現」secondary occurrences)，也就是指謂片語在由子句引領的命題之中，二者具有不同的邏輯意涵。這個區分有助於分析當今法國國王是禿頭，還不是禿頭的問題。首先「

註廿七 Ibid., pp.111-112.

當今法國國王是禿頭」若轉譯為「唯一且僅一實體是當今的法國國王，且是禿頭」，此句之中的「當今法國國王」這指謂片語是原級出現，有肯定當今有法國國王存在之意，此時整句命題皆為假，指謂片語也無指謂對象。但若說「說有唯一且僅一事體是當今的法國國王，且是禿頭，是假的」，此句之中「當今的法國國王」是次級出現，旨在否定當今有法王且是禿頭，故整句為真。如此一來「當今法王」在原級出現時為假，在次級出現時為真，也就不必煩惱頭髮的問題了。最後，根據描述理論，也不必假設「A 與B 不同」這不同必需是個對象了。在此若A 與B 確實不同，則可轉譯為：唯一且僅有一個事體 $x$ ，且「 $x$ 是A 與B 之不同」是真命題。若A 與B 並無不同，則可說沒有這樣的事體滿足這個命題。同理可推，所有的「非事體」，如「圓的方形」、「大於二的偶數質數」、「阿波羅」、「哈姆雷特」等等，皆可以說當其「原初出現」時必然為假，若為「次級出現」時則或可能為真。比如說「圓的方形」這指謂片語若意指「唯一且僅一個事體 $x$ 是既圓且方，且該事體是圓的」則為假，但若說「圓的方形是不可能存在的，總是為真」，則為真。(註廿八)

根據上述所說，羅素的描述理論的要旨如下：

- 一、指謂片語自身並不具任何意義，其意義取決於片語所在的命題；
- 二、指謂對象應視作邏輯事體，其若能滿足指謂片語所在命題則為真，反之則為假。
- 三、命題中原級出現的指謂片語所指謂的對象即指謂片語的內容，次級出現的指謂片語則是原級指謂片語的意義，前者常預設指謂對象實體存在，從者則止於表達語意；
- 四、確定與不定指謂片語或語句，皆可轉譯為適當的邏輯命題，其指謂部份是否確有指謂對象、或何種指謂對象，則視命題整體意義而定。

## 肆、餘論

誠如羅素在「論指謂」一文開始與結束的地方所說，指謂無論是直接指謂或間接指謂，對吾人的間接知識貢獻卓著。吾人若能明察指謂與指謂對象，表達意義、命題與真假間的關係，則將大有裨益於避免不當的邏輯謬誤。羅素這一構想深深影響後起的分析哲學家，不僅他所提出來的問題，成為分析哲學家們共同關懷的課題，他在「論指謂」中所運用的邏輯分析、語法與語言分析的方法，更成為分析哲學的不二法門。至於梅農的對象論與弗來格的意義與指謂論二者間羅素的立場較近乎弗來格的邏輯主義，二人皆肯定邏輯是獨立於心理學的客觀知識領域。然而弗來格對「意義」與「對象」的理解，在存有學上又較近乎梅農的主張，甚而有過之，意義與對象在弗來格看來若不是思想的一部分，就是實際的一部分，而二者皆是客觀實存的。三人之中梅農在分析哲學家的心目之中，分量無疑地最輕，由於他的學說難免心理主義的色彩，使他欲使對象論獨立於

註廿八 Ibid., pp.116-117.

心理學之外的努力，為人忽視了。事實上以羅素早年對梅農學說研究深入來看，梅農對分析哲學的發展也有推波助瀾之功。

直到一九五〇年史陶生(P.F. Strawson)發表「論指涉」(On Referring)一文以前，羅素在「論指謂」一文中提出「確定描述詞」的理論，就邏輯哲學與意義理論的發展來看，可謂居於承先啓後的地位。羅素認為語詞的意義必需取決於所在語句的脈絡(即語法)，以及無論語詞概念是否有實指，皆有邏輯事體與之相應，無疑地正承自弗來格的理論。不同於弗來格是羅素不認為語詞「指謂對象，表達意義」(a denoting phrase refers to an object and expresses a sense)，反而認為意義是語法形式與描述語的組合，描述對象實存與否不只關係到語句的意義，更關係到語句的真假，這也就是所謂的外延論(extensionality thesis)相較之下弗來格的意義理論則傾向於內延論(intensional theory)。其後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依循這個路徑，先受到羅素由描述理論發展出的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的影響，(羅素認為通過邏輯分析與改寫，人類的思字可化約為基本不可再分的邏輯原子的組合，這項構想無疑地本自其描述理論)，認為語詞命題全然指謂基本事實(atomic facts)，基本事實需有實證基礎，乃成為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的靈感泉源。接著維根斯坦又從羅素邏輯語法的理論，進一步發展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的學說，認為語詞的意義實取決於語言的使用規則，使語言哲學與意義理論邁進了使用理論(the Use Theory of Meaning)的領域。至於一九五〇年史陶生提出「論指涉」一文之後，使得分析哲學家投入「指謂」與「指涉」之別，以及「名稱」與「指謂」的論戰，給語言分析學派的哲學家帶來最多的論題註廿九，恐非羅素始料所及。有關羅素「論指謂」受到的批評，以及各種取代理論，限於篇幅，暫不在本文討論，日後可以另文為之。

註廿九 史陶生在「論指涉」一文中首先提出語詞「指謂」與「指涉」的不同，他認為羅素所謂的「確定描述詞」事實上是指具有「獨特指涉使用」(uniquely referring use)的表語。這類的表語(包括單數指稱代名詞、專名、單數人稱或非人稱代名詞、以及定冠詞所引領的名詞或片語)的真正作用在指涉一個對象，並不在「描述」(賦予對象性質)一個對象。史陶生認為羅素沒有清楚區分「指涉用途」與描述的不同，因此誤以為語詞的意義就在於指涉或意指的對象。事實上任何語句(如「法國國王是禿頭」)是否有意義乃取決於語句所屬語言的習慣、約定與規則，看語句是否能根據這些規則發揮指涉的功能。因此語句的意義不在於特定時刻其指涉的對象，而在於指涉使用的規則與習慣。羅素的邏輯語法分析，顯然扭曲了自然語言的性質。雖然羅素曾在一九五七年做一短文對史陶生的批評予以反駁("Mr. Strawson on Referring")，卻無法減少分析哲學家們的「分析興趣」。一九六六年唐納蘭在「指涉與確定描述」("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一文中指出羅素與史陶生都沒釐清確定描述與指涉使用的不同。羅素固然未曾考慮過這樣的區分，史陶生也因為過於強調語言的使用與規則，而忽略了所謂「確定的指涉使用」，乃取決於使用者在某種特殊情境下的意圖。例如某甲可以指著手中拿著酒杯的某乙說：「前面拿著馬丁尼酒的是約翰」，這時即使約翰拿的剛好是水，不是馬丁尼，這個確定描述語句也不能說是完全錯誤，沒有意義，或許描述本身是錯誤的，但是其指涉作用卻是正確的。此後描述理論與指涉理論和意義與真理的關係，更引發一系列的討論，可見John Wallace, "On the Frame of Reference," Saul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Keith S. Donnellan, "Proper Names and Identifying Descriptions," in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Dordrecht-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72)，以及Donald Davidson, Hilary Putnam等人的著作。

## Meinong, Frege and Russell on Object Denoted

Yih-hsien Yu

### Abstract

How can one speak of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exist? How can the propositions which involve denoting non-existent objects be predicated by true or false? Is an expression meaningful when it indicates some non-existent object? These question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espoused the movement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its early stage, i.e. Meinong, Frege, and Russ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anz Brentano, an act psychologist, Meinong applied the theory of objects (*Gegenstandestheorie*)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on-existents. The theory allows properties of independent ontological status and hence admits any grammatically well-formed expressions to acquire some meaning, regardless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real denoted by them or not. Whil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Frege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nse and the reference of an expression.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is comprised of its sense and reference, but the real being of the latter does not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er. In fact, for Frege both sense and the reference are objective, public, and uniform, and are entitled to different forms of reality. Russell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Meinong's and Frege's solutions, but he also disagreed with them in various ways. He proposed his 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 to be an improved formula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on-existents after severe criticism of the previous two's view. He attempted an analysis of the logical syntax of a denoting expression, which shows that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can only be determined by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expression occurs, but not by itself. Russell's 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 later became the "paradigm" of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ad significant repercussions fo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 also invited many obj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ers of ordinary (natural) language school.

## 墨家的辯學理論

陳榮波\*

### 摘要

- 一、前言：墨家辯學以邏輯思考作為根基，自成一有系統的辯術。  
二、辯學原則：1. 思想原則 2. 語意原則 3. 正名原則 4. 同類原則 5. 經驗原則。  
三、辯之意義與目的：辯之意義在於「爭彼」，其目的在於破除錯誤思惟，獲得辯論勝利，以便自悟悟人。  
四、辯學方法：  
1. 類推法 2. 求同法 3. 同異交得 4. 加辭的直接推理法 5. 辭、故、辟、侔、推、援之推理方法。  
五、辯學特色：1. 破斥謬誤的批評精神 2. 肯定客觀經驗與客觀知識 3. 重視「故」的科學精神 4. 注重「界說」的重要性 5. 自知知人。  
六、結語：墨家認為真理愈辯愈明，使真理普照在陽光之下，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互信、互愛。

## 一、前言

墨家是由墨子所開創出來的一學派，曾經為顯學，盛極一時（註一）。墨子非常重視辯學，「談辯」成為墨學重要研習科目（註二）。墨家辯學是以邏輯思考作為根基，而在中國哲學上，自成一有系統的辯術。

墨家的辯學是以「墨辯」為其主要內容（註三），共有〈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現分辯學原則、辯之意義與目的、辯學方法、辯學特色等四方面，於后分述說明之。

## 二、辯學原則

在中國先秦諸子中，莊子最反對「辯」，強烈否定「辯」的重要，韓非子主張「息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

註一：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參閱邵增樺註譯《韓非子今註今譯》第一卷〈顯學篇〉頁一 台灣商務印書館 台北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修訂第二次印刷。

註二：參閱（清）孫詒讓著《墨子閒詁》頁三九。子墨子曰：「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有，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華正書局 台北 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初版

註三：依照樊國基先生的研究，認為「墨經」一名最先見於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子。」又云：「墨辯一詞最早出現於（晉）魯勝《墨辯說》一書。」參閱樊國基撰《墨辯中「辯」的研究》香港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十四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現今一般通用的名字為「墨辯」，其內容包括〈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



辯」、「止辯」，而墨家非常注重「辯」，其用意在於追求客觀知識。墨辯的辯學理論依據何種原則？現分下列五項說明：

### 1. 思想原則

墨辯的思想原則具有西方二分法的思惟模式：(1)  $A = A$ ，非  $A = \text{非} A$ ：〈經說下〉第一六七條：「牛不非牛，馬不非馬，……，無難。」(註四)其意是說「牛」不是「非牛」，則謂「牛」是「牛」，而「馬」不是「非馬」，則「馬」即是「馬」。墨辯指出「牛」是「牛」，「非牛」是「非牛」，不可把「牛」與「非牛」混為一談。這也就是說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區別「是」與「非」之不同。(2)  $A$  而且又是非  $A$ ，是不可以： $A \cdot \sim A = 0$ ，例如〈經說上〉第七十四條：「非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註五)墨辯認為一物不可既是牛又是非牛。墨辯基於二分法，把物分為兩部份，此兩部分既排斥又窮盡，不允許有第三者情況存在。如果允許的話，就違背矛盾律。墨辯在於明辨真假，破邪(假)顯正(真)，不可俱真，亦不可俱假。如果雙方的論點俱真，就不必辯論；如果是俱假，它們皆變成謬論，則不能成為「辯」的真正涵義。

### 2. 語意原則

墨辯的語意原則就是「通意後對」。何謂「通意後對」？〈經上〉第一四一條：「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註六)高亨先生解釋如下：「有人問我，我必先通曉其所問之意，然後答之。不然，我不知其所謂為何，而答焉，詎有不謬哉。」(註七)墨辯認為人在談話時，先要瞭解對方所使用的語詞之真正意義，否則誤解愈陷愈深，導致雙方無法交談，更甯談知識了。

### 3. 正名原則

墨辯〈經下〉第一六八條：「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經說下〉第一六八條：「(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止，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具此也，彼此亦可。彼彼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註八)列表說明於下：

- (1) 此名 指謂 此實
- (2) 彼名 指謂 彼實
- (3) 此名 指謂 此實且彼實
- (4) 假定此名 = 彼名  
則此名 指謂 此實且彼實

註四：參閱高亨著《墨經校詁》頁一八八 台北 樂天出版社印行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初版

註五：同註四 頁七四

註六：同註五 頁一五九

註七：同註六 頁一六〇

註八：〈經下〉第一六八與〈經下〉第一六八條在同一頁，以後合註，不分開 同註七 頁一九〇～一九一

在上述四種情況，只有第三種情況是不對，稱為「狂舉」；其餘三種情況是對的，稱為「正舉」。這是基於墨辯「名以舉實」原則而來的。如果同名而異實，就會產生混淆。但如果為二名一實，墨辯認為是可以，並稱之為「重同」。

#### 4. 同類原則

墨辯的邏輯推理非常注重「類」概念，以同類為推理的使用範圍，不可隨便由同類推至異類。在同類內所作的類推不可存有異類存在。換言之，在類推時，一定要求異類全無。〈小取篇〉：「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同他）者同也，吾豈謂也（同他）者異也。」（註九）其意是說在同類內的某物可以類推至具有此類的其他物也具有此種本質屬性的同類性質。除外，還要注意到異類的量不可相比較。〈經下〉第一〇七條：「異類不叱，說在量。」〈經說下〉第一十七條：「（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藥與霍孰高？」（註十）例如「木」與「夜」是不同類，不能在量上相比。

#### 5. 經驗原則

名家著重概念的分析，而墨家著重客觀經驗事實作為觀察事物的準則，注重驗證的成果。因此，在談辯上必具有客觀經驗事實，否則，不能成為「辯」的對象。譬如說「作夢」與「睡覺」不可作為談辯的題材。〈經上〉第二十四條：「夢，臥而以爲然。」（註十一）又在〈經上〉第二十三條：「臥，知無知也。」（註十二）「作夢」與「睡覺」不能用客觀事實來證實，所以，不能成為辯論的依據。

### 三、辯之意義與目的

墨辯以「理」為出發點，一切「明理」為旨歸。吾人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物之所以然即是「理」。「理」就是法則，作為衡量萬事萬物的準則（註十三）。合乎法（理），就是「對」，否則就是「錯」。辯之意義是什麼？〈經上〉第七十五條：「辯，爭彼也。辯勝，當也。」（註十四）經說第七十五條：「（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註十五）本人認為「彼」之義即指「對的真理」，所謂「辯」在於爭彼，「爭彼」即獲得對的真理，換言之，在「對」與「錯」之中，

註九：同註二 頁三八〇

註十：同註八 頁一一六

註十一：同註十 頁四四

註十二：同註十一 頁四四

註十三：同註九 頁一八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以不若百工，辯也。」〈法儀〉

註十四：同註十二 頁七四

註十五：同註十四 頁七四

破除「錯」，抉擇「對」，成為辯勝。辯論是依照正確的法則而進行，其目的在於獲勝。墨辯以「牛」或「非牛」作為辯論的題材，在兩者之中，取正當的一方，因此，墨辯的用意在於破除對方不正的思想（此），讓對方能歸屬於我方正當的一方（彼），以便自悟而悟人。如果雙方都對或都錯，很顯然就不合乎「辯」之意義。辯的精神在於破邪顯正，分出高下（你錯我對）。這就是墨辯為何特別重視「自悟」與「正當知識之獲得」的緣故了。

#### 四、辯學方法

墨家很注意方法論（註十六）。方法是研究學問的敲門磚。墨辯的方法論可分為下列五種說明於下：

##### 1. 類推法

類推法即類比推理的方法。它雖然不是必然有效，但可幫助吾人理解事物。類推法只是在同類下類比（註十七），不可用於不同類或異類。具有本質的屬性，才能成為同一類。類推法在於使同類都具有此種屬性，同時也使異類偏盡全無。〈大取篇〉：「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註十八）分辯「同類」與「異類」是重要，否則就會陷於謬誤。〈經下〉第一〇二條：「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註十九）〈經下〉說第一〇二條：「（推）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註二十）高亨先生校訂經文為「（推）謂四足獸，牛與，馬與，物不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其意是說牛與馬四足動物為獸類，由此而推論出其他四足動物（如青蛙、烏龜）也是獸類，這是錯誤（註二十一）。因為類之範圍有大小，如超出範圍，則會導出謬誤。在上述例子中，只是說出部分的四足動物是獸類，而不是說所有四足動物（如青蛙、烏龜）都是獸類。因此，在作類推時，格外要謹慎，不可有出差錯！

##### 2. 求同法

〈經上〉第九十七條：「法同則觀其同。」〈經說上〉第九十七條：「（法）：法取同，觀巧轉。」（註二十二）依照高亨的解釋，所謂「法」是推理之根據，在三段論式中，是指「大前提」而言，而「同」指全稱命題的意思。（註二十三）經文「法同則觀其同」之意是說以全稱命題作為大前提，以推論某事物是否歸屬在大前提之內。在推論過程中，如發現所推出的事物與事實不符，則吾人應探究其原故，並對大前提之全稱命題加以修改，稱為「巧轉」。

舉例如下：第一式：大前提：凡魚是卵生動物

小前提：吳郭魚是魚

結 論：故吳郭魚是卵生動物

註十六、參閱 J.M. Boche'nski 著 《The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Thought》P.9 台北 雙葉書局 民國六十九年 所謂「方法論」是一種研究方法的理論

註十七：所謂「類比」依照聖多瑪斯(St. Thomas)的看法，即表示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

註十八：同註九 頁三七七

註十九：同註十八 頁一〇八

註二十：同註十九 頁一〇八

註廿一：同註廿 參閱高亨所舉的例子

註廿二：同註廿一 頁九八 <經上〉第九十七條與<經說上〉第九十七條在同一頁

註廿三：同註廿二 頁九八

第二式：大前提： 凡魚是卵生動物  
 小前提： 鯨魚是魚  
 結 論： 鯨魚是卵生動物

在第一、二兩式中，其論證形式相同，但第一式的結論正確，而第二式的結論不正確，因為鯨魚是胎生哺乳動物，所以吾人要對作為大前提的全稱肯定命題加以修正，墨辯稱之為「巧轉」。

### 3. 同異交得法

〈經上〉第八十九條：「同異交得，放有異。」（註二十四）何謂「同異交得」？即說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所謂「放有無」是指「以有無為例」而言。現舉「白馬」與「黃馬」為例，它們顏色不同，但皆「有」馬之屬性，這就是異中有同；另一方面，它們同為馬類，但白馬「無」黃色，黃馬「無」白色，這是同中有異。此種「同異交得法」可幫助吾人在比較事物時看出其異同點。

### 4. 加辭的直接推理法

根據陳祖耀先生對「加辭的直接推」看法如下：「所謂加辭，即加一個名言於原命題中，作成一個新命題的意思。加辭有兩種加法：一是加同一名言於原命題的主詞謂詞之上，一是加同一名言於原命題的主詞謂詞之下。」（註二十五）舉〈小取篇〉的例子說明：「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註二十六）在此例子中，前一命題「白馬，馬也」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墨辯稱為「是」；後一命題「乘白馬，乘馬也」是由前一命題的主謂詞同時各加一「乘」字，而構成一新命題，如它為吾人所共許；墨辯稱為「然」。在這一例子合乎墨辯「是而然」的加辭直接推理，又如：「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註二十七）在這一例子中，前一命題為「是」，而後一命題為吾人所不共許的習慣用法，稱為「不然」，而墨辯把此例子稱為「是而不然」。雖然此例子與上例子的論證形式相同，但所得到的結果不同。所以，吾人在作加辭的直接推理格外要小心其所加之辭是否足以變更原命題的主謂詞之關係，如果有變更時，就會變為謬誤。因為加辭的直接推理是「侔」的一種命題類比推理，不可忽略類比推理的規則。

### 5. 辭、故、辟、侔、推、援之推理方法

譚戒甫先生認為〈小取篇〉的論式為「辭、故、辟、侔、推、援」之六物所組成（註二十八）在這六物之中，是以「辭、故」兩物為骨幹，有時再加上「辟」、「辟侔」

註廿四：同註廿三 〈經說上〉第八十九條舉例說明：「（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怒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劫還園，去就也。烏折同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湖。」

註廿五：參閱陳祖耀著《理則學》 頁一〇〇 台北 三民

註廿六：同註十八 頁三八一

註廿七：同註廿六 頁三八一

註廿八：參閱譚戒甫著《墨辯發微》 頁二七二 台北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再版

或「推援」等等，變為二物式或三物式或四物式或五物式或六物式不等。「辭」即論者所提出的主張之命題，「故」是作為「辭」的充足條件或充要條件。何謂「辟、侔、推、援」？〈小取篇〉：「辟也者，舉也（同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註二十九）所謂「辟」（同譬）是指一種概念或事物的類比，亦是用一已知事物或概念來比喻說明要說明的事物或概念，例如用「橘子」來形容說明地球的形狀。「侔」是指命題或事實的類比，例如在第四種〈加辭的直接推理法〉所舉的例子。「援」是一種論證的類比，換言之，即你可依此論證而說，我怎麼不能依同一論證而說呢？至於「推」是一種歸納法，例如由孔子會死、孟子會死、蘇格拉底會死等等……，推論出凡人皆會死。現舉〈經下〉第二十八條來說明：「倚者不可正，說在剌。」〈經說下〉第二十八條：「倚：倍（同剖）、拒、擊、射、倚焉則不可正。（註三十）此經文根據陳孟麟解釋為「偏斜的力量就不正了，原因在於力的偏斜」。又經說文解釋為「劈物、推拒、牽引、涉箭，力量一偏斜就不正了。」（註三十一）譚先生論證如下：（註三十二）：

辭：倚者不可正

故：說在剌

推：倍（同剖）、拒、擊、射

援：倚焉則不正

由上所述，類比推理為墨辯推理的重要方法，在進行推理要小心翼，以防止謬誤之發生、「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註三十三）

## 五、辯學特色

墨家辯學在於去疑，明智。其特色有下列五點：

### 1. 破斥謬誤的批判精神

墨辯稱破斥謬誤為「誹」，而陷於矛盾的謬誤稱為「誣」。〈經上〉第三十條：「誹，明惡也。」（註三十四）墨家非常嚴謹辨明「誹」與「誣」。吾人學習的目的在於誹，明辨是非。

### 2. 肯定客觀經驗與客觀知識

墨家基於主客對立而產生客觀知識。主體為認識的主體，客體為被認識的對象。主

註廿九：同註廿七 頁三七九至三八〇

註三十：同註廿八 頁一六三

註卅一：參閱陳孟麟著 《墨辯邏輯學》（修訂本）頁二三六 齊魯書社出版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註卅二：同註三十 頁二五八

註卅三：同註廿九 頁三八〇

註卅四：同註卅二 頁六八

體與客體之間所產生的認識關係是通過官能、求知動機、主客接觸、理性作用等過程的構成條件而形成知識。知識是來自於客觀事物的實在性，否則不能成為知識。真正的客觀知識是人的正確判斷與客觀事實之符合。

### 3. 重視「故」的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是事實求是，追根究底，非常重視「故」。「故」的意義一為「原因」（事實的根源），二為「理由」（推理的根據）。墨辯把「故」分為兩種：（一）小故（二）大故。〈經說上〉第一條：「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若見之成見。」（註三十五）凡事必有其因，「因」有二種：①部分的因稱為小故（必要條件）②全部的因，稱為大故（充要條件）。對一事物的瞭解，必要探究其因，找其原故，在邏輯上，「故」相當於「小前提」，又稱為「媒介詞」，不可忽視之。

### 4. 注意「界說」的重要性

語詞的釐清是瞭解事理的基本要求。對語詞的釐清，最佳方法便是「界說」。「界說」在〈經上〉及〈經說上〉佔有很大的篇幅去解釋「界說」的重要性，例如〈經上〉第二十一條：「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經上〉第四十二條：「盡，莫不然也。」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註三十六）。墨辯的界說簡明扼要，其目的在使觀念正確，消除歧義與含混等混淆問題，值得吾人去研究的好題材。

### 5. 自知知人

〈經下〉第九條：「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註三十七）墨辯以兼愛的胸襟來關心世人。明理的第一步就是要自知，然後使人知之。這是墨辯撰寫的用心之所在。

## 六、結語

墨家的辯學理論可說是中國辯學的一大奇書。其內容除了邏輯推理等辯學方法外，尚包括光學、數學、力學與倫理學等內容，確是難能可貴的智慧寶藏。人的無知之產生有兩大原因（註三十八）：第一點即窮知，由於認知不夠，產生「以偏蓋全」，這時墨子所謂「知小而不知大」所致（註三十九），第二點即受人欲所驅使，由於欲望妄然而產生盲目的行動，結果誤了大事，遺害終身，更禍及社會國家與人類。總之，墨家認為真理愈辯愈明，使真理普照在陽光之下，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互信互愛。

註卅五：同註卅四 頁五〇

註卅六：同註卅五 頁六五及頁七七

註卅七：同註卅六 頁一三五

註卅八：同註卅七 頁九九 〈經上〉第七十五條：「爲，窮知而憊於欲也。」

註卅九：同註卅三 頁一七四 〈天志上〉



## THE DEMISE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THE CLOSE-DOWN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1980

Hung-ting Ku\*

###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Malayan Chines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re complicat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n 1956, despite the objec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those in Malaya, founded Nanyang University. But the University was closed down by Singapore government in 1980.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ingapore is a nation where Chinese is ethnic majority group.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meaning of the episode. The author, based upon solid evidence, makes efforts to explai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growth and close-down can be served as indica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apore identity.

### Foreword

The stud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area of Malaya has been an interesting topic for many scholars.<sup>1</sup>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

\* The preliminary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in the ASSA 1988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in Canberra, Australia.

<sup>1</sup>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0);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Anti-Japanese Boycott Movement, 1908-1928: A Study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23, Parts 1 & 2, 1969; Chui Kwei-Chiang, "The Respons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20, Parts 1 & 2, 1966; Ku Hung-ting, "British Colonialism Versus Chinese Nationalism: Malayan Chinese under Governor Clementi, 1930-1934,"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4, Parts 1 & 2, 1989; Pang Wing-seng, "The Double-Seventh Incident, 1937: Singapor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No. 2, September, 1973; Png poh-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Malayan Chinese since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have been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the index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Chinese promoted and praised the China-oriented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particularly in British Malaya where the ethnic Chinese consisted of a great proportion of its population.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its best to eliminate the emergence or/and growth of the so-called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since 1920s.

The existence of China-oriented consciousness culturally or/and politically, was complicat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in this regio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Despite the objection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that in British Malaya, founded Nanyang University (Nantah南大) in 1956. Ironically, twenty five years later, this University was close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where the Chinese were the ethnic group in power.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paper to trace and examine the basic changing elements behind this fascinating historical episod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al natur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Nanyang University

On March 15, 1956, Nanyang University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open.<sup>2</sup>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University provided high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is region. It wa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Southeast Asia.<sup>3</sup> But its emergence brought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 for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Malaya. They had from the beginning viewed the proposal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with disfavor.<sup>4</sup> In the pre-WW II days,

---

seng,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 in *Papers on Malayan History*, edited by K. G. Tregonning (Singapore, 1962); Yen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p>2</sup> The term "Malaya" here refers to the Malay Peninsula, including Penang, Malacca, Singapore and the British Malaya. The name of Nanyang, meaning the South Seas, was the ancient Chinese appellation for Southeast Asia.

<sup>3</sup> *Nanyang Siang Pau* (one of the two leading local Chinese newspapers), January 19, 1953; *Nanyang Ta-hsien ch'ang-hsiao-shih*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Nanyang Cultural Publisher, 1956); Foreword; pp. 1-8; p. 23.

<sup>4</sup> Without official blessing from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Nanyang University had to register as a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was virtually not the concern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past, Chinese high-school graduates in Malaya might go back to China to pursue college education.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1949 blocked this possible upward educational channel. The Chinese commun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r. Tan Lark Sye, a prominent Chinese businessman in Singapore, formed a committee in May 1953 to promote a Chinese university to satisfy the educational need for Chinese high-school graduates. This call for establishing a Chinese university was echoed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where the Chinese formed a sizable component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but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tried their best to block its development. Without the official blessing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Nanyang University was not allowed to register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but had to be registered as a company. Although Nantah opened its doors in 1956, the inauguration had to wait until March 1958. As the University was taking shap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Malaya were moving rapidly towards self-government. The newly elected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passed the 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 on March 27, 1957 to satisfy Nantah's status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but the Singapore Civil Service (and for that matter its Malayan counterpart) did not grant Nantah graduates university-graduate status.<sup>5</sup>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further issued the Prescott Report to disgrace the credibility of curricula and faculty qualifications of Nantah.<sup>6</sup>

After Singapore gained its self-government in 1959, its government announced to equally treat English, Chinese, Tamil and Malay languages in education, but based on the Prescott Report, it demanded Nantah to upgrade the English standard of its students. Some English newspapers even suggested Nantah to shift its instruction medium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Such a request offended the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 The strong protest forced the Education Minister of Singapore to promise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w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status quo.<sup>7</sup> Nonetheless, the newly

---

company. Although it opened its doors in 1956, the inauguration had to wait until 1958.

<sup>5</sup> *Nanyang University Prospectus, 1975-1976*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75 1st edition), p. 16.

<sup>6</sup> For details, see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mmission*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sup>7</sup> Hung-ting Ku,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Identit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Chung-kao hai-yang fa-ch'an Shih lun-wen-chih* (Collected papers on China's overseas expansion) (Taipei,

established government like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past, continued not to recognize the university status of Nantah degrees. It might well be due to the antagonistic attitude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Nantah, conflicts betwee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d the Nantah Student Union occurred. The police arrested many students and repeatedly raided the student union. While the students accused the government of attempting to destroy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ese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blamed the students for promoting communistic ideas and Chinese chauvinism.<sup>8</sup> In order to cool down students' anti-government sentiment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as ready to grant Nantah parity of treatment with the Universtiy of Singapore (Sintah) 新大, then known as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ovided that Nantah would reorganize itself as the government recommended.<sup>9</sup> However, the conflict continued and it came to a climax in September, 1963, when the chairman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Tan Lark Sye, was stripped off his Singapore citizenship.<sup>10</sup> After Tan was ousted from the Council,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Nantah authoritie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organization in June, 1964.<sup>11</sup>

In Singapore, though the ethnic Chinese consisted of about 75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and the majority of its political leaders were and still are Chinese,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the government was English just like that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of the newly founded Singapore, unlike its predecessor, adopted an intervention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ee Kuan Yaw's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step by step tried to control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o subdue Nantah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symbol of that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majority of the PAP leaders, including Lee, came from English stream and many of them could not speak Chinese. Generally, they adopted a

---

Academia Sincia, 1984) p. 406.

<sup>8</sup>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Minutes of the 7th Meeting of Nanyang University Senate*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63).

<sup>9</sup> In 1964, Ko Teck-kim succeeded Tan as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Chairman, see *Nanyang University, 1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66) pp. 18-23.

<sup>10</sup> *Nanyang University General Information, 1979-80*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79), p. 9.

<sup>11</sup> *Nanyang University, 1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pp. 6-8.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education which they regarded a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ir plan of 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Singapore into "Singaporean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AP, a handful of pro-government Nantah graduates organized the Association of Nantah Graduates in 1964.<sup>12</sup> The Association published a newspaper — *Liao-yuen pao* (燎原報) to promote the Singapore identity. It also joined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rporation as a member. In 1968,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ccredited Nanyang University and grante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it, Nantah now became a semi-state university.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its representatives to the University Council<sup>13</sup>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Nantah Graduates and state-appointed council members,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tightened its control over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s one after another were "forced" to resign after 1969. Between 1969 and 1977, four presidents came and went.<sup>14</sup> The administrative instability hindered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 The Reforms of Nantah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after 1974

At the 1974 Commencement, Lee Chao-meng, then the Education Minister of Singapore, announced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had to become a "national" university to admit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bilingual" practice in the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the lack of graduates of Chinese high-schools from Malaysia would make great impact on the instruction medium of Nanyang University. Six months later, Lee Chao-meng was appointed Vice-chancellor of Nantah and his appointment at first was welcom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Nantah Graduates.<sup>15</sup> Lee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at Nantah.<sup>16</sup> The

<sup>12</sup> Ibid, pp. 18-20; p. 129; *Nanyang University Prospectus*, 1975, p. 12.

<sup>13</sup> *Nanyang University Catalogs*,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The name of the catalogs varied: *Nanyang University Prospectus*, 1975-76; *Nanyang University Calendar*, 1975-76; *Nanyang University General Information*, 1976-80.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75-79).

<sup>14</sup> *Liao-yuan Pao* (the organ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it published irregularly), Vol. 2, No. 2, July 15, 1974 published a table of the teaching staff which indicated about one half of them were Nantah graduates.

<sup>15</sup> *Liao-yuan Pao*, September 30, 1975.

<sup>16</sup> In order to change the outlook of Nantah, the head of the University was now called the Vice-Chancellor instead of the President. See *Nanyang University Catalog*, 1975-76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75). As for the welcome state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see *Liao-yuan Pao*, Vol. 2, No. 3, September 30, 1974.

Association of Nantah Graduates echoed his policy by stating that a bilingual practice at Nanyang University would not only keep the University's essence, but also fit Singapore's national development.<sup>17</sup> Nonetheless, Lee Chao-meng's "bilingual" policy was in fact a "monolingual" practic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ll courses had to be taught in English.<sup>18</sup> Facing the demi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Nantah, the Association of Nantah Graduates finally stood up to show its disfavor to the monolingual practice. Citing a Lee Kuan Yaw's speech in 1970,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language training had to start in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Nantah was not a place for testing Singapore's educational policy.<sup>19</sup> Caught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resistance from the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Nantah faculty, Lee Chao-meng could not carry on his reforms and left his incomplete work to Professor Wu Teh-Yao. After an one-year uncertain period under Acting Vice-Chancellor Wu Teh-Yao,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ssigned a civil servant to be the director-general to rule Nantah.<sup>20</sup>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announced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would totally accept the curriculum and cours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order to develop Nantah as an equal partner of Sintah. Few weeks lat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aw in his "Bilingual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speech openly stated the necessity to have two universities in Singapore. Nonetheless, in order to upgrade the English level of Nantah students he suggested to merge them in an English environment, namely the Sintah campus.<sup>21</sup>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towards the goal of having the two universities as equal partners, resulted in the decision to set up a joint campus. The campus of the Sintah at Bakit Timah was made into a Joint Campus for Nantah and Sintah students.<sup>22</sup>

<sup>17</sup> After Lee Chao-meng assumed the post of Vice-chancellor, he revised the already-printed university catalog. Following the British style, he even changed the name "College of Arts" to "Faculty of Arts". See *Nanyang University Catalogs 1975-76*, 2 different editions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75). For the details of the changes of the course structures, see *Nanyang University catalogs*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74, 1975, 1976, 1977):

<sup>18</sup> *Liao-yuan Pao*, September 30, 1975.

<sup>19</sup> *Nanyang Siang Pao*, August 19, 1977; December 19, 1977; *Sin Chow Jit Poh* (another leading Chinese newspaper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December 19, 1977.

<sup>20</sup> For the text of Lee Kuan Yaw's speech, see *Liao-yuan Pao*, February 11, 1978; *Nanyang Siang Pao*, February 11, 21.

<sup>21</sup> *Liao-Yuan Pao*, Vol. 3, No 4, December 1978; *Nanyang Siang Pao & Sin Chow Jit Poh*, March, 1978.

<sup>22</sup> *Nanyang University General Information*, 1978-80, p. 11.

"It is hoped that in three to four years' time, when the object of equal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will have been reached, Nanyang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 return to the campus in Jurong."<sup>23</sup>

Two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oint Campus,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aw in a lette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suggested that the best solution for the fut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would be "merger". He outlined three options. But he indicated that "the first is the educationally ideal solution for merging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ith Nanyang into 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one campus".<sup>24</sup> He cited the decline of applicants for admissions and a shortage of well-qualified faculty as two main reasons for his suggestion.<sup>25</sup> He used tables and graphs to illustrate the trend. He nonetheless admitted that the increase of academic staff resignations was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long-term prospects of Nanyang and further explicitly stated the staff resignations would continue and morale would go down further if the future of Nanyang could not be settled in a near future.<sup>26</sup> Lee's statement and proposal had provoked relatively little public reaction. The Chinese newspapers had little to say.<sup>27</sup>

In replying to Lee Kuan Yaw's assaults, Wee Cho Yaw, then the chairman of the Nanyang Council, expressed his regret that the Joint Campus did not bring any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nyang. Instead, Nanyang now had to face the problem of a shortage of good students and experienced teaching staff. He sadly stated, "It is now clear that unless the trend is quickly corrected Nanyang will face a natural death in one to two years' time as a result of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students and lecturers."<sup>28</sup> He thus proposed

<sup>23</sup> *The Straits Times* (the leading English newspaper in Singapore), February 11, 1980.

<sup>24</sup>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11, 1980.

<sup>25</sup>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11, 1980.

<sup>26</sup> *The Straits Times* nonetheless stated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to regard the paucity of public debate as a sign of apathy or even disinterested. It seems fairly evident from letters and from private comments that Singaporeans at least Nanyang graduates, feel strongly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It also pointed out, "If few of them have been will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publicly on the subject it may be because they are resigned to its fate or feel, fairly or unfairly,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on the subject and whatever they might have to say will not carry weight."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1, 1980.

<sup>27</sup> For the text of Wee's reply, see *Straits Times*, March 21, 1980.

<sup>28</sup> *Nanyang Siang Pao*, *Sin Chew Jit Poh*, March 21, 1980; *Straits Times*, March 21, 1980.

that Nantah should adopt an American university system, affiliated to a reputable American institution. Such reorganization, he indicated, would require firm government support. If the above suggestion was rejected, he proposed that both Nantah and Sintah should develop as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as competing universities with colleges divided between them. Wee's proposal were backed by two other influential council members.<sup>29</sup> Several days later, another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member came out in support of reorganization Nantah into an American-style university.<sup>30</sup> According to Lee Kuan Yaw's own account that the most of the remaining council members supported the merger with a twin campus option.<sup>31</sup>

Although few spoke up, those who did argue that Nantah had a valuable role to play in Singapore's development. They felt that Singapore not only had room for two universities, but actually needed two.<sup>32</sup> Some others who favored an independent Nantah pointed out that Nantah owed its unfortunate image and difficulties in attracting the best students not to any inherent inferiority but to government policy.<sup>33</sup>

The resistance seemed to have outraged Lee Kuan Yaw. After one week's silence, Lee launched second wave attack. He warned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that, "choice is yours. The verdict will be delivered by the students." He argued that "Nanyang degrees are like currencies that have been debased."<sup>34</sup> To strengthen his argument, he cited the case in which a Nantah graduate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after receiving his B.A. degree from Nantah went to the Sintah for a M.A. degree to show his readers that the Nantah degrees were less valuable than the Sintah

<sup>29</sup> *Nanyang Siang Pao, Straits Times*, March 25, 1980.

<sup>30</sup> *Straits Times*, March 22, 1980.

<sup>31</sup> *Straits Times*, March 21, 22, 25, 1980; *Nanyang Siang Pao*, March 21, 25, 1980. For example, Professor Wu Tah Yao, former head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Sintah and then Dean of the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at Nantah, doubted that a single university could accommodate all the Singapore students who would like to go for higher education. He argued that Nantah could provide a valuable complementary role by concentrating on those areas it had excelled. Among them, he noted Nantah's pre-eminence in Chinese Studies and its Commence College. For details, see *Straits Times*, March 21, 1980.

<sup>32</sup> *Straits Times*, March 21, 1980.

<sup>33</sup> *Straits Times*, April 4, 1980.

<sup>34</sup> *Straits Times*, April 4, 1980. However, a reader sent a letter to *Straits Times* to explain reason why the Nantah graduate went to Sintah. For the text of the letter, see *Straits Times*, April 10, 1980.

degrees.<sup>35</sup>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lso released the so-called "Dayton Report" on March 16. Sir Frederick Dayton, a British educator was invited by Lee Kuan-Yaw to visit Singapore in late 1979. After a 3-day visit, Dayton expressed that there was no reason to have two universities in Singapore.<sup>36</sup> The Public Services Commission also echoed Lee's call by releasing a name list of "weak" students who got high marks at Nantah. It ridiculed Nantah by pointing out that many students who were academically poor in high schools got "First Class Honors" when they graduated from Nanyang University.<sup>37</sup>

After the total refutation of the academic status of Nanyang University, Lee Kuan Yaw again proposed the merger of the Nantah and Sintah to become a national university--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At the same time, he promised to set up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Nanyang (TUN) in 1992. The TUN would be located in the Jurong campus, Lee Kuan Yaw expressed that his proposal on the setting up of TUN offered "the best chances of preserving Nantah's name as well".<sup>38</sup>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N.U. Council voted to accept Lee's offer.<sup>39</sup>

One week later, Lee Kuan Yaw formally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To smooth away resentment, he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full nam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would b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corporating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Nanyang University ).<sup>40</sup> On May 30, 1990, Lee appointed th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Dr. Tony Tan, the Vice-Chancellor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NUS. On Dr. Tan's appointment, Lee

<sup>35</sup> *Straits Times*, March 16, 1980.

<sup>36</sup> *Straits Times*, April 2, 1980. Lee's accusation was refuted by Professor Anne Johnson's reply. Johnson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many students who did relatively badly at high schools and showed marked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in their four years at Nantah. For Johnson's reply, see *Straits Times*, April 10, 1980.

<sup>37</sup> For the full text of Lee's proposals, see *Straits Times*, *Sin Chow Jit Poh*, *Nanyang Siang Pao*, April 3, 1980.

<sup>38</sup> As late as on April 4, 1980. Mr. Tan Keong Choon, an influential Nantah Council member indicated that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develop Singapore into a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He expressed that he did not think that the proposed merger of two universities was the best policy. For Tan's view, see *Straits Times*, April 4, 1980.

<sup>39</sup> *Straits times*, *Nanyang Siang Pao*, *Sin Chow Jit Poh*, April 13, 1980.

<sup>40</sup> *Straits Times*, May 30, 1980.



said, "His task is to get the NUS going along the lines I have sketched out. He knows my thinking".<sup>41</sup> Three original Nantah Councilmen who opposed the merger in the beginning were appointed Council members of the NUS.<sup>42</sup>

### **Why did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ve to Close Nantah**

To provide college education for the graduates of Chinese high-schools in this regi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unded Nanyang University which reflected the great concern of the Chinese about higher education. The adop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the instruction medium further revealed that cultural attachment to China was very strong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who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tah. During this period, Malaya was still under British rul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for these Malayan Chinese could co-exist peacefully. Historically, thei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grew rapidly as the hostili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eveloped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sup>43</sup>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promoted their political loyalty to China and their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heir Chines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ot only existed side by side but also reinforced each other.<sup>44</sup> Many Malayan Chinese under British rule, did not politically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place where they resided.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Malayan Chinese realized the duplic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the Malayan Chinese, but they did not want to antagonize the "China-oriented" sentiment before they fully controlled the local political conditions. After Singapore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leaders of the PAP started to denounce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made attempts to eliminate the China-oriente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t might well have been due to the historical

<sup>41</sup> *The NUS Campus News*, Vol. 2, October, 1980.

<sup>42</sup> *Nanyang Ta-hsieh Ch'ang-hsiao-shih*, pp. 339-454.

<sup>43</sup>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3-1941*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0); Pang Wing-seng, "The Double-Seventh Incident, 1937: Singapor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No. 2, September, 1973; Stephen Leo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1, 1931-41*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 D. dissertation, 1976); Lee En-hua, "Malayan Chinese Anti-Japanese salvation Movement, 1937-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0, 1985.

<sup>44</sup> Lee Ah-cha,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School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786-1941*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54).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that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Singapore were afraid of the existence of Nantah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base for promoting the China-oriented identities, culturally as well as politically. Furthermore, after its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 in 1966, the survival of Singapore, a Chinese state among the Muslim-Malay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as at stake. Anti-Chinese activities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 created communal unrest in these Malay states and alarmed the "far-sighted" Singapore leaders. The reality of anti-Chinese environments warned them not to be too close to China either culturally or politically.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promote a "Singapore identity". They were well aware that though ethnically the Chinese were the majority group in Singapore, they were a tiny community among the vast Malay masses in this region. Both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dopted a suspicious stand towards the Chinese-dominated Singapore and they we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Chinese chauvinism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might stimulate the racial unrest within their boundaries. To eliminate or at least reduce the hostile attitudes of her neighboring Malay states,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Singapore often stressed her multi-ethnic features.<sup>45</sup> The "Third China" concept was condemned as a conspiracy aiming to destroy the survival of Singapore.<sup>46</sup>

Furthermo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in the early 1940's, the anti-Japanese militia in Malaya, mainly a Chinese organization, was influenced, if not controlled, by the leftists.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thus fostered the development of leftist ideas among Malayan Chine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ia into the Malaya Communist Army after the War, further alarmed many local anti-Communist leaders.<sup>47</sup> Many of them accused t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 not only produced China-oriented political sentiments but also promoted the growth of

---

<sup>45</sup>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dress of "Singapore Girls" either in the Singapore Airlines or in Singapore's T.V. shows has been the Malay batik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sup>46</sup> *Liau-yuan Pao*, Vol. 2, July 2, 1966; Foo Kim-leng, *The 1964 Singapore Riot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0); Anti-Chinese accidents broke out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from time to time. The latest incident occurred in October 1987. Many Chinese leaders who were propon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were arrested. For details, se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8, 29, 1987.

<sup>47</sup> Lee Ting-hui,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1948-66*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6); G. 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1971).

Communitistic concepts. Although it had been difficult to prove the accusation, they tended to believe it. After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mainland China, some of her supporters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Malaya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hinese-speaking Malayan Chinese. These activities further deepened the distrust of local anti-Communist leaders towards the Chinese-educated Chinese. 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re thus regarded as the hotbe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in Malaya and did not coincid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society.<sup>48</sup>

While many political leaders were suspecting the role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the leftist activities among the Nantah students reinforced their distrus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eftist controlled student union, Nantah students had a series of conflicts with the Malaya government and later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With a great effort,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finally eliminated the leftist control over the student union and many dissidents were arrested. The Nantah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dual supervision of the Singapor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the Association of Nantah Graduates gradually adopted some changes to adjust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It started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promote the Singapore identity among the students. In 1974, Nantah and Sintah established a common admission board to administer the admissions. In the eyes of those having prejudice against Nantah, the changes were regarded as Nantah's self-preservation tactics. It was a prevalent view among the policy-makers of Singapore in the 1970's that Nantah had always been and still was the place for promoting Chinese identity, politically as well culturally. Nantah, as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was obviously the main target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olitical dilemma caused by the Chinese educatio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mployed various means to strike at the Chinese schools. All government papers, correspondence, and employment applications were and still are in English.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language gradual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By 1987, there was not a single Chinese school in Singapore.<sup>49</sup>

<sup>48</sup> For detail, see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hapter 3; Lee Ting-hui, *op. cit.*, Chapters 2 and 5; C. V. Devan Nair, ed., *Socialism that Work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Chapters 2 and 3.

<sup>49</sup> In 1956, there were 30, 164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and 25, 073 in English schools. Ten years later,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in Chinese schools decreased to 20, 011, and they increased to

### Why did Nantah Lose the War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tried their best to block the development of Nantah. It was not allowed to be registered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was of course not accredited. Nonetheless,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 made its birth possible. The Fukien Association donated 523 acres of land as the campus whil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lowered their prices to build the buildings.<sup>50</sup> It wa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at Nantah was founded.

By 1980, Singapore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with three fourth of its population Chinese. However, when the survival of Nantah was in danger, few came to rescue her. The change of instruction medium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did not stir up much resentment. The set-up of the Joint Campus, a first step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even won the popular support. Two years later, the merger sugges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little resistance. Why was there such a different response towards Nantah's survival?

First of all,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had changed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Nantah (1956-1980). When Nantah was conceived,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s a whole, were in the mood of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suppression during the WWII stimulated the growth of their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The delay of self-government in the post-War period further created an antagonism betwe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and the conscious awakened Chinese masses in the Malaya area. The lack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for their children reinforced their desire to set up a Chinese university, independent of the control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The refusal to grant the permission and the denuncia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became a challenge to their nationalistic identity.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rried a double strength to help the Malayan Chines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Twenty-five

---

34,827 in English schools. In 1984,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schools reduced to so insignificant and th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announce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ny Chinese school in Singapore by 1987. See *China Times* (a leading Chinese newspaper, published in Taipei), February 20, 1984.

<sup>50</sup> *Nanyang University, 1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p. 14.

years later, Malaya split into two independent countrie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who resided there became citizens of these two newly established states. Although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were racial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y enjoyed much greater politic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than their fathers under the British rule.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enjoyed the full citizenship. The stop of immigration flow from China since 1950 began to change the population component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proportion of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decreased and the majority of Malayan Chinese were born there.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ere no longer the temporary residences but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 object of their political loyalty was thus no longer China but either Singapore or Malaysia.<sup>51</sup> The force which fostered the China-oriented political loyalty and cultural belonging lost its momentum. The Communist revolt in Malaya, though attracted some discontent Malayan Chinese, scared the commercially dominated Chinese community as a whole. The rise of Communist power in China didn't promote the China-oriented sentiments, but sped up the process of tie cut-off. The dream of home-return was thus brok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gradually solidified the local belonging sentiments. The object of political loyalty for many Malayan Chinese thus shifted from China to Singapore or Malaysia, though some of them still maintained a strong sentimental tie with Chinese culture. The changes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subjective identity greatly weakened their support for Nantah.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we may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y the opposition was so powerless whe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step by step coerced Nantah to submerge into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up>52</sup>

---

<sup>51</sup> To many Malayan Chinese, mainland China was their mother land, though few had ever been able to return there. The constant flow of new comers and the China published textbooks for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ften reminded them that they were sojourners in Malaya. The communist took over of mainland China in 1949 and a period of anti-communist policy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after the WW II, cut off the immigration flow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contact.

<sup>52</sup> Nonetheless, in the process of merger,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till showed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attitudes and actions. In Singapore, except few Council members indicated their mild objection to the merg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a whole, supported the decis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which often had an influential position in Singapore, could only announce that it didn't issue a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Nantah question due to the lack of quorum in its emergency meeting to show its mildest protest against government's high-headed policy towards Nantah. In the field of mass media, the government seemed to have a land-slide victory. It was in Malaysia that the dissenting voice could be heard. The graduates of Nantah in Malaysia stood up and opposed the merger. Mos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Malaysia prepared to preserve Nanyang University as a separate University. The Chinese

In retrospect, it might be well due to Lee's skillful and pragmatic management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was closed without much disturbance. Lee's slow but firm actions helped to make the completion of this complicated task possible. At first, Lee's PAP government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n Singapore. Although the "national language" was and still is Malay, both Chinese and Tamil were announced as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government.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Nanyang graduate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ven promised not to change the instruction medium. With a skillful manipulation, the enrollment of the Chines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ingapore declined as time passed.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the late 1970's became the dominant language not only in government but also in academic fields. Lee's PAP government then pushed the "bilingual" policy at Nanyang which in fact required the faculty to teach their classes in English.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appointed Council members and the Vice-Chancellor, Nanyang had in fact become an English university by 1978. After English became the main instruction medium, Lee proposed to set up the Joint Campus to upgrade the English standard of the Nanyang faculty and students in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ppease the Nanyang faculty and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as a whole, Lee openly announced that once the project succeeded, Nanyang students would return to the campus in Jurong.

In the Joint Campus which was in fact in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nyang lost its own identity and its students were detached from its own campus. As it lost, its own features but its graduates would receive government discriminated degrees, the Chinese high-school graduates thus preferred to enter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y 1980, it was clear that not many high-school graduates would choose Nanyang as their first choice.

Meanwhile, from time to time, Lee reminded his people that Singapore should have two universities. He explicitly stat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wo competitive and complementary universities was necessary. Although some doubted his sincerity, Lee's repeated assurance relieved the anxiety over the Nanyang issue and weakened the

---

Chamber of Commerce in Kuala Lumpur even threatened to boycott the trade. But their opposition was mute and couldn't be heard in Singapore for the newspapers from Malaysia were barred from circulation in Singapore. For details, see Straits Times, March 15, 26, 1980.

possible resistance force. When the majority of Nantah students were in the Joint Campus and had never been in Nantah's Jurong campus, Lee went one step forward to reveal a survey report indicating that the Nantah students in the Joint Campus did not want to go back to Jurong.<sup>53</sup> At the same time, Lee launched a surprise attack o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Nantah faculty and blamed Nantah for not being able to attract good students. He then suggested that the only way to save Nantah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To soften the possible objection from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h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Nanyang to satisfy the hard-core Nantah supporters.<sup>54</sup> When the Nantah Council resolved to accept the merger option, the battle was over.<sup>55</sup>

The location of this new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deliberately selected in Kent Ridge, a place between the original Sintah's Bukit Timah campus and Nantah's Jurong campus. All these arrangements at least partially satisfied the sentimental attachment of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in Singapore. The opposition to the merger was thus further softened. The censorship also deprived Nantah of the possible support from Malaysia. 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outside, Nantah became vulnerable under Lee's siege.

### Concluding Remarks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have made great change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owever, it was Lee's government to destroy the already weakened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a-oriented cultural or/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Since Lee and his PAP associates regarded Nantah as the power-house genera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hina-oriented political sentiments, Nantah was thus regarded by them as an obstacle in their nation-building process. The elimination of Nantah from Singapore was therefore a

---

<sup>53</sup> The survey's headline in the newspaper stated, "Joint Campus students were in favor of merger". See *Straits Times*, March 11, 1980. Nonetheless, most of the final year and honors students who had studied in the Jurong campus opposed a merger with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details, see *Straits Times*, April 4, 1980.

<sup>54</sup> *Straits Times*, March 11, 1980.

<sup>55</sup> *Straits Times*, April 6, 1980.

necessary step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ingapore" society. The issues on Nantah, to a certain extent, can thus be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apore identity. The close of Nantah, revealed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under Lee Kuan Yaw was able to transform the Chinese identity into a Singapore identity after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had already changed. Nonetheless, the assault on Nantah might also show that Lee and his PAP associates confused cultural identity with political loyalty. These non-Chinese speaking political leaders in Singapore did not understand that a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might not necessarily produce a China-oriented political loyalty, though the two had been closely interrelated in some cases.<sup>56</sup> Singapore may have to pay a heavy price for the demis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r/and tradition of its citizens in the future.

---

<sup>56</sup> To a great extent,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hina-oriente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r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brought the Malayan Chinese to help China financially rather than politically. For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the Malayan Chinese over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see Hung-ting Ku, "British Colonialism Versu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4, Parts 1 & 2, July, 1989.



## 新加坡「華僑民族主義」的消失：以一九八〇年南洋大學的關閉為例

古鴻廷\*

### 摘 要

海外華僑民族主義意識的興起與發展，為現代史上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課題。民族國家的出現，對民族主義的理念與實踐，有深重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歐美國家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它們的獨立，泰半可歸功於當地民族主義運動者的努力，這些新興國家，對土著民族主義的出現與急速發展，甚為肯定，然而，對華僑民族主義的興起，卻極力反對，這種現象，在東南亞地區尤為明顯。

對中國作政治效忠的意識，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為華僑民族主義的兩大支柱。新、馬地區原為大英帝國之殖民地，英屬馬來亞殖民地政府，在不妨礙其殖民統治前提下，對居留於此地區之華僑，甚少干涉其政、經活動，對當地的中文教育，更是採取放任的態度。二十世紀初期，新馬地區的華僑民族主義，在清廷、立憲派及革命黨三大勢力衝擊下，漸漸興起，兩次大戰期間，更在日本對華大肆侵略，僑教又相當發達的情形下，蓬勃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馬地區的華僑，一方面因中國身列戰後五強而自傲，又因英殖民地政府遲遲不授以殖民地自治地位，而對居留地無法產生認同感。在強烈的華僑民族主義主導下，東南亞華僑在一九五六年創立了「東南亞華人最高學府」——南洋大學。

南洋大學成立後，新加坡、馬來西亞先後獨立，華僑在新加坡成為多數族群，在馬來西亞也泰半成為居留國的公民，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斷絕了華僑回歸「祖國」的希望，在老僑逐漸凋零，土生新僑對中國缺乏認識，中文教育又在新加坡政府刻意打壓下漸漸衰微。華僑民族主義在這種新環境下，自然減退，一九八〇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後，正式關閉，南洋大學的關閉，似可視作新加坡華僑民族主義消失的指標。南洋大學的關閉，似也指出我國僑教今後當採的政策，為讓移民海外的中華兒女能在居留地「落地生根」，海外的中文學校，應著重僑胞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培養，減少鼓勵他們在政治上效忠祖國的活動。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 **A Review of L1 and L2 Reading Theories**

**Chiou-lan Chern\***

### **Abstract**

Theories and models in L1 reviewed in this paper have shown that reading is predominantly viewed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involving readers' use of schemata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L2 reading research reviewed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sights gained from L1 studies, although the debate on whether L1 and L2 reading processes are similar is still unsettled. Most of the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studies reviewed here are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read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review, ESL/EFL teachers will gain insights from theories and develop effective classroom applications.

A 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relevant to the reading of first language (L1) and second language (L2) has revealed tha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eading processes in native and non-native languages are similar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ince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past few years has attempte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first language (L1) reading can explain second language (L2) reading (Hudson, 1982), certain important L1 reading theories will be reviewed first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L1 theory to L2 reading will follow.

### **1. L1 Reading Theories**

Reading is a complex process which cannot be captured by a single definition.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would argue that reading is a rapid, purposeful, interactive comprehending activity (Goodman, 1985; Kintsch & van Dijk, 1978). It is also a flexible process which develops gradually (Grabe, 1991; Smith, 1982). Fluent reading is thought to be rapid because to make comprehension possible, readers must keep information flow at a sufficient rate for symbols and ideas to be connected and

---

\*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processed (Grabe, 1991). Reading is purposeful; people usually read for information or for enjoyment. Goodman (1985) lists five major purposes of reading: environmental reading (e.g., street signs), occupational reading (e.g., memos, business letters), informational reading (e.g., phone numbers, newspapers), recreational reading (e.g., novels, fiction), and ritualistic reading (e.g., some religious materials). That reading is interactive is supported by research that finds background knowledge to interact with printed information (Hudson, 1982) and that many skills work togeth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arr & Levy, 1990). Models in L1 reading developed by different scholars are reviewed in detail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 **1.1 Reading Models**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categories of reading models that are commonly referred to: top-down models, bottom-up models, and interactive models (Barnett, 1989; Cziko, 1980; Rayner & Pollatsek, 1989; Stanovich, 1991). Top-down models, those of Goodman (1968) and Smith (1982), consider reading as a linear process that moves from higher level cognitive stages to the bottom level of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grapheme and phoneme. In bottom-up models (Gough, 1985; LaBerge & Samuels, 1985), reading is described as a one-way flow of information beginning with the visual (graphic) inputs and proceeding through other features of the text like letters,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gradually building up to the high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However, not all reading models view reading as a linear process. Interactive models, such as those of Rumelhart (1985), Stanovich (1980), and Kintsch and van Dijk (1978), view reading as a cyclical process in which readers' cognitive activities interact with textual information. These three models are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 **A. Top-down Models**

Top-down models claim that the reading process is driven by the reader's mind. According to a top-down model, readers actively use their world knowledge to help them make intelligent guesses about the text. These models are represented by

Goodman's and Smith's theories in reading.

Goodman's (1965) psycholinguistic model of reading proposes that reading is an active hypothesis-testing process involving the reader's cognitive, linguistic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Goodman further describes reading as a "psycholinguistic process by which the reader, a language user, reconstructs, as best as he can, a message which has been encoded by a writer as a graphic display" (Goodman, 1971, p. 135). Thus, reading is viewed as a process of hypothesis testing, confirmation and rejection instead of an exact process which depends on accuracy or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all elements. Goodman argues that efficient reading results from "skill in selecting the fewest, most productive clues necessary to produce guesses which are right the first time" (Goodman, 1970, p. 260). He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readers accomplish this process by sampling, relying on the redundancy of the language and their knowledge of linguistic constraints. Readers predict structures, test them against the semantic context they build up from the discourse and then confirm them as they process further language (Goodman, 1971).

Smith (1982) also believes that reading is purposeful and that readers only select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their purposes when they read. Reading is also considered as an anticipatory process by Smith. Because readers normally look for meaning, they bring in nonvisual information like prior knowledge, to interact with the text to facilitate the anticipation of later text content (Smith, 1982).

Both Goodman and Smith consider reading as a reader-driven process. The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reading are, however, not without opposition. Bottom-up models, for example, emphasiz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dures and regard reading as a text-driven process.

#### B. Bottom-up Models

In a bottom-up model, text information has to be processed before comprehension can be achieved. Reading is therefore a process of accumulating and absorbing discrete units of the text to build up meaning. Gough's (1985) theory of reading elaborately describes this model.

Gough argues that the reader is not a guesser. To pin down as completely as possible the events that occur during the first second of reading, Gough (1985) give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ccount of the reading process from the moment printed words enter visual systems. According to Gough, reading begins with an eye fixation for some 250 msec. This saccadic movement sweeps 10 to 12 letter spaces to the right consuming 10 to 23 msec before a new fixation begins. When an initial fixation is achieved, a visual pattern is reflected onto the retina and an intricate sequence of activity in the visual system is set in motion, culmin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an icon, a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a visual stimulus that persists after the stimulus vanishes. When the lines and curves and angles of the first icon are identified as letters, a new icon is created from the next fixation (Gough, 1985). Gough's psycho-physiological point of view sees reading as processing letters serially from left to right and mapping them to systematic rules before being stored in reader's short-term memory. Without explaining how a sentence is understood, Gough states that when enough chunks of words are understood as a sentence, they go to the Place Where Sentences Go When They Are Understood (PWSGWTAU). Acknowledging that fluent readers identify letters quickly, Gough insists that a reader "plods through the sentences letter by letter and word by word" (Gough, 1985, p. 683).

LaBerge and Samuels (1985) have developed an equally detailed model of reading called the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According to these authors, the reading process begins with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visual signal on the sensory surface. The information is then analyzed by a set of specialized feature detectors which extract information about lines, angles, and intersections from the physical stimulus. Most of these feature detectors feed directly into letter codes whose activation results naturally from the convergence of a set of feature detectors. These letter codes then feed into spelling pattern codes which in turn feed into visual codes. Some features map directly onto phonological spelling pattern codes and others directly onto visual word codes. Eventually all features are mapped onto word-meaning codes or word-group-meaning code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odel is the emphasis on atten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automaticity in the reading process. LaBerge and Samuels (1985) presume that readers can probably attend t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Readers, however, can process many things simultaneously if only one of them requires attention. That is to say if decod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an be made automatic, then more attention

can be focused on meaning and text comprehension. Reading will become an automatic process when a reader's attention is shifted from decoding to comprehending.

Both Gough's and LaBerge and Samuel's models indicate a bottom-up process because the basic sequence is from features to letters, to spelling patterns, to visual word representations, to phonological word representations, to word meanings, and finally to word group meanings. Although these models allow different routes for the words to be mapped onto meaning, for example, visual codes can feed directly into word-meaning code without going through phonological word codes, it does not allow higher level processing to influence lower level analysis. W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level processing becomes mutually acceptable in the later versions of these reading theories, they bear some similarity to an interactive model.

### C. Interactive Models

Like top-down models, interactive models of reading are reader-driven. 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linear nature of top-down models, interactive models view reading as a cyclical process and allow higher level cognitive activities to influence lower level perceptual activities. Generally speaking, an interactive model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the text. It also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component skills to achieve fluent reading and full comprehension. To be more specific, an interactive model predicts that recognition of words in context would activate perceptu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cesses simultaneously, while that of words in isolation would only activate the perceptual component unless readers provide their own contextual elaboration (Rumelhart, 1985).

According to Rumelhart, when a reader reads, graphic inputs are registered in a "Visual Information Store" for the "Feature Extraction Device" to sort out important features. These selected features then move into the "Pattern Synthesizer," in which a reader's previous syntactic, semantic, orthographic, and lexical knowledge work together to arrive at a "Most Probable Interpretation" (Rumelhart, 1985, p.735). This reading theory has been expanded by Rumelhart and a group of researchers called the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 group. Rumelhart and McClelland and the PDP Research Group (1986) explain that many diff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and various processes exist in a reader's mind simultaneously and play a part in constraining others

or being constrained. Information is process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of numerous processing units, each sending excitatory and inhibitory signals to other units.

Aside from Rumelhart, Stanovich (1980) also presents an interactive-compensatory model of reading. According to Stanovich, the strength in one processing stage can compensate for weakness in another, regardless of their levels in the processing hierarchy. This model predicts that a reader without enough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topic will rely more heavily on contextual constraints. Poor readers, due to the reliance on conscious contextual facilitation which employs a large amount of attentional cognitive capacity, have little cognitive capacity left for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Stanovich, 1980; 1981).

Another example of an interactive concept of reading has been proposed by Ruddell and Speaker (1985). Four interactive component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The Reader Environment Component includes the immediate textual, conversational, and instructional features used by readers to construct meaning from text. The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Control Component influences text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activating procedures. The 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Component stores readers' schemata related to linguistic, strategic, and world knowledge. The Reader Product Component is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first three components. Like Stanovich's model, all components in Ruddell and Speaker's model function simultaneously during the reading process without any fixed sequence of their operation.

Kintsch and van Dijk's (1978) inferential model looks at comprehension to the exclusion of word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se researchers, propositions in a text a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goal in the form of a schema. The schema controls the macro-operators that transform text into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macropropositions which represent the gist of the text. Macropropositions also determine which micropropositions are relevant to the gist. When stored in long term memory, this representation is the reader's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One interactive model that accounts for comprehension process based on results from eye movement studies is that of Just and Carpenter (1987). Their studies support their assumptions that a reader interprets content words right after seeing them rather than postponing interpretation until more words have been read and that words are

recognized before higher level context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influence lexical access (Just & Carpenter, 1987). Though stressing word identification, this model is interactive because all stages of processing can affect and be affected by the processing of other stages.

Anderson and Pearson (1984) propose a schema-theoretic view of the mental processes in reading. According to them, readers' schemata are the abstract knowledge structures which already exist in memory. There are at least two kinds of schemata: content schemata, that is, knowledge relative to the content domain of the text, and formal schemata, that is, knowledge relative to the rhetorical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f the text. For Anderson and Pearson, readers rely on the knowledge of these schemata to derive meaning. This theory is later expanded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to show that the lack of knowledge in content and formal organizations of a new language can put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comprehension at stake (Carrell, 1987; Hudson, 1982; Malik, 1990; Pritchard, 1990; Steffensen, Joag-dev & Anderson, 1979).

The latest trend in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s of first language reading has been the realization that reading and writing can be mutually reinforcing interactive processes (Flood & Lapp, 1987; Grabe, 1991; Kucer, 1987). Pearson and Tierney's (1984) composing model of reading treats reading as the activ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meaning between a reader and an author. Comprehension is viewed as the act of composing a new version of the text by the reader. A reader has four interactive roles according to Pearson and Tierney: a planner who creates goals and activates prior knowledge appropriate to the text; a composer who fills in gaps in the text with inferences; an editor who examines the interpretations developed by the planner and the composer; and a monitor who directs the work of the planner, composer, and editor. Pearson and Tierney's concept of text reconstruction reiterates Kintsch and van Dijk's (1978) emphasis on text transformation and offers a new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n reading.

As is evident from the above review, interactive models of L1 reading have more recently dominated reading research. To see readers as interactive participants who reconstruct text for meaning has also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theory (Bernhardt, 1991; Swaffar, Arens & Byrnes, 1991). As a result of the



active role of readers emphasized in interactive models of reading, emphasis on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meaning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central to second/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theory and pedagogy.

## **2. Read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last decade has been a fruitful period of time for reading research in a second language. Volumes of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to address L2 reading issues (Barnett, 1989; Bernhardt, 1991; Carrell, Devine, & Eskey, 1988; Huckin, Coady, & Haynes, 1993; Swaffar, Arens & Byrnes, 1991).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issues involving L2 reading have looked for insights from the well-established first language theories and research. However, whether reading in L1 and L2 are similar still remains a controversial issue.

Goodman (1971) claims that learning to read a second language should be easier for those who are already literate in their first language because for all languages, no matter how different they are, the process of reading is similar. However, Coady (1979) emphasizes the dissimilarity of learning to read in L1 and L2. "First, there is the obvious need to lear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void the pitfalls of the native language" (Coady, 1979, p. 12).

Clarke (1979) claims that language competence has a powerful effect on the reader; the good L1 reader's advantage over the poor L1 reader can be reduced when their performance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re compared. The finding that "limited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produces a short-circuit effect on good readers, forcing them to revert to poor reader's strategies" (Clarke, 1979, p. 121), supports Coady's statement about the differences in reading L1 and L2 and thu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ESL readers' good reading skills. Yorio (1971) uses Goodman's basic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ading process to derive four factors involved in reading: (1)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the code); (2) ability to predict or guess in order to make the correct choices; (3) ability to remember the previous cues; and (4) ability to make the necessary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selected cues. When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se factors can cause problems for readers. Specifically, (1) the reader's knowledg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differs from that of a native speaker; (2) the guessing or predicting ability is hampered by the im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3) the wrong or uncertain choices of cues make meaningful association difficult; (4) memory span is shortened because of unfamiliarity with the material, thus making the recollection of previous cues difficult; and (5) at all levels and at all times, there is interference from one's native language (Yorio, 1971). All these factors that relate to linguistic competence put L2 readers at a disadvantage in reading.

Barnett (1989) also points out thre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First, most L2 readers do not have a sound phonological system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L1 readers do. This deficiency means that L2 readers may have difficulty in encoding text into their internal speech as described in the bottom-up model of L1 reading. Second, many L2 readers are already literate in L1 and their L1 reading strateg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opical and formal schemata are generally highly developed. However, some interference from the native language may exist in L2 reading. The third difference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pointed out by Barnett (1989) i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ch can make the activation of appropriate schemata difficult. For example, Steffensen, Joag-dev and Anderson's (1979) study of American and Indian readers reading about weddings of the two cultures found that readers produced more culturally-based distortions when reading the passage about a foreign wedding. A more recent study by Pritchard (1990) also supported the claim that cultural schemata influenced readers' processing strategies and level of comprehension achieved. This schema theory will be reviewed more extensively later in this chapter.

Most L2 theorists regard the reading process as primarily reader-based or conceptually driven, i.e., they believe that readers' purposes, cognitive skills, language proficiency, strategies,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schemata contribute more to comprehension than do graphic,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ymbols of the text itself (Bernhardt, 1986; Carrell, 1988). Following in part the discussion of component skills L1 reading research,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of L2 research includes bottom-up and automaticity studies, schema studies, research in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L2 reading ability, and finally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L2 reading.

### **2.1 Bottom-up and Automaticity**

Som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see whether second language readers rely

heavily on contextual information or use a strictly bottom-up approach to reading. Oller's (1972) study using eye movement photography suggests that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re more attentive to graphic information than are native speakers, which suggests that bottom-up processing is employed more by non-native than native speakers. Macnamara's (1970) and Hosenfeld's (1977) studies also show that second language readers appear to have more difficulty in us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n reading. Haynes' (1984) finding that graphemic analysis of word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SL students in processing the unknown words also suppor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bottom-up processing for L2 readers. Although the results from all the above studies suggest that bottom-up processing of words plays a major role in L2 reading, we need to look at how proficiency in L2 affects this processing.

One common result found in many L2 reading research studies does reflect that less proficient readers appear to be word-bound in reading (Grabe, 1991; Sprenger, 1975).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inguistic model of reading, this word-for-word reading phenomenon is regarded as evidence of slow sampling and incompetent guessing on the reader's part (Goodman, 1985). However, other views of this learner problem argue that poor readers are word-bound because they have not mastered bottom-up processing yet (Eskey, 1988; Grabe, 1991; McLaughlin, 1990; Segalowitz, 1991). The importance of automatic word-recognition has therefore been emphasized as a solution to some reading problems in L2.

## 2.2 Schema Theory

Describing how prior knowledge is used in higher-level comprehension, schema theory is probably the most thoroughly explored theory in L2 reading research (Barnett, 1989). It has recently become a major focus for researching the problems ESL readers may confront (Carrell, 1987; Malik, 1990; Pritchard, 1990; Steffensen, Joag-dev & Anderson, 1979). As discussed earlier, schema-based theory argues that readers process print by using prio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o produce representations of anticipated meaning. The knowledge and representation readers bring to their reading of text may either aid or impede comprehension depending on how closely the readers' experience matches the writers'. Of the two documented types of schemata, Carrell (1987) found that content schemata affec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formal schemata.

### 2.2.1 Content Schemata

Researchers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readers' content schemata on comprehension tend to agree that L2 readers with appropriat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passage understand and recall more of the passage than subjects with less background knowledge (Adams, 1982; Floyd & Carrell, 1987; Johnson, 1982; Lee, 1986; Omaggio, 1979).

Hudson's (1982) research on L2 reading schema theory has shown that a high degree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can overcome linguistic deficiencies. For example, in trying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L1 schema theory to the non-linguistic elements of L2 reading, Hudson claims that while there may be a short-circuit in the application of good reading skills, there will not be a short-circuit in the processing of meaning. This is because "the comprehended meaning of a message is fundamentally dependent upon a reader's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nd analysis of the text, in addition to his/her use of the local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ssage" (Hudson, 1982, p. 7). Hudson's statement attributes many reading problems to the lack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rather than to the lack of linguistic skills.

Walker (1981), however, points out that linguistic knowledge of spelling or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English, as well as of the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systems also helps ESL readers search for meaning in the text. This concept has reminded researchers to look at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 2.2.2 Formal Schemata

Carrell's (1984) study of advanced ESL students' reading processes shows that formal schemata affect comprehension in at least two ways. First, texts with tight organization of compare-contrast, cause-effect and problem-solution appear to be easier for later retrieval of text content than descriptive texts that are loosely organized around a series of facts. Second, as tex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reflected different rhetorical thinking patterns, ESL readers'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of text have been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a rhetorical pattern that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Carrell

(1988) has thus argued that lack of schema activation is one major source of processing difficulty for second language readers. It is also claimed by Carrell (1985) that explicit training in recognizing and analyzing text organiza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recalled. In a study tha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of text and reader schemata, Carrell (1987) concludes that unfamiliar content causes L2 readers more difficulties than does unfamiliar form. However, in the same study, rhetorical form proves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ent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event sequences. It appears that form, content and culture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ext comprehension.

### 2.3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L2 Rea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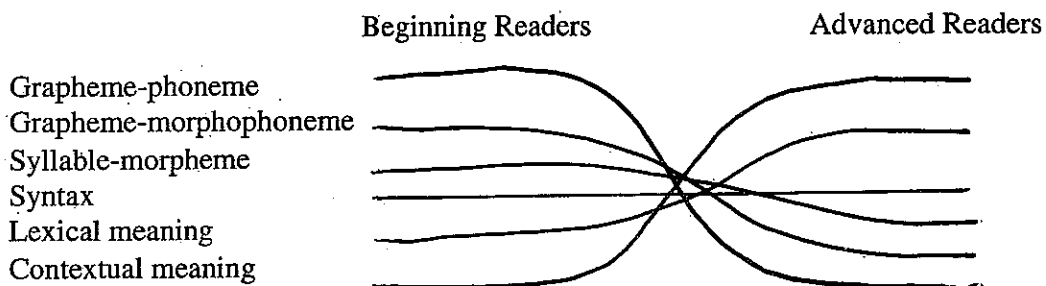
To account for the inherent knowledge of the monitoring and repair strategies available to readers when they read, Casanave (1988)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adding to existing schema theory a third type, strategy schema. Studies that train students to use reading strategies have found that L2 readers provided with reading strategies are able to automatize their higher-level processing skill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untrained readers. Readers trained to use strategies in reading have also been found to use their cognitive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refore comprehend better (Barnett, 1988; Kern, 1988).

Other studies that look at how reader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correlates with reading comprehension have found that read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cognitive strategies have predictive power for their comprehension (Devine, 1984; Padron, Knight & Waxman, 1986). These research studies undertake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echo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es claimed by psycholinguistics. They also have clear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L2 reading instruction.

### 2.4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Applying Goodman's (1970) and Smith's (1982) L1 psycholinguistic models to ESL reading, Coady's (1979) model of L2 reading is the most commonly cited one in L2 reading literature (Bernhardt, 1991). Coady postulates that comprehen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conceptual abilities,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processing

strategies. In describing ESL students' reading models, Coady (1979) lists six process strategies pertinent to reading: (1) grapheme-morphophoneme correspondences, (2) syllable-morpheme information, (3) syntactic information (deep and surface), (4) lexical meaning and contextual meaning, (5) 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6) affective mobilizers.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a typical L2 reader acquires the skills of reading by attending to more concrete process strategies such as phoneme-grapheme correspondences and word meaning, and gradually learn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more abstract strategies such as syntax and context as they become more advanced (Coady, 1979). (See Figure 1.)



Relative change in use of process strategies over time is presented from left to right, e.g., beginning to advanced rea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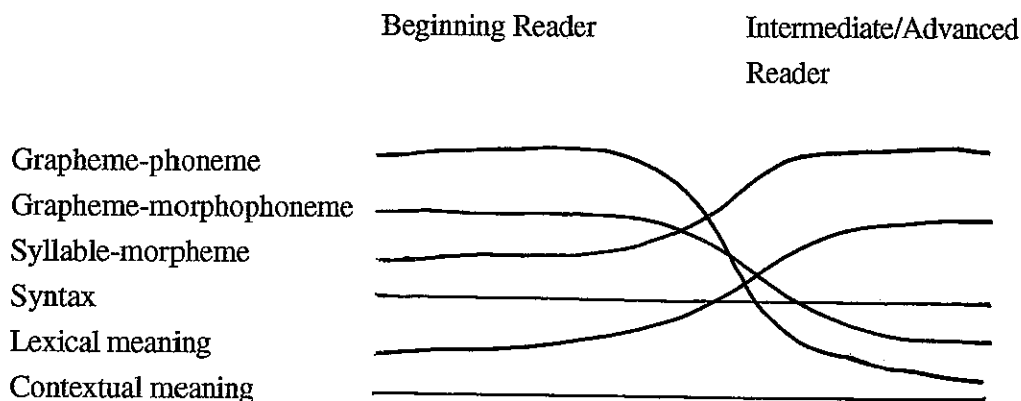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ady's (1979) Model of Process Strategies**

Coady (1979) also suggests that readers shift processing strategies to match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or to achieve different reading goals. Readers also have the capacity to decide which combination of skills is the most effective in a specific text.

Support for this model can be found in Cziko's (1980) study of oral reading errors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French. Cziko found that both native French speakers and advanced students of 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used an interactive strategy of drawing on both orthographic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n reading French, while students with less advanced competence in French did not us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to the same extent and relied primarily on graphic information.

But for Chinese ESL readers, Field (1985) has proposed a different model of reading (Figure 2). Her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ESL readers in China lead her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students have particular difficulty in using those more abstract strategies, even when they have gained a certain mastery over the English language.

Field's model in Figure 2 shows that syllable-morpheme decoding strategies are used most frequently b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readers, while contextual meaning is the least used. This suggests that Chinese students are more sound-centered and word-centered in reading, rather than meaning centered. This model also suggests that decoding strategies used by Chinese readers focus on details rather than overall comprehension. Field's model of Chinese ESL students' process strategies, therefore, suggests why reading in English is difficult and comprehension is low for the students she encountered in China.



**Figure 2.** Field's (1985) Model of Chinese Students' Process Strategies

These 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of L2 reade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urrent interest in individual reader's use of strategies to tackle text (Barnett, 1989).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se strategies transfer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has yet to be answered. Researchers are equally divided in this respect. Those who argue that language proficiency determines reading skills consider expertise in sampling graphic,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the text as essential to efficient top-down reading (Clarke, 1979; Cziko, 1980; Devine, 1981; MacNamara, 1970). The most commonly quoted research in this line of thought is Clarke's (1979) "short-circuit hypothesis." Analyzing ESL students' oral miscues, Clarke found evidence of a language competence ceiling which impeded good L1 readers' attempts to use good reading strategies in L2. This result has been supported by Laufer and Sim (1982, 1985).

Other researchers, however, argue that reading in L2 depends crucially upon the

reading ability in one's L1 rather than upon L2 proficiency (Coady, 1979; Hudson, 1982). According to these researchers, poor L2 readers are either poor L1 readers or those who fail to transfer L1 skills to L2 reading. Coady and Hudson consider high-level processing skills as having the capacity of being transferred. To them, the linguistic ceiling may be only one determinan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onger evidence of L1 skill transfer is found in advanced L2 readers who use L1 strategies (Benedetto, 1984; Hauptman, 1979; Sarig, 1987). Hauptman (1979) states that the English-speaking French students in his study used similar strategi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ncluding the ability and inability to use global cues, the willingness or reluctance to take chances, and the ease or difficulty in processing semantic information.

### References

- Adams, S.J. (1982). Script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unfamiliar vocabulary: Enhanc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skill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66, 155-159.
- Anderson, R.C., & Pearson, P.D. (1984). A schema-theoretic view of 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P.D. Pearson (Ed.),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pp. 252-295). New York: Longman.
- Barnett, M.A. (1989).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enedetto, R.A. (1984).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top-level organization strategi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Five case stud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Bernhardt, E.B. (1986). Cognitive process in L2: An examination of reading behaviors. In J.P. Lantolf, & A. Labarca. (Eds.),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ocus on the classroom* (pp. 35-50). Norwood, NJ: Ablex.
- Bernhardt, E.B. (1991). *Reading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oretical, empirical, & classroom perspectives*. Norwood, NJ: Ablex.



- Carrell, P.L. (1984). The effects of rhetorical organization on ESL readers. *TESOL Quarterly*, 18, 441-469.
- Carrell, P.L. (1985). Facilitating ESL reading by teaching text structure. *TESOL Quarterly*, 19, 727-752.
- Carrell, P.L. (1987). Content and formal schemata in ESL reading. *TESOL Quarterly*, 21, 461-481.
- Carrell, P.L. (1988). Some causes of text-boundness and schema-interference in ESL reading. In P. Carrell, J. Devine, & D. Eskey (Eds.),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pp. 101-1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rell, P.L., Devine, J., & Eskey, D.E. (1988).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M.A. (1979) Reading in Spanish and English: Evidence from adult ESL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29, 121-147.
- Coady, J. (1979). A psycholinguistic model of the ESL reader. In R. Mackay, B. Barkman & R.R. Jordan (Eds.), *Read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pp. 5-12).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Cziko, G.A. (1980).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reading strategies: A comparison of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oral reading errors. *Language Learning*, 30, 101-116.
- Devine, J. (1984). ESL reader's internalized models of the reading process. In J. Handscombe, R. Orem, & B. Taylor (Eds.), *On TESL '83* (pp. 95-108). Washington, DC: TESOL.
- Eskey, D.E. (1988). Holding in the bottom: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the language problems of second language readers. In P.L. Carrell, J. Devine, & D.E. Eskey (Eds.),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pp. 223-2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eld, M.L. (1985). A psycholinguistic model of the Chinese ESL reader. In P. Larson, E.L. Judd & D.S. Messerschmitt (Eds.), *On TESOL '84* (pp. 171-182). Washington, DC: TESOL.
- Flood, J., & Lapp, D. (1987). Reading and writing relationships: Assumptions and directions. In J. Squire (Ed.), *The dynam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pp. 9-26). Urbana, IL: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English.
- Floyd, P., & Carrell, P. (1987). Effects on ESL reading of teaching cultural content schemata. *Language Learning*, 37, 89-108.
- Goodman, K.S. (1965). A cognitive study of cues and miscues in reading. *Elementary English*, 42, 639-643.
- Goodman, K.S. (1968). The psycholinguistic nature of the reading process. In K. Goodman (Ed.), *The psycholinguistic nature of the reading process* (pp.13- 26).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K.S. (1970). Reading: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 In H. Singer & R.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pp. 259-271).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Goodman, K.S. (1971). Psycholinguistic universals in the reading process. In P. Pimsleur & T. Quinn (Eds.), *The psycholog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p. 135-1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K.S. (1985). Unity in reading. In H. Singer & R.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3rd ed.) (pp. 813-840).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Gough, P.B. (1985). One second of reading. In H. Singer & R.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3rd ed.) (pp. 661-686).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Grabe, W. (1991). Current development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research. *TESOL*

*Quarterly*, 25, 375-406.

- Hauptman, P.C. (1979). A comparison of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strategies among English-spea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language Studies Bulletin, Utrecht State University*, 4(2), 173-201.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ED 207 324)
- Haynes, M. (1984). Patterns and perils of guessing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n J. Handscombe, R.A. Orem & B.P. Taylor (Eds.), *On TESOL '83* (pp. 163-176). Washington, DC: TESOL.
- Hosenfeld, C. (1977).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ding strategies of successful and nonsuccessful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System*, 5(2), 110-123.
- Huckin, T.N., Haynes, M.E., & Coady, J. (1993). *Second language and vocabulary acquisition*. Norwood, NJ: Ablex.
- Hudson, T. (1982). The effects of induced schemata on the 'short-circuit' in L2 reading: Non-decoding factors in L2 reading performance. *Language Learning*, 32, 1-31.
- Johnson, P. (1982). Effect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language complexit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ext. *TESOL Quarterly*, 15, 169-181.
- Just, M.A., & Carpenter, P.A. (1987).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Kern, R.G. (1988). *The role of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Kintsch, W., & van Dijk, T.A. (1978). Toward a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5, 363- 394.
- Kucer, S. (1987). The cognitive bas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J. Squire (Ed.), *The dynam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pp. 27- 51). Urbana, IL: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English.

- LaBerge, D., & Samuels, S.J. (1985). Toward a theory of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reading. In H. Singer & R.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 of reading* (3rd ed.) (pp. 689-718.)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Laufer, B., & Sim, D. (1985).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ading threshold needed for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text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8, 405-411.
- Lee, J.F. (1986).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L2 reading.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1, 50-57.
- MacNamara, J. (1970).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ad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two languages. *TESOL Quarterly*, 4, 107-116.
- McLaughlin, B. (1990). Restructur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1, 113-128.
- Oller, J.W., Jr. (1972). Assessing competence in ESL reading. *TESOL Quarterly*, 6, 313-323.
- Omaggio, A.C. (1979). Pictures and seco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Do they help?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2(2), 107-116.
- Padron, Y., Knight, S.L., & Waxman, H.C. (1986). Analyzing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reading strategies. *The Reading Teacher*, 39, 430-433.
- Pritchard, R. (1990).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schemata on reading processing strategie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5, 273-295.
- Rayner, K., & Pollatsek, A. (1989).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Ruddell, R.B., & Speaker, R.B. (1985)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model. In H. Singer & R.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3rd ed.) (pp. 751-793).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Rumelhart, D.E. (1985). Toward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reading. In H. Singer & R.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3rd ed.) (pp. 722-750).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Rumelhart, D.E., & McClelland, J.L., & the PDP Research Group (1986).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Vols 1-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arig, G. (1987). High-level reading in the first an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Some comparative process data. In J. Devine, P.L. Carrell, & D.E. Eskey (Eds.), *Research in reading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p. 107-120). Washington, DC: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 Segalowitz, N. (1991). Does advanced skill in a second language reduce automaticity in the first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41, 59-83.
- Smith, F. (1982). *Understanding reading*. (3r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tanovich, K.E. (1991). Changing models of reading and reading acquisition. In L. Rieben & C. Perfetti (Eds.), *Learning to read: Basic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pp. 19-3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Swaffar, J.K., Arens, K.M., & Byrnes, H. (1991). *Reading for mean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alker, L.J.A. (1981). *Word-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of Spanish-speaking college students in read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Yorio, C.A. (1971). Some sources of reading problem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21, 107-115.

## 母語閱讀與外語閱讀之文獻探討

陳秋蘭\*

### 摘 要

本文探討近二十年來，學者專家對於閱讀過程，閱讀策略所提出之立論。在母語閱讀方面，因心理學家及語言學家所提出的理論，往往可做為外語閱讀學者立論之依據，本文先探討母語閱讀之文獻，再探討外語閱讀之理論，以做為英語閱讀教學之理論基礎。

---

\* 東海大學外文系



## Ancient Indian Poetics: A Brief Survey

Anjan K. Nath\*

### Abstract

The basis and source of inspiration of most Indian literatures lie in Sanskrit literature dating back to antiquity in the works of the grammarian Yaska (c.4 BC) and the dramatist, theorist Bharata (c.2BC-2AD), whose treatise on dramaturgy, the *Natyasastra*, elaborates on the techniques of the theatre, dealing with libretto, stage effects, music, dance, and histrionics. Several schools of thought developed following the discussions of Bharata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the arts became a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much the same as it is today in Western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ies of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Philosophical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language). In the present paper I have endeavoured to cover the most prominent schools of thought in Sanskrit literature and have given general descriptions of their major critical constructs. Some detail of the Rasa school and the concept of the *rasika* has been entered into as this concept pervades Indian literature to this day. Comparisons with western literature has been kept to only a mention at certain places simply to draw out the similarities, which may be obvious to those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The paper concludes by noting that Indi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has tended towards being constructive where the main purpose is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all literatures through the proper use of language. This univers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experience could lead the aesthete--the man with an educated imagination--to a state of super-mundane bliss. Thus Indian poetics is more inclined towards the philosophical and mystical rather than towards the neurological and synaesthetical.

Indian literary tradition is represented and engendered by Sanskrit literature which in turn served as a fountain-head for other literatures within the country. The study of poetics as a discipline occupied a status of its own though there is little material i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that could enable u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poetics to a very remote

---

\*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antiquity. Rajashekhara (c. 900-925 AD) in the *Kavya-mimansa*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divine origin of poetics saying that the " spirit of poetry" (*Kavyapurusa*), born of the goddess of learning Saraswati, was set by the Self-existent Being in order to spread the study of poetics. The frequent, dexterous, imaginatively appropriate, and numerous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Rig Veda* and the critical awareness that the hymns of the *Rig Veda* in general, and the hymns to *Vak* in particular, show, can be taken as the basis for the assumption that poetics had, at least in its elementary form, already developed in the Vedic period. In the *Chandogya Upanishad*, in his conversation with Sanata Kumar, Narada enumerates the subjects he has already mastered and mentions metrics i.e., the study of metrical forms and their suitabilit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onceptual contents as one of the subjects. Th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Upanishadic period certain branches of poetics had acquired the status of a subject to be studied in its own right. In the *Bhagavata Gita* too, Krishna, when identifying himself with the best and the noblest things in the universe, says that among the metrical forms in general is the form known as *gayatri*. And in the *Sama Veda* the metrical form called *vritti* is made use of among the other metrical forms. These are evidence enough to theorize that during the Epic period certain aspects of poetics had developed to such an extent as to lead to a comparative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metrical forms. However, no books are available on the basis of which it could be definitely established as to which particular kind of poetics was considered acceptable during the Vedic, Upanishadic, and Epic ages. Bharata(c.2BC-2AD) is the first Indian theorist whose writings on poetics are available. The present paper has, therefore, to begin like most other writings on the subject with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s postulated by Bharata and the later theorists.<sup>1</sup>

**The Poetic Situation:** Sanskrit aesthetic theories grew out of dramaturgy after Bharata's *Natyasastra* which is a treatise on the techniques of the theatre dealing with libretto, stage effects, music, dance, and histrionics. The discussion of the libretto in the sixteenth chapter forms the basis of poetics, though the earliest discussions on poetics begins with the grammarian Yaska(c.4 BC), where the subject tended to be treated as part of the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hough dramaturgy and

---

<sup>1</sup> While dealing with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include all the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who have written on the various theories, nor have the writers mentioned dealt with chronologically.

poetics have tended to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 dramaturgy being known as **natyasastra** (the study of drama) and poetics as **Kavyakriyakalpa** {technique of composition of *kavya* (poetry)}, but now called **alamkarasastra** on account of the **alamkaras** (figures of speech), regarded by some critics 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poetry -- Bharata uses the term **kavi** (poet) for both poet and dramatist. He maintains that the soul of the creation, whether it be drama or poem, is the aesthetic "art emotion", *rasa*.

In the *Rig Veda* the term *rasa* is generally used in the sense of the juice of the soma plant, but during the Upanishadic period its meaning changed to 'essence' and hence to the highest taste or experience accompanied by joy. In the writings on Indian poetics it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as the super-mundane bliss experienced during the realisation of "self-luminous consciousness" arising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divine. Jagannatha (1620-1665 AD) in his *Rasagangadhara* believes that the *Vedas* also contained germs of the theory of *rasa*, though how far this is tenable is a moot point. It, however, cannot be ignored that the Vedic poets had developed a keen sense of appreciation and love for poetry. The Vedic Aryans had a large number of gods and goddesses in their pantheon "and whatever they wrote or composed about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ceptions of these gods and goddesses were shrouded,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customs, in symbols, similes, parables, and allegories" (Nath, *Rig Veda Summary* xiv). The ancients who were not impressed by anything dissociated from the religious always tried to put every situation into a religious context.

Nations have established and do employ symbols --some obscure, some more intelligible, in order to lead the understanding into things *Divine*. In the same, you must hear the stories about the gods and receive them from such as interpret myths in a reverent and philosophical spirit. (Plutarch)

The rich poetry, the imaginative illustration, and the elevated thought of the *Rig Veda* and the *Upanishads* give evidence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literary sense of the Vedic poets.

N. Subramaniam commented, though erroneously, that criticism is totally unknown to the Sanskrit tradition:

There is warm approval, cold rejection, cynical sarcasm, verbal browbeating... commentators indulging with great gusto in mutual hair-

splitting, but no criticism as such. All texts are sacred. Commentators cut each other's throats, but all of them in a heap fall at the feet of the anonymous authors of the sacred texts. ("Art and Criticism")

Subramaniam, of course, was thinking in terms of typical Western criticism in the tradition of Aristotle and Cicero, when he made comments like: "The extant Sanskrit literature is stereotyped and convention-bound; its authors and patrons look upon the mere verbal jingle as a serious literary virtue." This in a way reflects Cicero's own rebuttal of Socrates for trying to separate wisdom and eloquence: "Hence aros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ongue and the heart, a distinction entirely absurd, useless and reprehensible; as if some would teach us to be wise, and others would make us eloquent" (*De Oratore* III. 32). We may say that the spirit of ancient Indian criticism (and modern Western stylistics) is Socratic in this respect --if for "heart" we read values, attitudes, motives, choice, preference, commitments and for "tongue", speech, literature, the artifact, "the poem itself" (Donoghue, *The Ordinary Universe* 16).

**The Concept of *Rasika*:** The word in Sanskrit which comes closest to the Western concept of a 'critic' is *sahrdya*. *Sahrdya* literally means being of the same or similar heart, i.e., of the same heart as that of the artist. It now has the connotation of a connoisseur, and where the emphasis is on 'heart' (*hrdya*). A *sahrdya* is generally one who has a refined and cultivated literary taste and who is capable of intense feeling and thereby through his criticism, communicates the pleasure he derives from a work of art. Just as a good artist is one who embodies his feelings and emotions in an "objective correlative", a *sahrdya* is one who experiences the same emotion through the objective correlative. And as Viswanatha (c. 1300-1380 AD) observes in his *Sahitya-Darpana*: "While grammarians and philosophers can grasp the meaning of individual words, it is only a *sahrdya* who can recognise the suggested meaning of words and appreciate poetry in its fullness" (261). He is an "experiencer" of the work of art; he recreates in himself and communicates to the reader the original aesthetic pleasure and hence, aesthetic judgement becomes, more or less, the work of art itself.

Besides the *sahrdya*, there is the intellectual critic, the *dosagna* and the *gunagna* who point out the blemishes (*dosas*) and the finer qualities (*gunas*) in a literary tex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categories of critics is that the latter two are essentially pedagogic in their approach (governed by the 'tongue') while the former, the *sahrdya*,

experiences the *rasa*, the essence of the work of art, and is known as a *Rasika* -- or connoisseur. The concept of the *rasika* in Indian poetics is much the same as the concept of the critic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and the analogy is applied towar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work of art, where the aesthetic creation is savoured in a mood of relish and which in turn leads to super-mundane bliss (*brahmananda*) similar to that arising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divine.

**The Rasa School:** Bharata's *Natyasastra*, a treatise on dramaturgy, forms the nucleus for most of the speculations in Indian poetics and, as it was noted earlier, he mak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poet and dramatist maintaining that in both, drama and poetry, "the soul of the creation remains the aesthetic emotion, *rasa*" (Chaitanya, *Sanskrit Poetics* 1).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rasa* operates,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into the constituent parts that go into creating it. Krishna Chaitanya, in his *Sanskrit Poetics* defines *rasa* as the process "when the *vibhavas*, *anubhavas*, and the *vyabhicharibhavas* combine to awaken the *sthayi-bhava*, the awakened *sthayibhava* finally develops into *rasa*" (2). Here the *sthayibhava* may be defined as those significant emotions or rather, the primordial, elemental, basic, everlasting emotions which are relevant to an aesthete. The *sthayibhava* is not activated emotion, but the dormant sentiment which can be aroused by appropriate stimuli. Thus, if we take the erotic sentiment as the *sthayibhava*, a woman and the spring season may operate as the *bibhavas* i.e., the prime stimuli which activate it, the *anubhavas* are the woman's suggestive or responsive glances and gestures, the *vyabhicharibhavas* are the transient feelings, joy in proximity, melancholy in separation, hopes or misgivings about winning -- all of which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to the basic emotive orientation (3).

The *bibhavas* are classified under two heads -- the *alambana* and the *uddipana*. The *alambana* is the focal point for the arousal of emotion, as the woman in the above example, and the *uddipana* is the enhancing stimulus or accessory circumstances like the spring season, the environment etc., which go towards the heightening of the primary focus. The *anubhavas*, i.e., the ensuants are also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the simple and voluntary behaviour like the glances and gestures, and the involuntary expressions (*satvika bhavas*) like the blush, tears, perspiration etc.. The *vyabhichari(sanchari)* *bhavas* are the concomitant or transient, ancillary emotions and where these ancillary emotions create subsidiary or concomitant desires. "Thus, in love, joy in union and

anxiety in separation are ancillary emotions. They are determined in their feeling-tone by the basic emotion and in turn reinforce it" (13).

Bharata mentions eight rasas: the erotic (*sringara*); the heroic (*veer*); the furious (*raudra*); the disgustful (*vibhatsa*); the comic (*hasya*); the marvellous (*adbhut*); the pathetic (*karuna*); the terrible (*bhayanak*). Most of the commentators on the *Natyasastra* like Lollata, and Udbhatta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as laid down by Bharata and maintain the number of rasas as basically eight. A few others, however, lay more stress on a particular rasa. Bhoja stresses on love (*sringara*), whereas Bhavabhuti gives more prominence to pathos (*karuna*) and Narayan Pandit considers wonder (*adbhut*) to b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Inspired by the revival of the Krishna cult, Rupa Goswami (16 AD) described devotion (*bhakti*) as the supreme rasa. Goswami expounded his theory in the *Bhaktirasamrtasindhu* and *Ujjvalanilamani*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his plays (based on the life of Krishna) which were designed to excite devotion to Krishna (the chief "excitant" of emotion). Rudrata (9 AD) includes love (*preya or watsalya*) with reference to affection, inclusive of paternal, filial, and brotherly love in his *Kavyalamkara*. The basic emotion for it is affection (*sneha*). This theory, however,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Abhinavagupta (c.950-960 AD) mentions serenity (*santa*) as a rasa with calmness (*sama*) as the basic emotion and Udbhatta (c.8 AD) and the Jain text *Anuyogadvara Sutra* (c.300 AD) also mention the *santa* rasa along with the shameful (*velanaa*).

Serenity (*santa*) is the rasa of the realisation of the self (*tattvajnana*) corresponding to liberation (*moksha*). This realisation of the self is much the same as the concept of *anatta* in the Pudgalavadin (personalist) controversy within Buddhism which seeks to deny the self in the quest for attaining Nirvana. The true self within is considered to be at one with the *Paramatman* of the universe, where the primary stimulus (*alambana bibhava*) for the experience of serenity is the *Paramatman* (or Brahman) and the accessory circumstances (*uddipana bibhava*) is the universe. Parallels of this view can be found in Western Catholic theism and the Schopenhauerian model for the tragic vision, as well, but perhaps the most illustrative example for our purpose here would be Ludwig Wittgenstein's arguments against the Cartesian model of the self. He claims that the use of the "I" as subject creates the illusion of something bodiless inhabiting the body an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misleading Cartesian model" is that the mind consists of

internal thoughts, feelings, sense impressions, etc., behind which lies the "I". Confronted with this notion of the self as some kind of unitary principle behind sensations or successive perceptions binding them together, he is led to conclude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self and that there is simply a bundle of sensations. The realisation of the "no-self" leads to 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bsolute and the state of such a realisation may be termed as Nirvana.

Whether it is the *Natyasastra* of Bharata, the *Kavyadarsa* of Dandin, or the *Dasarupaka* of Dhananjaya, what strikes one accustomed to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of poetics is the apparent banality with which tragedy is regarded, except perhaps for Bhavabhuti who considered pathos (karuna) as the basic, elemental rasa. This i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ethos of Greek drama that pervades most of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catharsis* of Aristotle finds no place in Sanskrit poetics and the concept of pity (karuna) and fear (bhayanak) in terms of which catharsis is to be understood account for only two of the rasas postulated by Indian theorists. The other instinctual emotions, as recognised by Sigmund Freud and later psychologists, and which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realisation of the remaining rasas were not considered by Aristotle or his followers to be as important as pity and fear. Aristotle identified those two emotions which were significa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gic dramas; the rasa theorists in India tried to identify all the instinctual emotions which were relevant to the creation of a state of bliss in the mind of a rasika.

The concept of tragedy was not so much of a taboo to the Indian poets, as some imagine it to be, as it was a part of a literary tradition where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was primarily to delight -- to lead the self to a state of bliss (*ananda*).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Vedic concept, the soul of an initiate never dies. Even after the life-force leaves his mortal frame, the spirit continues to function as in life directing and guiding the machinery of the universe (*Rigveda* 1-110.4; *Chandogya-Upanishad*-XVIII-12.3); he is a *bhumaa purusha* (universal spirit) in life as well as in death. "The Vedic vision of life was basically a poetic vision" (Nath, "Disposal of the Dead -A Vedic Prescription"<sup>14</sup>) and the reference to the soul as enjoying the rasa of experience (*rasena triptah*) is the germinal beginning which ultimately evolved into the magnificent structure of Vysa's thought as evident from the *Bhagavata*. Even Kalidasa could not break the bounds of tradition. He had to call in the supernatural and put in a seventh act to make Shakuntala

and Dushyanta live happily ever afterwards. Thus *Shakuntala*, which could have been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Sanskrit literature, falls short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ose who fail to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of *rasa* and are wont to consider catharsis as the only enobling and purifying experience.

**The Alamkara School:** Bhamah, Udbhatta, Dandin, Rudrata, and Pratiharenduraja are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lamkara school. According to this school of thought, the most essential element of poetry is *alamkara* (figures of speech), but none of the advocates of the theory refer to it as the soul of poetry even though they lay great emphasis on this aspect. In the *Kavyalamkara*, Bhamaha says that poetry's adornments like *rupakas* (metaphors) are used by poets in different ways and adds that a poem loses its charm if it is stripped of its embellishment. Bhamaha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ordinary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c.f I.A. Richards's "referential" and "emotive" use of language as outlined in his *Principles of Criticism*) and extends his concept of *alamkara* beyond mere figures of speech. He recognises the principles of *rasa* but does not give it much importance. His attitude may be seen as the reconciling of the two opposing schools of thought -- the *rasa* school and the linguistic school -- when he talks of the unity of sound and sense (*sabdharthau sahitaaukavyam*).

Udbhatta was a follower of two opposing schools represented by Bhamaha and Bharata. He begins his *Kavyalamkarasarasamgraha* with the treatment of *alamkaras* and, like Bhamaha, includes the discussion of *rasas* under *alamkaras*. The *alamkaras* are generally used for enhancing the poetic charm and this charm may relate to the emotions or to the expression. The function of the *alamkaras*, therefore, is, primarily to add to the heightening of poetic sensibility and secondarily, to render the expression candid and effective. In the figures *rasavat* (succulent), *preyas* (agreeable), *urjasvi* (mighty), and *samahita* (composed) different feelings, emotions and sentiments are made to function as *alamkaras*. According to Udbhatta, the figures of sense, like metaphor, simile etc. are integral parts of poetical qualities like sweetness and clarity of expression ("melody and diction").

**The Vakrokti School:** While classify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kavya* (poetry), Bhamaha says that the sub-division of poetry are admissible to the larger category of *kavya* in so far as they possess *vakrokti*, where *vakrokti* is ingenious or quaint utterance and stresses that *vakrokti* is desir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dorning poetic speech.

Bhamaha regards vakrokti not as an alamkara but as a characteristic mode of expression which underlies all alamkaras and which form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poetry itself -- whose meaning can be manifested by vakrokti alone, where vakrokti is an act of transcending the commonplace. Bhamaha also talks of *atisayokti*, a term employed to indicate over-semanticisation and not synonymous with vakrokti.

Bhamaha's concept of vakrokti was adopted by Kuntaka (c. 1050 AD), the founder of the Vakrokti school, who developed its implications fully in his *Vakroktijivita*. He takes the term vakrokti<sup>2</sup> a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all poetic figures (*alamkara-samayana-laksana*) and employs it to denote the selection of words and turning of ideas. Thus vakrokti refers to those ingenious utterances which, because of the poet's imagination, acquire a strikingness of expression which is not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tter-of-fact day-to-day use of language. Kuntaka takes a much wider view of the concept of vakrokti as postulated by Bhamaha and includes six types under his scheme: phonological ingenuity; ingenuity concerned with the stem-form of words; ingenuity in the use of affixes; ingenuity in the use of sentences; ingenuity in the arrangement of incidents; ingenuity of total design. Of these, the first four explain the alamkaras in general while the last two are further additions.

Dandin, however, maintains a different stand. He argues that if poetic expression invariably means figurative expression, the *vakrata* (deviation) implied in vakrokti cannot be laid down as the invariant characteristic of poetic figures for it is absent in *avabhavokti* (natural expression) which he insists is a genuine poetic figure. He discards the term vakrokti in favour of another of Bhamaha's terms, *atisayokti* (over semanticisation), and makes it clear that he is using the term in a deeper and broader sense in order to include poetic modality basic to all figures of speech. In Western stylistics, "deviation" as discussed by Hockett, Bloch, and Sapportia is similar to the idea of vakrokti. In the West, however, faults (both, grammatical and metrical) are permissible as part of the deviation, but to Indian theorists faultlessness is a prerequisite to good poetic composition.

**The Dhvani School:** The concept of figurative poetry in Sanskrit literature

<sup>2</sup> The term primarily was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accession of the evocative power by language in poetic expression and only secondarily means embellished utterance if the embellishment indicates additive elements like poetic figures.



grew out of the *Dhvanyaloka* of Anandavardhana. It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Locana* of Abhinavagupta and *Rasagangadhara* of Jaganatha. In Western literature parallels of this movement can be found in the imagist and symbolic poetry of Mallarme, Valery, Ezra Pound, Y.B. Yeats, T.S. Eliot,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Anandavardhana and his followers, suggestive poetry is the best; the Dhvani theory maintaining that dhvani is the major consideration of poetry.

The theory of dhvani arose by analogy by the theorists of the Alamkara school who derived their ideas from the concept of *sphota*, where *sphota* is variously defined as "expression", "concept", or "idea", but later on expanded its definition to include the sounds of a word as a whole and apart from those of its constituent letters.

The several expressed parts of a poem, they held, reveal the unexpressed deeper sense, which is something singular and different from the denotative and indicative elements both in order and in essence, and which is termed the dhvani (literally, sound, echo, tone) or *vyangya artha* (suggested sense) in poetry. (De, *Sanskrit Poetics* 143)

Anandavardhana, however,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d dhvani is sometimes used for the words and letters that reveal the *sphota*. From the concept of "expression", the dhvani theory seeks to take a grammatico-philosoph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function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Thus the main concern is with the linguistic texture of words (*sabda*) which are phonetic entities and their semantic meaning (*artha*). The theorists of this school concede a resonance based on indication (*lakshana-mula dhvani*), but maintain that it is the suggestive power of indication acting autonomously (Chaitanya 123). Another aspect of language, purport (*tatparya*), is also brought into play in order to denote suggestion. Mamata enunciates the *tatparya* theory thus:

When the denotations of words are conn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expectancy (*adamksha*), compatibility (*yogyata*), and proximity (*sannidhi*), another sense arises, called purport, which has a distinct form and which, though not constituting the sense of words, is yet the sense of the sentence. (Chaitanya 123)

If the dhvani theorists shifted the focus of poetic significance from the expressed to the suggested meaning, the expressed meaning was still the factor connoting the suggestive meaning. Suggestion, is then, but one potentiality of metaphor and simile. It is here

that we fi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vakrokti theory and the dhvani theory. Taking an overall view, however, both the theories require that in poetry there must be *loktara-vaicitrya* (transcendental charm) which can be judged only by the man of taste.

**The Riti School:** Both Vamana and Dandin, recognised the presence of the two types of suggested sense (*rasa* and *vastu* or matter-of-fact) and included them in their theories of *Riti*, which led Anandavardhana to comment that the exponents of the Riti school had to propound the *riti* theory out of their failure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dhvani theory (Kane, *History of Sanskrit Poetics* cliii).

Vamana (c.730-850 AD) was the chief exponent of the Riti school of thought. He expostulated that *riti* is the essence of poetry and defined it as "a specified arrangement of words, the term 'specified' referring to distinction according to the qualities possessed which are the cause of charm in poetry, while the figures are ranged as things which add to the charm" (Keith,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381). He goes on to say further that "kavya is appreciated because of embellishment" and "embellishment is another name for charm" -- where the *gunas* (excellences) are the essential cause of charm in poetry. The *guna* is defined as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riti* -- a term Vamana employs in place of Dandin's *marga*. *Riti* being the essence of poetry, the *gunas* represent tho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reate the beauty of poetry, a function which is assigned by Dandin to both the *gunas* and the *alamkaras*.

Dandin, who used the term *marga* for *riti*, did not significantly mention *riti* as the soul of poetry, but recognised the ten *gunas* as the vital elements of the *vaidarbhi marga*. The *gunas* were also recognised by Bharata who considered *vriti*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style) as an addition to the concept of *rasa*. The definitions of the individual *gunas* varied from writer to writer, but the principles remained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 *guna*, therefore, being the coping-stone of poetic expression

... is described as *nitya*, implying that the *alamkara* is *anitya* (alien); the *guna* is the dharma of *riti*, which is the soul (*atman*) of poetry, while the *alamkara* is apparently the dharma of *sabdha* and *artha*, which constitute its body .... the *alamkara* without the *guna* cannot by itself produce the beauty of poetry, which the *guna* can do without the *alamkara*. (De, *Some Problems of Sanskrit Poetics* 11)

**The Aucitya School:** The theory of *Aucitya*, or propriety in speech is one of

the gunas given prominence by Ksemendra (c. 1030-1070 AD). He claims that aucitya's presence is desired in as many as twenty-eight places in a kavya -- word, sentence, meaning of the composition, guna, and alamkara. In his *Aucityavicararacarca*, he defines aucitya as the adaptation of parts of the verse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whole, i.e., to a certain poetic harmony. Anandavardhana held the view that aucitya was an aid to the realisation of rasa, but Ksemendra maintained that the presence of rasas contributes to aucitya or poetic harmony. He extended his theory so as to include not only the alamkaras and gunas, but also the other elements of poetic expression like word, sentence, poem, verb case, gender, number, etc.. He sought to make his theory comprehensive and all inclusive. He accepted the rasas and the theory of dhvani, but did not consider vakrokti; his view was that aucitya infuses life to rasa through the proper choice of the different metres. The Aucitya school, though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Alamkarashastra did not have many followers.

In the Sanskrit tradition there is reference to poetics as being the science of beauty (*saundarya sastra*) where the synonyms for beauty are *saundarya*, *charutva*, *chamatkara*, etc.. This concept, however, is not brought into prominence as it was an accepted norm and part of a tradition where the theoreticians in their writing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aim of art is not so much to teach as to delight, except for Mammata who held a view similar to Sir Philip Sidney's, that delightful teaching is the end of poetry. Since the stress is in the experience of rasa (art emotion) which may find expression through structure, diction, figures of speech, etc., the concept of beauty and poetic action become one. There is no apparent difference between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 taste must reproduce the work of art within itself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judge it, and at that moment aesthetic judgement becomes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creative art itself or, in other words, the muse that resides in the poet and the critic is one and the same.

Croce also held the view that the nature of the poet and critic was the same, but felt that the artist was a greater genius:

The critic will be a small genius: the artist a great genius. The one will have the strength of ten, the other of a hundred. The former in order to raise himself to the aesthetic attitude of the latter, will have need of his assistance; but the nature of both must be the same. In order to judge of Dante we must raise ourselves to his level, but in that moment of

judgement and contemplation, our spirit is one with that of the poet and in that moment we and he are one single thing .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44)

Criticism cannot always be pleasant, it also need not be disparaging, but generally, its tendencies are towards suggesting some form of value judgement. The attitude of Sanskrit poetics, however, remains impartial and is definitely against equating beauty with truth and truth with beauty. Indian art, while taking nature as its principle and point of departure is never realistic in its aim. It is not a mirror to the world, but rather, its aim is to create a new reality. Indian thought had managed a magnificent programmatic ordering of human life by the definition of the four goals of men: economic security (*artha*); the satisfaction of libidinal and aesthetic urges (*kama*); moral living (*dharma*) whose prescription controlled the pursuit of the first two; the liber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moksha*). The consummation of all these ends was a poetic relish and, conversely, poetic experience could achieve the ultimate of all these goals through its own modality (Chaitanya x). Thus art is formulated in terms of its own language and has a separate and valid existence. In spite of its nonrealism, a quality of animism is inherent in Indian art. Gods, heroes, and common men are clearly inhabited by spirit; they possess a vital breath called *prana*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ir images. Even those which are purely mythical or monstrous boast of this inner vitality thereby adding to the *chamatkara* and creating a concept of universalization, the realisation of which leads to the super-mundane bliss of the *sahrdya*. Indian poetics, therefore, with its preoccupation with aesthetics leads more towards the philosophical and mystical rather than towards the neurological and the synaesthetical.

### Works Cited and Bibliography

- Chaitanya, Krishna. *Sanskrit Poetics*.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5.  
 Cicero. *De Oratore*. A.S Wilkins (ed). Lond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2.  
 Croce, Benedito.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D.Ainslie (Tr.). London: Heinemann, 1932.  
 De,S.K. *Sanskrit Poetics*. Calcutta: Firma K.L.M., 1960.  
 ---*Some Problems of Sanskrit Poetics*. Calcutta: Firma K.L.M., 1959.

- Donoghue, Denis. *The Ordinary Univers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 Kane, P.V. *History of Sanskrit Poetic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1.
- Keith, A.B.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 Delhi: OUP, 1922 (1973).
- Nath, R.M. *Rig Veda Summary*. Shillong: Nath Publishers, 1966.
- Nath, R. M. "Disposal of the Dead-A Vedic Prescription." *The Organiser* (July 1964): 14.
- Richards, Glyn.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in Wittgenstein, Hume and Buddhism: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Monist*: 61,1978 [42-55].
- Subrahmanian, K. "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a 'Critic' in Sanskrit Poetic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8, 1978 [368-369].
- Subramaniam, N. "Art and Criticism."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North-Eastern Hill University, India, on 29-10-1977.
- Warder, A.K. *Indian Kavya Literatur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2.

## 古代印度詩學：一個簡述

那安杰\*

### 摘 要

大多數的印度文學，其靈感的基礎與來源是梵文文學。梵文文學可以回溯到遠古時代的文法學家雅斯喀(Yaska, 約西元前四世紀)以及劇作家及理論家波羅多(Bharata, 約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後二世紀)的著作；而後者的《戲劇論》(the *Natyasastra*)詳細論述了劇場的技術，它處理到劇本、舞台效應、音樂、舞蹈及演出等問題。一些學派始依循波羅多的討論而發展出來，藝術的理論批評也因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如同當今西方文壇跟隨維根斯坦，語言哲學及語言學等方面的理論一般。在本文中，我試圖涵蓋了梵文文學中的主要學派並對主要之批判性理論做一描述。對於Rasa學派以及「鑑賞家」(rasika)之概念則予以更多的說明，因為此一概念貫穿印度文學直到今日。本文在某些地方只是以提指的方式指出印度與西方文學的相似處，這些對於熟悉此二者的人應是相當明白的。本文在結論時指出：印度的文學批評及批評理論是傾向於建構性的，其中主要的目的是藉由語言的適切使用而將全部的文學普遍化。這種語言與經驗的普遍化可以引導具備想像力之審美者邁向一個超越世俗的幸福境界。如此，印度詩學是較傾向於哲學的與神秘的，而非具體的與混雜性美感的。

---

\* 東海大學外文系



## You Are What You Eat -- An Anatomy of Ben Jonson's Food-coated Didacticism in *Volpone*

Steven Chen\*

### Abstract

Long time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ticism on *Volpone* has been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nsistency of plot and characters within the frame of the play. Little is mentioned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 Jonson the person and his work.

As a matter of fact, through *Volpone* as an intermediate, Ben Jonson's relationship with his audience is peculiarly personal and direct. According to T. S. Eliot, there is a transfusion of Ben Jonson's personality in most of his works. For one thing, Ben Jonson is very fond of parties; for another, Ben Jonson believes in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a playwright to instruct his audience; and for the other, Ben Jonson despises the opinion of his audience by calling them "the beast." The purpose of this critical trial is to discuss Ben Jonson's personality transfused in *Volpone* as eating motif and animal imagery for moral instruction: man is animal if given to insatiability.

A nineteenth century critic, Edwin Whipple, describes Ben Jonson as a joint product of "English mind and English larder." Jonas A. Barish observes that Ben Jonson often imagines himself as a "host welcoming spectators to a banquet" while presenting his plays. Robert Herrick, one of Ben Jonson's admir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lso praises that Ben Jonson's verse is "lyric feast." Eating is indeed conspicuous in Jonson's works, especially in *Volpone*. I will proceed my discussion by analysing eating in Jonson as a start, followed by an explication of the moral function of eating in *Volpone*.

### Introduction

For nearly four centuries, Ben Jonson has been drawing attention from critics and readers with his didacticism, arbitrariness, pugnacity, and -- his love of eating and

---

\*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drink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personality are all too easily to be dismissed as irrelevant when viewed respectivel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are found correlative under the general heading of satiety in Jonson the person and his works and, vice versa. T. S. Eliot when commenting on Ben Jonson indicates that: ". . . in order to enjoy him [Jonson] at all, we must get to the center of his work and his temperament, and that we must see him unbiased by time, as a contemporary" (15). It is Eliot's belief that a subtle relation exists between Jonson the person and his works, and he goes on to pursue that "The creation of a work of art, we will say the creation of a character in a drama, consis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usion of the personality, or, in a deeper sense, the life of the poet into the character" (21). Following T. S. Eliot's observ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aforesaid correlation by expounding animal imagery and the idea of satiety found both in Jonson the person and his works, which in turn present themselves in a perfect convergence under Jonson's assumption of a didactic role as a playwright in *Volpone*.

### Eating in Jonson

Eating is indeed a very important motif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Yet, if one paragon in the practice of eating motif has to be specified, Ben Jonson surely would qualify to be ranked as one of the nominees. There is a culinary aura in his personality that permeates most of his writings. Robert Adams indicates that eating is "given voice throughout his work to a degree unparalleled" (483). Edward Whipple, a nineteenth century critic, also comments that Jonson "seemed build up mentally as well as bodily, out of beef and sack, mutton and Canary," and thus is a "joint product of English mind and English larder" (Moulton 748). Alongside the line, Jonson's contemporary critic William Drummond also observes that Jonson is very fond of parties and, "drink, . . . is one of the elements in which he liveth" (Moulton 745).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is point, Robert Herrick's "Ode on Jonson" could be viewed as an exemplary impression on Jonson:

Ah Ben!  
Say how, or when  
Shall we thy guests

Meet at those lyric feasts,  
Made at Sun,  
The Dog, the Triple Tun?  
Where we such clusters had As made us nobly wild, not mad;  
And yet each verse of thine  
Outdid the meat, outddid the frolic wine.  
My Ben!  
Or come again,  
Or send to us,  
Thy wit's great overplus . . . .

(Moulton 749)

Here the analogy between verse (in its most general sense) and feast is evident as the phrase "lyric feasts" would imply. Robert Herrick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 physical pleasure of the palate can be metaphorically worked out by the spiritual delight in reading Jonson's verse. In *Discoveries*, Jonson explains that in order to imitate the ancient, a poet should:

feede with Appetite, and hath a Stomache to concoct, devide, and turn all into nourishment. . . , to draw forth out of the best, and choicest flowers, with the Bee and turn all into Honey, worke it into relish, and Savour; make out Imitation sweet.

(qtd. in Clark 111)

As the passage implies, imitation of the ancient has to be undertaken first through reading, but Jonson does not prescribe memorization or internalization that would be involved in actual practice; instead, he counteracts the mental activity of imitation by the action of eating: to "feede with an Appetite. . . and turn all into nourishment." Here Jonson's own opinion is an affirmation sound enough for the metaphor of verse as feast (including eating), whether it be the case of imitation or presentation.

Laying so much emphasis of eating on Jonson from within as well as without would cause misunderstanding to ascribe Jonson as a recipe writer. However, under the general idea of feasting, there exists a sophisticated cuisine behind which the idea of food and drink is attached to human nature such as love, praise, hospitality, greed, etc. In "Song: to Celia," for example, the persona toasts the lady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 . . . / Or leave a kiss but in a cup, / And I'll not ask for wine" (ll.1-4). Here Jonson suggests that the physical intoxication brought by "wine" could be equally derived by leaving "a kiss but in the cup." Wine and love are thus dexterously consummat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tion of the cup as a love bed.

Another analogy of food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s "Inviting a Friend to Supper," in which Jonson tantalizes the acceptance of invitation by saying: ". . . we'll speak our minds amidst our meat" and drink wine "Of which, had Horace or Anacreon tasted, / Their lives, as do their lines, till now had lasted" (ll. 23; 31-2). Through the alliteration of "our mind" and "our meat"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rhyme of "wine" and "line", Ben Jonson has added not only hospitality, admiration for the ancient, but also immortality into the feast. To view it more closely, the phrase "speak[ing] our mind amidst our meat" builds up the linkage between food and hospitality, where as wine and immortality are successfully related in the subjunctive mood assuming Horace's having tasted the wine.

Still another poem no less evident in eating motif is "To Penshurst," nominally dedicated to Sir Philip Sidney's family estate in Kent, but actually to Sidney himself. The theme -- gratitude in cordial praise -- comes flushing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palate. "The painted partridge lies in every field; / And for thy mess is willing to be killed" (ll.27-8). And "gluttony", one of the seven deadly sins in christianity is openly professed when Jonson says: "Here no man tells my cups; nor, standingby, / A Waiter doth my gluttony envy, / But gives me what I call, and let me eat" (ll.66-8). Together the word "gluttony" and the phrase "lets me eat" manifest a typical Jonsonian expression of cordial praise through the extreme opulence of food. Also worth noticing is Jonson's manipulation of holiday mood. The lines, "Thy mount, to which the dryads do resort, / Beneath the broad beech and the chestnut shade," build up a perfect setting for Jonson's celebration of "high feast" (ll. 9-11). Thus good wine, rich food, and holiday mood

constitute Jonson's infatuation with the linkage between feasting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 sensuality in "To Celia"; hospitality in "Inviting a Friend to Supper"; and gratitude in "To Penshurst".

In most of Jonson's plays, eating motif does not take up so great a proportion as it does in his poems, however, its existence is always apparent. In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after old Edward Knowell has pointed out the unfavorable status of poetry in the world's opinion, a dandy, young Knowell cries out:

Opinion? O let gross opinion  
Sink and be damned as deep as Barathrum . . .  
[poetry is now] poor and lame,  
Patched up in remnants and old worn rags,  
*Half starved for want of her particular food, . . .*  
But view her in her glorious ornaments,  
Attired in the majesty of art,  
Set high in spirit with the precious *taste*  
Of *sweet* philosophy, and which is most,  
Crowned with rich tradition of a soul,  
That hates to have her dignity profaned,  
With any *relish* on an earthly thought;  
Oh then how proud a presence doth she bear.  
Then is she like herself, fit to be seen  
Of none but grave and consecrated eyes.

(V.iii.213-33, *underline mine*)

In this passage, the readers witness again the dominance of eating motif. Jonson indicates that the impoverished state of poetry is like a lady "half starved for want of her particular food" (l.217). And the only way to restore her is through "precious taste of philosophy," not "relish on an earthly thought" (ll.221; 224). Eating in such a case merges with Jonson's responsibility as a poet and appears in the form of a dietician's prescription.

Another example is in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same play. When Wellbred invites young Edward Knowell to Florence for an exciting trip, he writes in his invitation:

. . . come over to me, quickly, this morning: I have such a present for thee.  
 . . . One is a Rimer sir, o' your own batch, your own levin. . . . The other  
 -- I will not venter his description with you, till you come, because I would  
 ha'you make hether *with an appetite* .

(I.ii. 80-7, *underline mine*)

Here, the word "appetite" excites not only young Edward's but also the audience's curiosity. Later on, when approached by his cousin, Stephen, a country simpleton, young Edward says something similar again:

What! my wise cossen! Nay, then, Iie furnish our *feast* with one gull more,  
 to'ard the messe. He [Wellbred] writes to me of a brace, and here's one,  
 that's three: O, for a fourth!

(I.iii. 70-3, *underline mine*)

"Appetite" and "feast" thus consistently echo with each other, leaving a conspicuous trace of eating motif. Jonson seems to take so much delight as a host before the complex net of humanity woven by various emotional experiences. Resonance of the similar kind also appears in Robert Adams' comment that Jonson's characters are defined "by their attitude to food and drink" (483). True, however, the readers should never fail to notice that as a host, Jonson is not altogether that jovial: he laughs, drinks, eats, and -- scolds! Take for example *Bartholomew Fair* in which Jonson portrays the English low life in Smithfield, London. Ursula's booth of beer and roast pig serves as the key note of a roisterous eating rhapsody; everyone in the play comes to the fair with more or less an intention to taste Ursula's roast pig. All walks of life in Jonson's day are thus united on a bodily level -- eating and drinking. Jonson seems to suggest that over-indulgence in food and drink tend to suffocate man's reason as Alikei Dick has also pointed out most adequately:

Everyone in the Fair tries by eating food or drinking to the point of *depersonalization* to find out what he "lack." The excessive use of food and wine causes them to be cheated easily. . . . Jonson laughs at them and expects his audience to laugh with him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never debase themselves so much.

(118, *underline mine*)

Using Alik Dick's term "depersonalization" as a bridge, it is now proper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how and to what extent Jonson has depersonalized his characters and, of course, the implied readers.

### **Animal Imagery and Jonson's Assumption of a Didactic Role**

Professor L. C. Knight, while discussing Ben Jonson's moral responsibility as a poet, reveals that since Jonson theorizes his intention to instruct the audience so often, his theory has to be viewed as "something intrinsic and fundamental to his art" (Barish 87). Besides or along with eating motif, I suggest that animal imagery is also "fundamental" to Jonson's art: H. A. Taine once observes that Jonson has "square jaw, enormous cheeks . . . [which are] animal organs as much developed as his intellect" (Moulton 749); Thomas Carlyle also reveal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f a lion" in Jonson (Moulton 748); A nineteenth century critic, Edwin Whiple, describes Jonson as having "a vast animal force in old Ben's self-assertion" with which "he bullies posterity as he bullies his contemporary" (Moulton 748). All these evidences would suffice to give enoug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that animal imagery has played in Jonson's works. Indeed, the references of animal could be deciphered readily and complacently as food items on Jonson's recipe. However, it would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Jonson if the two elements are told apart. William Drummond has recorded a passage of Jonson's speech in expressing his opinion on the essence of jokes: "In short, as vinegar is not accounted good until the wine be corrupted, so jests that are true and natural seldom raise laughter with *the beast, the multitude*" (Adams 389, *underline mine*). Apparently, the multitude whom Jonson has labeled as "beast" is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beast" laugh, "true and natural jests" have to be reprocessed just as good vinegar comes only after "wine be corrupted." The juxtaposition of "vinegar and beast" and "food and

audience" signals out a possibility where Jonson manipulates the animal imagery as not only something to attract his audience but a weapon to instruct them. It is worth noticing that Jonson does not say "until the wine is corrupted"; instead, he says "until the wine be corrupted." In the case of the former, it is a natural process whereas in that of the latter, it means a purposeful reprocessing.

For Jonson, comedies are never intended for pure entertainment or pastime only; they are composed with a strong intention to enlighten the audience. As has been reinforced by Jonson himself in *Discoveries*, the purpose of a comedy is "the same with a tragedy, for they both delight and teach" (qtd. in Adams 388). And he goes on to pursue that comedy is :

Bitter and profitable, this instructs and would inform us; what need we know anything, that are nobly born, more than a hoarce race or hunting match, our day to break with citizens, and such innate mysteries.

(qtd. Adams 388)

"Bitter and profitable" thus denote for Jonson's ultimate concern with the "innate mysteries," which found themselves a sinister playground in *Volpone*.

### ***Volpone*, a Perfect Convergence of Eating Motif, Animal Imagery, and Didacticism.**

*Volpone* is by common consent one of Jonson's most popular plays. Bernard Beckerman, editor of *Five Play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bserves that "of all Jonson's plays, *Volpone* is easily the most popular and accessible" (90). As a masterpiece, however, the comic power of *Volpone* cannot be complacently rooted on its popularity as an entertainment. As Douglas Duncan has put it, *Volpone* succeeds "by being funny and at the same time serious, so that to explain [its] success one must be able to connect the laughter and the thought [it] provoke[s]" (1). According to D. H. Lawrence, besides mirth, the genuine greatness of *Volpone* consists in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being] moral, not aesthetic, not decorative, not pastime, but moral" (Barish

86). Truly indeed, in Jonson's own words, the purpose of *Volpone* is to "inform men in the best reason of living" (Dedication, line 127). Using the moral rigor as a basis, this section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deas of feasting and animality in the light of how Jonson has manipulated them to convey his didactic purpose. Robert Adams once observes that "people on his [Jonson's] stage are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eat, . . . when they are not actually eating, they talk about it" (483). In Celia's words, this gluttony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ir frenzy for fortune, put off honor "beneath the basest circumstance,/ And modesty an exile made, for money" (III.vii.137-8)! Therefore, the eating list of *Volpone*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elucidates the characters' bestial indiscrimination of what they eat. According to Edward Partridge, the ultimate reach of the characters' feeding is "man" preceded by eating animals, "gold, hope, woman as a sexual object, and laughter" (153). For *Volpone*, gold is food. In the rape scene, Volpone says: "Our drink shall be prepared gold and amber" (III.vii.216). In Act one, scene two, hope is compared to a cherry drawn to the legacy hunters' mouths and pulled back again when Volpone says that he "play[s] with their hope, . . . [like] the cherry knock against their lips" (I.i.85-89). Another proof likewise can be found when Volpone says that he has "milked" the legacy hunters' expectation for three years (I.ii.127). Woman as sexual object is also counted as food. When Lady Politic goes to pay Volpone a visit, he cries out:

Now torment on me! Squire her in;  
For she will enter, or dwell here forever. . .  
that my laothing this  
Will quite expel *my appetite to the other* [Celia].

(III.iii.25-29, *underline mine*)

The "appetite" above means sexual desire.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laughter is also edible. "O, 'twill afford me a rare meal of laughter," says Volpone in Act five, scene three when he intends to have Mosca report his death and inflict the legacy-hunters by appointing Mosca as heir. Most shocking of all on the eating list is -- man. What has been a warning in *King Lear* is actually practiced in *Volpone* -- "Humanity must perforce to prey on itself,/ Like monsters of the deep" (IV.ii.49-50). Soon after the play begins, Volpone says: "I wound no earth with plough-shares, fat no beasts/ To feed the



shambles; have no mills for iron,/ Oil, corn, or men, to grind them into powder" (I.i.34-6). And is seconded by Mosca: "No, Sir, nor devour/ Soft prodigals. You shall have some will swallow/ A melting heir . . ." (I.i.41-3). For Volpone, man can be eaten to increase fortune. Later in Act one, scene two, cannibalism is given another portrayal. In the entertaining "play" (within the play), Androgyno sings to please his master that the Puritans "devour flesh and sometimes one another" (I.ii.44). Still another reinforcement of cannibalism appears in Act two, scene one, where Volpone celebrates his art of exploitation: "A diamond? plate? chequins? good morning's purchase./ Why, this is better than rob churches, yet,/ Or fat, by *eating once a month a man*" (I.v.90-2, underline mine). Volpone takes so much delight in eating human flesh till it finally becomes not only the substance to fill his own void, but also the temptation to allure others. For example, human body becomes the medicine to guarantee eternal beauty. In the soap box harangue of Scoto (Volpone's impersonation), "Scoto" says that his portion contains "human fat" (II.ii.153). Besides medicine, human flesh is also tranquilizer for Corvino when Mosca proposes to sell Voltore for "mummia" in order to appease Corvino's fear that Voltore should be made the co-heir. Cannibalism, as the above evidences would show, is put into a wide ranging verbal exhibition. Most adequate indeed is Harold Skulsky's comment on the sheer barbarism: "Only insanity or a desperate urge to survive in time of famine could prompt somebody civilized to eat people; that only a society that isn't civilized would tolerate or honor a custom of people eating" (298). Therefore, eating motif in general, and cannibalism in specific could no longer be taken as theatrical devices for exaggeration, but a warning (wrapped under Jonson's didacticism) against the bestiality in humanity.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food item in my discussion is animal. It ha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animal imagery carries an aesthetic function besides being just a food item. When coaxing Celia to succumb, Volpone says:

We will eat such at a meal.  
 The heads of parrots, tongues of nightingales,  
 The brains of peacocks, and of ostriches,  
 Shall be our food: and, could we get the phoenix,  
 Though nature lost her kind, she were our dish.

(III.vii.200-5)

Animals thus help to heighten carnal desire and "stand[s] for the softest taste and sensuality" (Enck 135).

Besides being as food, animals serve as the bridge for Jonson's implied denunciation. There is theatrical politics to be pointed out. The characters bearing animal names seem to be quite at peace with the complacent audience ready for entertainment. Yet, when the comedy intended as a feast proceeds, and the actors for the pursuit of gold start to feed on one another like animals, the audience's safe identity with man is immediately threatened, and the implication of animals changes from a comic device on a nominal level to one of irritating denunciation. The legitimation of such an argument may be sustained by examining the complex collision of three factors: first, Jonson's fondness for actual feasts; second, his imagination "as a host welcoming his spectators to a banquet" when presenting his play (Barish 5); and third, his hostility against the audience by calling them "the beast" (Adams 389). Jonson's intention is clear: if man fails to perceive or "abuse" the quality --reason-- that makes him a man, he is but an animal. Consequently, animal imagery plays more than a passive role of being just a food item; it is still a weapon for the actors on stage to manipulate one another, and in a broader way of implication -- the means for Jonson to teach his audience. Take for instance Celia and Bonario. Though not named after animals, they are nevertheless named as beasts by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court scene, Bonario is called by his father Corbaccio: "Monster of men, swine, goat, wolf, parricide!/ Speak not, thou viper" (IV.v.112-3). Celia's case is no better. Accused by Corvino of adultery, she is named as a "partridge" which is known to be the most libidinous in the animal kingdom (IV.v.117). Lady Politic also shares a part in abusing Celia as "chameleon" and "hyena" (IV.vi.4). Still another reinforcement in taking man as animal is in Act one, scene three when Mosca explains to Volpone the booming prospect of their cheating industry, saying: "Hood an ass with revered purple,/ So you can hide his two ambitious ears,/ And he shall pass for a cathedral doctor" (I.ii.110-113). An ass (animal) can pass for a cathedral doctor (man) if it has a hood of the "revered purple" (gold).

### **Collective Humanity As the Target of *Volpone***

Nearly at the end of *Volpone's* Dedication, Jonson assuredly predicts the timelessness of the play. Good works, Jonson argues, "shall live, and be read, till the wretches die, as things worst deserving of themselves in/ chief, and then of all mankind" (Dedication, ll.163-5). To attach universality as well as eternity seemed to have been Jonson's ready expectation when the play was being composed. In Act one, scene two, Volpone says: "This draws new clients daily to my house,/ *Women and men of every sex and age* . . . to engross me whole" (I.ii.76-6;82, *underline mine*). The phrase "*Women and men of every sex and age*" indicates clearly Jonson's intention in instructing each and every human being. In the proposed banquet for Celia, the scope of collective humanity is further implied by the idea of nationality:

Then will I have thee in more modern forms,  
 Attired like some sprightly dame of *France*,  
 Brave *Tuscan* lady, or proud *Spanish* beauty;  
 Sometimes, unto the *Persian* Sophy's wife,  
 Or the Grand Signor's mistress; and, for change,  
 To one of our most artful courtesans,  
 Or some quick *Negro*, or cold *Russian*.

(iii.vii.226-33, *underline mine*)

The proposal to put Celia into different attires is, I venture to suggest, analogous to Jonson's ambition in making *Volpone* true not only of Jonson's England, Volpone's Italy, but also of all mankind and in all time.

*Volpone* is an amalgam of extreme mirth and morality. As Jonas Barish indicates, the audience often "had difficulty specifying the grounds of his [Jonson's] greatness even though they were firmly convinced of it [*Volpone*]" (13). Indeed, as a comedy, *Volpone* bewilders the audience with its genre indication of being comic and thematic implication of being dark. The second Avocatore cries out in Act five, scene ten: "This same's a labyrinth," seeing Bonario and Celia as plaintiffs turned into defendants and then restored back again (V.x.43). The puzzle of the second Avocatore may symbolize the puzzle of the audie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play. In trying to solve the puzzle, my discussion has focused on the eating inclination and the idea of animality found in

Jonson's personality. According to Jonson himself in the Dedication, the play is composed without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to offend anybody, but actually does, and in an undeniable way. The characters, as T. S. Eliot understands, are not real characters in the usual sense of drama, but "constituents" (21). If so, the stage of *Volpon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heart of each individual where a possible crime is participated with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however reluctantly), punished, and -- purged. Richard Dutton puts this most adequately:

We must recognize and overcome within ourselves the weakness and blindness that might allow a *Volpone* to flourish . . . [and] get over the temptation simply to sneer at the likes of Corbaccio and Voltore, and to recognize what there is of a Corbaccio and Voltore within ourselves (73).

True, as a masterpiece, *Volpone* is not significant to only particular audience at a particular time. Although the play was produced to improve upon the Elizabethan audience's "appetite for novelty and vulgarity" (Adams 483), it actually has been eliciting gusto in all ages with its dominant eating motif.

Nearly at the end of *Volpone*, the first Avocatore declares:

Now you begin,  
When crimes are done, and past, and to be punished,  
To think what your crime are: away with them!  
Let all that see these vices thus rewarded.  
Take heart, and love to study 'em! Mischiefs feed  
Like beasts, till they be fat, and then they bleed.

(V.xii.148-52)

The phrase "feed like beasts" conveys the basic key note of the eating strategy of *Volpone*. Interestingly, in usual cases, only virtues can be rewarded, but here Jonson says "vices thus rewarded." There is a blank for the audience to fill. "Vices," I venture to suggest, have to be reprocessed into virtues after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and can be only "thus rewarded." Just as what has been proposed in James English's "The Laughing Reader: a New Direction for Studies of the Comic," the

audience has to "make continual, often minute adjustments of perception" to complete the context of a play, which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Volpone*. In the dedication to the "two famous University" in 1607 quarto, Jonson clearly indicates that *Volpone* is no "foul and unwashed bawdry as is now made *food* of the scene" (l.63, *underline mine*). And the duty of a comic poet, as he goes on to pursue, is to "imitate justice, and instruct life" (ll.141-2). As the above discussion would justify, although eating motif has been common in most of Jonson's plays and poems, it is different in *Volpone*. For instance, in "Inviting a Friend to Supper," the feast is held in balance of "reason and appetite" nourishing the participants' bodies as well as their mind (MacCanles 201). *Volpone*, however, contains no apparent reason among the characters. Appetite is aggravated by a stronger yet appetite, making the characters envisage their world purely in terms of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although apparent reason seems lacking, an implied one is embedded throughout. In the Prologue of the play, Jonson indicates:

Now, luck God send us, and a little wit  
Will serve, to make our play hit;  
According to the *palate of the season*.  
Here is rhyme, *not empty of reason* . . .  
Wherewith, he'll rub your cheeks, till (red with laughter)  
They shall look fresh, a week after.

(Prologue 1-4;35-6, *underline mine*)

The term "palates of the reason" indicates that the play is meant as food or an occasion that contains food, which is a feast. *Volpone*'s bidding good-bye at the end of the play also serves as a reinforcement of food implication: "The seasoning of a play is the applause" (V.xii.153). This consistent implication of feast "from cover to cover" contains a perverted logic in which reason is purposefully meant. Usually, "seasoning" is done before a meal, but it appears in the end. Jonson seems to suggest that to physically attend the performance does not mean one has eaten something. As the phrases in the beginning have indicated and would justify -- "not empty of reason" and "fresh a week after" -- the real feast, a spiritual one has to wait until one goes home, carrying his reason. Indeed, *Volpone* is such a challenging masterpiece that only a ruminative and alert reading could cope with. Throughout the whole play and by

different mouthpieces, Jonson's intention is carefully concealed here and there. In the mounteback scene, "Scoto" (Jonson) sentences that "to be a fool born is a disease incurable" (II.ii.214). Lady Politic (Jonson) encourages Volpone (the audience) to "encounter [the play] with reason" when "passions do rebel" (III.iv.102-3). "Volpone and Mosca," John Sweeney indicates, "act in a way that allows them to become spectators" (74). It is just because of the identity in being spectators that invites the audience to identify with Volpone and Mosca "with intelligent enjoyment of the game being played and excitement heightened by awareness of its threat" (Duncan 155). However, the final scene proves "the spectators" to be as vulnerable as their gold-motivated "actors." If the audience feel somehow repelled, the irritation arises not so much from the fact that Volpone and Mosca are punished as sinners, but as spectators.

According to Ad de Vries' *Dictionary of Symbols and Imagery*, eating is "man's first primal activity of materialistic existence" (156). Through the manipulation of eating motif, Jonson has successfully portrayed a distorted picture of eating with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in man's "materialistic existence" -- money -- and makes man resemble beast. As is also made evident in *Everyman in His Humour*, the only way for Jonson as a dramatist to rid of the human vices is through theatrical laughter:

When she [comedy] would show an image of the times,  
Andd sport with human follies, not with crimes  
Except, we make 'em such by loving still  
Our popular errors, when we know they're ill.  
I mean such errors as you'll all confess  
By *laughing at them*, they deserve no less:  
Which when you heartily do, there's *hope left them*,  
You that have so graced *monsters* may like *men*.

(Prologue 19-27, *underline mine*)

Knowing so well the susceptibility to vice in human nature, Jonson indicates that if the audience know what they laugh at is "ill," there lies the salvation to avoid becoming

"monsters." Edmund Waller's hyperbolism in "Upon Ben Jonson" strikes a cord of concordance in this respect:

Narcissus, cozened by the flattering well  
Which nothing could but of his beauty tell,  
Had here, discovering the deformed estate  
Of his fond mind, preserved himself with hate.

(ll. 16-20)

I believe that Narcissus would not have "preserved himself with hate," because, having discovered "the deformed estate/ Of his fond mind," he might perhaps love himself better.

*Volpone* is thus a sophisticated Jonsonian culmination of eating motif, animal imagery, and didacticism. Though apparently *Volpone* seems a play "To please the belly, and the groin" as Mosca has put it (III.i.19), it is meant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den/ Of villainy" in Bonario's (and certainly Jonson's) words (III.vii.273-4).

### Works Cited

\* *Volpone* is first acted in 1606 at the Globe by the King's Men; first published in 1607 in quarto by Thomas Thorpe, printer unknown. The adopted edition for this paper is from Bernard Beckerman's *Five Play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dams, Robert M., ed. *Ben Jonson's Plays and Masques*. N. Y.: Norton, 1979.

Barish Jonas A. "The Double Plot in *Volpone*." *Jonson: Volpone, A Case Book*. Ed. Jonas A. Barish. Hong Kong: MacMillan, 1985. 100-117.

Beckerman, Bernard, ed. *Five Play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ntario: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3.

Clark, Ira. "Ben Jonson's Imitation." *Criticism* 20.2 (1978): 107-128.

Dick, Alike Lafkidou. *Paedeia through Laughter*. Hague, the Netherlands: Mouton, 1974.

- Duncan, Douglas. *Ben Jonson and the Lucianic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9.
- Dutton, Richard. *Ben Jonson: to the First Folio*.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3.
- Eliot, T. S. "Ben Jonson." *Jons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Jonas A. Barish.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3. 21-36.
- Enck, John J. "Jonson and the Comic Truth." *Jonson: Volpone, A Case Book*. Ed. Jonas A. Barish. Hong Kong: MacMillan, 1985. 133-149.
- English, James F. "The Laughing Reader: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Studies of the Comic." *Genre* 19.2 (1986): 129-155.
- Knight, L. C. "Drama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nson." Ed. Jonas A. Barish. *Jonson: Volpone, A Case Book*. Hong Kong: MacMillan, 1985. 79-87.
- McCanles, Michael. "Festival in Jonsonian Comedy." *Renaissance Drama* 8 (1977): 203-211.
- Moulton, Charles Wells, ed. *The Libra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Authors*. Cla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59.
- Partridge, Edward B. "The Broken Compass." *Jonson: Volpone, A Case Book*. Ed. Jonas A. Barish. Hong Kong: MacMillan, 1985. 150-157.
- Shakespeare, William. *King Lear*. Ed. Kenneth Muir. London: Methuen, 1975.
- Skulsky, Harold. "Cannibals vs. Demons in *Volpon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3.3 (1973): 291-309.
- Sweeney III, John Gordon. *Jons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Public Thea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5.
- . "Volpone and the Theater of Self-Interest."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2.2 (1982): 220-241.
- Vries, Ad. de, ed. *Dictionary of Symbols and Imager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 吃什麼像什麼－剖析班強生狐伯尼一劇中以食物爲糖衣的說教色彩

陳順龍\*

### 摘 要

飲食是生命賴以維續之重要行爲，亦爲文學上之重要母題 (motif)。但是，卻也因其重要性被視爲太理所當然，所以飲食母題 (eating motif) 受到的探討不多，有亦屬鳳毛麟角。班強生 (Ben Jonson) 在英國文學史上以喜歡宴飲爲人所矚目；爲文時更自視爲宴會之東道，而讀者觀眾爲食客。

動物爲飲食上的一大主體。巧的是，班強生其形高大，爲人霸氣，評論家咸認爲其氣質上有動物般的活力；而更巧的是，「動物」一詞非唯被用來形容班強生，亦被班強生用來指稱讀者觀眾一稱其爲禽獸，有待教化！

職是之故，班強生其人，其作品，飲食母題，與動物意象四者之間便存在著極微妙的關係。本文擬從班強生的「好吃」，與其作品中飲食母題充斥的現象著手探討，繼而闡述狐伯尼一劇中，班氏如何巧妙經營飲食母題與動物意象二者之組合，達到教化劇場觀眾與讀者的目的。

飲食、動物、與飲食動物之間的微妙關係，就班強生與讀者觀眾而言，都應該是寓意深遠的。

---

\* 東海大學外文系

## 福沢諭吉の平等觀の二面性

陶長君\*

### 摘 要

本論的目的在探討福澤諭吉平等思想的二面性。即由先天的自然法則及後天的學二方面來對其平等思想所起的作用做一統合地把握，從而理解其思想架構的論理性及一貫性；以檢視配合當時國際情勢下福澤諭吉言論的真義。

#### 1、はじめに

本論は福沢諭吉の平等觀の二面性についてそれが生じて来る原因を「天」の思想から検討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福沢諭吉の平等觀のよく表れているのは、『学問のすすめ』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て福沢諭吉の言う平等がある限界を持つという例として『脱亜論』（1）があげられる。福沢諭吉には国内レベルと国外レベルの二面性があることは、早に指摘されている（2）が、一人の思想家の思想的矛盾である（3）として片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問題がここにはある。むしろ、一時代を代表するような思想家が自己矛盾を放置するとは考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あり、論理的一貫性を持つものとして捉えなおすことが必要であると考ええる。

#### 2、『学問のすすめ』に見られる平等觀

福沢諭吉が明治新政府の進歩性に信頼を抱きはじめ、彼自身が積極的に社会と文明の改造に取り組みはじめたのは、明治4年頃である。

絶遠の東洋に一新文明国を開き、東に日本西に英国と、相對して後れをとらぬよ

---

註（1）『時事新報』「脱亜論」1885年3月16日の社説に掲げられた。

（2）『服部之総著作集』第6巻、理論社1955年、83頁、や「明治初期の『対外観』」坂野潤治『日本外交の思想』有斐閣1982年、11頁。

（3）坂野潤治「明治初期の『対外観』」『日本外交の思想』有斐閣1982年

うになれないものでもない、ここに第二の誓願を起す。(4)

この誓願によって、『学問のすすめ』が執筆される。明治4年には明治政府によって廃藩置県が実施され、次々と新たな改革が進められていた時であった。福沢諭吉は、新政府が開明的であるものなら、自らはさらにその先を進もうと考えていた。彼の意味する「文明」とは既にその概念の中に西洋文明の意が含まれていた事を忘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日本は後進の国であり、外からの衝撃によって眼を覚まされた。そのために、早く富国強兵を図らねばならない。西洋と互する「文明」を会得せねばならない。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文明論の概略』が書かれている。その際、西洋心酔におぼれ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も確かに主張されている。すべて日本のものは悪く、西洋のものは秀れているとする軽薄な議論が横行していることを批判し、『学問のすすめ』の第十五篇では、疑いの精神をもって是々非々の判断を行う必要性を強調している。外からの衝撃に対し、内からこれをはねかえす力に日本は乏しい。この内からの力を養うものが、独立の原則であり、独立を支える根拠が平等であると福沢諭吉は考えているのである。

江戸時代、即ち幕藩時代の日本は士農工商という身分制度が厳格に維持されていた。人々は士農工商の出自によって、やはり士農工商それぞれの家業を継がねばならなかった。同時期の中国の士大夫階層や客家などといった身分的社会的階層意識に比べても、なお厳しいものがあった。それが故に逆に日本では、町人文化の発達や、町人思想の進展による町人道の成立がみられ、近代化への一つの礎を形成したことが指摘できるものの、身分意識の面から見ると命令が習慣化しており、下からの力の盛り上がりには欠けていた。日本人の、上からの意志に唯々諾々と従うという身分制度から来る意識は、新時代「明治」になっても抜き難く存していたのであった。

福沢諭吉は日本国の内なる、しかも平民からの力こそが、真に新しい社会をつくると考えていた。その場合の社会の構成員である個人が独立して、その力を集めて富国強兵するという基本発想は、西洋近代思想の中核である。即ち、文明の基本ルールは、西洋の近代の始まりとともに始まった。個人中心的な考えを把みとしているもの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

一方、福沢諭吉の本を読み福沢諭吉に学ぶ当時の日本人の側からしてみると、「四民平等」(5)は何故行われたのかという、「平等」の理念をわかりやすく知ることのできる書物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学問のすすめ』は当時の大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り、当時の日本の人口3千5百万のうち160人に1人がこの本を読んだと言われる。22万弱の人が読んだ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が、この数字は現代の日本にその

---

註 (4) 『福翁自伝』明治4年の記述。

(5) 1869年に行われた封建的身分制度の撤廃をさす。華族・士族・平民の3族籍に再編された。

##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の二面性

まま持ってきても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る数字である。

「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と言えり。(6)

この言は『学問のすすめ』の冒頭に出てくる有名な一節である。この言こそ、日本人に衝撃を与えた平等の思想の宣言でもあった。この言を字義通りに解するならば、人間には上下関係は存しないこととなるが、現実の社会は、上下の差の「その有様雲と泥との相違あるに似たる」(7)という状況にある。差が生じる因は「学」と「智」に求められる。このことは、機会を改めて述べるが、差は後天的なものであって、先天的には、上下がない、という把握に注目せねばならない。

### 3、福沢諭吉における「天」

平等観が「天」に由来するとすれば、今求められるものは、福沢諭吉における「天」とは何か、という問題の検討である。

福沢諭吉の先の一節は、引用を示す「」のマークで繰られている。これが何処からの引用であるかは、福沢諭吉自身は明示していない。しかし、諸研究者によって、アメリカ独立宣言の引用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る。(8)即ち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の福沢流の解釈であるとされる。この場合、createdは普通は「創られた」と訳される。独立宣言のこの語の主体は、当然Godである。福沢諭吉はあえてこれを「天」と訳す。「神」と訳した場合、日本的な神と誤解する者もあることが考えられる。福沢諭吉自体は、日本的な「神」については、これを軽視していることを述べてはばからない。

幼少のときから神様がこわいだの、仏様がありがたいだのいうことはちよいともない。卜筮・呪詛、いっさい不信仰で、狐狸がつ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はじめからばかにして少しも信じない(9)。

このような例からも福沢諭吉の反伝統精神を読みとることができる。『福翁自伝』には稲荷の神体を取り捨て、代わりの石を入れた、とか、神札を便所に使ったとかの記述が散見し、日本の「神」について何をか言わんやと言わんばかりの態度である。西洋のキリスト教的「神」又は「上帝」については『覚書』に、西洋諸国の人民は、上帝を信仰する心が強いために、科学的精神に欠けている。ところが日本の人民には超世俗的な上帝を信じるものが少ないとして次のように言う。

註 (6)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冒頭。

(7)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冒頭。

(8) 『日本の名著』「福沢諭吉」補注484頁等に述べられている。

(9) 『福翁自伝』「稲荷様の神体を見る。」

命を言わざる者はサイヤンスに入りやすし。日本固有の徳なり。(10)

「上帝」「神」について肯定的には把えていないことがわかる。超世俗的なものを排する態度から実務。実学を重んずる精神を読みと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日本的「神」にせよ、西洋キリスト教的「神」「上帝」にせよ、訳語として登場させることは、福沢諭吉の精神からして良しとできなかったに他ならない。又、「神」と訳されていれば、大部分の日本人にとっても受け入れ難いものとなったはずである。福沢諭吉は超越存在をもって平等の根拠とすることを認めなかった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事は、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について重要な示唆を与える。西洋に平等の意識が生れるのは、上帝についての根拠があればこそであった。絶対的超越者である全能の神の視点からすれば、人間の才の大小の差など無に等しい。即ち、神の視座からして人間は被造物として平等なのである。しかも人間には、「生めよ殖やせよ地に満てよ」(11)として万物を治める権能が神より与えられている。人であれば、人種・民族を越えて、それぞれが付与されている人権を持ち、その故に平等が存する。福沢諭吉にはこうした、絶対的平等観というものが欠けていた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従って常に相対的、時局的な平等観が述べられ、二面性を感じさせずにはおられなくなるのである。むしろ、「智」による不平等を是認してい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故にこそ、「脱亜論」の主張も登場可能になる。

先に「天」は「神」「上帝」のかわりに用いられた用語であると述べたが、では、「天」にはGodに変わる、如何なる性格が付与されてあるのかの検討が要される。

「天」なる用語自体は言う迄もなく儒教の概念による。しかし、福沢諭吉は儒教的概念でこれを用いていない。福沢諭吉の「天」に儒教的性格が全くな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天より人を生ずる」(12)という謂は、儒教で言う「天生民」「天生蒸民」の謂と同じものを彷彿とさせる。福沢諭吉には深い儒教の素養があった。

私の父は漢学者で、身分は私と同じであることから(13)

白石の塾にいて漢書はいかなるものを読んだかと申すと、経書をもっぱらにして論語、孟子はもちろん、すべて経義の研究を努め……(略)……(14)

福沢諭吉は漢学を深く修めていたから、儒教の「鬼神は敬して之を遠ざく」精神をよく知り、儒教のこうした合理的な面は評価するものの、同時に知るが故にあえて漢学を敵とする言辞を多くした。自らも「漢学が不信仰になった」と言い、「漢学に重きを置かぬ」「いわゆる獅子身中の虫で、漢学のためには私は実に悪い外道である。」

註 (10) 『福沢諭吉全集』「覚書」。

(11) 『聖書』「創世記」。

(12)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13) 『福翁自伝』「父母の遺伝」。

(14) 『福翁自伝』「左伝通読十一遍」。

##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の二面性

「私が漢学を敵にしたのは」(15)と言い、腐儒の腐説を攻撃して止むことがない。開国の時節にあたって漢説を脱却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福沢諭吉の「天」には、儒教的な性格はあっても、それがすべてではない。又、当時の日本の知識人の素養が儒教であった事を考え、知識人の説得という要請から「天」の語を選んだというのではない。福沢諭吉のもの言いからすると、迎合はするはずもない。

## 4、「天」の合理的意味

すると福沢諭吉の「天」に付与せられてある新しい性格は何かを用例から探ることになる。福沢諭吉が「天」という用語にある法則性を持たせていることは次の例に明らかである。

一夫多妻はまったく天理に反している。(16)

天の道理に基づき人の情に従い、他人の妨げをなさずしてわが一身の自由を達することなり。(17)

人たる者は天の正道に従うをもって職分とす。(18)

天より定めたる法に従いて、分限を越えざること緊要なるのみ。(19)

こうした場合、天理、天の道理、天の正道、天の法、という、天の法則性に言及している用例を見ると、そこには「分限を守る」ことに集約される、何らかの規制が働いていることに気付かされる。その規制とは、我も他人も相互にその働きを妨げない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一夫が妻を多く得たいというのは、情欲の行き過ぎであって、男対女の比が22対20であるが故に一夫一婦が天理であると言うのである。情欲の行き過ぎを抑え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ることになる。「自由」は「他人の妨」をなさぬことによって得られるものである。注意を要するのは、結婚を認めないとかは言わぬことであって情欲の存することも天による。「人の天性」(20)という言い方で欲望を表現してもいる。情欲のあることは天性で、限りなき情欲を伸長してしまうことが天理でないことになる。

福沢諭吉における「天」とは、「天然」の意であると解せば、妥当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次の例がある。

人の生まるるは天の然らしむるところにて人力にあらず。この人々互いに相敬愛

註 (15) 『福翁自伝』「数理と独立」の部分からいずれも引用した。

(16) 『福翁自伝』八編。

(17)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18) 『学問のすすめ』七編。

(19) 『学問のすすめ』八編。

(20) 『学問のすすめ』十編。

しておのその職分を尽くし互いに相妨ぐることなき所以は、もと同類の人間にして一天を与にし、ともに与に天地の間の造物なればなり。(21)

正理を守りて身を棄つるとは、天の道理を信じて疑わず……(略)……理のあるところはこの論によりてすでに明らかなれば、天然の人心これに服せざるな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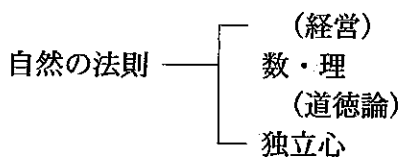
(22)

この例でも、天理・正理を言いながら、相手を妨げないことが述べられる。天理に従いながら情欲を慰める限りにおいて、不徳ではないと言う箇所もある。(23) 即ち、「天然」は「自然」と同意であって、人が生れること、情欲の存すること等すべて、「おのづからしかり」であることである。情欲のあるがままは是認されるが、情欲の行きすぎは、おのづからしかるところに反するのである。そして、おのづからしかりて、あるがままにあることは、人には誰にも認められることであるから、他者の自然を、別なる者が妨げることは、自然を損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この故に、相手を妨げることは天理にそぐわない。相手を妨げないところに天理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その初めから相對觀の中に天理が存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人が生れること、情欲のあること、男と女の出生比が定まっていること等は、自然の働きであって、これは人によって変わ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ながら人が、自らの働きを実際に現実に用いるに当っては、相手を妨げるか、否かによってその是非が定まってくる。元より、実学・実務を言う福沢諭吉であるから、その主眼は如何に自由を持ちつつ、権利を行使できるかにある。相手を妨げない限りにおいて欲望の達成、手段の選択に絶対なるものはなく、いかなる方策も許される。天そのものは相對でないとしても、その行使に絶対なるものは存しない。

福沢諭吉は、教育主義の所で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元来私の教育主義は自然の原則に重きを置いて、数と理とこの二つのものを本にして、人間万事有形の経営はすべてソレカラ割り出して行きたい。…(略)…東洋になきものは、有形において数理学と、無形において独立心と、この二点である。(24) 教育と学問を同じものとして把えと、次のように図示できよう。



- 
- 註 (21) 『学問のすすめ』二編。  
 (22) 『学問のすすめ』七編。  
 (23) 『学問のすすめ』十三編。  
 (24) 『福翁自伝』教育方針。

##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の二面性

ここにある自然の原則を、天理と置き換えて読む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さて、冒頭に「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の言を引いたが、この平等観に流れているものは、天理そのものは自ら然りてあるものであっても、その運用にあたっては、相手に応じ、時局に応じ、相対的に変わ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絶対に犯されてはならぬ手段があるのではなく、相手を妨げないかぎりにおいて、自己の伸長は、可能な限り認められるのである。こうして、「脱亜論」の成立する、その論理が既に、「天」の考え方の中に存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できる。相手に応じ、時局に応じ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は、「実利の点からみて、合理的、合目的に働きうる原理である」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が、福沢諭吉に、限界ある平等観を持たせる原因となっていると言うことも、同時に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福沢諭吉は平等を言うが、それは日本を「文明国」にしようとの意図のもとに言われるものである。従属することは「文明国」たる資格を持つことにならない。独立するためには、国と国が対等にあらねばならない。この対等の概念にあたるのが、平等の思想である。福沢諭吉の「平等」は「天」の概念の下にあり、この「天」は自然の原則と置き換えることが可能なものである。それぞれがあるがままにあることを認める。このことから、他が他を妨害しないことが求められて来る。「妨害」しないこと、この点において、制限があるのであり、本来的、絶対的な、価値として、考えられているものではない。故に、後に『脱亜論』が生じてくる因がここ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 5、現実世界で立場の不平等が存する根拠

先に私は福沢諭吉の「天」に由来する平等観の根拠について述べた。福沢諭吉における平等とは、おのづからしかる存在である人それぞれにおいて、あるがままにあることが、他者から妨げられずに継続することであることを述べた。しかも、福沢諭吉においては、相手との相対関係において是非が決ま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も述べた。

相対関係において是非が決まると述べたが、実は、現実世界にあって、平等ならざる事態があることも、実は福沢諭吉には容認せられている。福沢諭吉において、平等は先天的に「ある」ものとしては意識されるが、後天的に「なる」ものとしては、把握されていない。『脱亜論』に見られる、アジア軽視的な考え方は、対等に相手を見ないところに表れている。対等でないところに平等はありえない。では何を根拠に福沢諭吉は、現実世界の立場の不平等を容認しているのか、そして、その生じてくる原因は何であろうか。

現実世界に不平等が存していること、これは福沢諭吉も認めている。彼の論は、「そう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認めても、「それをなくそう」という方向には発想しない。



「それはどうして生じているか」そのために「そうならぬようどうするか」の方向に論が進められてゆく。

福沢諭吉は人間世界に賢愚・貧富・貴賤のあることを認めている。(25)これが「天」の根拠からして不正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マルクス流の、乃至はキリスト教流の不正解消への思想なり活動が生ずるであろう。しかし福沢諭吉の「天」は「そうある」即ち「自然」としての根拠であって、「そうなる」べきという、当為への根拠とはなっていない。即ち、天の当然として、現実世界の差異が認めら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訳語は西洋のものであっても、訳されて自らのものとなっている思想はもはや西洋のものではない。福沢諭吉の言う根拠は、「学問を勤めて物事をよく知る」か否かにある。(26)人は生まれながらに貴賤・貧富の差なし、と福沢諭吉は言う。しかしこれは生まれた瞬間、及び、生れ出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語るのみの言である。一度生れれば、人は富貴の家に生れた者は富貴に、貧賤の家に生まれた者は貧賤に育たねばならぬ事については触れられていない。しかも続けて「ただ学問を勤めて物事をよく知る者は」貴人となり富人となり、「無学なる者は」貧人となり下人となると言うのである。福沢諭吉の「学」とは言う迄もなく「実学」を意味する。実生活に役立つ学の意であってここから富人になるという言が出ている。身分が重く貴いとは、「世の中のむずかしき仕事」を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具体的には、医者・学者・政府の役人・大なる商売をする町人・あまたの奉公人を召し使う大百姓などをさす。さすがに、天皇や大名、旧貴族などのことは示していない。「仕事」というが故である。

さて、注目すべきは、福沢諭吉の言う「実学」の中味である。具体的には、まず、いろは四十七文字、手紙の文言、帳合いの仕方、算盤、天秤が入門となる。次いで、「地理学」「究理学」「歴史」「経済学」「修身学」が挙げられる。(27)このうち「修身学」の説明に、「身の行いを修め、人に交わり、この世を渡るべき天然の道理を述べたるものなり。」と述べている所を見ると、「天然の道理」とは、人と交わるに際しての理と捉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平等とは、人と交わる際に存するもので、人と離れて「理」のあるものではない。すると、人を越えた絶対の「理」でなく、相待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ここからも知られる。

註 (25) 「今、広くこの人間世界を見渡すに、かしこき人あり、おろかなる人あり、貧しきもあり、富めるもあり、貴人もあり、下人もありて……」『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26) 「されば前にも言えるとおおり、人は生まれながらにして貴賤・貧富の別なし。ただ学問を勤めて物事をよく知る者は貴人となり富人となり、無学なる者は貧人となり下人となるなり」『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27)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の二面性

ることが少なくなるからである。

では、福沢諭吉は東アジアの国をどう把握していたのか。『脱亜論』には中国すなわち「支那」と韓国すなわち「朝鮮」が近隣の二国として登場する。そして次のように言う。

其支那朝鮮に接するの法も、隣国なるが故にとて特別の会釈に及ばず、正に西洋人が之に接するの風に從て処分す可きのみ。(35)

『脱亜論』は『時事新報』の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号に掲載された。従って、ここに表れている東アジア観は1885年の状況把握によるものである。福沢諭吉の東アジア観は、年代によって、又、中国と韓国によって異な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すでに指摘されている所である。(36)この当時は対朝鮮関係で言うと、10年前の1875年に江華島事件が日本軍の手で起こされ、朝鮮朝の鎖国政策を打ち破らせることになった。1876年この方針のもと日朝修好条規が締結され、日本はこれまで西洋諸国からせまられた不平等条約を、朝鮮に対してつきつける態度に出た。1874年には征韓論は政府主流から退けられていたものが、一挙に国策として表舞台に出てくることになる。自由民権運動の高まりの視野を外に向けさせることに役立つとも目された。事実、自由党も1884年には国権拡張論の論説を掲げ、対外拡張を主張する。反政府運動を展開する自由党ですらこうである。1882年には朝鮮政府部内で親清派による(大院君を中心とする)一派が、親日派(閔妃を中心とする)一派に対する焼き打ちをするという壬午の変が起こり、日本は済物浦条約で朝鮮に迫った。その頃、福沢諭吉のもとには、朴泳孝・金玉均らの独立派の政治家が学を乞いに來ていた。福沢諭吉は彼らを可愛がったようである。一八八四年、甲申事変が起こる。その主謀者は、金玉均であった。彼らは独立党という、まさに福沢諭吉の主張する「独立」の名を冠した党を組織していたのだった。しかし、清国軍の介入によって金玉均は亡命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る。福沢諭吉は、朝鮮において近代化を図ろうとした勢力、しかも自らのかかわった勢力が朝鮮において、つぶされたことを知り救いがたいと感ずる。こうして、彼は自らの立場を変えることになる。それは状況が変わったとの判断に依るのである。

一方、対中国関係では、朝鮮の帰属をめぐる、日本は争うことになる。甲申事変に介入し、これをつぶしたのは清であり、福沢諭吉の目には、清は文明化をはばむものとして映ずる。こうした中国観の表れは、次の文にも読みとれる。

支那人などのごとく、わが国よりほかに国なきごとく、外国の人を見ればひとくちに夷狄夷狄と唱え、四足にてあるく畜類のようにこれを賤めこれを嫌い、自国

註 (35) 『脱亜論』『時事新報』1885年3月16日に出ている。

(36) 坂野潤治「明治初期の『対外観』」『日本外交の思想』有斐閣1982年。

「学」の肝要は「分限を知る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る。天の道理に基づき人の情に従い、他人の妨げをなさずしてわが一身の自由を達することを意味する。自由とわがまとの界は他人の妨げをなすとなさざるとの間にあると言うのであるから、わが一身の自由とは、わが望むところのものごとが、その望み通りに達せられることをいうことになる。その是非は「他人を妨げる」か否かにかかっている。天理人情にさえ叶うことならば、一命をも抛ちて争うことが認められている。相手が我を妨げるという条件があれば、争いも認められることになる。「学」ある者は、「自由を達せ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自由」は「学」が存してこそあることになる。

逆に「無学」の者は「憐れむべく悪むべきもの」とであるとされる。そして福沢諭吉は次のように言う。

かかる愚民を支配するにはとても道理をもって論すべき方便なければ、ただ威をもって畏すのみ。(28)

学なきものは学あるものから支配され、威をもって畏されることになる。学なきものに自由はない。福沢諭吉の念頭には、西洋によって日本が畏されるものとならぬように、「学ばね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福沢が、人間と国家を同様のものとして考えている事を確認しておこう。

自由独立のことは人の一身にあるのみならず、一国の上にもあることなり。(29)

人の一身も一国も、天の道理に基づきて、不羈自由なるものなれば、もしこの一国の自由を妨げんとする者あらば世界万国を敵とするも恐るるに足らず、この一身を妨げんとする者あらば政府の官吏も憚るに足らず。(30)

この例から福沢諭吉においては人のつきあいと、国のつきあいとは同じ道理に則って考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が確認できる。人があるがままの性によって、行動したいように行動することは認められていた。国においても、国としてありたいようにあることが認められる。人は他を妨げない限り、自由を達せられる。国も他国を妨げない限り、自由独立を達せられる。逆に人は他から妨げられれば争うことができる。国も他国から妨げられれば他国と争う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が平等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前提が平等であっても現実として平等でいるためには、「学」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無学の者は他から支配され畏し導かれる。無学の国は他国から支配され畏し導かれる。逆に言えば、学ある国は他国を支配し、畏し導くことになる。注意せ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は、畏しかつ滅して良い、とは言っていないことである。しかも福沢諭吉自

註 (28)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29)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30)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身、暴力を嫌うことは、『福翁自伝』にある所(31)からもわかる。従って、学のない国といえどもその存立まで奪おうとは福沢諭吉は考え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とはいうものの、国と国との関係にあって、実際はその外交は武力を背景に畏すものである。こうして實際上、福沢諭吉は国が国を制することを認めることになる。こうした考えの延長線上にあるものが『脱亜論』である。そして、国の「学」とは文明を意味することを忘れてはならない。

文明とは人の知恵の外に見われたるものなり。(32)

文明に前後あれば前なる者は後なる者を制し、後なる者は前なる者に制せられるの理なり。(33)

そもそも『学問のすすめ』が「絶遠の東洋に一新文明国を開き、東に日本西に英国と、相對して後れをとらぬように」(34)と誓願を起こして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を考えあわせると、福沢諭吉の求めていたのは文明国になるための学で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る。こうして、現実世界で立場の差が生ずるのは、文明のあるなしがその根拠として挙げられ、文明が先んじていれば他国を制するもやむを得ず、文明が後れていれば他国に制せられるもやむを得ないとしてこれが容認せ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だからといって日本が他国に制せられることは望まず、制せられぬために「学をすすめ」よとの主張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た。

## 6、『脱亜論』に見られる不平等

前項において述べたことは、文明が後れている国は文明が進んでいる国に制せられてもやむを得ないと福沢諭吉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あった。そして他国を制し制せらる根拠は文明のあるなしであるという事であった。さらに、平等の根拠である「天」が、対人(国にあっては対国)の関係においてあるもので、時と状況によって「相手を妨げない」ところで是非の成立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した。

「相手を妨げる」という事も、相手の程度に拠るものである。相手が文明国であれば、当然、実学も発達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り、妨げられる度合は少なくなる。逆に相手が文明国でなければ、妨げられる度合が大きくなる。自らが妨げ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知

---

註 (31) 「ツイゾ人と掴み合つたの、打つたの打たれたのということはちよいともない。これは少年のときばかりでない。少年の時分から老年の今日に至るまで、私の手は怒りに乗じて人の身体に触れたことはない。」『福翁自伝』「喜怒色に顯わさず」。

(32) 『文明論の概略』「文明の本旨を論ず」。

(33) 『文明論の概略』「自国の独立を論ず」。

(34) 『福翁自伝』明治四年の項。

の力をも計らずしてみだりに外国人を追い払わんとし、かえってその夷狄に窘めらるるなどの始末は、実に国の分限を知らず、一人の身の上にて言えば天然の自由を達せずしてわがまま放蕩に陥る者と言うべし。(37)

この文は1872年に書かれているが、こうした中国の旧弊を指摘する方向はそのまま維持されてきていた。1885年当時は日本はまだ清に対して、強国であるとの恐れを抱いている。このことは、福沢諭吉においても同じであって、1894年に始まる日清戦争に日本が勝利を収めたときに、福沢諭吉が手ばなしの喜びようを表出するところにも表れている。清が日本に敵対関係にあることは、福沢諭吉にも十分意識されていた。敵対と言うのは、勿論、朝鮮問題をなかだちとしてである。

1885年当時、朝鮮は清によって征圧されかかり、独立自由を抑える旧い力の代表として清が意識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て、福沢諭吉は路線の転換を図ったとされるのが定説である。則ち、アジアの盟主論からアジア侵略への道であると。

しかしながら、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から考えると、そこにはさほど大きな転換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時と状況により変化に対応した方策がとられてもかまわないのであって、アジアを保護しつつ盟主となる、と言ったところで、アジアを植民地とし、その地の民を教導すると言ったところで、学(すなわち文明)ある国や人間が、学なき国や人間を畏し、制してもやむなしとする行き方は異なるものではない。福沢諭吉にとって、朝鮮は、独立し、平等ある国となろうと努力する学ある人々を弾圧してしまう、無智にして乱暴に及んだ国であった。清は、そうした無智の国、朝鮮を背後で線るわがままの国であった。「他者を妨げる国」と映ることになる。そうした把握になれば、これを日本が文明国化すれば、支配し、制してかまわないことになる。1885年当時、日本がかなり文明化していることを福沢諭吉は各所で言及している。こうして見ると、『脱亜論』が「一人の思想家の思想的矛盾」(38)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は首肯されるであろう。

## 7、「学」の重視の生因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について、次の二面が指摘できる。一つは、おのづからしかるものとしての「天」の理であるところの平等である。これは「そう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て、当為のものではない。もう一つは、差を生じさせている理としての「学」である。この両者は福沢諭吉の言を借りれば、「権理通義」の理と、「有様」の

註 (37)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38) 坂野潤治「明治初期の『対外観』」『日本外交の思想』有斐閣1982年。

##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の二面性

理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39) 人の命には軽重はないが、有様は異な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言い方もする。おのづから然りてあるものはあるものとして尊重される。しかしその自由は、学の到達度によって分限を異にし、各人は分限に安んずべきである。これも文明であるとする。しかりてあるものと、「学」の程度によって自由の度も決まるという理の面での (機会の) 平等が、そこには考えられてある。

しかし、人間社会の差等は福沢諭吉の言う「学」のみによって生じるものでない事は、改めて持ち出す迄もあるまい。勿論、福沢諭吉の「学」・「実学」は単に学ぶことや机上の学問のみ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実証・実験・実践・発明、そして実用を越えるもの (40) だとされる。しかしながら、学ぶこと・学ぶ態度の重視がそこにあることは変わるものではない。

学の重視が起ってくる原因は、福沢諭吉の学ぶ態度と不離である。

ついぞ枕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のは時は何時でもかまわぬ、ほとんど昼夜の区別はない、日が暮れたからといって寝ようとも思わず、しきりに書を読んでいる。読書にくだびれ眠くなってくれば、机の上に突っ伏して眠るか、あるいは床の間の床縁を枕にして寝るか、ついぞ本当に蒲団を敷いて夜具をかけて枕をし寝るなどということは、ただの一度もしたことがない。 (41)

西洋日進の書を読むことは日本国中の人にはできないことだ、自分たちの仲間に限ってこんなことができる、貧乏をしても難渋をしても、粗衣粗食、一見みるかげもない貧書生でありながら、知力思想の活発高尚なることは王侯貴人も眼下に見下すという気位で、ただむずかしければおもしろい、苦中有樂、苦即樂という境遇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 (42)

「学ぶ」ことそのものに中毒したかの如くの記述である。しかも、そのことに優越感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容易に読みとれる。学の姿の畏敬を感じるが、しかし、そこにこうした、学ぶ者の優越感が見え隠れすることには注意を要する。「王侯貴人も見下す気位」に、「学」あれば貴人であるとの記述と通ずるものを見出すことはたやすい。優越感の裏がえしは「見下す」態度である。

頼山陽などもはなはだ信じない。……まことに目下に見下して (43)

私は客などがウジャウジャ酒を飲むのは大きらい。「俗な奴らだ。」 (44)

註 (39) 『学問のすすめ』「初編」。

(40) 丸山真男「福沢に於ける実学の転回」『東洋文化研究』昭和22年3月。

(41) 『福翁自伝』「塾生の勉強」。

(42) 『福翁自伝』「大阪書生の特色」。

(43) 『福翁自伝』。

(44) 『福翁自伝』「青天白日に徳利」。

これは牛屋の主人から穢多のように見込まれたのでしょう。(45)

福沢諭吉には、俗なもの、旧体にしがみつくもの、学のないものを嫌う傾向が見られる。福沢諭吉自身に意識されない差別的傾向がなかったとは言い切れない面がある。同じ日本人に対してもあるこうした意識が、自分の知人の亡命をきっかけに認識する朝鮮、中国に対して無くなるものではなかろう。むしろ増幅され、「悪友」の表現と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る。(46) 現代の目から見て、差別と感じられるものが、当時の目からして、差別と感じら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それは一人福沢諭吉の問題ではない。まさに「自由」を標榜する自由党ですら、対外伸長を唱えた時代であった。

又、そのことと不離のものとしてあるのが、愛国の想いである。

わが国は無事の日にあらず、しかもそのことは昔年に比してさらに困難なりとは、まさに外国交際のこの困難病のことなり。一片の本心において私有をも生命をも抛つべき場所とは、まさに外国交際のこの場所なり。(47)

1885年の状況として、朝鮮をめぐる清と争うに至るとすれば、西洋の文明と対外政策に習うに如かずという結論に達するのも無理もない。それも一策として考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稿を改めて論ずることとしたい。福沢諭吉における意図せざる差別的傾向と、愛国の想いから来る日本中心の発想とには、時代の制約という問題がつきまとうことを改めて指摘しておきたい。

## 9、まとめ

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は「権理通義」としての天理と、「有様」の理としての「学」による理との二面があり、「有様」の理としての「学」の面から差等が是認されていることをのべた。人と国のつきあいは、同様の理で扱われ、学ぶ者が、制し支配するというのである。こうした考えは学に専心した者の優越感と愛国心からも来るものである。差等を失くせと言うのではなく、現に差等があるのであるから、日本は「学」によって文明化し、他を制し、支配するもやむなきことになる。それは当時の朝鮮・清について、古い価値観にしばられているものという状況把握がなされていたことにも一因する。脱亜論の一見、差別的論調は、福沢諭吉の平等観に由来している点からも整理できるものである。

註 (45) 『福翁自伝』「豚を殺す」。

(46) 『脱亜論』「我れは心に於いて亜細亜東方の悪友を謝絶するものなり」。

(47) 『文明論の概略』「自国の独立を論ず」。

